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通史·近代卷(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世界通史

第一章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在世界历史上，在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那就是 16 世纪末的尼德兰革命。但是，它的影响是微小的，而且革命的结果，尼德兰并没有走上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则第一次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推翻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次革命也推动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在英国革命期间及革命后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也促进了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兴起。因此，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革命的背景

（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

早在 15 世纪末，在英国东部及西南地区就开始了圈地运动。这个运动到 16 世纪末及 17 世纪初更加猛烈了，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促成的。第一，到 16 世纪末，由于工业的发展及城市的成长，增加了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于是原料品及粮食价格扶摇直上。在这个情况下，经营生产粮食的大农场是有利可图的，这就推动地主投入圈地运动的热潮。第二，到 17 世纪初，封建的习惯地租与资本主义地租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地主看到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比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对自己更为有利。这也是刺激地主进行疯狂的圈地的重要因素。

圈地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后果。第一，它实现了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农民）与生产手段（土地）分离的过程，使英国成为原始积累的典型国家。脱离土地的农民一方面为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为工业创造了市场，因为农民消失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过程。第二，圈地的结果，在英国农村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剥削过渡到农业资本家对农业工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地主在圈地之后，往往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有的则自己经营资本主义农场，一变而为农业资本家。农业资本家在大规模的农场上采用雇佣劳动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农场在经济上相当于工业中的手工工场。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的地主所得的地租已经不是封建地租，而是资本主义地租了。资本主义地租是建立在剥削农业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的，农业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因此，地主便成了农业工人的间接的剥削者。由于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由于农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地主所得的资本主义地租总是提到很高的水平，因之他们的收入是很可观的。进行了圈地的地主，无论是亲身经营资本主义农场也好，还是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也好，他们都与资本主义发生

密切的关系了，也就是都资产阶级化了。马克思把这样的贵族地主称为新贵族，以有别于封建贵族。第三，在经过圈地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农场上，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17世纪上期，资本主义农场一般都使用人工肥料，在排水及土壤改进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许多农场已使用新农具甚至农业机器了（如播种机）。这些农业技术及方法的改进，只有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场上才有可能实现。结果，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因而产量比封建农业经济提高了三四倍。

不过，圈地运动及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7世纪上期，只限于东部及西南地区，而西北部及北部地区依然保存着古老的封建农业经济。处在地主的封建剥削下面的农民，在法律上分为两种，一为自由持有农，一为公簿持有农。后者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比前者为甚，社会地位亦较前者为低。不过二者都向地主缴纳封建地租。封建地租早在13、14世纪以来就已采取货币地租形式，而且货币地租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公簿持有农除了向地主缴纳封建地租外，还要负担一系列苛捐杂税：当本人死后子嗣继承份地时，必须向地主缴纳“死后税”，在把土地转让给他人时，要纳“许可税”。地主还可以向公簿持有农任意课以罚金，并且强迫他们为自己提供劳役。据1647年长期国会登记册上的记载，在德拉姆郡南部斯托克顿主教的一所庄园里，公簿持有农必须替地主修理水磨，替地主运粮食到德拉姆城，替地主收割干草，否则要交纳40先令的免役金。他们“犯罪”时还得受庄园法庭审判。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农奴制残余。到17世纪上半期，由于价格革命的影响，货币购买力大大降低，于是许多地主不顾传统习惯，提高了货币地租额，从而加强了对于农民的剥削。

（二）工商业的发展

呢绒工业是英国的“民族”工业，革命前呢绒生产遍及全国各个城市及广大农村。早在16世纪，在呢绒业中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有的采取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形式，也有的发展到集中的手工工场阶段。有些集中的手工工场的规模已相当大了，如伦敦商人萨缪尔·米科在自己的工场里同时雇用了数千个工人，其产品还可以行销于国外。到17世纪上半期，在古老的行会手工业中也生长出资本主义要素来。行会的上层分子，亦即富裕的作坊主人通过残酷地剥削工匠及学徒而致富，并且扩大了经营规模，因之这样的作坊逐渐地便带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性质。除了呢绒业而外，在制铁等部门也产生了手工工场的组织形式。

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兴隆起来。英国不但出口呢绒等工业产品，而且还进口大量原料。英国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贸易公司进行的，其中最古老的要算“商人冒险公司”。大商人每年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甚多。英国商人还参加非洲奴隶贸易，甚至有人从事海盗活动。

手工工场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增长，推动了金融事业的发展。英国最早履行银行职能的是“金匠”，“金匠”接受私人存款，也对外贷款和兑换货币。这可以说是银行的萌芽。伦敦是英国贸易及金融事业的中心，而商业区又是伦敦商业金融事业的中心。伦敦交易所开设于1568年，它不但在英国，而且在全欧洲也有很大的影响。

总的说来，到17世纪上半期，英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优势。到1665年，英国农业资本（包括土地房屋及农具）价值等于2.1亿镑，而其他的资本价值（包括工商业）只等于4000万镑。

英国的工商业与外国相比，也不算是最先进的，英国无论在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荷兰和法国。英国工商业发展虽然不大，但是英国资本主义总的发展却比欧洲其他国家有更大的成就。这是因为英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渗透程度，是为其他国家所不及的。

（三）经济变动下的英国社会阶级状况

圈地运动大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首先是原来是统一的贵族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两大集团。在东部及西南部的农村里出现了直接间接与资本主义农业发生关系的贵族——新贵族。新贵族主要是从中、小贵族（乡绅）转变而来的，因为参加圈地的绝大多数是这些乡绅。

新贵族的土地财产不断地扩大，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时拍卖的寺院土地，大部分落到新贵族手中。17世纪初国王詹姆士一世出卖王领土地时，有一半为新贵族买去。1625~1634年的十年间全国出卖土地总值为23万镑，而新贵族仅仅133人就买到一半以上的土地。新贵族还投资到工商业，成为身兼工商业者的土地所有者。同时，新贵族也经常由商人来补充自己的队伍，很多大商人由于买到土地一变而为地主。他们从破产的封建贵族手中买到土地后，就出租给农业资本家，坐收资本主义地租，从而跻身于新贵族集团。新贵族所处的地位异常优越，他们和旧式封建贵族享受同样的特权及政治地位，而经济地位却比旧贵族为高。就是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比起来，新贵族也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因为他们本身多半担任地方官吏，可以利用特权及政治地位发展自己的经济。新贵族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他们的经济与工业资本主义互相适应，因而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而且由于有的新贵族兼营工商业，也由于新贵族不断由商人补充，所以新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便自然而然地建立了同盟。新贵族的国会议员在下院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法院里以陪审员的身份袒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盟中，后者总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新贵族也有其苦恼，这是因为他们受到骑士领有制的压抑。在英国，从中世纪以来一直保存着所谓骑士领有制，在这个制度下，英国每一个

地主的土地都不算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法律上，国王是全国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全国土地都属于他所有，而地主贵族的土地则被认为是从国王那里领到的，因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是有条件的，他的领有土地，是以向国王履行一定的封建义务为前提的。最早，贵族地主为了履行封建义务，必须为国王服军役。从 12 世纪以来，这个义务又为“盾牌钱”所代替，即由地主缴纳货币捐税，以代替服军役。除“盾牌钱”以外，地主还要负担各种贡赋，其中有所谓“助钱”，这是地主的长子接受骑士衔、长女出嫁以及国王作战被俘时为了拿钱赎取而必须缴纳的。其次是继承税，亦即地主子嗣继承采邑时所应纳的税。以上总称为骑士捐。但是，使地主更难以忍受的是，在骑士领有制下面，在他们死后而子女尚未成人时，他们的土地要暂时归国王所派来的官吏管理。在管理期间，国王甚至干涉地主女儿的婚姻问题，如果当事人不愿受干涉的话，必须缴纳“婚姻费”，其数量也是不少的。子女成年时，还必须向国王纳特别捐，然后才能领回土地。此外，在国王官吏管理土地期间，他们还任意侵吞地主财产。而且，在 16、17 世纪，国王还以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干涉地主的圈地，并且对圈地者处以罚金。17 世纪初，地主由于圈地而纳给国王的罚金，构成国王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总之，封建的骑士领有制到 17 世纪已经与大部分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存在条件处于尖锐的矛盾状态。新贵族的土地所有制在经济上并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在法律上，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却继续受到国王的限制，这对于他们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他们迫切要求废除骑士领有制，以便把自己的封建财产变为无条件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

未参加圈地运动的封建贵族依旧经营古老的封建经济，靠剥削农民的封建地租而生活。他们中间还有不少人担任官职或国教教会僧侣。“价格革命”的结果，他们的固定的地租收入减少了，因而他们的生活下降，负债累累者，大有人在，因而变卖土地者，亦复不少。这些旧贵族虽然经济地位下降了，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是统治阶级，他们的命运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和国教教会的僧侣一样，都是最反动的集团。

资产阶级包括农业资本家和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农业资本家有不少人是从自由持有农转化而来的，他们经营资本主义农场，使用雇佣工人。16 世纪的“价格革命”使他们发财了，所以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与新贵族相埒。随着手工工场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有所抬头。但是在城市资产阶级中间势力最大的是大商人大金融家。大金融家很早就与宫廷发生关系，并且扮演了向国家放贷的高利贷者的角色。大商人也占有重要地位。16 世纪末及 17 世纪初，英国专制政府实行贸易独占制度：在对外贸易方面，只有从政府领取特许状的贸易公司方能在指定地区进行独占贸易，一般商人不得插足其间。因此，参加独占贸易公司的大商人，个个发了大财。这样的大商人，全国只有两百人左右。大独占贸易公司靠独占地位而任意高抬物价，因之经过这些公司从海外购买原料的手工工场也大吃其亏。在这个情况下，广大

中、小商人及手工工场主都反对独占制度。

在农村，人口众多的仍是以公簿持有农为主的自耕农，他们负担着沉重的封建义务，因此他们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使自己的份地成为自己的真正的财产。在圈地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浪者，生活无着，到处靠乞讨为生，其艰难困苦，是一言难尽的。他们渴望收回失去的土地，并且使土地变为自己的财产。在资本主义农场中劳动的农业工人，其状况也并不好多少，其工资甚为菲薄，远远落在粮食价格后面。在 1540~1640 年的 100 年间，小麦价格上升三倍，而工资只增加两倍。

在手工工场中工作的雇佣工人，也极度贫困，其工资收入远远不足以糊口。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及学徒，在师傅的剥削下，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城市劳动人民也备受专制国家的政治压迫，他们享受不到任何自由及权利，他们也被剥夺了选举权，政府官吏及地方贵族可以任意欺凌他们。

残酷的剥削及地主的圈地行为，一再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反对圈地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城市劳动者反抗富人的斗争以及反对专制政府的税吏和地方治安法官的斗争，也此伏彼起。

进入 17 世纪以后，斗争有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发展。1607 年 5 月，英国中部的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圈地斗争，数千农民，自称为“平等派”，手持镰刀和棍棒、叉子，动手拆毁栅栏，填平沟洫，夺回被圈的土地。他们坚决表示：“宁肯英勇地死去，也不愿缓慢地死于贫困。”附近的居民运来食物、工具，以支持他们的斗争。但是，这次运动遭到无情的镇压。到 17 世纪 20 年代，农民运动又勃然爆发，席卷了西部及南部各郡。到 30 年代，反圈地运动在东部诸郡也高涨起来，自称“沼泽派”的农民英勇地反抗地主圈占公共沼泽地的行为。

城市的反抗斗争也加强了。1617 年，在伦敦爆发了手工业作坊学徒工运动，1622 年，格罗斯特郡又发生失业工人的暴动，失业者成群结队闯进富人家中，夺走食物。1639~1640 年在伦敦又出现了失业工人及贫民的示威运动。

（四）资产阶级新贵族与清教徒运动

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英国早先也是个天主教国家，到 16 世纪也发生了宗教改革。不过，英国的宗教改革是在国王亨利八世手中完成的。在这次宗教改革中，亨利八世切断了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关系，并且在 1534 年宣布自己为英国教会的首脑，同时封闭了七百多所天主教寺院，没收了寺院的土地。经过宗教改革后的英国教会称为英吉利国教教会（简称国教教会），其教义、组织及仪式与原来的天主教教会无重大区别，仍保存了主教制及各级教会的土地财产。与天主教不同的只是在于它的最高领导权从罗马教皇转到英国国王手中罢了。诚然，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国教教义发生

了一些变化，有些地方接近大陆上的新教，但是仍旧保存了天主教的不少痕迹。

日益成长起来的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逐渐地感到英国国教不利于本身的发展。这是因为：第一，国教教会成了国王手中的工具，是巩固专制制度的支柱；第二，国教教会的僧侣奢侈放荡，残酷地剥削教徒，这显然影响了提倡节约的资产阶级积累资金及扩大工商业活动；第三，国教教会保存了许多天主教教会的仪式及习惯：斋戒、祈祷及礼拜等繁文缛节，这些东西对于终日忙碌的资产阶级说来，是浪费时光的。为了反对国教，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便借用了现成的加尔文教教义作为斗争的武器。这里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加尔文教教义颇适合资产阶级口味。加尔文教教义的中心内容是宿命论，它认为：有一种人是上帝的选民，注定要得到“拯救”，而另一种人则注定要永世受地狱之苦。第一种人不需要任何善行都能“得救”第二种人则任何善行都“拯救”不了，因为世上一切都由上帝预先安排好了，非人类的意志所能左右。加尔文教还认为人们不管做什么职业，必须在自己的事业上表现出成绩，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假如他是一个实业家，他的买卖做得越好越成功，就越容易成为选民。这样，受到中世纪天主教会束缚的资产者，从此可以用上帝的名义，把他们自己认为是“世界使命”的商业活动神圣化了。第二，加尔文教又废除“偶像崇拜”的华美仪式及讨厌的教会勒索，取消荒诞的纪念日，这一切都有利于资产阶级。第三，加尔文教的组织比较民主，因而合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要求。

英国加尔文教又称清教，这是由于加尔文教徒要求清除教会里的天主教残余而得名。清教最早出现于 16 世纪 60 年代。它一开始就以战斗姿态出现，猛烈地攻击国教教会僧侣的道德“败坏”及生活“糜烂”，而提出“严肃”的、“勤劳”的生活理想。实际上这是原始积累时代被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这样，资产阶级便不能发财。清教徒主张排除教会里的一切华美的装饰，如圣像、祭坛和花玻璃等。他们反对用祈祷书来祈祷，反对在提到基督时鞠躬，反对用十字架为受洗者祝福，反对在读福音书时起立。国教教会继续保持这些仪式，清教徒则宁愿在家中作礼拜。实质上，在清教徒“简化”、“廉价”的要求后面隐藏着追求利润及积累资本的欲望。清教徒通常身着黑袍，打扮朴素，与身穿华丽袍服的封建贵族及国教僧侣恰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不苟言笑，把跳舞、音乐及嬉游看作是恶魔的引诱和罪恶的根源。

到 17 世纪上半期，虽然清教徒在英国居民中的数目日益增多，但是仍有不少居民信仰英国国教，而且在英国西北部还有不少天主教徒。但是清教教义最明显地表现了上升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清教徒宣传新的资产阶级道德和新的宗教的、政治的组织形式，他们在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

不过，清教徒并不是清一色的，早在 16 世纪末就发生分裂，分裂为长老会派和独立派。最富有的集团——大资产阶级上层新贵族——主张严格地

按照加尔文教会的形式改组国教教会，这些人被称为“长老会派”。他们要求长老（年长者）在教会中起主要作用，地方教会会议及中央教会会议应由长老组成，长老应当担当与天主教的主教差不多的角色，由他们督促信徒们奉行统一的教会仪式，并且严厉惩罚破坏教会纪律的人。长老会派认为长老不但应该在教会中保持领导地位，而且也应该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独立派主张每个宗教团体都应该独立于国家政权及一切教会权力之外，信徒既不应该服从教皇和国王，也不应当服从长老及其宗教会议，他们提倡每一位信徒都享有宗教信仰上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当然是在加尔文教教义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圣经》的理解自由地“说教”和“预言”。与长老会派不同，独立派分成许多小教派，在组织上是涣散的。属于独立派的有中等资产阶级新贵族，也有部分农民和城市平民。

（五）英国专制制度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开始

早在 15 世纪末，英国就开始形成专制制度，在专制制度下，国王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凭借各种专制机构统治和压榨人民，并且以维护封建贵族的利益及封建剥削制度为己任。最重要的专制机构有枢密会议（枢密大臣是国王的左右手，协助国王统治国家）、星法院（是专门负责镇压叛乱贵族的机关）、高等法院（最初是压迫天主教徒的机关，后来变为迫害清教徒的工具）、国王裁判所（古老的司法机构）以及作为国王的精神统治机构的国教教会。国王不仅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而且也是大土地所有者。国王领地包括庄园、森林及狩猎园等，它们遍及全国各地。国王领地收入在 1617 年为 8 万镑，其面积之大，可以概见。

但是，专制主义在英国从未发展到法国那样强大的地步：第一，尚未形成庞大的官僚系统，在地方上还保留贵族的自治机关，地方各级行政人员都是地方贵族自己选出的，而不是由国王任命。第二，国王没有常备军，国家有事时只能临时召集民兵。第三，英国有国会，国会的存在是对王权的一个限制，而在法国，等级代表机关——“三级会议”早已停开了。英国国王没有经常的、固定的财政收入，平时国王及宫廷只能靠国王领地的地租及骑士捐维持生活。如有特殊的金钱需要，或者一旦发生战争，国王便不得不召集国会，要求国会同意他向臣民征收临时捐税。这就是为什么国会能够从中世纪以来在英国继续存在下来的原因。

英国国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议员是由国王任命的大贵族、高级僧侣及富人组成的。上院可以对下院通过的法律行使否决权，可以驳回下院所通过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但是批准新税的权力却属于下院，如果下院不同意，国王是无权征收新税的。下院议员人数较多，议员的选举在各州及一些城市举行，每七年选举一次。在各州，只有乡绅及每年收入达 40 先令的自由持有农方能享有选举权。乡绅在地方上势力很大，因此从地方上选进国会

的代表多半出身乡绅。至于城市选举，则因地而异，有些城市从来就有选举权，有些城市则用金钱从国王那里买到选举权，更有些城市根本无权参加选举。大多数城市的选举操在富商大贾手中，因而当选的多是他们。这样，英国国会本身是颇不民主的，但是它却起了限制王权的作用。

英国专制主义在发展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起于 15 世纪末，迄于 16 世纪下期，大体上相当于都铎王朝统治时期；第二阶段起于 16 世纪末，迄于 17 世纪革命的爆发，大部分是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在第一阶段，专制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起了保护作用，因此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到第二阶段就不同了，一方面资产阶级特别是新贵族的财富日益增加，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他们不甘心受专制政府的任意支配，而开始进行反抗斗争（主要是通过国会），他们的目的便是夺取政权，以便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专制王权究竟是封建贵族专政的政权，君主是封建势力的最高代表和体现，他眼看资产阶级新贵族日益壮大，日益威胁封建统治，于是便开始镇压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反抗。因此，专制政府与资产阶级新贵族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占主要地位。这个斗争在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国后便开始了。

1603 年，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伊丽莎白女王逝世，由于无嗣，遵照女王遗嘱，苏格兰王詹姆士继承为英国国王，是为詹姆士一世。此后便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詹姆士一世虽然身兼苏格兰和英国国王，但这两个国家并未合并。詹姆士一世提倡“王权神授说”。他说：王权是上帝授予的，国王是上帝派到地上来统治人民的，因此国王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臣民必须礼之若神明。国王既受命于上帝，则其不受地上法律的限制，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又胡说什么“国王是法律的创立者，而非法律创造国王”。因此，国王是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他对待自己的行为只能向上帝负责，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王的命令。假如臣民认为国王滥用权力，他们只能祈求上帝开导国王，把他引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他还说：国会的权力也是从国王得来的，它的使命只能是向国王提出自己的愿望，而无权讨论国王的行动。“议论上帝……是渎神；议论君主……是叛乱。我不容许议论我的政权”。

詹姆士不但为专制主义暴政大造舆论，而且还加紧推行反动政策。他疯狂地迫害清教徒，在 1604 年的一次会议上公然威胁清教徒，表示要驱逐他们。同年，他还颁布命令，无条件地禁止非国教的任何教派组织的存在及活动。结果，许多清教徒由于在国内存身不下去，而逃往荷兰或北美。

除了宗教迫害之外，他还加紧搜刮人民。詹姆士的宫廷生活奢侈腐化，弄得入不敷出，因此他不得不一再召开国会，要求国会同意他征收新税。1614 年国会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他实行改革。因此他便解散了国会。此后，一连七年没有召开国会。在这个期间，詹姆士一世想尽一切手段增加自己的收入。1618 年他开始实行国内独占制度：只有从政府买到独占特许权的企业公司才有权利贩卖某些商品，其中包括肥皂、植物油、煤、盐、纸、皮革、玻

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专卖商可以以原价的三倍出售这些商品。估计当时国王由于出卖独占特许权，每年可得七八万镑的收入。

但是，这样做，詹姆士一世还不满足，他又实行日用品采买优先制，宫廷的采买官可以在市场上任意以贬低的价格强购农民、小生产者及小商人的物品，然后以三倍的价钱抛售。他又异想天开地实行鬻卖爵位的办法，定男爵价格为 1000 镑，子爵为 10,000 镑，伯爵为 20,000 镑。此外，他又令各州州长向居民强制借债。

詹姆士一世的这种无限制的搜刮政策，特别是独占制度及日用品采买优先制，严重地影响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因而民愤极大。

对内是这样倒行逆施，对外政策亦乖张失措，大大地损害了资产阶级利益。当时，英国海外贸易殖民事业的强大敌人是西班牙，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要求英国专制政府实行打击西班牙海上力量的政策。但是，詹姆士一世却对西班牙实行友好政策。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联合起来，有助于巩固自己对英国的专制统治。他的对外政策，引起英国资产阶级的极大不满。

（六）专制制度的危机与革命的成熟

1625 年詹姆士一世身死，王子查理即位，是为查理一世。他和其父一样，相信“王权神授说”，而刚愎轻浮，犹有过之。

他继续推行搜刮政策。他通过州长，向各州富人强制借债，但是遭到拒绝。于是凡拒绝贷款者，均被逮捕入狱。由于强制借债政策失败，查理一世乃在 1628 年召集国会，指望国会同意征收新税。这一届国会在资产阶级新贵族的领袖约翰·义律和约翰·皮姆等人的领导下，乘机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采纳。在请愿书中列举了四点要求：第一，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强制向人民借债和征税；第二，除非依据法庭判决及国家法律，不得逮捕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第三，不许按照战时法逮捕人；第四，在普通人民家中不得驻扎军队。同时国会答应拨出 35 万镑作为国王接受请愿书的条件。查理一世经过考虑之后，才勉强接受了请愿书中的要求。

但是，这并没有缓和国王和国会之间的斗争。不久又发生了国王征收吨税与磅税的争端。吨税是对入口的酒类征收的入口税，磅税是对出口的羊毛等物品征收的出口税。过去，每逢新王即位时，国会就照例授权国王终身征收这两种税捐。但是这次查理一世即位后，国会只同意他征收一年，而国王则坚持要求终身征税权。由于英国每年进出口额甚大，这两种税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占国王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查理一世不顾国会的决定，年复一年地派官征收这两种关税。

1629 年秋，国会针对国王强行征税的做法，宣布交纳吨税及磅税的商人为“自由的叛徒”。查理一世恼羞成怒，下令解散国会，于是英国开始了无

国会统治时期达 11 年之久。在这 11 年中，查理一世肆无忌惮地推行反动的高压政策及搜刮政策。

大主教劳德在查理一世的指使下，厉行宗教压迫政策，迫害的对象不仅有独立派，而且也有长老会派。镇压机器开动了，星法院和高等法院不断逮捕清教徒，在审问时施加种种非刑拷打。1630 年苏格兰人雷顿由于著书攻击主教制而被捕，不但被处以 1 万镑罚金，而且惨遭毒打，被割掉耳朵后，判处终身监禁。1637 年，长老会派分子普林尼等三人被捕，也处以终身监禁，罪名是他们诽谤大主教。

在这个期间，反动政策特别表现在财政方面，查理一世不但继续征收吨税及磅税，而且还想出各种花样翻新的办法来搜刮全国居民。英国国王拥有大片大片的森林领地，而且靠近国王森林领地的民间土地又常常被国王官吏划入王领森林范围之内。1634 年，查理一世突然下令勘查国王森林地界，并且规定：无论何人，凡其土地“侵犯”国王森林地界者，必须交出罚金。这种讹诈政策使得许多地主被罚，从而给专制政府带来数万镑的收入。1630 ~ 1634 年间，国王又以全国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向圈地者课以罚款。实际上，专制政府并不想认真禁止圈地，只不过借此机会向圈地的地主们进行勒索而已。政府又恢复了古老的船税，这个措施不但损害了地主的利益，而且也大大地加重了城市广大居民的经济负担。原来早在诺尔曼时代，英国海岸频遭海盗侵袭，为了防备海盗，政府曾向沿海居民征用船只。实际上，这种征用船只的办法后来久已不采用了。但是，查理一世在 1634 年借口英国海岸有被袭击的危险，颁布了“船税令”，在沿海诸州征收船税。1636 ~ 1637 年，这个法令又推行到内地诸州，要求全体居民都必须交纳船税。

这个法令遭到许多人的反抗，如白金汉州的富户约翰·汉普登就带头拒绝交纳船税，尽管他应该交纳的船税不过 20 先令。

更严重的是，查理一世无限制地推行工商业独占制度。在 1629 年至 1640 年间，英国许多消费品的生产及出卖的独占权都被交给一些大商人、大企业公司，国王在授予独占权时，获得了大量金钱。被划入独占的消费品种类极为广泛，其中包括肥皂、盐、铁、煤、砖、玻璃、皮革、淀粉、火药、麻布、染料、纽扣、酒、啤酒、油脂、针和别针等差不多所有的日常用品。

实行无限制的独占政策，其影响所及，至为广泛。正常的工商业开始停滞，消费品价格腾踊，失业人数遽增。煤的独占，不但直接影响煤的生产，而且还间接地影响了利用煤为燃料的其他生产部门。如冶金工业便由于煤价高涨而形衰退。没有得到专卖权的企业家便只好歇业或解雇工人，这就造成工人失业及挨饿。一部分资产阶级感到生意前途暗淡，而不得不携带资本移往国外，主要是荷兰。另外则有不少信仰清教的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农民迁往美洲。留在国内的广大居民都感到生活的道路被堵死了，为了自己的前途，只有与专制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二节 1640 到 1649 年革命

（一）长期国会与内战的爆发

1637 年，苏格兰发生了起义。这次起义，是国王在苏格兰实行的暴政所引起的。到 1639 年，苏格兰起义者的队伍已进入英国北部边境。为了镇压苏格兰起义，必须拨出大量款项以充军费，必须要求国会同意征收新税。因此，查理一世不得不在 1640 年 4 月召集新的国会。但是新国会中的新贵族代表猛烈地抨击国王的暴政。查理一世在一怒之下，解散了国会。这一届国会一共只存在三个星期，所以历史上称之为“短期国会”。对于国王的这一专横行为，资产阶级新贵族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既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武装力量。然而这时劳动人民的自发的运动却给予国王专制政府有力的回击。

当国会解散的消息传出之后，群众的愤怒爆发了。伦敦及其郊区的下层劳动人民，如帮工、学徒、水手及脚夫等接连不断地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国王解散国会，还要求惩办国王的帮凶——大主教劳德，并冲进他的住宅。还有 1 万名市民要求召开新的国会。而且到这一年 8 月，苏格兰起义军又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在内外夹攻之下，国王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下令选举新的国会。11 月 3 日，新国会召开了，这一届国会存在了 13 年之久，所以史称“长期国会”。长期国会的召开是革命的开始。

长期国会的大多数议员是贵族。不仅上院全体议员（123 个世俗贵族和 26 个僧侣贵族）都是大贵族，而且在 500 多个下院议员中，有 180 余议员是骑士，约有 80 个是子爵或从男爵，另有 170 多人也都是绅士。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直接代表只有 70 人左右。资产阶级议员只是后来经过补选才有所增多。在补选中，甚至有一些富裕的自由农民也进入了国会。国会的阶级成分决定了国会的政治态度，大多数议员倾向妥协，他们至多要求限制国王权力及实行某些温和的改革。只有以皮姆为首的少数议员态度比较坚决，主张实行更彻底的改革。

国会开幕后不久，皮姆就提议对国王宠臣斯特拉福进行审判，理由是他应对近年来的一系列暴政负主要责任。这实际上是向国王政府的公开挑战。然而在一些保守的议员的百般阻挠下，这个建议迟迟未获采纳。群众对此甚为愤慨，他们来到国会前举行示威。也有成千上万的市民签名向国会提出请愿书，要求将斯特拉福作为“臭名昭著的罪犯”处以死刑。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下院以 204 票对 59 票通过关于判处斯特拉福死刑的决议。然而上院却拒绝批准这个决议。伦敦群众得知后，不胜愤慨，他们人山人海武装起来跑到西敏寺院（国会所在地），一连两天冲击和包围国会，一再高呼“制裁！制裁！”的口号，并且责骂那些反对处死斯特拉福的人为“祖国的叛徒”。5 月 8 日，上院在群众的一片口号声中以 37 票对 11 票通过了判处死刑的决议。

但是查理一世硬是不肯批准这个决议，他曾向斯特拉福一再表示，他的“生命、荣誉和财产都不会被牺牲”。群众对国王包庇自己的宠臣的行为非常气愤。5月9日，大批群众涌向王宫前面。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查理一世只好签署了斯特拉福的死刑决议。5月12日对斯特拉福行刑时，聚观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这充分反映了人民对他的仇恨。

在1640年12月到1642年初，国会在与专制政府的斗争中还取得一系列其他胜利。1640年12月，下院在一项特别决议里宣布征收船税为非法。1641年2月，国会通过一项法案，限制了国王干涉国会的权力，规定：一届国会解散后到下一届国会召开前，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国会在开始工作后未滿50天以前，未经国会本身的同意，不能解散国会或者中断它的会议。5月10日，国王被迫批准了这个法案。6月，国王又被迫下“罪己诏”，谴责了自己过去实施的税收政策，批准了关于任何补助金、关税和他种税（包括船税在内）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征收的法案。另外，在这一年7月，查理一世又被迫取消星法院、高等法院等暴政机关。8月，他又不得不取消国内工商业独占制度。

国会取得这些胜利，也是伦敦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大主教劳德的话就是证明，他说：“每当下院有什么议案将要提出，并且认为上院会坚决拒绝或国王不会同意的时候，渐渐地暴民们就会来到国会，高声喊出他们所要求的这个或那个要求……”但是，人民运动的发展，使得长期国会的许多议员感到畏惧，他们的这种畏惧很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于“根枝法案”的态度上。

早在1640年12月11日就有15,000人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给国会，在请愿书上列举了高级僧侣的许多渎职行为，要求把主教，主持牧师及教士大会等“连根带枝”一齐废除。因此，国会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在1641年5月提出了关于废除主教职位的“根枝法案”。这个法案刚一提出，就遭到许多议员的攻击。反对者的动机，从一些人的发言中可以窥见。议员瓦勒说他之所以反对这个法案，是因为主教制可以充当防御人民的外围堡垒，如果人民“用举手及递交请愿书的方式就可以在宗教事务上取得平等，那末随之而来的将是要求土地法以及世俗事务上的平等”。该法案虽然在下院获得通过（只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但是被上院拒绝了。

也正是由于恐惧人民运动，所以国会有越来越多的议员倾向于与王党妥协，他们之反对“大抗议”，就说明了这一点。1641年10月20日，长期国会开始讨论“大抗议”。“大抗议”是国会与专制主义斗争的最重要文献，其中揭露了国王政府的暴政，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政策要求：实现工商业活动的自由，高级政府官员及大臣只能从“国会有根据相信”的人们中间任命，而且建立大臣对国会的负责制等等。但是，在讨论时，许多议员认为这些要求过分了，他们特别反对大臣对国会的负责制。11月22日表决时，只是以11票的多数（159票对148票）通过。

当“大抗议”被提交给国王时，他不但拒绝批准，而且还在 1642 年 1 月 3 日以叛国的罪名要求国会交出一贯表现激进的皮姆、汉普顿、赫塞里格、霍里斯和斯特罗德等五位议员。然而国会不肯交出，于是国王便在 1 月 5 日亲自带领大批军队来到国会，想逮捕这些议员。其实，皮姆等人得到消息后，早已逃到商业区躲避起来。商业区的数千名手工业者和平民武装起来，保护了皮姆等人。一周以后，伦敦市及南渥克的脚夫和水手组成的队伍簇拥着皮姆等五个人，沿途高呼“保卫国会，保卫王国”的口号，把他们护送到国会下院。这时，伦敦附近的白金汉郡和肯特郡的农民也结成队伍开到伦敦。劳动人民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伦敦。

查理一世深知伦敦对自己不利，于是便决定离开伦敦到北方去，因为北方是旧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区，这里的封建贵族会全力支持国王的。1 月 10 日查理一世从伦敦启程来到了北方的约克城。到达北方后，查理一世便在封建贵族的帮助下加紧组织军队，积极准备内战。当地的封建贵族纷纷捐献财产，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参加军队的组织训练工作。

这时的国会也开始了军事上的准备。7 月 12 日，国会通过决议，成立了国会军队。

8 月，查理一世认为军事准备已经充分，便悍然向国会宣战。9 月 28 日，国王军队与国会军队在瓦塞斯特附近发生了战斗，内战就这样爆发了。为了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政权，国王终于首先诉诸暴力。

（二）第一次内战

内战爆发后，全国立刻分为两大阵营：以国王为首的保王党阵营与以国会为首的革命阵营。从地理上讲，属于保王党阵营的是落后的西北部农业地区，属于革命阵营的是富庶的、工商业及农业发达的东南地区。从阶级关系来说，站在革命阵营方面的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及一切劳动大众，苏格兰起义者也加入革命阵营。领导革命阵营的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新贵族，因为新贵族不但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由于本身是贵族，长期享有政治特权，所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及能力。站在保王党方面的是旧的封建贵族及国教教会的僧侣。这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是显然有利于革命阵营的，因为它拥有许多重要港口及舰队，这就保证国会军队在海上的优势，并且使它有可能切断国王军队与外部的联系。而且国会方面更有取之不尽的财政来源，因为重要的工商业都市都在国会的控制之下，国会随时可以从伦敦的大商人及银行家那里取得贷款。国会也不愁没有巨额税收充作军费，因为东南地区有发达的工商业。革命阵营还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东南地区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相反地，保王党阵营在财政上只能依靠封建贵族的临时捐助，所以是很不可靠的，它的经济力量也非常薄弱，因为它所控制的西北地区的工商业及农业都极为落后。最后，

在人力方面，国会方面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是为正义的革命事业而战的，因而可以发挥无穷无尽的战斗力。而保王党阵营没有群众基础，支持它的只是没落的封建贵族。

优势虽然是在革命阵营方面，但是革命阵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领导革命阵营的是长老会派（长老会派控制了国会），军事指挥者也都是长老会派军官，而长老会派领导集团在内战中所执行的是一条保守的军事路线，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不敢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反对国王的战争，而主要依靠雇佣兵作战，这样一来就严重地削弱了革命阵营的战斗力。第二，指挥军队的长老会派时时刻刻不忘与国王妥协，所以在战场上一贯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而不肯大胆进攻。比如在国王北上后和内战开始之前，国会议员皮姆曾主张在国王凑足兵力之前，率军北上，直捣国王的老巢，一举而扑灭国王的势力，但是长老会派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坐使国王军事力量增强，因而造成战争拖延的局面。再比如在战争开始后，指挥军队的长老会派军官艾塞克斯在战场上按兵不动，迟迟不肯指挥军队前进。1642年10月，在牛津附近打败了国王军队后，本应乘胜追击敌人，但是艾塞克斯突然下令退兵，结果使敌人转败为胜。

长老会派之所以执行保守的军事路线，是因为它代表上层有产阶级的利益，最害怕人民，生怕人民参加革命战争，有朝一日会侵犯自己的财产，从而他们总是希望与国王势力妥协，以便共同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

长老会派的保守的军事路线给革命战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所以战局越来越不利于革命阵营，到1643年秋，国王军队占领了东南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全国有四分之三的土地落到国王军队的铁蹄之下。

当国会中的长老会派上层领导把内战步步引向失败的绝路上的时候，农民群众的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内战开始后不久，有的农民就说：“贵族们当我们的主人已经很久了。现在该我们去当一当他们的主人了。”许多地区农民拿起武器与地主展开斗争。

但是，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是西南各郡发生的“棒民”运动。“棒民”运动采取的是“中间”道路，既反对封建王党，也反对国会。“棒民”大约有十万人，基本群众是农民，但是领导力量却比较复杂，除农民外，还有教士、贵族、军官、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等。“棒民”自称他们的目的便是联防互保，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财产”，使其免受“一切掠夺者和其他非法暴力的侵犯”。但总的说来，“棒民”对王党更为敌视，他们之所以举起“中间”道路的旗帜，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国会的政策不满。“棒民”运动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打击了当地的封建贵族和王党的气焰，保卫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在于它在客观上促进国会的军事改革，因为如果战争继续沿着失败的道路发展下去，农民运动将会进一步扩大，在长期国会看来，为了制止农民运动的发展，就必须扭转战局，而为了扭转战局，就必须实行军事改革。

当然，促进国会实行军事改革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战争的失败本身。因为

一旦战争败衄，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命运和前途将不堪设想。于是，最关切这两大新兴阶级的切身利益的独立派首先提出军队改组的要求。在独立派的压力下，国会在 1645 年初决定改组军队，通过了“自抑法”。根据“自抑法”，凡身兼议员的军官均应辞去军官职务。于是，艾塞克斯、曼切斯特和瓦勒等昏庸怯懦的长老会派军事领导人都离开军队，军队的指挥权落到以奥立佛·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分子手中。

克伦威尔于 1599 年出生在亨丁顿郡的一个乡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克伦威尔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后来又一度在伦敦攻读法律，从伦敦返故里后，一心一意经营牧场和管理土地。但是由于一个时期农产品价格猛跌，他的家几乎濒于破产，卖掉了很多土地及房产。此后，他就变为小地主了，财产收入勉强够维持生计。

1640 年克伦威尔当选为长期国会议员，1641 年他积极参加“大抗议”的草拟工作，这时，他的卓越的政治才能已见知于当世。不过，在国王及宫廷大臣眼中，他的威望要比其他政治领袖小得多。

内战开始后，具有远见卓识的克伦威尔深知：为了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利用人民的力量。因此他在战斗开始后，就装备了一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人组成的队伍参加战斗。这是一支新型的骑兵队伍，纪律严明，英勇善战，而且每个士兵都浸透着革命意识，满怀着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仇恨，因而他的队伍转战各地，屡次获胜，有“勇士军”之称¹。1644 年 7 月 2 日，克伦威尔的骑兵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击溃了保王党骑兵，取得了内战以来第一次大捷。

在担任了指挥全军的重要职务后，克伦威尔便以“勇士军”为榜样改组军队，改组后的军队称“新模范军”。“新模范军”不但有严格的纪律，而且实行民主，大胆提拔出身下层人民的士兵为军官。如福克斯上校是铜匠出身，普莱德上校是车夫出身。因而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克伦威尔还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方针。过去长老会派军官根本不想打败敌人，因而毫无作战计划，处处陷于被动地位。克伦威尔采取了大胆进攻的战略，并且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实际上这意味着克伦威尔执行了正确的革命的军事路线。

军事改革后不久，战局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645 年 6 月，国会军在纳斯比附近取得了大捷，几乎全部歼灭了敌军，并且俘虏 5000 人。此后，战局急转直下，到 1646 年 7 月，内战终于以革命阵营的胜利而结束。国王查理一世也成为阶下囚。

（三）反对长老会派的斗争

1646 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英国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革命

¹ 勇士军的原文为“ironside”。过去译为“铁骑军”，不甚确切。

阵营与保王党阵营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而革命阵营内部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斗争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是如何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成果并且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革命阵营内代表不同阶级的各个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打算和主张，并且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对英国革命的发展和结局，而且对以后很长时期英国历史发展，都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个斗争首先是长期国会的政策引起的。

1640年11月长期国会召开后，它越来越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内战爆发后，它成了最高政权机关。长期国会的议员成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内战一开始，国会中的保王党议员就离开国会，投到保王党阵营，于是长老会派和独立派在国会里占绝对的优势。到1645年新模范军建立时，根据“自抑法”，在军队里担任军官的长老会派议员放弃了军职，把力量集中在国会里，此后国会就成了长老会派手中控制的工具。国会长老会派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权，竭力维护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利益，实行了一系列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

(1) 宗教政策。在人民的压力下，早在1642年2月，长期国会就已经把国会里的主教都赶走了，接着又禁止僧侣干涉世俗事务，到1646年终于废除了主教制。英国国教教会也被取消了，长老会得到官方的承认。但是长老会开始干涉公民事务，并且要求全国人民一律遵奉长老会的信条。这样一来，和革命前一样，人民还是享受不到信仰自由。长期国会也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1643年长期国会下令实行书刊的预先检查制度，禁止出版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著作及报纸。这实际上就是限制了人民表达不满情绪的自由。

(2) 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本来在内战年月里，由于受到国王军队的蹂躏，人民的生活陷于困难的境地。资产阶级新贵族控制下的国会不但不采取任何措施去减轻人民的苦难，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1643年7月在皮姆的建议下开始征收国产税，亦即对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最初它只是一种临时措施，以三年为限。可是后来一直没有废除。最初只向奢侈品征税，但是后来到1644年1月，肉类、盐、兔子、鸽子等也被列入被征税的项目之内。到1647年，政府每年所征收的间接税平均达400万镑。国产税的征收引起物价飞腾，因而大大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3) 长期国会保留了教会什一税。和欧洲天主教国家一样，英国国教教会也向农民征收什一税。农民许久以来就被这个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长期国会的大多数议员反对废除什一税，因为英国宗教改革后，许多世俗封建主取得征收什一税的权利。在革命时期，由于出卖主教土地，享有征收什一税的权利的世俗地主人数更为增加。结果，什一税被保存下来了。

(4) 实行反农民的土地法。在革命当中，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让农民所耕种的土地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但是长期国会所实行的土地立法，不但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反而大大损害了他们

的利益而使新贵族得到好处。土地立法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1646年长期国会通过了废除骑士领有制的法律，取消了贵族地主对于国王的封建从属关系，从而使贵族地主的土地变为他们的真正财产。地主此后不要再向国王政府纳骑士捐了，在土地问题上再也不受国王政府的干涉了，进行圈地时也不用向国王缴纳罚金了。但是这个立法给英国广大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实施这项立法之后，贵族地主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圈地，因而圈地运动比革命前大大加速，到18世纪下期，即革命后100年内，圈地运动基本上完成了，英国的独立农民阶级终于全部消灭了。土地立法的第二个内容是：长期国会在内战期间没收了国王、保王党人及国教教会的土地。在内战期间及战争结束后，又把这些没收来的土地分期分批拍卖了。结果，这些土地都落到大资产阶级新贵族手中。相反地，农民并没有得到土地，他们继续处在被剥削的地位。这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领导这次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联盟，新贵族是农民的直接敌人，他们当然不肯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长期国会所实行的这些反人民的政策和措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愤慨。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富裕农民，即城乡小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不久，他们就发动了一个强大的运动——平等派运动。他们愤怒地抨击了长期国会的倒行逆施。并且提出了下列要求：解散长期国会，实行普选制，并且在普选制原则的基础上选出新的国会。平等派的领袖有约翰·李尔本、理查德·欧佛顿、威廉·渥尔文等人。李尔本本来是地主的幼子，在12岁时就被送到伦敦去当学徒。在内战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并且由于勇敢善战而累迁至上校地位。他早在1645年就开始发表民主言论，提出了国家最高权力应该属于人民的主张。他认为国会的活动应当以人民的幸福为依归。他反对上院的存在，他说上院和国王一样，都不是人民选出的，只有为人民所选出的下院才能代表人民。他也反对君主制，主张取消国王。他指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比别人享受更优越的地位。因此他反对封建特权。在1645~1646年间，他又提出了取消独占制及减轻“贫民及中等人”的税务负担等要求。欧佛顿和渥尔文也大胆地宣传人民主权思想，强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要求废除君主制。总之平等派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国王没有上院的、每个成年男子都能参加选举的、一院制国会的民主共和国。因此，平等派运动在本质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一个最革命的人民运动，因而博得城乡广大贫民的拥护，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最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国会军队的广大士兵的强烈支持，士兵们纷纷加入平等派运动。士兵就是穿军服的劳动人民，因而平等派运动发展为一个群众性的、武装的人民运动。

这样，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在英国出现三个政治派别：除了长老会派及独立派之外，又出现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和部分劳动群众利益的平等派。长老会派控制着国会，因而掌握全国政权。他们在政治上力图保持现状，

反对革命进一步发展，并且屡次与国王谈判，希望保留君主制度，以期他们的阶级利益得到更可靠的保障。军队的指挥权掌握在独立派军官手中。独立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等新贵族两大集团的利益。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这两大集团的阶级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政治上，长老会派控制了长期国会，独立派被排斥在统治圈外；在经济上，对外贸易独占制仍未取消，中等工商业者的经济活动受到压抑；在宗教上，长老会教义成为全国必须信奉的教义，独立派的宗教活动及思想言论受到限制。因此，独立派对现状颇为不满，准备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军队，与长老会派控制下的国会作斗争。但是他们也害怕平等派运动会侵犯本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有时又企图勾结国王和长老会派，共同镇压平等派及人民运动。

按理说，当时掌握国家最高政权的长老会派应该考虑解决摆在革命阵营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如何满足各革命阶级在革命中所提出的要求，以及如何处置被俘的国王等问题。但是长老会派不但不考虑这类问题，反而把矛头直接指向在内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军队。这是因为长老会派看到军队已成为中、下层势力的大本营，士兵已经成为平等派的同义语，深深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于是，1647年3月，国会便以减轻人民赋税负担为借口，决议解散军队，妄图借此打击平等派。这个决议在军队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士兵们在平等派的领导下，拒绝解散。李尔本猛烈抨击国会中的长老会派，指出他们比大宪章颁布以来任何一个君主更为残暴。他说：现在人民别无选择，只有用武力把这些暴君连根铲除。1647年4月末5月初，许多连队的士兵在李尔本等平等派的帮助下选出了自己的代表——鼓动员，并且组成了“鼓动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建立，就成了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同时也成为联系军队里的士兵与军队外的平等派的纽带。这样，以军队内的士兵为基干的民主力量开始形成，这个民主力量不但直接与国会里的长老会派对抗，而且大有摆脱独立派军官的控制之势。

不久，军队里有人听说长老会派加紧了同国王的勾结，为了防止长老会派的阴谋得逞，1647年6月初，骑兵掌旗官乔埃斯率领骑兵500人到囚禁国王的赫姆比城堡把国王劫持过来，押到军队驻地——纽马凯附近。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军官们在高涨着的士兵运动面前，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和广大士兵一道与长老会派国会作斗争，或者由于害怕民主势力的发展而站到长老会派国会方面和它共同镇压士兵。最初他们犹豫不决，抱观望态度。士兵对此颇有反感，士兵鼓动员公开警告克伦威尔说：如果他不立刻前来领导他们的话，他们将不顾他而独自前进了。于是克伦威尔不得不表示愿意站到士兵这一方面来。当时克伦威尔之所以决定采取这个态度，是由于他看到选择和长老会派合作的道路，等于独立派军官的自杀，因为军队是他与长老会派进行斗争的支柱，相反地选择与士兵合作的道路，既可以依靠士兵的支持去推翻长老会派的统治，又可以保持自己对士兵的领导权，并且有机会控制士兵的越轨行动。

独立派与平等派合作的标志，便是成立“全军会议”，这是1647年6月5日在克伦威尔的建议下成立的。会议由军队的所有的高级将领和每团两个军官代表、两个士兵代表（鼓动员）组成，作为代表全军讨论重大问题的机构。在会议中，高级军官人数比士兵代表多，克伦威尔想借此去控制士兵的行动。而李尔本等平等派却天真地相信士兵代表可以在会议中与军官代表分庭抗礼，以平等地位讨论国家大事。可以说：以前成立鼓动员委员会是士兵摆脱独立派高级军官的控制的重要契机，而现在成立“全军会议”则又使平等派士兵落到高级军官的控制之下了。这是平等派一大失策。

6月5日，全军会议通过了“庄严协约”，表明军官和士兵同心协力反抗国会关于解散军队的决议。6月14日会议又通过“军队的宣言”，宣布军队负有保卫人民自由的使命，并且要求解散现有的长期国会而召开新的国会，改革现存的选举制度，三年改选一次国会，实现请愿自由及出版自由等等。宣言也阐明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同时还从理论上说明士兵——身穿军服的农民、手工业者——有权过问国家大事。从表面上看，这个文件贯串了平等派的思想，从而这个文件的发表似乎是平等派原则主张的胜利，但实际上这不过是独立派高级军官的一种策略，他们暂时在理论上让步，用来赚取平等派士兵在组织上的服从。

在发表“军队的宣言”之后，广大士兵强烈地要求军队开进伦敦，对国会长老会派采取行动。然而克伦威尔对于这个要求一再推搪，他害怕军队到了首都以后士兵的声势进一步增长，更难以驾驭。但是未几长老会派议员在伦敦掀起反对独立派的骚乱（7月26、27日）。这样，克伦威尔再也无法抑制士兵的要求，于是决定向伦敦进军。军队在进军途中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8月6日清晨浩浩荡荡进入伦敦。在进入首都后，军队首先平定了长老会派所掀起的骚乱，然后清洗了长期国会中的11名长老会派首要分子。独立派开始控制了长期国会。

这样，国会同军队的斗争，长老会派同独立派的斗争，就以军队和独立派的胜利而告结束。此后，独立派与平等派之间的斗争开始占首要地位。

（四）平等派与独立派的斗争

早在8月1日独立派军官就以全军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政治纲领：“军队建议纲目”，其主要内容有：第一，解散长期国会，另选出新国会，但惟有纳直接税者方能参加选举。这无异剥夺了劳动人民的选举权，用意无非是保证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政治统治。第二，保留君主制及上院，但要限制国王的权力：由国会产生的国务会议向国会负责，而不向国王负责，国务会议有宣战、媾和和外交大权。8月末，独立派军官便以这个文件为基础与国王谈判，但是国王对于限制王权这一点很不满意，所以谈判失败了。

独立派与国王的勾结，引起了广大士兵的愤慨，他们猛烈地抨击独立派

军官。他们也反对“军队建议纲目”，并且在10月15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军队事业”，到10月下旬又提出更为激烈的纲领草案：“人民公约”。这两个文件内容要点如下：第一，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第二，解散长期国会，按普选制原则选出新国会，凡年满21岁及以上者均有选举权，只有保王党人例外；选区按人口比例重新分配。第三，取消上院，成立一院制国会，国会享有立法大权，有对外宣战及决定对外政策的权力，也有任免官吏的权力。下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不受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干涉”。第四，任何权力机构都不能干涉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不能强迫人民服兵役从事战争。第五，所有的人，不论其官职、财产、地位、出身的不同，都一律服从统一的法律。第六，取消对外贸易的独占制度，废除日用品的国产税。第七，停止圈地，把以前夺取的公社土地归还给农民，取消什一税。一句话，平等派士兵在这里勾画出一幅反映城乡劳动人民渴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诚然，纲领中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它没有要求改善农村中人口众多的公簿持有农的地位。但是它在17世纪中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纲领，对于鼓动群众斗争，推动革命深入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样，到1647年下半年，独立派和平等派提出截然不同的纲领，从而形成相持不下的对立局面。为了打开这个僵局，10月末11月初在伦敦郊区帕特尼举行了军队会议。在会上，唇枪舌剑，辩论得极其激烈。参加辩论的，独立派有克伦威尔和爱尔顿，平等派有雷因波洛上校、塞克斯比及军队外的平等派威尔德曼和配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政权形式和普选权。平等派在发言中一致要求消灭君主制，认为君主制是与自然权利学说及人民主权论格格不入的。独立派则主张保留受限制的王权，他们认为取消君主制将是一个可怕的跳跃，将导致国家的崩溃。爱尔顿说国王及上院的权力“是地上最合法的”，是由于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而产生的。双方锋芒相对，各不相让。

在讨论普选权问题时，独立派坚决反对普选权。爱尔顿声称：“我想，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权利是不存在的。我认为除了与这个王国经常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外，任何人没有决定王国事务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选举应该决定用什么法律来管理我们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凑在一起，实质上代表王国，从而应该选举代表。”爱尔顿所指的“经常与王国有利害关系”的人，实际上就是有财产的地主及工商业者。爱尔顿甚至不承认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他对人民抱鄙视的态度，他甚至狂妄地声称人民群众仅仅有权利享受“空气和地面上的生存空间”。他的观点遭到配第的有力反驳。配第说：“我们认为没有丧失出生权利的一切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选举权”。爱尔顿又以私有财产的捍卫者的姿态发言道：承认选举权的平等，结果将使财产受到侵犯，为了确保财产不受侵犯，就应该由土地所有者、商人、手工工场主来管理国家。独立派的另一个代表里乞说：不关心保存财产的人们的数目，比有产者的数目多五倍，如果前者享有选举权的话，他们选出的代表会轻而易举

地制定消灭财产的法律。为了反驳独立派的这个论点，平等派在会上一般地都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且配第还说：实行普选权不但不会造成财产的消灭，而且还有助于私有财产的保存。平等派雷因波洛痛陈剥夺人民的选举权的坏处，他指出：剥夺大多数人民参加投票的权利，将造成英国的暴虐统治，其专横跋扈将不减于过去的专制王权。他还说：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投票权不是财产而是理智。否定一个人的投票权，就是否定他运用他的理智的权利。他还引用自然权利学说及主权在民的思想为普选权辩护。塞克斯比主张一切英国人都参加选举，而不应以财产多少为转移，他断然反对剥夺贫民的选举权。

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

11月5日，趁克伦威尔缺席的机会，军队会议在平等派的坚持下通过了召开全军大会来表决是否接受“人民公约”的决定。

为了破坏平等派的计划，高级军官下令军队分为三个部分，分期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举行军事检阅，为的是避免平等派利用全军大会达到表决“人民公约”的目的。平等派又决定利用军事检阅的机会举行武装示威，强迫高级军官接受“人民公约”。

本来军事统帅部只指定七个团队在威尔集会接受检阅，平等派却发动了另外两个团队来参加。这九个团队的士兵都在帽子上贴着“人民公约”全文。11月15日，当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出现在检阅场时，平等派下级军官雷因波洛便从团队中走出来，准备把“人民公约”交给费尔法克斯，但是被克伦威尔部下的军官推开了，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对每个团队都讲了话，号召士兵们服从命令把“人民公约”拿掉，并且要求他们在关于服从长官命令的誓词上签名。在听完讲话之后，原来的七个团队服从了总司令的命令，在誓词上签了名，并且自动取下了“人民公约”，但是另外两个团队的士兵却拒绝这样做。不过，他们只是消极地不服从，而没有积极行动起来。克伦威尔为了防止士兵转入行动，便决定采取威吓手段，他突然拔出剑来闯到士兵队伍中间，严厉命令他们抛掉帽子上的“人民公约”，他自己还动手去撕，并且当场逮捕14名平等派积极分子，就地组成军事法庭把其中三名士兵判处死刑。其中一个人（阿诺尔德）当场处决，另外两个人后来被减刑。如英国历史家迦狄诺所说，克伦威尔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叛乱军队的秩序重新恢复起来”。

因此，平等派士兵与独立派军官之间的斗争，就以独立派的胜利而告终。平等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独立的组织和领导权。他们只知高唱民主原则，而忽视了现实的权力，在组织和领导权问题上任凭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摆布。高级军官们虽然在争论原则问题时，有时也有些让步的表现，但是在领导权问题上寸步不让。当克伦威尔一步一步地把平等派从领导机构中排挤出去之后，就运用这个领导地位的权威，把平等派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本来平等派在1647年成立鼓动员组织

后，就应该把它巩固和发展下去，并且以此为中心把士兵群众和社会上的小资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斗争组织领导起来，摆脱高级军官的控制。如果这样做，平等派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还是有可能的。

这次平等派虽然一败涂地，但是他们在 1647 年所进行的宣传和斗争，还是意义重大的。它大大提高了城乡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政治觉悟。平等派的主权在民及共和主义思想成了人民群众一致奋斗的目标。1649 年处死国王、取消上院及宣布共和国，都体现了平等派的主张。

（五）第二次内战与共和国的建立

独立派与平等派之间的斗争，给保王党人以可乘之机。他们积极布置力量，准备挑起新的内战，以图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但是，保王党人认识到：要想在新的内战中取得胜利，必须借助外力，于是他们又和苏格兰人勾结起来。原来苏格兰人最初起义是为了反对英国国王的专制暴政，但是后来随着英国革命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平等派影响的扩大，苏格兰起义者内部发生分化，代表北部封建地主的右翼分子开始倾向英国国王，并且决定干涉英国革命。1647 年 12 月，他们与被监禁在怀特岛的查理一世达成协议，约定苏格兰派军队联合英国保王党人发动第二次内战。

1648 年 2 月，保王党人在南威尔士举行叛乱，潘布洛克要塞很快地落到保王党人手中。第二次内战就这样揭幕了。5 月 21 日，保王党人又在肯特举行大规模的叛乱，占领了许多城市，并且准备攻打伦敦。英国北部巴尔维克也落到保王党手中。7 月，苏格兰军队大举入侵，并与英国保王党队伍互相配合，使战争蔓延起来。

新的内战迫使平等派与独立派成立新的同盟。但是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本来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在镇压平等派之后，无意与平等派和解，而对查理一世仍抱有幻想，和他一直保持联系，希望他能接受立宪君主的地位。只有在 1647 年 11 月 21 日截获了国王给王后的信之后，他们才断绝了与国王的联系，因为从信里知道国王宁愿得到苏格兰人的支持，也不接受克伦威尔的条件。但是只有到 1648 年春第二次内战爆发后，克伦威尔才决定与平等派重新联合。这一年 4 月 29 日在温莎举行军官会议，并且邀请平等派军官及士兵鼓动员参加，在会上双方一致决定同心协力消灭保王党人，把查理一世交付法庭审判定罪。独立派军官为了得到平等派的支持，答应在战争胜利结束后实现“人民公约”。

温莎会议是平等派与独立派重新合作的开始，两派的合作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各地保王党叛乱一个接一个被平定。克伦威尔的军队又在普列斯顿战役中击溃了苏格兰军队。1648 年 9 月末，克伦威尔的军队直捣苏格兰的爱丁堡。到年底，第二次内战又以革命阵营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次内战结束后，长老会派又成为平等派与独立派必须对付的共同敌

人。原来早在这次内战前夕，当平等派与独立派之间的斗争难解难分之际，长老会派分子又乘机在长期国会中活跃起来，并且不久又取得国会中的统治地位。而且在第二次内战中，他们成了内奸，百般地阻挠战争的进行，特别在军事供应方面故意制造困难，使得克伦威尔非常苦恼。长老会派实际上已堕落后为反革命了。因此第二次内战结束后，推翻国会中的长老会派的统治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但是，平等派与独立派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后者的目的只限于推翻长老会派的统治，以建立独立派的统治，而前者不仅要求推翻长老会派的统治，而且也要求把“人民公约”付诸实现。不过，为了取得平等派的支持以便与长老会派作斗争，独立派不得不向平等派让步，1648年11月18日举行的军事会议通过了独立派军官所草拟的“军队抗议书”，其主要内容是要解散长期国会，选出新的国会，并主张下院应享有最高权力。但是它没有具体规定新的国家形式及普选制。

为了推翻长老会派统治，1648年12月，军队第二次进入伦敦，12月6日清晨，普莱德上校率领步兵和骑兵部队包围了国会。普莱德手持名单，按名单驱逐长老会派议员96名，同时逮捕了47名长老会派议员。结果，在下院只剩下独立派及支持它的议员50人左右。因此此后这个国会得名为“残阙国会”。这意味着独立派重新掌权。

长老会派统治倒台后，处理国王的问题又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在广大人民心目中，国王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敌人，平等派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建议处死国王。1648年12月下旬，独立派上层分子开了几次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当时他们另有打算：让查理一世退位，由其子哥洛塞斯特侯爵（时年十岁）继承王位。这显然是在玩弄手法以图保留君主制。克伦威尔本人起初也无意坚决镇压国王。但是后来他的态度转变了，主张严惩国王。这首先是广大人民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当时许多郡的人民及士兵一致要求把国王作为元凶明正典刑。特别是伦敦北郊区的小手工业者、工匠、学徒工、工人及贫农的态度最为坚决。克伦威尔态度之转变，也是由于国王在1646年3月写给他的一个亲信大臣的信被发现了，信上有这样的话：“我努力争取回到伦敦，……我有可能把长老会派或独立派拉到我这方面来，消灭这一个或那一个，好再成为真正的国王，这不是没有希望的”。这使得过去一直对国王抱幻想的克伦威尔开始认识到保留查理一世的危险性。因此，克伦威尔接受人民的要求决定审判国王。

1648年12月23日，根据克伦威尔的命令，国王被押到伦敦附近的温莎城堡，等候受审。1649年1月1日，下院通过决议，宣布国王为反对国会和发动内战的罪魁，成立最高司法裁判所以审判国王。但是第二天上院否决了下院的这个决议。

针对上院这个行动，下院在1月4日又通过决议，宣称：“在上帝明鉴下，人民是一切公正权力的来源……集合在国会里、为人民选出并代表人民

的英国下院，在这个国家享有最高的权力；……下院所制定的或宣布的任何法律都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民都受这些法律的约束，尽管没有得到国王或上院的同意或批准”。这个决议剥夺了上院的“否决”的权力，宣布下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就使得下院1月1日的决议获得法律的效力。下院的决议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1月5日伦敦市民向国会递交请愿书，赞成下院通过的关于审判国王及国家最高权力属于下院的决议。

为了执行审判国王的决议，很快地成立了“最高司法裁判所”，克伦威尔及一些独立派军官都被任命为审判官。1月20日审判开始。在审判的日子里，不但长老会派表示抗议审判国王的举动，而且独立派中也有许多人不敢把国王治罪。但是人民群众天天麇聚在法庭附近，不断向独立派法官施加压力。每逢国王进出法庭，群众便频频高呼：“审判和处死！”在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最高裁判所决定判处国王死刑。

1月27日，法庭举行最后宣判。在宣读判决书之前，主席布拉德肖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法律高于国王，而国会高于法律，因为法律是代表人民的国会所制定的，从而法官根据法律审判国王是合法的。布拉德肖在结束发言后，便叫秘书宣读判决书，其中有言：“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及国家的敌人，应该被斩首”。

30日，查理一世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被斩首示众。

国王伏法之后，英国在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共和国，而且这时独立派也无法拒绝共和国了，因为如果他们竟敢拒绝的话，便不可避免地激起人民愤怒的爆发，独立派的统治便岌岌可危。

2月6日，下院讨论上院存在的问题时，以克伦威尔为首的下院议员曾建议保留上院作为咨询机关，但是这个建议被44对29的多数票否决；于是下院通过了取消上院的决议。

2月7日，下院又通过了关于取消君主制的决议，决议宣称：“经验证明：……在这个国家，国王的职位及与他相联系的政权之属于任何一个人，都是无益的，对于这个国家的自由是难以忍受的和危险的，因此它应该被取消”。

关于取消上院及君主制的两项决议，在3月17日及19日分别被批准为法律。于是英国便成为“没有国王及上院”的一院制共和国了。

但是，处死国王及取消上院和君主制，距离平等派的“人民公约”的要求还很远，因为独立派并没有解散长期国会，更没有宣布普选制和在普选制原则的基础上选出新的国会。

在2月7日，下院还通过了关于设立从属于下院的国务会议的决定。2月13日，国务会议正式成立，参加国务会议的有41个人，其中压倒多数是独立派领袖，如克伦威尔等人。在法律上，国务会议不过是国会的下属机关，应该执行国会的指示及命令，但实际上国务会议支配全部陆海军，其职权无所不包，可以说凌驾于国会之上。

第三节 从共和国到 1688 年革命

（一）共和国时期的人民运动

独立派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后，竭力把这个共和国变为独立派独掌大权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说明它是为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服务的。

和以往的长老会派国会一样，独立派政府并不想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它继续拍卖教会、国王及保王党人的土地。在拍卖的过程中规定了种种限制，使大块土地落到资产阶级新贵族手中，同时却保留了农民的封建义务。

共和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积极推行侵略政策，为的是替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海上贸易权和建立世界霸权。从 1649 年到 1651 年建造一支大舰队，并且装备了 40 艘军舰。当时英国的劲敌是荷兰。17 世纪的荷兰有“海上马车夫”之称，荷兰商人垄断了对英国海外殖民地的贸易，从中获得大量的利润。针对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在 1650 年和 1651 年颁布了两次重要法令——“航海条例”。1650 年的法令禁止外国人不经英国政府的许可而和英国殖民地进行贸易；1651 年的法令宣布：欧洲以外地方的商品，只有由英国船员管理的英国船装载，才许运入英国的领土；而欧洲国家的商品，或者用英国船，或者用生产该项商品的国家的船装运，才可以运到英国的领土。这些法令的目的是想把荷兰从英国对其殖民地和欧洲各国的贸易中排斥出去。荷兰当然不肯承认英国的“航海条例”，因此在 1652 年发生了英荷战争。战争的结果，英国胜利了，根据 1654 年的和约，荷兰不得不接受英国的“航海条例”，而放弃了海上贸易垄断地位。

独立派共和国竭力为资产阶级谋利，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却视若无睹，因此在共和国成立之后，群众运动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一个新的人民运动兴起了，那就是“掘土派运动”。如前所述，长期国会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共和国成立后，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这便是“掘土派运动”出现的背景。

掘土派的领袖是杰拉德·温斯坦莱，他认为土地私有是贫困的根源，所以他主张实行土地共有制。他这种思想反映了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掘土派还用实际行动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成群结队地开垦荒地，想在自己所开垦的土地上实行土地共有制度。但是到 1651 年，克伦威尔的军队用暴力手段把他们镇压下去了。掘土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提倡不抵抗主义。

在共和国成立后，平等派运动又活跃起来了。原因是：第一，1649 年独立派虽然在人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宣布成立一院制的共和国（这是平等派的纲领要求之一），但是并没有遵照他们的诺言把“人民公约”全部付诸实施。

所以平等派不能不再再接再厉为实现自己的全部纲领要求而斗争。第二，城市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这是沉重的间接税、粮价上涨及失业造成的。据当代人记载，在兰开夏，粮食极度缺乏，因之许多人死于饥饿。相反地，资产阶级新贵族却利用国家的混乱，在投机事业中发了大财。冷酷的现实教育了人民大众，并且推动平等派走上了新的斗争道路。

早在 1648 年 12 月，李尔本在《保卫共同权利和自由》这本小册子里就揭发独立派的背信弃义的行径。下院在 1649 年 1 月 5 日通过决议，禁止平等派出版小册子，于是平等派又在 1 月 19 日向下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出版自由。2 月 2 日，军官会议建议下院颁布法律严惩在军队中煽动“骚乱”的平等派分子。但是平等派毫不气馁，坚持斗争下去。李尔本又发表新的小册子：《揭发英国的新枷锁》，并且在 2 月 26 日以请愿书的形式提交给国会。李尔本在这里无情地攻击独立派共和国，他特别反对新成立的国务会议，担心这个不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国务会议有“使自己的政权永久化并且永远消灭国会本身的意图”，因为“支配全部陆海军”的国务会议“将有极大的可能把自己变为绝对的和不负责任的”机关。他写道：“国会的一半权力已经为国务会议所吞噬了”。他要求解散国务会议，建议在短期内任命一个委员会以代替国务会议，这个委员会应该向国会负责。他还要求国会议员凡身兼军职者应该辞去军职，这显然暗中指克伦威尔而言，这是因为李尔本害怕独立派军事统帅克伦威尔利用其在国会中的地位建立军事独裁。可见李尔本早在 1649 年初就已预见到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的可能性。

3 月 24 日，李尔本又发表了《揭发英国的新枷锁》第二部分。在这里他虽然继续攻击国会，但是在攻击国会的同时，还向国会呼吁，希望它保卫人民的自由，免受高级军官的侵犯。他还号召人民起义，推翻这些篡夺政权的人们的统治。他谴责共和国的统治者在劳动人民及贫民的福利方面什么事也没有做，并且质问当政者及独立派军官在拍卖主教及保王党人土地时以廉价抢购土地的行为。在结束语里，李尔本表示希望下院从速审查“人民公约”并付诸实施。

长期国会不但没有听取李尔本的劝告，反而在 3 月 28 日逮捕了李尔本和欧佛顿等人。不久又由国务会议进行审讯。李尔本在受审时，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气概，他拒绝在国务会议委员面前脱帽，否认国务会议有审判他的权利，他要求在答辩时给他以完全的自由。

李尔本等人的被捕，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抗议。3 月 30 日有 3 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送达国会；4 月 2 日，下院又收到签名者不下 8 万人的请愿书。这两份请愿书都要求释放李尔本等人。到 4 月 23 日，更有数百名妇女手持请愿书在国会附近示威，并想闯进国会大厦。这些请愿者多数是手工业者、小商人、工匠及城市贫民的妻子。

逮捕李尔本，在平等派士兵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决定用武装起义回答独立派当政者的暴政。在起义之前，他们在 5 月 1 日发表了一部新的“人

民公约”，其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原则，是以前发表的“人民公约”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几年来的阶级斗争中形成起来的平等派的全部政治纲领。

按照新的“人民公约”，“国家最高权力属于以平等的比例代表制为基础而选出的、有400名成员的代表机关”。在平等派以前，从来没有任何其他政党提出过按人口为比例选举代表的要求，这可以说是平等派的创举。它还规定：“21岁及以上的一切男子均应享有选举权，但仆役及取得布施的人却是例外”。行政官吏、军官及财务人员没有权利被选为代表机关的代表，同时，代表亦不应该兼军政职务或从事司法工作，这个文件特别强调行政与立法两个机构划清界限，因为二者的合一将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压迫人民的”。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平等派的用意是实现三权分立，以防止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权力集中在一个机构手中。此外，又规定：任何代表都不能连选连任，这是为了“避免由于同一个人继续当权所带来的许多危险及不便”。

新的“人民公约”主张成立一院制的国会，一年改选一次，这是因为平等派看到长期国会由于多年掌政而流于专权。新的“人民公约”还规定：在国会休会期间设置国会委员会，以避免行政机关在国会休会期间侵犯国会的职权。行政人员必须向国会报告自己的工作，也不许国会干涉行政事务。

从人民主权思想出发，平等派特别注意限制国会的权能，以防止它侵犯人民的自由权利。他们要求保障出版自由及宗教自由，并且宣布一切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他们也要求贸易自由，反对独占专卖制度。这反映了中、小商人的要求，因为在特权独占制度下，中、小商人是无权参加国内外贸易的。

新的“人民公约”还宣布：任何政府都无权“平均和破坏人们的财产，或者使一切东西成为公有”。

新的“人民公约”在当时是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纲领，为即将举行起义的平等派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及行动纲领。

起义爆发于5月上旬，起义是几个军团分别举行的。牛津郡的起义者在汤姆逊大尉的领导下还发表了一个义正词严的宣言，严厉谴责当政的独立派破坏自己的诺言的行为。宣言指出：起义的目的便是“把英国从刀剑的政权下面解救出来，保卫‘权利请愿书’，释放非法监禁的人们，改善贫民的生活”，以实现新的“人民公约”的全部要求。它还警告说：如有人胆敢伤害李尔本等人，就将以严厉手段对待他们。它又说：一旦按照新的“人民公约”的原则选出人民代表机关时，起义者将立刻放下武器。

独立派政府对待起义者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进行无情的镇压，另一方面表示将接受起义者的要求，尽早解散长期国会和选出新的国会。其实这些表示都是骗人的，目的在于瓦解起义者的斗志。

结果，到5月中旬起义便被镇压下去，起义领袖之一汤姆逊在英勇的抵抗中牺牲了。

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第一，平等派的纲领只强调政治民主，而忽视了广

大贫民的经济要求，因而失去了他们的支持，而且起义者也未能主动去联系群众。第二，平等派领袖李尔本等人被囚在狱，起义者失去有力的领导。

到 1649 年秋，平等派又举行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发生在两个地方：在牛津发生的是英格尔斯比军团的士兵起义，在瓦塞斯特郡发生的是骑兵旗手平等派狄恩所领导的人民起义。牛津起义士兵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经济要求：解散现存的国会，以平等派的“人民公约”为基础选出新的国会，恢复全军会议，而且必须有士兵鼓动员参加；立即废除教会什一税；取消国产税；发下欠给士兵的薪金。

但是，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也以失败告终，两地起义都先后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起义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平等派有致命弱点：它没有得到多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支持。这是因为平等派未能提出具体的土地纲领，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

在镇压平等派起义后不久，国务会议又审讯了李尔本。李尔本在审讯中表现了迥非寻常的渊博的法学知识及辩才，他的发言不止一次使法官及有经验的律师张口结舌陷入窘境。他一个接一个驳倒了对于他的控告。检察长为了证明他有罪，要求在法庭上宣读他所写的小册子中攻击政府的词句。但这却起了煽动宣传的作用，使得参加旁听的听众及陪审员不由自主地对李尔本发生好感和敬意。最后，陪审员宣判李尔本无罪。

平等派的失败，给英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前所述，英吉利共和国是在人民运动——平等派运动的强有力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而平等派运动的存在，又是共和国的有力支柱。现在平等派消灭了，那末共和国制度也就失去了一个可靠的保障。这就为克伦威尔在 1653 年推翻共和制度和建立军事独裁铺平了道路。

然而，共和国的覆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英国远征爱尔兰。

（二）远征爱尔兰与共和国的覆灭

英国早在 12 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对爱尔兰的侵略。通过几次侵略，英国在爱尔兰的东部及东南部建立了殖民统治。英国人的殖民压迫不断引起爱尔兰人的反抗。1641 年，乘英国发生革命的机会，爱尔兰人发动了反英起义，并且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本想马上派兵去镇压爱尔兰起义，但是国内炽烈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一时腾不出手来。只有到 1649 年共和国成立后，英国才决定远征爱尔兰。远征的目的是：镇压起义及粉碎英国保王党人的复辟阴谋。因为在 1649 年宣布废除君主制之后，英国保王党复辟势力便与爱尔兰人勾结起来，企图以爱尔兰为基地，扑灭英国革命，以实现其反革命复辟的目的。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之决定举行这项远征，还有其不可告人的动机：首先想掠夺爱尔兰的财产及土地，其次是想借远征

爱尔兰之机会，瓦解平等派运动（当时平等派尚未最后失败）。在他们看来，为了瓦解平等派运动，把平等派士兵调出国外，是个最好的办法。

1649年4月，克伦威尔下令调一部分军队参加远征，但是遭到平等派士兵的严词拒绝，因此远征一事暂时搁置下来。只有在镇压平等派五月起义及清洗军队中的民主分子之后，英国政府才得以得心应手地举行远征。因此，爱尔兰远征一开始便包含有反动的、侵略的性质。

1649年8月，英国军队在克伦威尔亲自率领下开始了侵略爱尔兰的远征。战争历时三年（1650年克伦威尔回国，把指挥大权委托给其他军事统帅），到1652年5月终于征服了爱尔兰。

英国侵略军在爱尔兰到处遇到英勇顽强的抵抗。为了摧毁爱尔兰人的抵抗，克伦威尔是不择手段的，有时烧光田地谷物，想制造饥饿去打击爱尔兰人的斗争意志；有时也使用外交诡计及政治欺骗，制造对方内部的矛盾；有时用贿赂及虚伪的诺言去分化爱尔兰人及涣散其组织。而更主要的是用残忍手段去屠杀爱尔兰人，以图消灭其抵抗的意志。骇人听闻的暴行，是数见不鲜的。在攻陷德洛盖德后，克伦威尔下令屠城，屠杀持续了两天。有一次英军放火焚毁圣彼得教堂的钟楼，里面有80人被活活烧死。躲在该教堂中的一千多名居民大部分惨遭杀害，侥幸不死者，也都被运往西印度群岛卖为奴隶。在攻破威克斯福德的时候，英军仅在大街上和广场上就杀死二千多人。

在征服爱尔兰之后，英国侵略者便开始有系统地没收爱尔兰起义者的大量土地。这些没收来的土地有一半分给军队，其中大部分落到军官手中，只有微不足道的少量土地为士兵所得；另一半土地被送给伦敦大商人，作为偿债之用，因为在内战期间长期国会曾借过他们的债。克伦威尔本人也在爱尔兰取得1000英亩的土地。这些英国新地主们把英国古老的封建土地关系全盘搬到爱尔兰，对爱尔兰佃农进行了残酷的封建剥削。

英国的侵略及掠夺，给爱尔兰人民带来了浩劫。爱尔兰人从1641年到1652年由于战争而丧命者达五十多万人。经过兵燹战祸而活下来的人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据当时人记载，“……贫民遍于全国各地；有些人常常吃马肉及草类，有些人饿死在大道上；时常有失掉亲人或为亲人所遗弃的穷孩子受到命运的专横摆布；其中有些孩子还成为狼和其他野兽及肉食鸟的虏获品”。

英国大规模没收爱尔兰土地的结果，爱尔兰的基本群众沦为佃户，他们通过中间人从英国大地主那里租来小得可怜的地段，地租高得惊人，条件极为苛刻，因而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但是，英国之远征及掠夺爱尔兰，反过来对英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英国许多军官及伦敦大商人成了爱尔兰的大封建地主，他们时时刻刻感到爱尔兰起义的威胁，最害怕的是有一天爱尔兰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在他们看来，只有在英国建立军事独裁的统治，才有可能确保爱尔兰的“安全”。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克伦威尔身上，因为后者在远征爱尔兰的过程中，表现出

卓越的军事才能。第二，参加远征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也受了不小的影响。尽管他们分到的爱尔兰土地数量极少，但是究竟得到一些便宜因而丧失了以往的革命精神，这也使得军事独裁的建立，减少了不小的阻力。第三，克伦威尔本人也由于变成了爱尔兰的大封建地主，而开始失去了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领袖所具有的那种革命精神。而且这次远征胜利是他指挥的结果，这也使他增长了当独裁者的野心。一句话，侵略爱尔兰的结果，为在英国推翻共和制及建立军事独裁铺平了道路。

1653年，克伦威尔在军官们及伦敦大商人的拥戴下，用武力把长期国会解散，自己就任为护国主。护国主是终身职，他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并且把立法行政及军事大权集于一身。因此，护国政体在本质上是半君主制的军事独裁的一种形式。

尽管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国会之后，又不得不召集新的国会，但是在护国政体下，所谓国会不过是一种点缀品，护国主的权力高高凌驾于国会之上，护国主的话就是法律。他的统治工具便是赤裸裸的武力，他把全国分为11个军区，实行军事管制，全国几乎变成了一座大军营。

在护国主的军事专政统治下，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强了。言论自由被禁止了，民主思想遭到禁锢，其严厉程度比之革命前的专制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护国主的统治也为后来封建复辟铺平了道路。

护国政体的阶级基础是在革命期间及征服爱尔兰期间得到土地的大地主阶级。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的任务便是保卫这个阶级的利益。但是同时，克伦威尔也在大资产阶级身上寻找自己的支柱，为了向大资产阶级讨好，他在1655年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英国海上远征队远渡重洋，占领了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牙买加岛。1658年英军又在欧洲西海岸摧毁西班牙军队，占领了“大陆的钥匙”——敦刻尔克。

克伦威尔替英国资产阶级奠定了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基础。

（三）保王党人的活动与1660年的复辟

在共和国成立之后，被推翻的封建贵族、国教教会僧侣及其总代表——斯图亚特王朝，一刻也没有放弃复辟的念头。

1649年共和国刚一宣布成立，保王党人就以约克郡（英国北部）的朋特弗拉克为根据地开始了活动。他们准备发动新的叛乱，想拥戴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斯图亚特（当时住在外国）在英国复辟。而且，长老会派分子也参加了保王党人的行列，这更增大了复辟势力的声势。

针对这个情况，共和国政府在1649年4月采取了果断的措施：逮捕了几名首要的保王党人，有的处死，有的监禁，有的驱逐到国外去。这就给复辟势力以很大的打击。然而保王党人并不死心。他们又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干涉上面。查理一世的妻子亨利·玛丽住在法国宫廷里，极力怂恿法国专

制政府干涉英国革命，帮助查理一世的儿子恢复在英国的王位。但是由于法国在 1648~1653 年间发生了“投石党”运动，法国国王力不从心，所以干涉英国革命的计划流产了。

但是，复辟势力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反革命目的，他们又勾结爱尔兰，企图利用爱尔兰的反英起义，来达到复辟的目的。当然，由于爱尔兰被英国征服，这个阴谋也破灭了。于是，他们又与苏格兰封建势力勾结起来。1650 年 5 月，苏格兰人与查理·斯图亚特达成协议，苏格兰人答应帮助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复辟。6 月初，查理本人也来到了苏格兰。

得知这个消息后，克伦威尔又决定远征苏格兰。1650 年 7 月开始远征，9 月英军在登巴尔附近打了一次胜仗，到 1650 年年底苏格兰的整个平原地区都落到英军占领之下。苏格兰军队退到北部山地，然而在 1651 年初正式拥戴查理为苏格兰国王，准备继续负隅抵抗。这一年 7 月英军直接北上，但是这却给苏格兰军队开放了南下的道路。8 月，有两万苏格兰军队在查理本人的统率下，越过国境，来到了英国北部，查理本来幻想在来到英国之后会得到居民的支持，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英国人民再也不愿把专制制度的枷锁重新套在自己的头上了。同时，苏格兰军的入侵，更意味着对英国人的民族感情的打击。甚至不满独立派共和国统治的人们也激发出民族感情来。因此北部及中部诸郡的居民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民兵，以抵抗苏格兰军的入侵。1651 年 9 月，入侵军在瓦塞斯特地方陷入英国强大兵力的包围之中，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查理一个人逃走了，他在保王党人的帮助下，渡海逃到法国。瓦塞斯特战役决定了苏格兰的命运，此后，局面越来越不利于苏格兰。英军占领了整个苏格兰，到 1652 年 5 月，苏格兰人停止了最后的抵抗。1654 年，苏格兰被合并于英国。

英国征服苏格兰，意味着英国复辟势力又一次被挫败。

但是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蛰居在法国，准备时机一到，东山再起。1660 年，英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为复辟创造了方便条件。

1658 年，护国主克伦威尔死去，他的儿子理查德继承为护国主，于是政局马上动荡起来。理查德是个无能之辈，高级军官都不服从他。他不久知难而退，政权便落到高级军官手中，但是在高级军官之间，又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彼此明争暗斗，吵个不休。这种情况就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利用这个机会，人民运动又高涨了，平等派分子又恢复活动，他们甚至准备新的武装起义，以推翻军人的统治。在外省，从 50 年代后期又爆发了农民运动。在东部地方，农民与圈地的地主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砍伐地主的森林，夺取他们的猎园，作为耕地。全国出现了农民运动的新高涨。因此，英国又处在人民革命的前夕。资产阶级、新贵族都惊慌失措，特别是在革命中独吞了胜利果实而发了大财的人们，都害怕自己的财产受到侵犯。他们发现眼前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他们认为只有

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才能出现这样的社会秩序。所以他们决心迎接查理·斯图亚特回国复辟。

资产阶级新贵族之要求旧王朝复辟，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护国时期，克伦威尔连年进行对外战争，维持了庞大的军队，因而增加了有产阶级的赋税负担，这就使得他们厌倦军事统治，他们感到复辟后就可以改变这个局面，并且可以带来和平。第二，新贵族虽然是资产阶级化了，但是毕竟还是贵族，与旧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富于对旧王朝的妥协性，从而他们之要求复辟，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为了迎接旧王朝回来，没有武力是不行的，最后他们找到了这样的武力，那就是蒙克将军的军队，这支军队当时驻扎在苏格兰。蒙克将军本来就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在内战期间曾站在国王方面与国会军队打过仗，后来虽然钻进革命队伍，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君主制的念头。他曾用全力肃清自己军队中的民主分子，以便使自己的军队成为一个帮助复辟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这些情况，英国有产阶级都是有所耳闻的，因此他们便邀请蒙克率领军队来伦敦帮忙。1660年2月，蒙克军队进入伦敦，接着便大规模逮捕人民运动的领袖。在用铁的手腕控制了局势之后，便派专人到法国与查理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复辟的协议。同年4月，查理在布列达发表了宣言，他在宣言中宣布：大赦一切革命参加者；保障宗教自由；对于在革命期间发生的土地财产上的变动，予以保障。实际上，这些诺言都是骗人的，用意是为了骗取英国国内有产阶级的信任。而后者竟天真地相信他的这些诺言，同意了上述协议。1660年5月25日，查理带领一群流亡的保王党人回国，并且在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拥戴下，登上了王位，称查理二世。于是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复辟时期。

（四）1688年革命

查理二世狡诈阴险，他念念不忘恢复革命前的专制主义统治，但是他同时又害怕得罪资产阶级新贵族。这就决定了他在对内政策上面的矛盾性质：一方面在经济上不得不按照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行事，另一方面疯狂地推行政治上宗教上的反动政策。

166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在立法程序上确认了1646年长期国会通过的关于取消骑士领有制的法律。1660年和1662年，国会又先后通过“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目的在于把北美殖民地变为英国工业的市场及原料品供应地。国会通过的这些法律都为查理二世批准了。

为了保护英国的呢绒工业，1661年和1662年，英国政府下令严格禁止羊毛出口，违反者以刑事犯处理。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政府也禁止皮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同时也无条件地禁止外国工业品如麻布、呢绒等输入英国。

为了照顾新贵族及农业资本家的利益，又提高谷物入口税。1660年国会颁布“谷物条例”，规定：国内小麦价格1夸脱不超过44先令时，征收2先令的入口税，超过44先令时，课以4便士的入口税。1670年更规定：小麦1夸脱不超过53先令4便士时，征入口税16先令，在53先令4便士至80先令之间时，征收8先令，超过80先令时，征收4先令。这样，使得新贵族及农业资本家有可能更多地剥削国内广大的粮食消费者。

政府对于继续开展的圈地运动也不加禁止了。

因此，在复辟的年月里，英国的原始积累迅速地进行着。在1660年至1688年间，英国的贸易、工业生产及商船吨数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但是，在经济上照顾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查理二世最关心的是斯图亚特王朝及封建贵族的利益。因此，在复辟后不久，他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

首先他宣布：凡参加审判查理一世的人，都是“弑君者”，“弑君者”不按大赦处理。后来他又把一切共和主义者及参加革命的人都包括在“弑君者”的范围之内。在查理二世的指使下，对于所谓“弑君者”进行惨无人道的报复：凡活着的人，均处以死刑，对于已死者，也不留情：1661年末，把克伦威尔的尸首从坟里掘出来，然后枭首示众。反革命白色恐怖越来越凶，大批革命人士为此而不得不逃到国外避难。其次，查理二世的政府公然宣布恢复国教教会，并且对非国教教徒进行种种迫害：规定不信奉国教的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对宣传其他宗教的人，处以罚金或监禁。最后，查理二世还下令由政府出钱赎回被长期国会没收及出卖的教会及保王党人的土地。但是这在实施上有许多困难，因为这类土地往往经过几次转手，原来的主人要想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需要办理很多的麻烦手续，而且手续费也是多得惊人的，因此他们多数宁愿和新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交涉，以获得一定的赔偿为条件而放弃以前的土地。

此外，查理二世还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亲法政策：当时法国是英国海外贸易及海外殖民方面的最大的竞争者及威胁，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要求在对外政策上打击法国，用政府力量消灭法国的海外势力，并且夺取法国海外殖民地。但是查理二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但不替英国资产阶级打击法国这个竞争者，反而和法国维持亲密的外交关系，甚至出卖英国国家利益给法国：1662年他把克伦威尔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重要商港——敦刻尔克出卖给法国，只得到20万镑的钱。这就使英国大商人失去大陆贸易的重要根据地。

查理二世之所以采取亲法政策是因为他过去亡命国外时，一直靠法国国王的津贴生活，在复辟后仍旧暗中接受法国宫廷的补贴：每年达20万镑。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骨子里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复辟后也时时刻刻没有忘记恢复革命前的专制统治。他把希望寄托在法国国王身上。希望时机一到，靠法国的帮助来达到这个目的。

查理二世的反攻倒算及卖国的亲法政策，在资产阶级新贵族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但是更使他们无法容忍的是他的恢复天主教的企图。

1670年，查理二世与法国国王订立了“都佛密约”，规定：查理二世有义务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而法国国王则有义务在英国国内发生“骚动”时，派法国军队前往镇压，这实际上就是帮助查理二世恢复专制制度。1672年，为了执行这个密约的规定，查理二世颁布了“容忍宣言”，宣布国王有权恢复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英国天主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恢复天主教的先声。查理二世恢复天主教的企图，使得资产阶级新贵族寝食不安，这是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则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买到天主教寺院土地的大商人及新贵族势必要归还这些土地，至于天主教本身不适合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活动，那更不待言了。这样，资产阶级新贵族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尖锐地批评“容忍宣言”。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查理二世不得不在1673年撤销这个“宣言”。

查理二世无子嗣，乃弟詹姆士成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詹姆士是天主教徒，一旦继承王位，他之恢复天主教，自是意中的事。为了杜绝天主教恢复的可能，1679年5月，国会里的资产阶级新贵族代表提出了所谓“排斥法案”，要求取消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永远禁止他回国，否则以叛国罪论处。在国会内拥护该法案的被称辉格党，而反对者称托利党。为了预防辉格党人被逮捕，辉格党人促使国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该法规定：如果没有法院发出的拘票，任何人都不能被逮捕；被逮捕的人在受审之前的拘留期不得超过一定的时日，换言之，对于依法逮捕的人，必须及时提交法院审讯。这个法律对于保护人身自由具有很大的意义。

1680年11月15日，下院以多数票通过了“排斥法案”，但是上院多数议员却把它否决了。

1685年查理二世死了，詹姆士即位，是为詹姆士二世。他在即位后，便取消了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并且降低了对法国的商品征收的入口税率。工商界对此极为愤慨。詹姆士二世也和查理二世一样，从路易十四那里领取补助金，并且更加明目张胆地着手实行恢复天主教的计划，以便履行查理二世所曾应许的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诺言。路易十四当时也通过代理人煽动詹姆士二世加速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作为恢复天主教的计划的第一步，便是任命天主教徒为军官。

这个措施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它引起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猛烈反对，因为天主教比国教更反动，更不利于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经济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它也遭到过去一贯追随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王党人（封建贵族及国教僧侣）的反对，这是有特殊原因的：首先，国教僧侣担心天主教一旦恢复，国教教会就要让位给天主教会，自己的教会职位及收入就大成问题。其次，在大封建贵族中间还有许多人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被赠予天主教寺院的土地，他们害怕随着天主教会的恢复，自己的土地也有丧失之虞。

因此，为了阻止天主教的恢复，也为了防止英国君主作出任何违反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事，到 1688 年，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辉格党人便和代表国教僧侣及封建贵族的托利党人联合起来，他们决定发动一次革命：废黜詹姆斯二世，而迎接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荷兰执政威廉到英国来，尊之为英国女王及国王。他们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第一，荷兰是法国海上贸易的死敌，如果威廉任英国国王，英荷两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法国这个竞争者。第二，威廉是新教国家荷兰的元首，玛丽是国教教徒，他们夫妇入主英国，可以杜绝天主教的恢复。第三，玛丽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有继承王位的权利。第四，威廉是荷兰的一国之主，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他可以调动荷兰军队来镇压詹姆斯二世的反抗。

1688 年 11 月 5 日，威廉率领荷兰海军在英国登陆，12 月 10 日，詹姆斯二世慌张地逃到法国去了。革命成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本来想干涉英国革命，但是当时法国卷入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分不出兵力来与英国为敌，所以干涉又成泡影。

1689 年 2 月，威廉正式即英国王位，是为威廉三世。这一年 3 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此后英国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国王必须按照国会的意志行事，而且只有在下院同意下，才能征收新税及招募常备军。换言之，法案杜绝了天主教恢复的可能，并且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提高了国会的地位，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封建贵族一样，成了英国的统治阶级。英国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了。

1688 年革命与 17 世纪 40 年代的革命相比，不过是一个“比较微不足道的”插曲。但是，过分缩小它的意义也是不对的，因为它在英国历史上究竟不失为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对英国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恩格斯写道：“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1688 年革命正是确立了“新的重心”，正是一个“新的起点”。从此以后，英国资本主义循着正常的轨道发展起来。第二，17 世纪 40 年代的革命虽然予英国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只是在 1688 年革命后，专制制度才在英国最后绝迹，君主立宪制度才巩固地确立起来。1689 年的“权利法案”不管它如何保守，毕竟给新的国王威廉三世套上了一副马勒。在威廉的后继者在位时期，国王终于变成“统而不治”的“虚君”了。第三，1688 年以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意味着资产阶级新贵族统治的确立，这就使得这两大阶级有可能利用政治上层建筑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于是英国原始积累加速进行了，手工工场迅速发展起来了，通过对法战争海外殖民地扩大了，从而加速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一切都是以 1688 年革命为起点的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

的结果。总之，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与 1688 年革命有莫大关系，这次革命之重要性，于此可见。

（五）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思想家

在英国革命的年代里，残酷的阶级斗争是伴随着尖锐的思想斗争而进行的。在革命的前夕及革命初期，几乎所有阶级都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斗争。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宗教外衣逐渐地被抛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代替宗教而出现了赤裸裸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资产阶级新贵族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出一套政治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在资产阶级新贵族取得政权之后，就成为新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巩固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在与平等派的斗争中，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已经开始抛开宗教思想，而提出一系列纯政治理论来。它的代言人爱尔顿提出“社会契约”说，认为私有财产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人们有义务遵守自己所订立的契约，不容许随便改变人们的财产关系。他说：“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应当满足于享有并且支配根据法律属于他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用暴力夺取他人的东西。”爱尔顿之所以反对平等派所提出的普选制原则，就是因为他害怕普选制会带来对于私有财产的威胁。独立派大多数人是君主立宪主义者，他们认为君主制最能保障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财产权。总之，独立派之拒绝普选制及拥护君主制，都是为了保障私有财产制度。

在英国革命期间，在独立派思想家中，也有极少数共和主义者，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便是约翰·米尔顿。米尔顿是思想家和诗人。他在革命爆发前后，曾发表文章，猛烈地攻击英国国教教会的主教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当时资产阶级新贵族反对国教的斗争。他认为主教是迷信及偏见的传播者，从而阻碍科学及教育的发展。当 1644 年内战正在进行之际，他发表了一本名为《阿雷欧巴吉蒂克》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热烈地捍卫了言论及出版自由，他说在英国建立的检查制度，妨碍了“真理的传播”。在他看来，为了与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言论与出版自由是非常必要的。米尔顿在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同时，也主张采取措施限制封建贵族保王党人的言论、出版“自由”，他以为只有这样做，革命事业才能免遭革命敌人的损害及破坏。

米尔顿也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他特别仇视君主制度。他在 1649 年写的文章里历数君主制的罪恶及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他认为：人民反对暴君，和反对社会灾难一样，都是合法的行为。人民有权利审判、废除，甚至处死暴君。他的言论对于判处查理一世死刑起了一定的作用。

米尔顿还进一步提出人民主权论，作为处死国王的根据。他指出：在“自

《阿雷欧巴吉蒂克》的原文为 Areopagitica，有译为《论出版自由》。

然状态”中，一切人生来都是自由的，后来由于他们不善于使自己的卑鄙的情欲从属于理智，才脱离了“自然状态”而被迫成立政府，以保障社会的安宁，他们把政权委给国王及公职人员，并与国王订立契约。因此，国王及公职人员的权力来自人民，是人民委托给他们的。人民在与国王订立契约的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最高权力。如果国王从人民那里夺去这个最高权力，这就等于破坏人民的“自然的天赋权利”。由此可见，国王是低于全体人民的，人民有权力审判、废除并处死国王，也有权更换和惩办官吏。

但是，米尔顿的人民主权论是具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的。他一方面攻击贵族，认为贵族不能是主权的体现者；而另一方面又说什么“粗野的普通人民”也具有极坏的本性，所以也无资格管理国家大事。他以为只有从“有理智的、能干的”人们中间才能选拔出执政人员。

米尔顿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由于紧张地写作，早在 1652 年米尔顿就失明了。但是他仍不放弃写作，在 60 年代末及 70 年代初他献身于诗的创作，写出了《失乐园》《复得的乐园》及《萨莫逊战士》等三部作品。我们在研究这三部作品时，便可以发现：在共和国破灭后，在米尔顿的创作里依然响着革命的曲调。在《失乐园》里，他描写撒旦（传说中的恶魔）起义反对上帝权威的故事，里面充满了暴动式的、感情激越的言词及起义的号召。俄国伟大思想家别林斯基称米尔顿的这部诗篇具有“反对权威的崇拜暴动”的思想。在 1671 年问世的悲剧《萨莫逊战士》里，米尔顿的思想有了新的激扬。和不愿在敌人面前屈服并相信战胜俗物的萨莫逊一样，米尔顿对胜利了的反动势力进行大胆的挑战，并且预言暴力者不可避免的灭亡。米尔顿的关于“人民主权”的言论及见解，对于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发生很大的影响。

革命时期出现的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便是托马斯·霍布士。霍布士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当上了一个大贵族的家庭教师。当英国革命发生后，他站在反对革命的立场上谴责革命。不久他又旅居法国，在法国和保王党人有密切的往来，并且担任查理一世之子查理·斯图亚特的数学教师。霍布士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认为唯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才是真实的，而观念及概念只是它们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不过他也是一位机械唯物论者，他把物质运动的多种形式都归结为机械的运动，并且认为运动也不是物体存在的普遍形式，它只不过是偶然的现象。是非本质的属性，尽管它和静止同样是为物质所固有的。

霍布士也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在他的名著《利维坦》中阐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关于国家的起源，提出了下面的学说：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中，“自然赋予全体人类以一切物品”，所以一切物品都是共有的。但是在“自然状态”中，人类为了争夺物品而进行彼此之间的无休止的厮杀。所以“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后来，人们意识到：为了确保和平及制止战争，必须订立契约成立国家。人们在成立国家的同时，同意

放弃一切自然权利并且把它转交给国家，这是与米尔顿的观点截然不同的地方，因为米尔顿认为人民在订立契约时，并没有放弃自然权利。由于霍布士认为人们在成立国家时放弃了自然权利，所以国家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可以干涉个人自由，唯有这样，国家才能保障和平及幸福。因此在他看来，君主专制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形式，主张在保存君主专制的条件下实行某些改革。

共有制的社会在当时是英国广大劳动人民所憧憬的理想，为了对抗这种思想，霍布士极力把原始共产社会（即他所说的“自然状态”）描写为人与人相杀的可怕时期，企图借此来扑灭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霍布士在本质上是代表贵族利益的思想家，他并不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代表者。

1688年革命后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约翰·洛克。洛克的观点是1688年革命在思想上的反映。

洛克也承认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所谓“自然状态”，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类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他又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上帝将自然界的万物送给人类，作为人们的共有财产，但是人们只有用自己的劳动才能从自然界得到东西以为己用，于是他的劳动果实就成为他的私有财产。这样，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他说：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们所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及私有财产权利加在一起就是“自然权利”。这样，他把私有财产硬加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企图借此证明私有财产制的永久性及其原始性，从而消灭在下层人民中间流行的关于人类原始时代就存在着财产共有的思想。

和霍布士一样，洛克也以社会契约论去解释国家的起源。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们虽然享有无限的自由平等权利及私有财产权，然而在享有这些“自然权利”时，人们并得不到保障，时时刻刻都有遭受他人侵害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推动人们互相订立契约成为国家，希望国家政权能够保障他们的“自然权利”，首先是财产权；而人们联合为国家并且把自己放在国家的统治下，其主要目标便是保存私有财产。

在洛克眼中，资产阶级议会君主制，是国家政权的最好形式，因为它“依照多数人的意志”行动。他用机械学上的规律去比喻它：物体顺着加在它上面的最大的力量的方向移动。但是，必须看到：洛克所指的“多数”，在实际上只意味着资产阶级新贵族在议会中的代表，亦即完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多数的“多数”。洛克主张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及联邦权（管理对外事务）的分立，同时承认体现在议会中的立法权的优越地位。但是，他又认为立法权并不是无限制的，它有责任尊重公民的人身及财产的自由。在他看来，体现在国王及其政府身上的行政权，应该在立法权的控制下管理国家；立法权在国王及其政府破坏国家的法律时，有权更换国王及其政府。在国王及其政府破坏法律，用法律制裁仍无结果，并且国王及其政府的行动继

续威胁大多数公民的生命、财产及人身自由时，全体人民有权利用公开起义的方式推翻国王及其政府。

洛克的这些观点是为 1688 年革命公开辩护。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史学中被称为“清教徒革命”，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有意掩盖这一场革命的阶级内容。诚然，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在与国王的军队进行战斗的时候，是打着宗教的旗号的，但是在宗教旗号后面却隐藏着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及利益。英国的两次内战，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贵族与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之间的阶级大搏斗，这场阶级大搏斗的结果，资产阶级新贵族胜利了，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了。因此，这次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这次革命的特点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建立联盟，推翻了封建贵族、国教教会及国王的统治。

革命的战斗力量及推动力量是广大农民及手工业者以及城乡贫民。正是人民群众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了革命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推动，革命才步步深入，并且发展到处死国王及建立共和国的地步。

但是由于领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联盟，所以革命的结果，君主制保存下来了，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也保存下来了，农民继续处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之下。

第二章 英国工业革命

第一节 工业革命的历史背景

(一) 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确立

英国经过 17 世纪 40 年代的革命风暴和 1660 年开始的复辟反动的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期动荡之后，到 1688~1689 年，政局终于稳定下来。此后，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1688 年革命后，根据 1689 年的“权利法案”，国王权力受到限制，国会权力提高了；立法权、军权及财政大权完全属于国会，国王手中只剩下行政权：枢密院大臣仍由国王任命并且向国王负责。但是，1689 年确立的政治制度，在以后不到一百年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689 年即位的英王威廉三世本来是荷兰的执政，他之得以入主英国，全赖国会中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帮助，因此他一开始便从这两大政党中遴选人员充任枢密院大臣。但是后来在这些大臣中间时常发生党派争执，而且这些大臣和国会的关系也不和谐。到 1694 年，在森德兰的建议下，威廉三世免除了托利党大臣，而专任国会下院多数党——辉格党领袖为大臣，由是枢密大臣与国会中的多数党都属于同一个政党了。这样一来，政府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1698 年，当托利党在选举中获胜并且在下院中形成多数时，国王为了避免与下院发生磨擦，又让辉格党大臣辞职而另任命托利党人为枢密大臣。于是，在威廉三世在位时期就在英国开创一个先例：国王必须任命下院多数党领袖为枢密大臣。

内阁也产生于威廉三世时期。内阁的前身是作为国王直辖行政机关的枢密院。威廉三世在任命下院多数党为枢密大臣后，他时常与少数几个重要的大臣议事于密室（cabinet）。从此以后，这几个大臣就逐渐形成为内阁，而且内阁大臣向国王提出的建议，国王一般地总是采纳，而不能逆着大臣的意愿行事。根据 1701 年的“王位继承法”，国会所通过的法案都要由有关大臣签署；这样，批准法律的部分责任由国王转到内阁大臣身上了。到威廉三世的后继者安妮女王在位初期又形成这样的先例：内阁大臣所推荐的法案为国会两院通过后，国王或女王必须批准；假若国王或女王否决这项法案，那末内阁大臣就必须辞职，但是国王或女王仍只能从下院多数党中任命大臣。不过，从 1707 年以后，英国国王就不再行使否决权了。这意味着国会开始享有绝对的立法权。

1714 年安妮女王逝世，根据 1701 年的“王位继承法”，詹姆士一世的孙女索菲亚的儿子乔治（德意志的汉诺威选帝侯）来到英国继承了英国王位，是为乔治一世。乔治一世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他在即英国王位时已经 54 岁了。他与其关心英国，毋宁更关心汉诺威，他把英国王位只看成是加强汉诺威侯国地位的手段。同时他不谙英国事务，不懂英语，而英国大臣

又不懂德语，他主持大臣会议时只能使用拉丁语，而拉丁语大家又都讲得不好，因而乔治一世从 1717 年起就不再出席和主持内阁会议了。由于国王不参加内阁会议，在内阁大臣中逐渐就产生了主持内阁会议的首席大臣——首相，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式使用首相这样的称谓。而第一个首相便是罗伯特·渥尔波（在 1721 年开始任首相），他之所以能够上升到首相地位，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才干。这样，在乔治一世时期又开创了英王不参加内阁会议及首相领导内阁的先例。内阁之有了自己的首脑——首相，意味着内阁完全摆脱了国王的控制。

1742 年，渥尔波的内阁失去了下院的信任，于是他的内阁就辞职了。这又造成一个先例：每当内阁的政策失去下院的支持时，这个内阁就必须辞职。

1783 ~ 1784 年当小威廉·庇特的组阁遭到下院多数党反对时，他解散了下院，而宣布举行新的选举。结果新选出的下院支持了庇特。此后又形成了一个惯例：倘若内阁在下院失掉多数议员的信任，它就可以解散它，而重新选举，如果新选出的下院对这一个内阁表示信任，就可以继续执政，否则就应辞职，而让新下院的多数党去组阁。

此外，根据 1701 年“王位继承法”，在下院弹劾官吏时，国王颁布的大赦令不能生效；法官在行为良好时可以继续留任，只有经过国会两院同意，才能把他免职。于是，这又限制了国王对于司法权的干预。

这样，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嬗变，到 18 世纪末在英国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这个制度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国会掌握全部立法大权，国王没有否决权。第二，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内阁由下院产生，国王只能指定下院多数党领袖组阁。第三，内阁对下院负责，首相或有关大臣定期向国会报告工作。第四，内阁必须得到下院的信任，一旦下院投不信任票，内阁或者辞职，或者下令解散国会而重新选举，由新选出的下院决定内阁之去留。第五，国会有弹劾大权及罢免法官的权力。由此可见，在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下面，国会不但是最高立法机关，而且也取得了决定内阁人选、监督内阁施政、决定内阁去留及干预司法工作的大权。与此同时，英国国王失去一切权力而变为“统而不治”的“虚君”。英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上述这些演变，固然与一系列偶然事件有关，特别是与统治英国的几个君主都是外国人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力量也愈益强大，在这个强大的阶级联盟面前，国王势必要步步退让。

诚然，在 18 世纪下期，国王乔治三世曾由于不满足于当“统而不治”的“虚君”而企图恢复已失去的王权，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已经巩固地确立起来了，靠君主个人的努力想开历史的倒车，是徒劳的。

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已经牢

固地建立起来，因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会下院就是被控制在他们的两大政党手中。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靠腐朽的、不民主的选举制度来维持自己在下院中的统治地位的。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选区划分一直未有变动，往日曾经是繁华的城镇，到 18 世纪已经变成荒无人烟的野地，成为“衰败城镇”，但仍保留下院中的议员席位。老萨勒姆从人烟稠密的城市变为荒寂的山村，但是仍在下院拥有两个席位。邓维奇原来是海岸城市，后来沉没海底，但是还保留下院的议员名额。博塞尼成为只剩下三家农舍的小村，但是其居民却有权利选出两名议员到下院去。在这个情况下，大地主就可以垄断这些“衰败城镇”的选举，从而把自己的人“选进”下院中去。18 世纪中叶，下院差不多有一半议员（513 人中间的 254 人）是从“衰败城镇”选出来的。相反地，有些昔日的荒野或荒村，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及里子等地已变为烟囱林立、房舍栉比的大都市，在下院里却没有一个代表。这就剥夺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及工人阶级的选举权。而且，在城市及农村，选举权有很大的限制。在城市，选举权只限于由大商人所组成的自治团体，在这样的团体的成员中间互选。而且自治团体成员往往高价出售选票，只有拿出巨款购买他们的富人才能当选。在农村，享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大地主。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更高，根据 1710 年法案，各郡选出的议员每年必须有 600 英镑以上的收入，城市选出的议员每年必须有 300 英镑以上的收入。

18 世纪中叶，全国 725 万人口中只有 15 万人是选民，因此国会已成为与广大群众失去联系的机构。同时，它也日益脱离了自己的选民，因为从 18 世纪上期开始，下院议员任期从三年延长到七年。

不但国会选举充满了贿赂及收买选民的现象，而且在下院内部也是贿赂公行。内阁要想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往往购买议员，使他们投信任票支持自己。贪污腐化成了英国国会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是必须指出：与当时在欧洲大陆上盛行的封建专制制度相比，英国国会制度显然还是进步的政治制度，因为它实行的是代议机构的统治，而不是国王一人的独断独行，它为一个新兴的阶级服务，而不是维护反动的封建贵族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像君主专制制度那样窒息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国会制度及腐朽的选举制度掌握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用一整套政治上层建筑为本阶级服务，加紧推行圈地运动、国债制度、对外战争及对殖民地的掠夺等内外政策，从而大大加速了原始积累过程。

（二）原始积累过程的加速

英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通过 1688 年革命上台后不久，就利用政治上层建筑积极巩固资本主义基础，他们通过国会及立法程序为本阶级谋利。

首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用合法手段进行圈地，因而大大加快了“圈地运动”的步伐。革命前贵族把农民赶出庄园，把土地圈为牧场或农场，还只是一种“个人的暴力行为”。现在，他们凭借国会的立法进行圈地，因而把法律变为掠夺人民的工具。

自从 1709 年国会通过第一个圈地法案以后，圈地法案件数与年俱增。1717 年到 1727 年间有 15 件，1728 年到 1760 年间有 226 件，1761 年到 1769 年间有 1482 件，而在 1797 年到 1820 年间有 1727 件。在这些法案下被圈占的土地约有 400 万英亩。

这种“合法的”圈地，其程序如下：先由圈地申请人经本区五分之四的当事人同意，向国会提出，国会审查通过，法案成立，再由一个委员会付诸实行。“重分土地，给予补偿”，这种圈地办法，貌似公正，但暴力和欺诈依旧是它的特色。所谓“五分之四的当事人同意”，不是以农户为单位，而是按所占田亩面积或地价计算。往往一区之内，一两户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就可满足这一规定。所谓“重分土地，给予补偿”，实则近乎没收。圈围范围内的无契佃户们，申诉无据，上告无门，世代耕种的土地被人剥夺。自耕农民在官绅串通、软硬兼施之下，贱价卖掉自己的土地，所得无几。马克思指出：“公有地圈围法”的实质“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

圈地运动把大批农民赶出了自己世代居住的农村。当时人记载：“在某些地方，100 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八所或十所”，“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四五个富有的畜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 20~30 个租地农民和同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他们的家庭，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他们留下的唯一痕迹。自耕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有的贫病交困，冻饿而死；有的沦为农场主的雇工；大部分流落城市，加入产业后备军的行列。大批“自由”劳动力的存在，正是工业革命所必需的。

在圈地运动中，夺得了土地的地主，把土地租给资本主义农场主经营。农业资本家雇用工人，利用大农场的优势，改进耕作技术，用四圃轮作制代替休耕制，牛羊由放牧改为圈栏饲养，对土地实行深耕细作，增施有机肥料，提高产量。小农场缺乏资本，无力采用新技术，在大农场的竞争下，景况不佳，不断破产。据估计，1740~1788 年间，有 4 万家小农场陷于绝境。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和出口提供了日益增多的原料和粮食。英国小麦和面粉的出口，1700 年为 4.9 万夸脱，1750 年上升到 95 万夸脱。

马克思指出：“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

场。”过去，与手工业结合的农民家庭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生活资料。现在，农业地区变成了原料产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英国圈地运动共持续三百多年，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最后完成，它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批“自由”的劳动力和巩固的工业品国内市场。

其次是加紧推行对法战争。结果英国取得最后胜利，因而大大地扩充了英国海外殖民地。在征服殖民地的过程中，英国侵略者疯狂地抢劫殖民地的财物珍宝。比如英国侵略军在占领印度孟加拉省后，就洗劫了国库，英国殖民强盗头子克莱武一人就净得 23.4 万英镑的巨额财富。从 1757 年到 1815 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搜刮了 10 亿英镑。此外，通过对西印度群岛的榨取，在 1789 年以前，英国大种植场主每年可得 400 万英镑的收入。

对法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使得英国成为海上霸主。此后英国在强大的海军的保护下，独占了世界贸易，其中包括奴隶贸易。从世界贸易中，特别是从奴隶贸易中获得惊人利润。18 世纪末，奴隶贸易每年给英国商人带来 30 万英镑的纯收入。

从殖民地榨取到的巨额财富及从海上贸易赚到的大量利润，都流入本国化为资本。而且殖民地的扩大，也为英国商品提供了海外市场。

最后，通过国债制度及近代赋税政策加强了对国内人民的掠夺。

为了进行对法战争，为了筹措军费，英国政府大借内债，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国债已达 7581.2 万镑，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又增至 12,679.4 万镑。国债的购买者都是大商人大银行家。为了照顾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采取了高利息的政策。英格兰银行在购买公债券时，政府许给的利息是八厘（8%）。18 世纪 60 年代初政府每年要支出 500 万镑的国债利息。因之购买国债的大资产阶级都发了大财。

英国政府在举办国债的同时，还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特别是消费税负担，不但提高了消费税税率，而且也增加了消费税商品的品种。据当代人讲，在 18 世纪 30 年代，英国人在每 20 先令的开支中，有 10 先令是以消费税的形式交给了国家。这样，政府一方面向大资产阶级债权人支付高额利息，另一方面又从人民那里搜刮巨额税款——这意味着人民手中的大量财富通过国家机构这个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大资产阶级金库中去了。因此，国债制度及消费税政策也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杠杆了。

总之，到 18 世纪下半期，圈地运动加速进行的结果，在英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数众多的无产者大军。通过对殖民地的无情掠夺，海外贸易、国债制度及消费税政策，使国内外劳动人民的财富都集中到英国资产阶级手中，并且化为资本。这一切就为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但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也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作为主要工业部门的毛织业是如此，冶金、制盐、酿酒、丝织、麻织和棉织行业也是如此。毛织业遍布全国，全国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以此为生。集中的手工工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1736 年，有一家呢绒工场配置了 600 台织布机。

手工工场是从手工业小生产到机器大生产的过渡形式，它为机器大工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手工工场使分工得到了高度发展，据亚当·斯密记载，制造一个扣针，分为 18 道工序，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道工序。分工的发展，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使劳动工具专门化。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五百种不同的锤，每一种锤都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劳动工具的改进和多样化创造了发明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手工工场培养了专门从事某种劳动的熟练工人，这就为发明和使用机器创造了条件。

但是，工场手工业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它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生产。少数较大的手工工场和大量城市小作坊、农村家庭手工业并存。工场手工业不能排挤掉小生产，不能使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只有大机器生产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牢固的基础。其次，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依然是手工技术。这种狭窄的技术基础，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的迅速增长，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力图将自然力和科学技术知识运用于生产，解决生产和需要脱节的现象。到 18 世纪中叶，社会对应用科学和技术更加关心，获得专利权的事例显著增长。1740 年批准的专利是 4 件，1750 年为 7 件，1760 年为 14 件，1770 年为 30 件。这种情况预示着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已经到来。

第二节 工业革命的进程及其后果

（一）工业革命的进程

英国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工业首先开始的。在英国，棉纺织业是一个新兴工业部门，与历史悠久的毛织业相比，没有旧传统的束缚，没有对产品的各种限制，比较容易采用新技术。

18世纪以前，英国的棉织品质地低劣，竞争不过印度、中国的棉织品。当时穿着中印棉布衣服风靡一时。为了保护本国纺织业的发展，1700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禁止从印度、中国和伊朗输入染色的棉织品，法令宣称：输入的棉货“消耗国家的财富，……夺去人民的工作”。但是，英国只有采用新技术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同印度、中国的产品竞争。正是这个商品竞争的需要，才推动了一系列新发明。

1733年，兰开夏的钟表匠凯伊发明了飞梭。原来织工织布，手掷梭子于经纬线之间，现在脚踏踏板，带动飞梭往返飞动，提高工效一倍。飞梭的使用造成了纺纱和织布之间的不平衡，一个织工往往需要六至八个纺工供给棉纱，长期发生纱荒。改进纺纱技术，成了棉纺织业发展的关键。

在1764年和1767年间，织工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机。珍妮机是由手工工具变为机器的典型。手纺车只纺一根纱，珍妮机由一人操作，可纺六七根纱，后经改良，可纺12根纱，提高工效15倍。珍妮机结构简单，体积小，成本低，便于在分散的手工工场中广泛使用。珍妮机的推广，降低了棉纱生产费用，提高了产量，但它所纺的纱太细，容易断，需要进一步改善。

1768年发明了水力纺纱机。这部机器是由钟表匠凯伊在木匠海斯协助下制造的。理发师阿克莱特在1769年取得了该项发明的专利权。1771年，他在克隆福德开办第一个水力棉纺纱厂，短期内就雇用了六百多名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这是建立近代机器大工厂的开端。水力纺纱机纺出来的纱，比珍妮机结实，但太粗。1779年，童工出身的克伦普顿综合珍妮机和水力纺纱机的优点，发明骡机，能纺出精细而又结实的棉纱。骡机经过别人改进，成为自动棉纺纱机，可以带动300~400个纱锭，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造成了纺纱和织布之间新的不平衡，织布跟不上纺纱，迫切要求革新织布机。1785年，牧师艾德蒙特·卡特莱特在木工、锻工的帮助下，发明了织布机，1791年建立了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工厂。后经改进，一台织布机可以织造相当于40个手织工人织的布。

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棉纺织业是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除棉纺织机以外，还出现了与之配套的净棉机、梳棉机、漂白机、整染机，组成了复杂

骡机（mule），意即综合机。

的机器系列。

棉纺织业是在工业革命中起带头作用的行业，它推动了煤炭工业、钢铁工业的发展，加速了蒸汽机的研制。

纺织机都是工具机，它们需要强大的动力来推动，人力是不能胜任的。利用风力，太不稳定，往往无法控制；使用畜力，如马，费用昂贵，往往不听使唤，所以，当时主要使用水力。但是，水力要有足够的落差，因而工厂必须建筑在有急流的乡间，而不能建筑在交通方便的城市；流水不能随意增加，枯水季节不能补充，受到季节的限制。发明一种不受地理条件限制的动力成了工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机械修理工。他刻苦学习，掌握了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读过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的著作。他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改进，在1769年试制成功单向蒸汽机，1782年造出双向蒸汽机，使之可以作旋转动作。1784年4月，瓦特在取得专利的说明书中，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大工业普遍适用的发动机。瓦特的蒸汽机解决了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问题，推动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炼铁厂用它来开动鼓风机，为高炉提供风力，煤矿用它来排除矿井积水，纺织行业用它来作为动力。1785年用于棉纺厂，1793年用于毛纺厂，1789年用于织布厂。1800年，英国全国已有蒸汽机321台，总功率5210马力，1825年增至15,000台，总功率达375,000马力。

棉纺织机，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推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

18世纪80年代，毛纺织业开始使用机器。麻纺织业使用机器较晚，1810年法国人日拉试验机器纺麻成功。英国人稍加改善后，予以推广。在轻工业的其他部门，如造纸、印刷等行业也逐渐使用机器进行生产。

蒸汽机的使用，使英国丰富的煤铁矿藏有了价值，煤炭和钢铁工业成了英国近代工业的支柱。

冶铁业是英国古老的工业部门之一，一向用木炭熔解铁矿石。后来，森林砍伐殆尽，木炭产量减少，生铁产量相应下降，不得不从瑞典、俄国、德国输入生铁。1735年，亚伯罕·德尔比父子发明用焦煤混合生石灰炼铁的方法。60年代加装鼓风设备后，这项技术才被广泛采用。80年代，科特试验成功“搅炼”法，提高了锻铁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在采煤业中，除已采用蒸汽抽水机外，还发明了凿井机、安全灯、曳运机，使煤炭产量成倍增长。

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要求革新交通工具，以便迅速运输它所生产的大量产品，供应大量的原料和燃料。1759年开凿了布黎纪瓦特公爵运河把煤运到

puddling，亦译“搅拌”。铁矿在冶炼时，随着杂质的氧化，铁液熔点逐渐升高而变稠，经搅拌成团，通过锻压，挤去灰渣，即得熟铁。

曼彻斯特。这项工程完工后，曼彻斯特的煤价恰好跌落了一半。到 1830 年左右，基本形成了全国水路运输网。仅英格兰就有 2200 英里运河和 1800 英里可通航的河流。1807 年美国富尔顿发明汽船。1811 年英国仿造成功，开始在内河和沿海使用。1819 年，第一艘轮船横渡大西洋，海上交通出现了新面貌。

陆路交通工具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1765 年用铁轨代替木轨，用于运输煤炭。1788 年约克郡最早架设铁桥。1814 年，矿工的儿子斯蒂芬逊制成第一台可供实用的蒸汽机车。1825 年建设从斯托克顿到达林顿的第一条铁路。1830 年在曼彻斯特至利物浦铁路线上正式使用蒸汽机车。到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主要铁路干线已经基本建成，铁路里程从 1825 年的 26 英里增至 1844 年的 2235 英里。

在工业革命初期，机器以木材为原料，用手工制造。18 世纪末年，开始使用汽锤和简单的车床制造金属部件。后来又发明了各种锻压设备和金属加工机床，逐渐用机器制造机器。机器制造业的机械化，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完成。

英国工业革命是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它开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完成于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历时七八十年。继英国之后，法、美、德等国也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上期先后开始了工业革命。

这场技术革命的过程，就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自觉应用自然科学的过程。社会对技术的需要把科学推向前进，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指导技术改革，技术改革（如蒸汽机、纺织机）把科学知识应用到生产过程，构成为“直接生产力”。

（二）工业革命的社会经济后果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对英国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从 1770 年到 1840 年间，每个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提高 20 倍。原棉消耗量从 1800 年的 5200 万磅，增加到 1840 年 4.59 亿磅。生铁产量 1720 年为 2.5 万吨，1840 年增至 139.64 万吨。煤炭产量 1700 年为 260 万吨，1836 年增至 3000 万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建成了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到 19 世纪 50 年代取得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

工业革命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马克思指出：“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到工业革命完成时，工厂制度在工业生产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1841 年，工厂工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63～164 页。

人占棉纺织业从业总人数的 68.7%，占毛纺织业的 50%，占丝织业的 40%。而且，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高过手工业工人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工厂制度的确立，完全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大都同农村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们或者有简单的工具，或者租一小块土地，在劳动之余耕种。机器大工业完全割断了他们同农村的联系，剥夺了他们最后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现在，他们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他们除了做一辈子雇佣奴隶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生活出路了。

机器大工业，促使工场手工业逐步崩溃，家庭手工业迅速衰落。经不起大工业竞争的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仅织布手工业者就达 80 万人。恩格斯指出：大工业“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形成，就是社会日益分裂成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只有机器大工业才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彻底剥夺绝大多数农民，把居民从农业地区驱赶出去，人口在工业城市里集中起来。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大半，1811 年从事农业的家庭下降为 89.6 万户，占全国总户数的 34.7%，1831 年再降为 27.7%。与此同时，城市人口飞速增长，大城市不断增加。例如，曼彻斯特 1700 年只有 1 万居民，1841 年竟达 35 万人；格拉斯哥的人口也从 3 万增加到 30 万。由于工业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增加，谷物价格不断上涨，农业资本家加紧扩大自己的耕地面积，圈占一切可以圈占的土地，那怕是贫瘠的土地。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开展的“清扫领地”，把残存的小佃农、茅舍农都赶出了领地。他们有的流入城市，加入产业后备军的队伍；有的留在农村，充当农业资本家的雇工。1851 年英国农业工人的总数已达 144 万人。机器大工业彻底破坏了温情脉脉的封建宗法关系，使农村的阶级关系简化成大地主、大租佃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三大阶级。

工业革命也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显暴露出来。1825 年，英国发生了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在危机期间，生产急剧下降，物价暴跌，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很大一部分已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这次危机过后，大约每过十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危机，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地冲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三）工农运动的发展

工业革命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苦难。工人变成了机器的简单附属品，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296 页。

受到厂主、监工的层层监视。厂主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巧立各种名目对工人罚款。机器大工业把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卷进了劳动力市场。1835年，在棉纺织厂219,000工人中，13岁以下的儿童占49,000，13岁至18岁的少年占66,000，成年妇女占67,000。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给妇女和儿童带来的痛苦不堪言状。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工人子女六七岁就得进厂做工。在花边行业，“……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

由于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由于破产的小生产者源源不断地流入无产者的行列，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资本家拚命降低工人工资。1810年英国纺织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为42先令6便士，1825年下降为25先令6便士。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工资的时候，房主、店主和当铺老板便向工人扑来，竞相榨取工人身上的血和肉。

在工人居住区，房屋建筑简陋，天空浓烟密布，街道狭窄拥挤。有的工人家庭祖孙几辈挤在一间矮小的房间里，有的工人找不到栖身之所，寄寓于地下室中。兰开夏一个工人的家是“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条腿的圆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着两条脏床单”。

艰苦繁重的劳动，极端恶劣的生活，污秽不堪的环境，伤寒、霍乱等流行病的逞凶肆虐，使工人及其子女的健康受到致命的摧残，寿命缩短，年少夭亡。根据1840年的调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

工业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与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早在18世纪60年代，哈格里沃斯、阿克莱特等人的机器都曾被砸毁。1779年，兰开夏约五百名织工率先起事，得到煤矿工人的支援。他们集合八千余人攻打纺织厂，捣毁机器，烧毁厂房。政府调集大军，用血腥手段将其镇压下去。

相传卢德是捣毁机器的首创者，因而在历史上把破坏机器运动叫做“卢德运动”。19世纪初年，卢德运动蔓延到全国各个工业区，中心在诺丁翰。资产阶级开动国家机器，除严酷镇压外，1813年又颁布捣毁机器惩治法，规定凡破坏机器者一律处死。

破坏机器是工人阶级自发斗争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当时工人还没有认识到造成灾难的根源不是机器，而是资本主义制度。

随着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力量的增强、觉悟的提高，工人开始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18世纪末年以来，工人中间一直有秘密工会组织存在。1812年，苏格兰的秘密工会还组织了格拉斯哥织工罢工。1824年，在工人斗争的压力下，国会宣布废除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在全国，工

会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它们出色地领导了 1825 年开始的罢工斗争，维护了工人自身的利益。

作为工业革命的后果，农民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机器大工业把农业完全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彻底消灭了宗法式的农民，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它同时也给直接生产者带来空前的灾难，这表现为农业工人受奴役、受剥削，失业和贫困。农业机械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劳动人手，并开始大量吸收童工和女工，加速了农村失业大军的形成。工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再也不能大量吸收这些受排挤的农村劳动力，他们不得不像城市失业工人一样，靠着每周六七个先令的济贫捐度日，生活极端困难。

到 1815 年，历时 22 年的对法战争结束了。和平恢复以后，粮价猛烈下跌。1813 年，小麦每夸特为 109 先令，1815 年仅值 65 先令。土地贵族和农场主降低工资，把跌价的负担转嫁给农业工人。

1816 年，在东部各郡的小麦产区，农业工人到处举行暴动。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举行集会，烧毁干草堆和农场主的住宅。在埃里岛的“小港”，农业工人英勇战斗了三天，2 人牺牲，75 人被俘，5 名俘虏被绞死，9 名被流放。在这一时期，农村暴动共计发生了一千五百起左右。

1830 年，农业工人的暴动再次高涨。这一年，农业灾害特别严重。据估计，流行性羊瘟使约两百万头羊死亡。打谷机的采用，是酿成这次暴动的导火线。打谷是当时仍然保留的旧操作法，农民们可以依靠打谷取得工资以补充日常收入之不足。使用打谷板和手连枷的手工劳动当然竞争不过脱粒迅速的打谷机。这年 8 月，在肯特郡的哈德累斯首先发生暴动。400 个工人聚集起来，捣毁打谷机，烧掉压迫民众的治安法官的干草堆。起义的第二天，军队警察一齐出动，镇压了这次暴动。然而 1830~1831 年冬，捣毁打谷机的运动继续在英国东南部扩展，几乎每夜都有冲天的火光，烧掉农场主的干草堆、谷仓和畜圈。

在捣毁打谷机运动期间，人们用斯温大尉的名义散发了一封信，其中写道：“今年我们要毁坏谷堆和打谷机，明年我们要同牧师闹一场，后年我们要进攻政客们。”因此，这次农业工人的暴动，在历史上又叫“斯温暴动”。起义者还提出了增加工资、降低什一税等要求。

斯温暴动犹如暴风骤雨，吓得农场主和教士们惶惶不安。英国政府调集军队进行残酷镇压。9 名起义者被处绞刑，475 人被流放，约有同样数目的人被处以各种徒刑。

农村无产阶级用公开的社会战争来反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表明劳动群众中最保守的部分也卷进了革命的洪流。

(四) 资产阶级急进运动

工业革命的结果，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大大提高。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在 18 世纪的选举制度下，他们也被剥夺了选举权。因此，他们便在 18 世纪 60 年代掀起了一个以争取选举权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急进运动。18 世纪下半期的英国急进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 60~80 年代，第二阶段相当于 90 年代。

第一阶段是从 60 年代初威尔克斯事件开始的。当时英王是乔治三世，他不满足于国王的“虚君”地位，依靠托利党的支持，妄图恢复失去的王权。他指定托利党人组阁，尽管该党在下院并不占多数。领导托利党内阁的布特勋爵乃采取广泛贿赂下院议员的手段，为自己布置了百依百顺的多数。这就激起一位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下院议员威尔克斯的愤慨，他在 1762 年在《北不列颠人》报上尖锐地抨击乔治三世的专横。乔治三世乃下令逮捕威尔克斯，下院逢迎国王的旨意，又把威尔克斯开除了。1768 年，人们又把他选为下院议员，下院拒绝承认他为议员。于是，许多城市的群众举行示威，坚决支持他的当选。到 1771 年，下院不得不承认他的议员资格。急进运动就是以威尔克斯事件为导火线而爆发起来的。领导运动的是工业资产阶级，他们不但攻击乔治三世，而且还进一步抨击腐败的国会选举制度，要求实行改革，扩大选举权。他们还成立各种政治团体，召集许多次群众大会，积极展开宣传鼓动活动。急进派霍恩·吐克在 1769 年成立“权利法案保卫协会”，要求实现平等、充分的代表权，根绝国会贪污受贿现象。到 1776 年约翰·卡特莱特（发明家兼工业家艾德蒙特·卡特莱特之兄弟）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改革纲领，他在标题为《抉择》的小册子里提出如下要求：实现普遍选举权（男子），国会一年改选一次，用秘密投票方式选举，实现平等代表权等等。为了鼓动改革，他还成立一个“宪法协会”。

在这些团体的宣传鼓动下，工人群众特别是伦敦工人积极参加这个运动。

但是第一阶段的运动到 80 年代就衰落了，这主要是因为 1786 年英国统治阶级对工业资产阶级进行了让步，这一年英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缔结商约，它规定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英法双方都允许对方的商品自由进口。这实际上对英国有利，因为经过工业革命，物美价廉的英国商品必然要压倒法国商品。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既然在经济上得到满足，他们就不再热心于政治改革了。

第二阶段的急进运动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开始的。在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都活跃起来，他们纷纷成立革命团体，再一次提出改革的要求。但是随着法国革命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法国下层人民运动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越来越感到不安，担心英国劳动人民有类似的革命举动，所以他们就退出运动，并且站到统治阶级方面，参加了以镇压民主运动及反对雅各宾主义为目标的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首的反动联盟，这个联盟把一切有产阶级——大地主、大商人、大金融家、富裕的商

店老板和新兴工厂主——团结在一起了。于是，英国急进运动的领导权就落到小资产阶级（独立手工业者）身上，这就使这个运动带有更民主的色彩：不但要求实行普选制，而且也要求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1792年1月成立的“伦敦通讯协会”成为这个运动的核心，这个协会的领袖是苏格兰鞋匠托马斯·哈第，协会的参加者主要是店员、工匠和小商人。到1794年会员发展到8万人以上，在伦敦以外的许多城市——曼彻斯特、纽凯斯尔、里子、设菲尔德、考文垂等——都有这样的协会。“通讯协会”在1792年8月发表的“公开宣言”中表示要为下列目标而斗争：实现普选权，一年一度的国会，廉价政府，简化法律，缩减军队以减轻人民纳税负担，将圈占的土地归还给人民。但是协会把重点放在政治问题上，认为只有劳动人民的代表参加国会，才有可能解除人民的苦痛及改善人民生活。协会对于私有财产表明了如下态度：“体力智力的区别及勤劳的区别应该造成与之成比例的财产上的区别，而这种财产当它为人们取得并且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的时候，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协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发表宣言，并且向法国国民大会发出贺信等等。

在法国大革命发展到雅各宾专政阶段时，英国人民洋溢着同情法国革命的热情，崇拜和仿效法国成为一时的风尚，人们互相称“公民”，称会议为“国民大会”。1793年11月，在爱丁堡召开了“国民大会”，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通讯协会都派代表参加。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急进运动只限于伦敦一地的话，那末第二阶段的急进运动是全国范围的运动。

但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到90年代末终于遭到政府的镇压，许多领袖被逮捕。第二阶段的急进运动之所以不免失败，原因有二：第一，工业资产阶级站到统治阶级方面，这就使得这个运动面临一切有产阶级的反对。第二，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领导集团倾向于和平手段——开大会及请愿。

（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工业革命时期，在思想战线上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1723～1790年）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富裕的海关职员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1748年在爱丁堡大学任教，讲授修辞学和文学。1764年开始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1776年出版划时代著作《国富论》。

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期，正是英国从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的时代。他在《国富论》中，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他指出，一切财富的本原是劳动，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条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能

原书全名应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

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既有科学的成分，又有庸俗的成分。他正确地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他有时又说商品的价值是由它所能购得的劳动量决定的，即由工资决定的。由两种价值论导引出两种利润论。一方面，他认为利润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他说：“劳动者附加在原料上的价值……须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支给劳动者的工资，又一部分支给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料代价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这里所说的利润就是剩余价值，而亚当·斯密却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另一方面，他又把利润当作生产费用的一部分，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亚当·斯密反对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要求取消保护关税、行会制度和特权公司；主张自由放任，他把自由竞争当作永恒不变的法则，要求国家不干涉工商业活动，不干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反对工人建立任何组织。他把社会上的人们分成三个阶级，即没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能获得利润的资本家，占有土地因而能获得地租的地主。但是，他鼓吹社会分裂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是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合乎自然秩序的永恒的经济制度。

亚当·斯密为英国工业革命制造了舆论，建立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的科学成分在李嘉图手中得到了发展。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伦敦交易所一个经纪人的儿子，早年随父从事投机活动，成为富翁。后来离开交易所，专门从事研究，捍卫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一书。

李嘉图批判了把购得劳动当作价值尺度的错误观点，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量，即劳动时间决定的。他说：“投在商品内的劳动量，支配商品的交换价值；劳动量增加，商品价值增大；劳动量减少，商品价值减低。”他确认劳动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源泉，只要劳动时间不变，则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不会因工资的变化而变化，工资增加则利润相应地减少，工资减少则利润相应地增加。实际上，李嘉图指出了工人和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对立。但是，他形而上学地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自古已然”，永远如此。他断言工人和资本家的存在是永恒的自然现象，工人工资的大小决定于工人及其家属维持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工资有一定限度，不可能长期提高。

1819年，李嘉图当选为议员，尖锐地抨击“谷物条例”，积极主张自由贸易，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发言人。

第三章 17、18 世纪的欧洲大陆主要国家

第一节 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法国

（一）路易十四与法国专制制度

在中世纪，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法国也是封建割据国家，地方贵族各霸一方以与国王权力相抗衡。但是自从 15 世纪末以来，国王借助武力逐步削平地方势力，王权开始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逐渐形成。往日称雄地方的大贵族，多半迁居到首都，成为宫廷贵族，过着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

路易十四当政（1661～1715 年）是法国专制制度“全盛”时期。当时国王的权力发展到顶点，立法、行政及司法大权都操在他的手中；路易十四曾经说过“国家即朕”的话，这正反映了实际情况。

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更加完善。在军事上他实行两项重大改革：第一，中央取得了直接调动各省军队的权力，在对外战争时，可以任意从各省调军队到国外，在国内发生叛乱时，也可以从一省调军队到另一省去。第二，改雇用外国人当兵为招募本国人当兵，这个新办法可以把人民群众中间的武勇强悍分子吸收到军队中来，这不但削弱了人民反抗政府的力量，而且加强了镇压人民的力量。

路易十四加强了官僚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层层相属的官僚系统成为统治及压迫人民的强大机器。在中央，国王下面的掌玺大臣担当了国王的秘书的角色。国务大臣五人至六人分别掌管内政外交各个部门的事务，并且向国王负责。在国务大臣中，财政总监居首席地位，因为财政问题是专制国家的中心问题。在地方，有执行国王政令的各省省长。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国王派财政官到各省去监督地方政务，他不但监督省内的财务，而且也监督警务、司法、行政及军事等方面的工作，其权限凌驾于省长之上。各市市长及市政官直接由国王任命，并且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

天主教教会也是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主教是法国的国家宗教，国家要求每个臣民都信奉天主教。天主教教会是专制王权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它用宗教迷信麻醉人民，使其安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

与英国不同，在法国没有像国会那样的代议机构去限制王权。诚然，在法国，法院具有限制王权的职能：它对国家的政令有审核、注册及抗诉的权力，但是在路易十四当政后，这些职能都被取消了。

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常备军，为了维持宫廷的奢侈无度的生活，也为了养活大批宫廷贵族，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成为专制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为了增加财务收入，必须增加赋税。但是，在法国，封建贵族及天主教僧侣都享有免税的特权。而且专制政府也不愿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因为这样会影响封建领主的收入。在这个情况下，只剩下增加工、商业税收的一

条出路。为了增加工、商业的税收，必须培养税源，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因此，路易十四任用柯尔柏为财政总监，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柯尔柏锐意扶植法国工业，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招聘外国工匠，由政府向企业提供补助，取消一部分国内关卡，改善交通运输以便于商品出口，设立独占贸易公司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了扩大出口，柯尔柏又发展舰队及商船队。他还积极推行海外殖民政策：在印度建立贸易据点，在北美经营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因为在他看来法国有了自己的殖民地，就可以保证法国商品在没有外国商品竞争的条件下运销到那里去。

但是，柯尔柏的重商主义政策收效不大，在他任财政总监期间（1662～1683年），法国手工工场生产并没有多大起色。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劳动力来源不足。法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因而脱离土地的农民为数极少。第二，国内市场狭小。这是因为法国农民在封建领主的残酷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贫困生活，以致购买力很低。第三，专制政府对工商业课税太重，影响企业主的资金积累。

（二）路易十四的侵略战争

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是一个军事强国，拥有强大的常备军。同时，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法国：德意志分成大大小小许多国家，没有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强国；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西班牙及葡萄牙开始衰落，英国和荷兰互相交战，而且1660年复辟后的英国又变成法国专制王朝的附庸。利用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路易十四梦想称霸欧洲，建立一个欧洲帝国。

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首先成为路易十四觊觎的对象。当时西班牙国王和奥地利大公兼神圣罗马皇帝都属于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及奥地利都拥有广阔的领土。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除了西班牙本部外，在北面拥有南尼德兰（即后来的比利时），在东面还拥有弗兰施—孔特，而且意大利的一些小国也属于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除奥地利本部外，还领有波希米亚王国（即捷克）及匈牙利。至于法国的东北邻德意志的莱茵河流域则至少在形式上属于神圣罗马皇帝。这样，法国几乎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的包围之中。因此，一心一意想称霸欧洲的路易十四便决定首先切割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

路易十四的第一次侵略战争是1667年到1668年的“遗产之战”。1665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逝世，路易十四之妻为菲利普之女，于是路易十四便要求西班牙把南尼德兰割让给法国，作为陪嫁品。但是西班牙拒绝了，路易十四乃决定诉诸武力。1667年对西班牙的战争开始了，荷兰害怕法国在征服南

重商主义是16世纪到18世纪盛行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的增多是富国的标志，因而主张发展工商业，奖励出口，以便促进大量金银流入本国。

尼德兰之后会威胁荷兰的安全，乃参加反对法国的战争。荷兰又和英国及瑞典结成联盟，因之后两个国家也参战了。法军在开战后，迅速地占领了弗兰施—孔特全部及佛兰德尔（西班牙领土）一部分。但是由于法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它不得不在 1668 年中止战争。根据亚琛和约，法国只得到佛兰德尔一部分，路易十四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他把这次受挫归咎于荷兰，因为英国和瑞典就是被荷兰拉入战争的。而且路易十四还理解到荷兰将永远反对法国侵占南尼德兰的计划。因此，路易十四决定发动一次战争一举消灭荷兰。他之决定消灭荷兰，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法、荷之间存在贸易上的竞争，在他看来，为了建立法国在海上贸易优势，也必须打败荷兰。

在准备对荷战争时，法国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以图孤立荷兰。首先它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订立秘密的“都佛条约”，迫使英国退出英荷联盟而参加未来的法国对荷兰的战争。此外，法国又以金钱收买瑞典，使其退出反法联盟。

1672 年，法国军队通过南尼德兰攻进荷兰，并且深入荷兰腹地。但是荷兰人在执政威廉的领导下进行抗战，并且决开防水的海堤，使大地成为泽国。同时荷兰海军又重创法英联军。不久，德意志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奥地利大公国、西班牙及德意志的其他国家与荷兰建立军事同盟。但是法军屡获胜利，它打败了勃兰登堡及奥地利军队。后来，英国国会迫使查理二世参加荷兰方面的反法联盟，于是路易十四才决定停战。在 1679 年的尼姆威根条约中，西班牙把弗兰施—孔特及佛兰德尔的一些要塞让给法国。

这次战争刚一告终，路易十四就成立一个由法国的法学家们组成的“合并院”，这些法学家们制造各种借口宣布法国国王对于德意志二十多个城市的统治权。当时欧洲列强无力防止法国的扩张，英国国王领取路易十四的津贴，因而对他唯命是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忙于防御土耳其入侵。因此，当法军在 1681 年突然占领斯特拉斯堡时，欧洲竟无人敢于过问。

法国势力不断加强，使整个欧洲为之不安。荷兰的执政威廉在尼姆威根和约签订后，立即展开外交活动，结果成立了反法的“圣奥格斯堡同盟”，加入同盟的有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萨伏依及瑞典等。为了先发制人，路易十四在 1688 年派大军侵入莱茵—巴拉丁。本来法国想依靠英国的帮助，但是英国 1688 年革命把路易十四的宿敌荷兰的威廉拥上英国王座，于是英国不久就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又陷入孤立，仗打得很为吃力，因而求和。根据 1697 年的“里斯维克和约”，路易十四放弃了莱茵—巴拉丁。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路易十四在位时期的最后一次战争。早在 17 世纪 90 年代，路易十四就有吞并西班牙的野心。1700 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逝世，无子嗣。路易十四便提出以自己的孙子菲利普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的要求，理由是菲利普为查理二世之近亲（路易十四之妻为查理二世之姊）。当时西班牙国力甚弱，无力反抗，因之菲利普竟不费吹灰之力就登上了西班牙王位。当时奥地利大公兼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借口自己的妻子是西

班牙王之妹，也要求由他的次子查理大公继承西班牙王位（罗马皇帝的长子约瑟夫是皇帝的继承人）。英国害怕法国领土扩张会破坏欧洲均势，同时又想打败法国这个贸易劲敌，所以在 1701 年与奥国成立反法同盟，对法宣战。接着，荷兰、普鲁士、葡萄牙也加入了这个同盟并且参加了反法战争。这一场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而引起的战争一直持续到 1713 年。最初，法军进展很大，它占领了尼德兰、意大利、西班牙及德意志一些地区。但是由于法国势孤力单，加上反法同盟军方面有英国名将马尔波罗公爵指挥，法军很快转入劣势。1704 年在一次战役中，法军被从德意志赶走。同一年英军占领了西班牙属的直布罗陀。1706 年法军也被迫退出意大利。1709 年，法军又被英军赶出尼德兰。在海上战斗中，法军也处于不利地位。战争转移到法国境内进行了。但是在法国陷入危急之际，欧洲国际局势发生新的转变：1709 年俄国军队大破瑞典军队。英国害怕俄国强大会破坏欧洲均势，因之从 1710 年起，英国在反法战争中持消极态度，并且从 1711 年 1 月起就开始与法国谈判。1711 年 4 月，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死（他是在 1705 年即位），无子嗣，于是查理大公即皇帝位，为查理六世。这样一来，如果反法盟军击败法国，神圣罗马皇帝必然要继承西班牙王位，这也会破坏欧洲均势。这更使英国下决心结束战争。因此，法国避免了毁灭的命运。

1713 年在乌特勒支召开和平会议，法、英、荷、普、西、葡等国缔结了和约。和约承认路易十四之孙菲利普为西班牙王，但是不许他在路易十四死后继承法国王位，以免法国吞并西班牙。奥地利到 1714 年才和法国订立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取得了西班牙属南尼德兰及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属地——那不勒斯、撒丁尼亚、米兰及托斯坎纳的部分土地。

路易十四的连年战争及穷兵黩武，对法国发生很恶劣的影响。战争给人民带来难以忍受的苦难：人丁被抽去当兵送死，赋税负担越来越重。战争也造成了国家的财政危机。1700 年到 1706 年，国家收入为 3.5 亿利弗尔，但是支出却高达 11 亿利弗尔。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财政赤字达到 25 亿利弗尔，相当于国家每年收入的 32 倍。

（三）农民状况与农民运动

法国农奴制度早已消灭了，到 17 世纪只有东部及北部少数地区还残存少数农奴，而法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是自由农民了。他们有迁居的自由，有订立财产契约的自由。但是在这种人身自由的背后还隐藏着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土地是贵族地主的财产，农民为了使用地主的土地，就不能不向地主缴纳封建地租，而且农民还要受地主的司法权及警察权的支配。

法国自由农民在法律上分为两种：年贡交纳农和佃农。佃农按租约所规定的年限使用土地，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一年以上，有的是终身，还有几代的。在租约期满后土地归地主处理。但是到 17 世纪，地主通常宁愿按短期

出租土地，而不是终身或数代。年贡交纳农所使用的土地是永远归自己使用，是世代相传下去的。只要农民无误地履行封建义务，地主无权把土地收回。农民也可以把土地转租给别人，甚至把它出卖。但是不管谁买到这块土地，他都要向地主交封建地租。

这两种农民所缴纳的封建地租，有的采取实物地租的形式，有的采取货币地租的形式。不过，到 17 世纪货币地租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形式。农民开始分化了，出现一些富农，也出现许多贫农。但是他们同样受到地主的封建剥削。

同时，法国农民也受教会、国家及高利贷者的剥削。他们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把农产品的十分之一变为货币缴纳给教会。他们也要向国家缴纳直接税及间接税。同时，农民时常手头短缺，所以不能不向市民或富农借债，利息极高。

这样，在层层剥削下的法国农民一般都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据一位军事工程师的统计，十分之六的法国居民都过着乞丐的生活或接近乞丐的生活。在其余的十分之四的居民中又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十分恶劣”。一到荒年，农民就逃脱不了挨饿或饿死的命运。1662 年发生灾荒，许多村庄的人都死光了，有的人被迫以死尸为食。

与人民的贫困饥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路易十四的宫廷生活。据威尼斯驻法国大使的记载，“在凡尔赛宫的大走廊里燃点着几千支蜡烛。这样蜡烛映照在满布壁上的镜中，映照在贵妇和骑士的钻石上。照得比白天还亮。简直像是在梦里，简直像是在魔法的王国里。美丽和庄严的气氛在闪烁发光。连眼睛都不敢相信这前所未见的、鲜艳的、珍贵和美丽的装束，带着翎毛的男子，发饰华贵的妇女。”

人民并没有向命运屈服。每逢荒年，城乡都爆发反对粮食投机商人的骚动。有时，人民铤而走险，用武装起义去回答压迫者。在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法国的农民起义几乎“史不绝书”，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发生的“卡米札尔”（意即穿衬衫的人）起义。这次起义爆发于 1702 年，地点是兰格多克省的塞汶山区。起义的农民利用丘陵及森林的自然条件，展开了游击战，人数达两千余人，屡次挫败政府军。政府军采取了狡猾的策略：一方面放火烧掉村庄，实行野蛮的镇压，另一方面对起义者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到 1705 年终于把起义镇压下去。

（四）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启蒙运动的兴起

路易十四死于 1715 年，继位的是他的曾孙路易十五，当时他年仅五岁。

在路易十五达到成年开始亲政后，他的昏庸暴露无遗。他整天寻欢作乐，沉湎于酒色之中，而把政事完全委之于宠臣及宠妾之手。他的宠妾彭巴都尔夫人恃宠弄权，大臣之进退及将军之黜陟，都凭她个人之好恶。甚至对

外政策及财政大权也都掌握在她手里。她骄横任性，奢侈无度，为了建造堂皇壮丽的宫殿，不惜花费大量金钱。政治之腐败，于此可见一斑。

反动统治阶级愈腐朽堕落，镇压人民就愈凶，当时在法国亦是如此。一个大臣发出“逮捕密札”就可以逮捕任何一个人，并且可以无限期地把他关押在监狱里。大哲学家伏尔泰就曾因为与一个贵族口角而被捕入狱。政府对书刊及印刷品实行严厉的检查制度，大多数政治著作被禁止发行，甚至被烧毁，警察及密探遍布各地，对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加以恶密的监视。在监狱里实行各种非人道的刑讯，死刑采用了车裂、分尸等野蛮的形式。

但是，高压手段是吓不倒人民的。路易十五在位的60年几乎与人民运动相始终，农民骚动、工人罢工及城市平民的发动愈来愈频繁了。1749~1750年在巴黎发生的骚动发展为人民与军队之间的流血巷战。这说明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已经很不稳固了。

这个时期法国对外战争连遭失败，又从外部打击了法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如果说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打破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的包围的话，那末到18世纪，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就占有了法国对外政策的首位。但是这个斗争以法国的失败而终。七年战争（1756~1763年）结束时，法国不得不把它在美洲及印度的大片殖民地让给英国，从而使英国成为海上霸主，而法国也就失去了已往的商业殖民强国的地位。

与此同时，法国国内呈现一片黑暗，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性——国王的昏暴、宫廷的荒淫无耻、贵族僧侣的骄奢淫佚、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贫困和苦难等等——暴露得更加清楚了。这一切都遭到先进人物的有力抨击，这种抨击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平民思想家梅利叶、摩莱里及马布利等人。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照耀在法国天空上，给法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伏尔泰（1694~1778年）本名为弗朗索阿·马利·阿洛埃，自幼即以才华出众而崭露头角。他一生中著作甚丰，通过抨击文章、科学论文及艺术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法国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他首先对天主教会进行大胆的攻击，他讥刺和嘲笑天主教教义的繁琐哲学及僧侣说教中的教条主义。在他看来，天主教僧侣就是一群“狂信者、骗子手”。他说宗教本身就是弥天大谎，基督教也不例外，天主教就是“一些狡猾之徒所虚构出来的最庸俗的欺骗之网”。他揭穿了《圣经》里面的各种迷信记载。他认为现存社会的一切灾难都来源于无知，而无知就是教会造成的。因此，天主教会是一切进步的障碍。他指出：只要消灭无知、迷信和狂信，那么一切都会好的。他号召为科学及进步而奋斗。

伏尔泰虽然以反对天主教为己任，但是他又承认有必要保留宗教，因为他认为宗教可以维系人心，有助于巩固社会秩序。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上帝，那末也要捏造出一个来。”

为了批判当代法国社会，伏尔泰提倡自然权利学说。在他看来，自然赋予人类以自由平等的权利。他说：“本身自由，周围的人与自己平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人们的自然生活。”伏尔泰所理解的自由，便是取消农奴制，及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以及没有任何暴政。同时他也强调自由与法制的关系，他说：“自由只存在于依靠法律进行统治的地方。”但是他所强调的平等，是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不是社会生活上的平等。他并不反对财产上的不平等，他说：“在我们多灾多难的世界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不可能不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是富人阶级，另一个是贫困阶级。”他在他所著的《哲学词典》中对于“平等”作了如下解释：“除非有无限数量的有用的人一无所有，人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人类就是这样。”

他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赞成实行“开明专制”，认为“开明”的君主实行改革，就可以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度。他希望“开明”君主能动手消灭封建制度，取消僧侣特权，剥夺教会登记婚姻及死亡的职权，并且没收教会财产而实行僧侣薪金制。他还期待“开明”君主废除国内关税、统一法律。

他也提出改革法律的主张，认为罪与刑应该相称，反对刑罚过分残酷。他主张改革刑事诉讼法，强调重证据及实行辩护制的必要。他反对当时法国在审讯中实行拷打的办法。他要求改革司法，特别是取消用钱购买法官职位的制度。他也反对官爵世袭制度。

但是，伏尔泰对人民群众抱很大的偏见。他相信：政治权力及国家领导权应该由少数人，由富人掌握。他写道：“在这个社会里，既无土地又无房屋的人难道也应该有选举权吗？”“当黎民被容许议论〔国事〕的时候，一切都将毁灭。”可见他对人民群众怀恐惧心理。这都表明了他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

但是不管怎样，伏尔泰的功绩是不朽的。他以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语言，大胆揭露、讽刺法国旧制度的一切弊端，并且向愚昧和无知宣战，这在当时的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年）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任波尔多省法院院长。他著有《波斯人通信集》《论罗马盛衰的原因》《法的精神》及《保卫法的精神》等。在《波斯人通信集》中，他以两个旅行法国的波斯人的口气，嘲笑法国的社会秩序、法国的风俗习惯及天主教僧侣的愚昧；谴责宫廷的浪费、贵族的专横骄奢及专制政治的黑暗腐化等等。

《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用27年的辛勤劳动写出的巨著。他在这部书中阐述的政治思想，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孟德斯鸠首先论证了社会现象的规律性。他证明：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避免地受地理条件、经济状况、人民的宗教，特别是其政治制度等因素所制约。但是，据孟德斯鸠看来，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因素，亦即政治制度。他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律的精神及立法的内容，它甚至可以抵消地理因素的作用。在这里显然他夸大了政治制度的意义，他不了解政治制度本身是取

决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的。他的这个解释虽然很不科学，但是比起天主教神学观点，是前进了一大步。

正是因为他重视政治制度的作用，所以拿出更多的精力研究了政治制度。他认为政权属于全体人民的是民主政体，政权属于有限的人的是贵族政体。不过在他看来，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越少，则贵族政体就越巩固，因而他相信最好的贵族政体是接近民主政体的。在他看来，一个人按照法律并且依靠贵族来统治国家的是君主政体。他说：贵族的存在，是君主政体不可缺少的标志，贵族是君主政体中的“调和”力量。他相信以上三种政体都是合理的政体，除这三种政体外，还有一种政体，那就是暴君政体，这个政体是不合理的。他认为暴君政体是靠恐惧来维持的，在这个政体下，君主把自己看成一切，把其他一切人视同草芥；同时他不要任何法律，他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孟德斯鸠用最激烈的语言谴责暴政，他说暴政破坏了法国社会，暴政也违反了人性。他之谴责暴君政体，实际上就是抨击当代法国的专制制度。

孟德斯鸠不但抨击暴君政体，而且他还专门研究了防止或避免出现暴君政体的办法。在他看来，只有划分国家的权力，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才能避免暴政的出现。

他建议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权力的分立，这三个权力应该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机构。他指出：不但三个权力不应结合在一起，就是两个权力也不应集中在一个机构手中。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掌握在一个机关手里，那末颁布法律的机关同时也执行法律，这样一来它就不会严格遵守法律中的规定，就会破坏法律，国家就将处于暴政之下，而专制制度的弊害就在这里。如果在一个机构中同时集中司法权和行政权，那末也将同样流于专制。那时法官将成为压迫者，因为他既是法律监督者，又是法律执行者。同样地，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集中于一个机构，法官在判决案件时，将不会严格遵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自己制定的，他可以改变法律的内容。

他主张，在君主国家，立法权应该委托给人民代表机关，国王只应该是行政机关的首脑，司法权则属于陪审法庭。按照孟德斯鸠的意见，行政权应该交给一个人，因为他认为惟有这样，办事才能迅速而有效率。他虽然要求由人民代表机关掌握立法权，但是同时他也希望对于这个机关加上一个限制，那就是：除了选出的人民代表机关作为下院外，还要有一个由贵族代表所组成的上院。

在要求三权分立的同时，他还强调三个权力互相牵制的重要性。比如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要由君主批准，而立法机关也要干预一些行政方面的问题——如财政问题和军队的问题。他说：在这个情况下，尽管三个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妨碍，但是三者还是可以和谐运行的。

三权分立原则的锋芒是指向国王专制制度的，因为在这个制度下面，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及司法大权，而实行三权分立就意味着国王权力受到很大

的限制。因此，三权分立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意义。而且这个学说对于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自幼家境贫寒，当过学徒、杂役、家庭书记、教书匠、流浪的音乐家等等。贫困的流浪生活以及同下层人民的不断接触，使他深刻了解人民的疾苦。主人的鞭笞、贵族的凌辱和官府的欺压，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仇恨。因此，他之成为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战士及伟大的民主旗手，并不是偶然的。

卢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把奔放的感情与深邃的哲理凝结在一起，从而不仅启发了读者的头脑，而且也感动了读者的心灵。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法国进步社会，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就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活动的。

卢梭的著作主要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等，通过这些著作表达了他那博大精深的民主思想。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劈头一句话就是：“人是生而自由的，可是现在他却处处带着镣铐！”这有力地道出了饱受压迫而渴望自由的法国人民的心声。卢梭反复证明：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的，平等自由是合乎人的天性的，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他同时又看到广大人民却受贵族、僧侣的奴役，受专制暴君的压迫。因此，他大声疾呼，号召人民向这些压迫者兴师问罪，向吃人的旧制度开火。他对剥夺人民的自由的专制暴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严正指出：这种把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个自然人，也就是集中于一个具体的人手里，是极不合理的。他说：“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并且永远不能够抗拒国王。”君主为了巩固本身的统治，尽可能把人民保持在蒙昧、软弱、贫困、愚蠢的状态之中。君主本人不是即位时就昏庸无道，就必定是王位使得他变成昏庸无道。换言之，君主制本身必然导致君主的昏暴。他愤怒地驳斥了关于君主都是神明，而人民都是牲畜的理论。他指出：压迫者是靠暴力进行统治的，但是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被剥夺了自由的奴隶终究会起来反抗的。人民是可以暴力推翻暴君的。

他勇敢地捍卫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他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而一切权力的表现和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当人民的权力被篡夺并被运用来压迫和奴役人民时，人民完全有权利举行起义，有权利利用暴力来消灭篡权者。这样，卢梭名正言顺地阐明了革命权利的思想。

卢梭也反对富人剥削、压迫穷人的不平等现象。他指出：社会“给富人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以强有力的保障，而几乎弄得穷人不能安保他们亲手搭起的草屋。难道社会的一切利益不是都给豪强和富人占去了吗？难道全部肥缺不是都落在他们头上吗？难道免税的特权和优惠不都是只由他们享受吗？……”

卢梭不但抨击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而且还深入地阐明了不平等的起源。

他相信人类最早是处在“自然状态”中，在“自然状态”中，人们都是自由、平等的，都过幸福的生活。当时人们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国家和政权。人们道德高尚，友谊和同情是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卢梭称这个是人类“黄金时代”。但是，在卢梭看来，人天生有改进的能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工具的发明。有了工具后，人们便开始从事农业而过定居的生活。后来人们又制造金属工具，于是又改进了耕种。随着生产的进步，道德开始变坏，风俗也趋向浅薄。因此有些坏人开始侵占公有土地，私有财产也就产生了。这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私有财产之出现，又引起贫富的差别。而贫富之划分又导致斗争、骚乱及战争。因为战争对富人不利，他们就决定用奸计欺骗贫民，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借口下，向贫民提议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建立“最高权力”。于是包括贫富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共同缔结社会契约，成立国家。在成立国家时，人们在富人欺骗下放弃了在“自然状态”下所享受的自由，而接受了国家的统治。但是国家成立后，统治者并不按照社会契约的规定，为人民谋幸福，而是压迫人民。因此，国家的产生是不平等的第二阶段。

最后，暴政的产生，是不平等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不平等达到极点，人们的不幸也达到极点。但是为了摆脱这个悲惨状态，人们是不是应该返回到他所说的“黄金时代”呢？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样人们岂不要回到森林中去与熊罴共处吗？他认为，在这个情况下，人们的出路就是推翻暴政，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他主张在民主共和国里实行直接民主。在立法工作中，每个公民都直接参加法律的制定，参加法律的讨论及表决。他反对由人民选出代表来制定法律，他认为在制定法律的工作中，人民的意志是不能被代表的。因此他反对代议制度，并且攻击英国议会制度。他说，英国议会无非是公共意志的篡夺者，而且在英国式的代议制度下，人民只有在选举议员时才是自由的，而议员一旦选出，人民又成为奴隶。

从这个主张他引伸出对于国家权力的看法。他认为在民主制度下面，既然每个公民都参加立法，那末国家最高权力就是全体人民的总的意志的体现，从而这样的权力只能保障人民的利益而不致损害人民的利益。因此，只应加强这个权力而不应削弱或限制这个权力。这个权力也不应该加以分割，因为人民的总的意志是不能分割的。正是基于这个看法，他反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在他看来，在民主共和国里，为了防止行政机关以私人意志代替人民意志，应该建立经常性的人民监督制度：定期召集人民大会，由人民大会对下面两个问题作出决定：一、是否愿意保存现存的统治形式？二、政府权力是否仍保留在现任人员手里？卢梭认为这样做，就会使行政人员永远处在被罢免的威胁之下，因而他们就不能不竭尽全力去执行人民的意志，而不敢肆意压迫人民了。卢梭在谈到人民与政府官吏之间的关系时强调指出：“行政权力的受任者决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

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于这些官吏来说，决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人民的意志〕的问题；而且在承担国家所赋予他们的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并没有为自己争条件的任何权利。”

卢梭的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是以“小国寡民”为前提的。他所憧憬的便是小型的民主共和国，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小型的共和国里才能做到每个公民都参加立法工作，都直接监督行政机关。他之所以向往小国寡民制度，与他早年的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他生长在瑞士，亲眼看到瑞士盛行的小国寡民制度。他还梦想把欧洲分割成许多小型共和国。

卢梭对于他所设计出来的民主共和国，赞美备至。他说：在民主下面，人们虽然不如在“自然状态”下那样无拘无束，他们必须服从国家权威，但是他们仍然是自由的。因为全体人民都参加立法，一个人服从法律就等于服从自己，从而服从民主政权就会保证个人幸福及自由。固然，他失掉了“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但是在民主共和国里所得到的东西要比在“自然状态”下所得到的东西多。在民主制度下面，“他的能力得到训练和发挥，他的思想得到扩展，情操也高尚了，他的全部灵魂都提高了”。他从“蠢笨的、受限制的动物”变为“有思想的生物——人”。

卢梭也为民主共和国设计了一个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他并不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他认为私有财产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他所反对的只是贫富悬殊，“一小撮人沉溺于奢侈生活而大多数人缺少生活最必需的物资”的现象。在他的理想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不多的财产，足以满足起码的生活需要，“没有一个人富得能够购买其他人，没有一个人穷得被迫出卖自己”。他以为这个理想是不难实现的，为了防止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提议改革税制，征收遗产税及累进税等。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断定卢梭是一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在他的思想言论里，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但是他作为一位向封建社会冲锋陷阵的战士，能够用锐利的笔锋直接刺进封建专制制度的要害，并且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为饱受压迫的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这便是他的伟大之处。

与卢梭等人大约同时，有一批思想家——狄德罗（1713～1784年）、霍尔巴赫（1723～1789年）、爱尔维修（1715～1771年）——曾经共同编纂百科全书，因而得名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一般都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论为思想武器与封建专制制度、天主教会及宗教迷信作斗争。

18世纪法国唯物论是在自然科学比较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当时，数学、物理学及天文学都有显著的发展，这就使得这些思想家们有可能认识到：世界并不是什么上帝创造出来的，而是宇宙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是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它决定了人们的主观意识。

百科全书派认为宗教是一种有意识的欺骗。霍尔巴赫写道：“在我看来，宗教之所以被臆想出来，只不过是要抬高国王的身价以统治百姓，并把百姓置于国王权力之下。”不过法国唯物主义者还不能正确解释宗教的起源及其阶级本质。按照他们的见解，宗教产生于蒙昧无知，只要普及知识启发人类的智慧，就会消灭它。可见，他们并未能从社会经济的基础去探讨宗教的起源及本质。

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是机械唯物论，他们不了解自然界的发展。他们虽然不否认物质的变化及运动，但是他们视变化为物质的量的增减，还认识不到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们也把宇宙看作是一架物质的机器，否定有偶然性，也否认人类意志的能动性，这样就陷入宿命论中去。

法国唯物论者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便是：尽管在解释自然现象时，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一接触到社会历史现象，他们就落到唯心主义泥沼中去。霍尔巴赫就认为君主的心情及怪癖是战争及战争所引起的破坏、灾难的原因。不过，他们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也提出过某些独到的见解。比如，在他们看来，社会制度的改造，必须先从教育入手。

百科全书派在政治主张上一般都是温和的，大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虽然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有时也承认人民有反抗暴君的起义的权利，但是由于害怕群众害怕革命，他们更强调“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通过和平途径来使社会适应资产阶级的的发展。

但是总的说来，百科全书派在启迪人们的知识及破除愚昧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启蒙运动中还有反映下层人民利益的思想家梅利叶（1664～1729年）、摩莱里（生卒年不详）及马布利（1709～1785年）诸人。这几个思想家共同点是：他们不仅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而且也反对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但是他们都是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空想共产主义者。

归纳起来，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有如下几点。第一，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把人们从长时期的思想僵化中解放出来。他们用理性去批判宗教迷信，批判腐朽的专制制度，批判反动的特权等级制度，批判当代法国的一切黑暗不合理的现象。他们用理性为武器去冲破中世纪以来所设置的种种“禁区”，冲破一切禁锢人们思想的网罗，引导人们独立思考，并且在人们面前展示一幅未来的美好的图景。第二，他们强调人的尊严，并且宣布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人，无论其出身如何，都有独立的人格，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都应该成为有知识的人、自由的人，都应该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要继续当专制制度下默不作声的奴隶。第三，一部分先进的启蒙思想家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否定有超自然的所谓神的力量存在。他们大力传播科学知识，向宗教神学宣战，从而在破除人们的宗教迷信思想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四，少数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等人，提倡起义或革命的权利。他们认为，当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遭到蹂躏时，人民有权利发动革命来推翻压迫

者。他们的这个主张，成为 18 世纪末法国人民举行大革命的重要的理论根据。

18 世纪启蒙运动，实际上为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启蒙思想在大革命中成为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第二节 17、18 世纪的德意志

（一）德意志的政治分裂与经济落后

近代开端后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为止，政治上的分裂与经济上的落后是德意志的两大历史特点。

从 11 世纪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逐渐缩小，到 1500 年只限于德意志领土了。而且 15 世纪以后，当英、法诸国逐步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仍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所谓神圣罗马皇帝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国家元首，帝国境内的封建诸侯各自为政，他们的领地实际上等于独立的王国。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毫无实权，不能干预诸侯领地的内政。皇帝是由选举产生的终身职，他是几个特定的选帝侯选出来的。最初一共有八个选帝侯，从 1692 年起，又出现了第九个——汉诺威选帝侯。但是自从 1273 年以来，哈布斯堡王朝的代表一成不变地被选为皇帝，这是因为这个王朝在帝国境内领有奥地利这样强大的领地，当时德意志时常遭到土耳其的侵略威胁，奥地利的强大及其地理位置起了抵制土耳其侵略的前哨作用。

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到 16 世纪进一步加深，这是宗教战争所促成的。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帝国境内有许多天主教会土地被没收了，封建诸侯乘机抢到大块教会土地，并且使新成立的路德派教会服从自己的支配。这便增大了他们的力量，从而更加强了他们的独立性。

但是，皇帝是不甘心自己所处的无权地位的，他渴望加强帝国中央的权力，而诸侯却力求维持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于是便发生了皇帝与德意志诸侯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演变为三十年战争。战争发生于 1618 年，结束于 1648 年，西欧的英、法、荷及北欧的瑞典诸国都参加到德意志诸侯方面对皇帝作战，因为这些国家都害怕德意志统一。三十年战争的结果，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德意志诸侯不必得到皇帝的同意即可以自由宣战或媾和，他们都可以享受自主权。这样一来，德意志政治分裂成为定局。到 18 世纪下期，在德意志土地上共有大大小小诸侯国家 296 个，骑士领地一千多个。皇帝只保留授予贵族头衔的权利。帝国议会由选帝侯院、诸侯院及城市院组成。选帝侯院的构成是九个选帝侯，诸侯院的构成是 98 个诸侯，城市院的构成是帝国城市的代表。但是，帝国议会形同虚设，它根本无权干涉诸侯国内部的事务。

各国诸侯都把自己领地上的立法、行政及司法、军事和财政大权集于一身，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通过官僚机构、警察和常备军来统治和压迫境内人民。到 18 世纪，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小诸侯们往往把自己的臣民成批出卖或零售给外国君主当雇佣兵。在 18 世纪英法战争的年代里，德意志诸侯通过出卖臣民当雇佣兵而从法国得到 107,226,000 利弗尔，从

英国得到四千六百多万英镑。还有的诸侯靠开设赌场增加收入，也有的靠垄断盐酒等的买卖来增加收入。这些诸侯国家之间也互相钩心斗角，彼此交战不已。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有的诸侯不惜勾结德意志以外的国家帮助自己侵占德意志境内邻邦的土地。

政治上的分裂是造成德意志人民苦难的重要原因，而德意志人民苦难的另一个原因，便是经济落后。

在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繁荣居欧洲首位，这是因为当时地中海是欧洲对东方贸易的主要航路，而德意志是地中海通往欧洲各地去的贸易必经之路。但是，到 15 世纪，土耳其征服了东罗马帝国，截断了欧洲对东方的交通；接着 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的结果，美洲被欧洲人发现了，绕非洲南端的新航路也找到了。因此，世界贸易航路便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沿岸去，德意志远离了航路，于是它便进入长期的经济衰退状态。

后来三十年战争又给德意志带来浩劫，它蹂躏了德意志的许多城市，破坏了广大农村，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德意志经济的衰落。

只有到 17 世纪末，德意志经济才有了转机，在莱茵区、勃兰登堡及萨克森才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到 18 世纪初，在柏林的羊毛工业中，在克雷菲尔德的丝织工业中，都出现集中的手工工场。有的手工工场雇用 2000 个到 4000 个工人。

然而，直到 18 世纪末，德意志经济仍远远落于英法的后面。因为当时在德意志经济发展道路上横亘着两大障碍：

第一是政治上的分裂。在德意志土地上大小国家林立，互相交战、倾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法律系统、一套度量衡制度、一套货币系统，更严重的是各国在边界上都设有税关——这一切都大大妨碍商品的流通。德意志税关之多，为害之大，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从皮尔纳到莱比锡的易北河水路上有 32 道关卡，从汉诺威的闵顿到不来梅之间的维塞尔河水路上设有 21 道关卡。陆路上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严重地阻碍德意志统一市场的形成及工商业的发展。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重重的阻碍，商业资产阶级投到工业中去的资金甚少，他们不得不把更多的金钱投到土地上去。

第二是农奴制度。早在十字军东侵（11 世纪末到 13 世纪末）以来，德意志的农奴制就开始走向瓦解，农奴逐渐摆脱农奴地位而变为自由农民了。他们可以自由迁徙，自由租种地主的土地，不再为地主提供劳役，而只是缴纳实物地租了。

但是到 16 世纪，德意志农民又开始下降到农奴的地位，农奴制又恢复了，这种情况恩格斯称为“农奴制第二版”。有的地主趁农民缴不起地租的机会，把农民的份地收归己有；有的地主在农民流入城市时，把闲下来的份地收归己有。这种剥夺农民土地的行为，令人想起英国的圈地运动。但是与圈地运动不同的是：第一，德意志地主一般地并不剥夺农民的全部土地，而只夺取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供农民使用。第二，德意志地主不是驱逐农民，

而是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叫他们为自己服劳役。

17 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又进一步推进了农民农奴化的过程，有更多的农民变为农奴。在北德意志及东北德意志，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变成荆棘丛生的荒野，地主们往往把这些荒芜下来的份地收回。此外，战争使许多农民破产：他们失去劳动工具、家畜、肥料及种籽等等，地主便利用农民的这种困难，收回农民的一部分份地。这些地主在收回一部分份地之后，便把农民变为农奴，强迫他们为自己服劳役。

“农奴制第二版”在北德意志及东北德意志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勃兰登堡、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及西里西亚等地便是农奴制盛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农奴制采取最残酷的形式，在某些场合，农奴每周全部时间都在地主土地上劳作，他们只能利用夜晚的时间耕种自己的份地。地主往往用监工，手执鞭子，监督农奴劳动。农奴被剥夺了大部分自由：他们不能学习手艺，不得地主同意也不能结婚。农奴也常常被出卖、出借或被典当出去，甚至在地主的赌场中被输掉。每一个地主都身兼地方法官或警察长，农民完全处在地主的任意宰割之下。

只是在西南、西部及西北德意志还保存着自由农民。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自由农民所受的剥削也是相当沉重的，地主强迫他们缴纳数量很高的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而且他们有时也必须向地主提供一定的劳役地租。

那末，为什么在西欧资本主义方兴未艾之际，在德意志却出现了“农奴制第二版”的历史倒退现象？经过德国及东欧国家的学者的多年研究，原因已经弄清楚了：第一，16、17 世纪西欧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猛增，因之对粮食的需求也猛增，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也随之猛涨。在这个情况下，德意志地主有经营粮食生产的强烈要求。同时，由于德意志经济落后，地主不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物，为了经营粮食生产，他们只能在古老的农奴制中找到出路。第二，德意志地主贵族在地方上拥有很大的权势，他们可以任意摆布农民；同时德意志的市民阶级力量薄弱，他们无力去支持农民反抗地主恢复农奴制的横霸行为。

农奴制的存在，对于德意志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抑作用，因为农奴制不仅由于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而堵塞了劳动力的来源，而且也限制了工业品国内市场的扩大。

（二）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

在德意志诸国中，只有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国家最为强大，这两个国家的互争雄长，构成 17、18 世纪德意志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德意志诸邦中，奥地利占有特殊地位。第一，它是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皇帝的世袭领地；第二，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到 16 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除原有的奥地利本部外，还领有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捷克（居民为

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一部分。1699年又从土耳其手中夺取匈牙利的其余部分,于是整个匈牙利(居民为马札尔人)都归哈布斯堡家族统治。

奥地利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有其特殊背景的:为了抵抗和防御土耳其人的侵略,捷克及匈牙利的上层贵族不得不请求奥地利的保护而承认神圣罗马皇帝为自己的君主。

在捷克,民族压迫是与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的。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曾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捷克中、小贵族都被逐出国外,或者被没收了土地。这些土地都落到德意志人手中,这些德意志人都成了剥削当地农民的地主。而且奥地利统治者无情地摧残斯拉夫人的民族文化,以德语为捷克的官方语言。

在匈牙利,当地的贵族地主与奥地利统治集团勾结在一起共同压迫人民。奥地利派来的官吏对匈牙利人民横征暴敛,并且粗暴地推行德意志化政策,以德语为匈牙利的官方语言。

奥地利帝国还统治南尼德兰和意大利大部分土地。

到18世纪,意大利不但仍受外国势力宰割,而且土地分崩离析,诸国林立。北意大利的伦巴底属于奥地利,托斯坎纳、帕尔马以及摩登纳也处在奥地利的控制之下。在南意大利,两西西里王国(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处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意大利的中部的教皇国则有罗马教皇在统治着。威尼斯和热那亚是两个独立的共和国,政权属于少数贵族和名阀。意大利半岛上最强大的独立国家是撒丁尼亚王国(包括萨伏依、皮蒙特和撒丁尼亚岛)。

到17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帝国境内也强化了农奴制。在捷克、西里西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及下奥地利的某些地区盛行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强迫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主经济。地主残酷地剥削农奴,任意增加劳役时间(在捷克甚至达到每周六天)。农民不得到封建主的允许不能结婚,不能随便迁居。他们还承担很重的军税(国税)及什一税(教会税)。

农奴制剥削激起了农民的反抗斗争。在17、18世纪中,捷克农民运动几乎一直没有间断。在匈牙利,1677~1685年乔科里领导的农民起义及1703~1711年拉科齐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是农民对于地主野蛮的剥削的有力回答。而且这两次匈牙利农民起义都带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

奥地利在17世纪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到18世纪,进入集中的手工工场阶段,在麻布工业及呢绒工业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工场。西里西亚和捷克是帝国的工业中心。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被垄断在德意志资产阶级手中。而且,农奴制的存在,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这样,这个多民族的帝国内部矛盾重重,既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又有新兴资本主义与旧的封建关系之间的矛盾。

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帝国政府在18世纪下半期曾试图实行一些改革。

这些改革是在“开明专制”的招牌下进行的。所谓“开明专制”是东欧一些落后国家的君主玩弄的政治花样，在表面上是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些主张进行改革，而实质上这些改革只是触及封建专制主义的皮毛，而丝毫也没有破坏它的基础。因之，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在奥地利，这些改革是在玛丽亚·特利萨在位时期的首相考尼茨公爵及玛丽亚·特利萨的后继人约瑟夫二世的主持下进行的，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土地改革。这是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被迫实施的。玛丽亚·特利萨在 1771 年和 1775 年颁布法令，宣布减少农民劳役地租及代役租的数量，劳役固定为每周三天，每天十小时，并且减少农民为地主拉车运输的义务。同时宣布取消皇室领地上的农奴制度。

约瑟夫二世在这方面更前进了一步，1781 年他下令宣布捷克、莫拉维亚和奥地利帝国其他地区的农奴为自由人。此后，他们可以自由结婚，有权利自由离开地主的庄园，并且可以选择任何职业。但是，留在地主庄园的农民如果继续使用地主的份地，必须照旧为地主服劳役，并且缴纳其他贡赋。

奥地利统治者之决定采取这个重要措施，是由于考虑到：封建贡赋过重，农民无力负担国税，也无力按时应征入伍。同时，实现农民人身自由也可以解决手工工场自由劳动力缺乏问题。最后，这样做也可以缓和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有利于巩固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

第二，约瑟夫二世下令封闭天主教寺院，没收其财产为国有。

第三，约瑟夫二世又奖励工商业，实行保护关税，成立国家工场，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因为工、商业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税收。

但是，以上一系列改革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在约瑟夫二世于 1790 年逝世之后，反动的贵族把所有这些改革都取消了。

（三）普鲁士王国的兴起及其军国主义

普鲁士是德意志诸邦中领土最广、力量最强、地位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 40 年代它一直影响着整个德意志的历史。

普鲁士国家是靠不断地扩张领土而发展起来的。

早在 10 世纪，霍亨索伦家族就统治了瑞士北方的索伦山上一个城堡。到 12 世纪，这个家族的代表又成为纽伦堡城市的城主。1415 年，这个家族的代表腓特烈一世又从神圣罗马皇帝那里取得了勃兰登堡领地和选帝侯称号。勃兰登堡位于德意志东北边境，经常与邻近的斯拉夫人发生战争，因而它的军队取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中，勃兰登堡选帝侯接受了路德教（新教），这就使得他有可能攫取天主教教会的土地财产，由是勃兰登堡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新教国家。到 17 世纪初，勃兰登堡选帝侯又利用婚姻关系取得了莱茵河下游的克列夫兹、马尔克及拉文斯堡。1618 年，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又取得了波兰的附庸国——东普鲁士，因而他就由勃

兰登堡选帝侯一变而为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侯。为了取得东普鲁士，他不惜向波兰国王称臣纳贡。三十年战争结束时（1648年），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兼并了东部波美拉尼亚。同年，他又趁波兰新王即位的机会，摆脱了对波兰的臣属关系。到1701年，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又以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条件，从神圣罗马皇帝那里取得普鲁士国王的称号。由是，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侯国就变为普鲁士王国。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又从奥国夺取了西里西亚。1772年在瓜分波兰时，又分到西普鲁士（格但斯克和托伦除外），这样就把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连接起来。如果说它原来的领地勃兰登堡的面积是23,751平方公里的话，那末到1772年就增加到194,891平方公里了。

普鲁士之兴起，是有其经济前提的。正是在17世纪以后经济繁荣的基础上，这个国家才能强盛起来。普鲁士经济繁荣的原因有二：第一，勃兰登堡的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有利。贸易航路之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虽然引起整个德意志经济衰落及停滞，但是却促进了勃兰登堡的经济繁荣。贸易航路的转移，使得南德意志和中部德意志的个别地区不得不向北海岸寻找贸易出口，而勃兰登堡就成为必经之路，因为德意志流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一切河川（易北河、奥得河、莱茵河及威悉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土。

第二，霍亨索伦王朝实行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普鲁士经济发展。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在位时期（1640~1688年）就开始奖励工、商业发展。1685年法国政府取消南特勒今后，胡格诺教徒纷纷逃往国外。腓特烈·威廉下令收容法国流亡者并给予优待。至1703年，大约有20,000名法国胡格诺教徒和13,000名其他国家的新教徒定居到勃兰登堡。他们主要是商人及技艺高强的手工业者，因而把资本和技术带到这里。这些新来的移民建立了毛织和棉织手工工场，进行丝的加工，进行天鹅绒、蜡烛、绢带等物的生产。但是在农奴制存在的条件下，自由劳动力来源非常有限。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腓特烈·威廉利用刑事犯及狱囚、流浪汉及乞丐充当新工业的劳动力。其孙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继续实行这个政策，他特别奖励军事工业，如毛呢工业。

普鲁士的崛起，也是和它所推行的军国主义政策分不开的。从腓特烈·威廉以来，普鲁士的统治者就把国家变为一架强大的军事机器。到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普鲁士军队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八万五千四百六十多人，相当于全国居民的4%。在全欧，普鲁士在人口方面占第十三位，但是其军队数目占第四位。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用在军事上。普鲁士军队的军官皆是容克（地主贵族）出身，普通士兵则由雇佣兵及农奴兵构成。在军队中强调盲目服从，军官可以任意鞭撻士卒，有些士卒往往因不堪军官的虐待而自杀。平时军纪虽严，但一到战时，军官则纵容士兵烧杀掠劫。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与容克阶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容克阶级积极支持军国主义政策，这是因为这个政策给他们带来许多利益：第一，实行军国主义及侵略扩张，他们就可以获得新的地产。第二，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大，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扩充起来，这就为容克子弟提供更多的当官的机会。第

三，加强军事力量，也相应地增加军官的数目，从而为容克子弟提供更多的军官职位。第四，强大的军事机构，可以有效地维护容克阶级赖以存在的农奴制度。

容克阶级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们的经济力量是建立在农奴制上面的。德意志的“农奴制第二版”在普鲁士表现得最为突出。从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期，普鲁士，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又农奴化了：他们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被迫向地主提供劳役地租及代役租。地主还对农奴行使警察权及司法权。地主的横霸势力统治了普鲁士整个农村。在剥削农奴劳动的基础上，地主的财富增加了，他们每年把大批粮食输往西欧先进国家。

容克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和统治，是受到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保护的。1653年，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和容克达成协议，颁布了贵族议会的决定，肯定了容克向农民征收劳役地租及代役租的权利，也承认了容克对农民行使的警察权及司法权，容克则同意选帝侯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征收“军事税”，用以建立常备军。

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不仅维护了农奴制剥削，而且也是统治阶级对内榨取民脂民膏压制民主及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工具。

但是，必须看到：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也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普鲁士国家机器自从18世纪20年代以来就达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化和“合理化”。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形成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一切都按照规章办事，节约及廉洁蔚为风气，甚至宫廷也厉行节约开支。因而普鲁士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全欧树立了一个典范。

而且，普鲁士专制主义的代表人物——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容抹煞的。他大力提倡向国内落后地区移民，开垦荒地（如开垦奥得河沼泽地）及开凿运河，修筑公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假如没有国家发挥作用（提供财政资助，任用有组织才干的官员，统筹计划及组织领导等等），这些建设是无法完成的。此外，他还对普鲁士的科学、艺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如重建普鲁士科学院，重新起用被驱逐出境的启蒙思想家。他还与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交往。他也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然而这些都丝毫改变不了普鲁士专制主义的阶级本质。而且，普鲁士专制主义再加上军国主义，便构成所谓普鲁士精神，这种精神主要表现为对上级的盲目服从，对下级的蛮横无理，民族主义傲慢及对外的侵略成性，好勇斗狠，强权即公理的思想等等。而这个精神的主要体现者便是容克阶级。

第三节 封建农奴制的俄国

(一) 彼得一世的改革与俄国国际影响的增长

在 17、18 世纪，俄国虽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但是通过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它的疆域愈益扩大，国力愈益增强，在国际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原来在近代开端时，俄国处在强邻的包围之中。在南方，土耳其占据着黑海北岸及克里木半岛，从而封锁了俄国到黑海的去路。在西北方，瑞典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因而截断了俄国通往波罗的海去的道路。在西南方，俄国又与大国波兰为邻。

当时俄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大商人都迫切要求打破这个局面，要求俄国实现以下两大任务：第一，夺取瑞典手中的波罗的海东岸的土地，以打通到波罗的海去的通路。第二，夺取土耳其手中的黑海北岸土地，以打通通往黑海及地中海去的道路。这是因为实现上述任务，可以满足地主贵族的领土扩张欲，也可以满足大商人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这两大任务在 18 世纪都实现了。

首先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是彼得一世（1682～1725 年）。彼得一世的目的不止于夺取出海口，而且还想建立在欧洲的霸权。

彼得一世早在 1695 年就迫不及待地出兵攻打土耳其，翌年又出兵，结果只占领了亚速夫，而夺取出海口的计划失败了。

1700 年，彼得一世又集中兵力发动了侵略瑞典的战争，这个战争前后持续 21 年之久，史称北方大战。结果，瑞典大败，俄国

乃从瑞典手中取得了波罗的海东岸土地。第一个任务实现了。

但是彼得一世在位时期始终未能完成夺取黑海口岸的任务，这个任务到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 年）时才完成。通过 1768 年到 1774 年和 1787 年到 1791 年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俄国终于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黑海北岸的大片土地，并且取得了在黑海上自由航行的权利。

但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犹不满足，她又积极策划瓜分波兰。波兰瓜分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 1772 年，参加瓜分的有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在瓜分中，俄国占领西德维纳河、德鲁奇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白俄罗斯地区和一部分拉脱维亚地区；普鲁士占领瓦尔米亚、波莫热省（格但斯克市除外）、海尔姆诺省（托伦市除外）、马尔鲍克省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一部分大波兰、库雅维亚地区；奥地利占领维斯瓦河和桑河以南地区，加里西亚的大部分。第二次瓜分是在 1793 年，只有俄国和普鲁士参加。俄国取得白俄罗斯的一部分，立陶宛的一部分和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普鲁士取得格但斯克和托伦两个城市和大波兰的几个省及玛佐夫舍的一部分。第三次

瓜分是在 1795 年。在这次瓜分中，俄国吞并了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奥地利占领了包括克拉科、卢布林在内的全部小波兰地区的一部分玛佐夫舍地区。普鲁士夺取了其余的西部领土、华沙、其余部分的玛佐夫舍地区。至此，波兰被瓜分完毕。波兰灭亡了。

通过上述对瑞典、土耳其的一系列战争及参加对波兰的瓜分，俄国从偏处东北欧的弱国变为东欧的强大国家，并且成为东欧的霸主。

俄国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取得胜利并且一跃而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是和彼得一世的改革分不开的。他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推行的改革，大大增强了俄国内部力量，从而才能够在国际斗争中取得一连串的胜利。

彼得一世的改革，大体上有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沙皇的专制权力。17 世纪俄国专制制度尚未开始形成，地方的封建贵族拥有强大势力，甚至中央政府大权也为大贵族所把持。由贵族组成的杜马权力很大，沙皇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军队也为贵族所操纵，沙皇也无力支配军队。彼得一世看到这种政权涣散状况不利于对外斗争，因此他即位后不久就着手加强专制制度。为了这个目的，他想方设法削弱了大贵族的势力，取消贵族代表机关——杜马，而另外成立了从属于沙皇的国务院。国务院是立法机关，也是监督行政的机关。为了打击地方贵族的割据势力，他又把全国分为八省，派省长到各省去替沙皇管理地方。他又改革教会，使俄国东正教教会完全听从沙皇管束，使其成为沙皇统治的精神工具。此外，军队也从大贵族手中转移到沙皇手中。沙皇权力的加强，使得沙皇有可能得心应手地推行对外侵略战争。

第二，厉行军事改革。彼得一世认识到为了争取出海口，为了争夺欧洲霸权，必须建设海军。为此，他在 1697 年亲身到西欧诸国旅行，在那里学习造船术，并且聘来大批技术人员。1698 年回国后便开始建造舰队。在陆军方面，也进行大规模建设，成立军官学校，训练新式军事干部，取消军队中的封建贵族的特权，成立兵工厂等等。由于实行这些改革和建设，俄国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第三，发展工业。早在 1695 年对土战争失败后，彼得一世就认识到工业落后是俄国挨打的重要原因，此后他发展工业不遗余力：一面成立国家工场，一面奖励私人企业。鉴于在农奴制的俄国缺乏自由劳动力，他下令把乞丐编入工场。但是更重要的措施是：1721 年他下令允许商人购买农奴，以便手工工场使用农奴劳动。这样的农奴在人身方面仍是不自由的，在人格上依附于工场主。此外，他也鼓励地主开设工场，用自己的庄园上的农奴进行生产。在这个政策下，在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手工工场有了相当的发展，呢绒、麻布、皮革的生产增加了好几倍。生铁的生产也大大增长。并出现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如炼钢业、造船业及丝织业等。到彼得一世在位末年，俄国大约有二百四十个手工工场。工业的发展，对于增强国家军事力量起了巨大

作用。

但是，18 世纪俄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也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俄国。

首先，当时瑞典国内政治斗争很尖锐，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很大。瑞典农民在中世纪是自由的，他们大多数在自己的地产上或国有土地上劳动。但是到 16 世纪中叶以后的 100 年内，国有土地大部分被上层贵族夺去，于是农民落到贵族地主的剥削下面。1655 年以后，国王下令把转到贵族手中的土地部分地归还国家。1673 年到 1680 年又实行了土地归还国家的政策。这引起了贵族的极大不满，因而发生了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尖锐斗争。这个斗争大大地削弱了瑞典在对俄战争中的力量。

其次，波兰虽然原来是一个东欧的大国，但是其内部存在严重的弱点：大封建贵族势力很大，他们割据各地，而国王权力很小。而且国王是选举产生的，他成了大贵族手中的傀儡，每次选举总要引起大贵族之间的争吵。这一切都足以招致外来干涉，促成了列强对波兰的瓜分。

再其次，土耳其虽然有广土众民，但是到 18 世纪开始衰落，政治黑暗，军队腐化，以致在对俄战争中无力取胜。

最后，西欧局势有利于俄国。18 世纪上半期英、法两国拿出全力互相搏斗，无暇干涉俄国在东方的行动。到 1789 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欧洲封建国家集中力量与法国革命作斗争，也无力限制俄国的侵略活动。

（二）农奴制度与俄国的经济落后

俄国在 18 世纪的过程中虽然由弱国发展为东欧强国，但是由于农奴制度的存在，国内社会经济还是非常落后的。

在俄国农奴制度下面，农民不仅担负着沉重的劳役地租，而且也丧失了大部分的人身自由。俄国农民分为地主农民与国有农民，前者是在地主庄园中劳动，后者是在国有土地上劳动。到 17 世纪，沙皇时常把大量的国有土地以及国有土地上的农民赐给贵族。在 1645～1699 年间，只是被赐予的农民就达五万五千多户。因此，地主农民数目大增。地主农民比国有农民更苦，地主时常兼并农民的份地和增加农民的劳役地租。农民还被迫缴纳许多实物，包括农产品及家庭工业品。

俄国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起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厉害。不过俄国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是有发展过程的。

本来在 16 世纪以前，俄国农民有迁徙的自由，在地主剥削加重的时候，他们就逃到别处去，或者转移到其他地主那里去。这种情况还得到法律的认可。1497 年和 1550 年的法律就规定：农民每年有一次出走权，即在尤里也夫日（俄历 11 月 26 日）前后一个星期内可以出走。换言之，在完成田间工作后可以转移。地主对这种情况颇不满意，因此他们百般刁难，尽量限制农

民出走。在他们的要求下，政府颁布了限制农民出走的法律，规定：欠地主债的农民不许出走。实际上大多数农民是负债的，因为如果不向地主借债，他们往往无法购置农具。1580年，政府为了满足地主的要求，又颁布法律，规定在1581年到1586年的五年之内禁止农民在尤里也夫日前后出走。后来又补充规定：在1590年到1595年的五年内也禁止出走。最后，禁止出走成为永久的禁令了。到1597年又颁布关于追捕逃亡农奴的诏令，它责成一切地主把过去五年内从外地迁到他们的土地上的农民一律送归原主，但五年以前逃来的农奴不在此限。1607年的法规为追回逃亡农民规定了15年的期限。1649年的法典里规定农民无条件地固定在土地上，逃亡农奴不管逃亡时期过了多久，都应送归原主，而且，地主不仅对农奴的人身和劳动有充分的权利，而且对其全部财产和整个家庭的劳动也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农奴的卑下地位及人身依附关系在16世纪到17世纪就已经在法律上固定下来了。

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农民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彼得一世不但从农民中抽丁当兵，而且还叫他们负担人头税，这对于农民的地位发生很大影响，因为它扩大了地主对于农民的权力：地主须负责使自己的农奴如期完纳人丁税。而且，彼得一世在位时还开始了广泛出卖农奴的做法。只用十个卢布就可以买到一名女农奴。

到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民状况更加恶化。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5年下一道敕谕，授权地主放逐“无礼”的农民去做苦工。两年后又下令禁止农民控告地主。叶卡捷琳娜二世还允许地主自己制定惩罚农奴的法规。这样一来，地主虐待农奴更加肆无忌惮了。女农奴主萨尔蒂科娃亲手折磨死的农奴竟达140人。

地主对于农民的穷凶极恶的压榨和奴役，引起农民不断地反抗。农民起义史不绝书，其中最著名的是1670年的拉辛起义和18世纪的普加乔夫起义（1773年）。普加乔夫起义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农民运动，也是空前广泛的群众性武装斗争，因为除了农民之外，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也投入了斗争。但是这两次农民起义都以失败而终。

农奴制之存在，是俄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它严重地妨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17世纪，当西欧诸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日新月异地在发展的时候，俄国资本主义几乎还没有出世。俄国国内的商业交换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全俄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但是工业基本上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虽然有少数大工场，但是它们使用的是农奴劳动，远远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只有到18世纪初，俄国工业才有起色，这是彼得一世实行改革的结果。在改革之前，俄国手工工场一共只有21个（其中4个是官营，17个是私营），而改革时期，手工工场增加到205个。

在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俄国手工工场数目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在1776

年，俄国手工工场为数 478 个。

俄国手工工场数目虽然大增，但是在工场工人中农奴工人占很大的比重，自由工人为数甚少。因之劳动生产率之低下可想而知。而且，手工工场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市场上的大部分商品还是农民手工业者及城市小手工业者供应的。因之，小手工业占优势。一直到 18 世纪末，俄国的手工工场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西欧，甚至比德意志还要落后。

第四节 17、18 世纪的海上争霸

16 世纪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商业殖民帝国。

为了争霸，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结果，西班牙获胜，并在 1580 年合并了葡萄牙。葡萄牙虽然在 1640 年恢复独立，但是经过这次合并，它的地位一落千丈，海上贸易衰落了，许多海外殖民地被后起的荷兰夺去了。不过，葡萄牙在失去从前的优势后，仍旧保有不少殖民地：在南美有富饶的巴西，在非洲大陆有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在印度有果阿和第乌岛，在中国有澳门，而且在大西洋和大洋洲也有一些岛屿。

葡萄牙衰落的原因，主要在于本国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军事实力去保卫自己的利益。

但是，西班牙也好景不常，从 16 世纪末也逐渐走下坡路。16 世纪末的尼德兰革命，使得西班牙失去荷兰这个富庶的属地，这是对它的霸权的一个沉重打击。1588 年英国海军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又有力地削弱了西班牙的海上实力。在 17 世纪上半期的三十年战争中，西班牙又损失了 300 艘战舰，这意味着西班牙的海军全部毁灭。在 1655 年英西战争中，西班牙又失去西印度群岛中的重要海岛——牙买加。在 1658 年的对英战争中，又失去欧洲西海岸重要商港敦刻尔克。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 年）的结果，根据乌特勒支条约，西班牙又进一步丧失了欧洲的属地——把南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地让给奥地利，把对西班牙殖民地的奴隶贸易独占权送给英国。

这样，到 18 世纪上期，西班牙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强国的地位。不过，它在海外仍保有庞大的殖民地：在美洲有墨西哥、新格拉那达、秘鲁、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加拉加斯、危地马拉和佛罗里达以及西印度群岛的古巴、波多黎各、东部圣多明各；在亚洲有菲律宾及部分婆罗洲。

西班牙殖民帝国衰落的原因，首先在于它对于殖民地的统制和限制太严，这就阻抑了殖民地上的工农业人口的增长。其次，从殖民地掠夺来的黄金白银没有转化为资本投入本国的工农业中去，而是被大贵族挥霍掉了。最后，西班牙政府的对内政策摧残了国内的工商业。本来西班牙的工商业在 16 世纪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政府对工商业征税太重，以致使许多工商业企业倒闭。更严重的是政府在 1609 年放逐了摩尔人，而在这以前西班牙的工商业大部分是摩尔人经营的。这样一来，就把西班牙的工商业毁掉了。国内工商业的衰落，造成西班牙的国力不振，以致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遭到失败。

早在 17 世纪上期，西班牙就失去了世界霸权，代之而起的荷兰成为头等贸易及殖民强国。

荷兰由于其地理位置及有限的自然资源，很早就向海上发展。早在 16 世纪就大力发展航运业。到 17 世纪，荷兰商人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贸易，拥有庞大的商船队，仅从事捕鱼及运鱼的船只就有 6400 艘。波罗的海的全

部贸易、对印度的贸易、对美洲殖民地的贸易，都掌握在荷兰人手中。他们甚至侵占了英国对其殖民地的贸易地盘。

荷兰也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除了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的锡兰、印度马拉巴海岸、科罗曼德海岸及马六甲外，还占有北美的新尼德兰（1664年被英国夺去，改名为纽约），南美的圭亚那，非洲的海角殖民地，东方的爪哇、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一部分、摩鹿加群岛和西里伯斯。

但是，就在17世纪荷兰执世界贸易殖民的牛耳的时候，英、法两国起来向荷兰争夺霸权了。

17世纪，法国在美洲建立了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两个殖民地，并且开始征服印度，在印度沿海建立了本地治里、昌达那加等贸易站。法国又在西印度夺取马提尼克及瓜德罗普两个岛屿，在非洲侵略马达加斯加、占领戈雷及塞内加尔河口。

英国在17世纪初也开始了殖民活动，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开始建立殖民地，到1688年，已经建立了十个殖民地。同时，英国也侵入印度，到1688年为止，英国在印度已经占领了三个重要据点：加尔各答、圣乔治要塞（在马德拉斯）及西海岸的孟买。在西印度，英国占有牙买加、巴巴多斯及巴哈马，在非洲占有冈比亚及黄金海岸。

同时，英、法两国商人也积极参加了海上贸易活动。

首先与荷兰发生冲突的是英国。在17世纪中期和后期，英国通过几次战争，予荷兰以致命打击，迫使荷兰承认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荷兰不仅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而且也丢失了在北美的殖民地（新尼德兰）。此后，荷兰的势力就一蹶不振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得不退居英国的小伙伴的地位。

荷兰之所以败于英国之手，是因为荷兰是商业国家，没有工业基础，而英国则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工农业资本主义都有了相当发展的国家。

在打败荷兰这个敌手之后，与英国争霸的只剩下法国这个劲敌了。因此，在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刚一确立，英国就开始了与法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长期斗争。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打败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拉拢和利用反法的国家，与法国作战，自由则集中海军力量，夺取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在英、法争霸的斗争中，一共发生四次重要战争——1689~1697年的圣奥格斯堡同盟的战争，1702~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及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通过这几次战争，特别是七年战争，法国损失惨重，在印度，法国虽然被允许保留其沿海贸易点，但是不能在印度维持军队，这样就被剥夺了征服印度的可能。在北美，法国只剩下纽芬兰沿岸两个小岛，西印度几个岛屿；在南美法国只保留圭亚那这个据点。英国则夺取了法国的整个圣劳伦斯河流域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土地以及格林纳达岛（在西印度）。英国还取得了西班牙的佛罗里达。

这样一来，在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

国，三个世纪的海上争霸的最后的胜利者。

在长期争霸中，英国之所以最后战败法国，根本原因在于法国是一个走向衰落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而英国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国家。此外，英、法殖民地的差异也是决定法国最后战败的重要因素。法国的北美殖民地人口稀少，只有少数贸易据点，守军也少。而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上，居民有两百万人以上，有繁荣的经济，殖民地可以在英法战争中为母国提供丰富的物力及人力。

第四章 北美独立战争

第一节 独立战争的背景

(一)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概况

美国在独立以前，是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从 17 世纪初到 18 世纪中叶先后建立起来的 13 个殖民地。殖民地上的白人是从欧洲，主要是从英国移来的，他们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居民中的黑人是以奴隶身份从非洲贩运来的。至于北美原来的居民印第安人，则在殖民地建立的过程中，有的被驱逐到西部山区不毛之地，有的干脆被屠杀，他们的土地都被白人夺去。印第安人曾对这些白人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抵抗和斗争，但是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印第安人是无力与白人抗衡的，而且他们内部的不团结也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的反抗斗争都失败了。北美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除资本主义制度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的租佃制和奴隶制度。半封建的租佃制是从英国搬来的，并且是与大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在纽约的殖民地，大封建地主往往田连阡陌，250 万英亩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地主手中。其中只约翰逊一个人就独占 5 万英亩的土地。这些大地主当中有大部分人原是英国的贵族，他们的土地都是在殖民地创建时期英国国王政府赠送给他们的。此外，在一些殖民地上还有英国国王的遥领土地。这些大地主通常都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佃农。纽约殖民地的许多地区，几乎有六分之五的居民是佃农。大地主时常任意提高地租，佃农受到残酷的剥削。地主对于佃农的剥削，在本质上带有半封建性质。

为了维护大土地所有者，在大多数殖民地上还实行长子继承制。在南部和中部一些殖民地上还实行所谓嗣续限定法。在这个制度下，只有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继承土地财产，目的是为了保持贵族的大土地所有制。长子继承制及嗣续限定法都是封建残余的表现。

不过，这种半封建的租佃制并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它只限于中部殖民地的某些地区。因为北美殖民地有广阔的未垦土地，劳动者占地垦荒是比较容易的，尽管殖民地当局禁止随便占地。在中部及北部殖民地上更普遍的土地所有制是小农土地所有制，在这个制度下，农民是小土地所有者，也是劳动者。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处在大商人的剥削之下，因为他们的剩余产品通常是经过大商人之手转卖到市场上去的，而大商人往往大大压低收购价格，高价出卖。

在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中，最野蛮的要算奴隶制度了，它是殖

在北部是麻萨诸塞、罗德艾兰、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在中部是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德拉瓦；在南部是弗吉尼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

民地上的地主和资本家一手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白人契约奴制度，另一种是黑人奴隶制度。

在 13 个殖民地上到处都有白人契约奴，他们的来源有四个方面：第一，殖民地上因欠债而无力偿还者，他们被法庭判为契约奴；第二，想到北美而缺少路费的英国贫民卖身为奴，以偿路费；第三，被拐骗的乞丐、儿童等；第四，英国的罪犯。这些白人契约奴都是按照契约上的规定为主人服劳役的，通常他们必须当五年至七年的契约奴，期满才能获得自由。

比白人契约奴更苦的是黑人奴隶。黑人奴隶是欧美奴隶商人从非洲运到这里来的。

在 13 个殖民地上都有黑奴，但是大规模的黑人奴隶制度只限于南方几个殖民地。南方奴隶主经营大种植场，使用成群的黑人奴隶为他们生产烟草、稻米、靛青等农作物。

在南方种植场上，黑人奴隶在奴隶主的惨无人道的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一般是在鞭打下进行劳动的。主人可以任意虐待奴隶，动辄加以各种体罚，甚至可以杀死奴隶而不受任何惩罚，因为法律是保护奴隶主的利益的。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不领任何工资，只是靠奴隶主供应的少量劣等食品维持生命。

到 18 世纪，黑人奴隶制逐渐有代替白人契约奴制的趋势。

殖民地上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制度，也决定了复杂的阶级关系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贯串了整个殖民地时代：有佃农反对大地主的斗争，有小农反对商人剥削的斗争，有工人反对工场主的斗争，有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往往发展为武装起义。黑人奴隶的密谋及起义，此伏彼起，使奴隶主经常处在惶恐状态之中。统治阶级对起义者的报复，是惨绝人寰的。如纽约殖民地总督在谈到 1712 年纽约奴隶起义被镇压的情况时写道：“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被烧死，有几个人被绞死，一个人被车裂，一个人活着在城里被吊在锁链上。这样想出的惩罚办法是最有教训意味的。”

不过，北美殖民地居民在政治上却享有一定程度的议会民主。

北美殖民地的统治机构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英国统治殖民地的政治机构，另一方面是代表殖民地居民的议会。而英国的殖民统治机构也分为二：一是在英国政府内部设置的管理殖民地的机构；一是英国派到殖民地去直接进行统治的总督及其属员（但这只限于王家殖民地）。

在北美 13 个殖民地中，有八个是王家殖民地，有三个是业主殖民地，有两个是自治殖民地。王家殖民地的总督是由英国国王任命的；业主殖民地总督则由业主自己指派，但是受英国法律节制；自治殖民地总督是由殖民地居民选出，但是他们必须按照英国国王所颁布的特许状进行统治。

总督依靠参事会统治殖民地，他是殖民地上的行政首脑，议会所通过的法律由他执行。他有权否决议会所通过的法案，也有任命各级官员的权力。

各殖民地上的议会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它一般地分为上、下两院，职权

无明文规定。但是在实际上殖民地议会的下院相当于英国国会的下院，享有立法权，特别是征税、征兵及发行纸币的权力。在王家殖民地上，通过议会与总督的斗争，议会下院的权力愈益增大。下院最后争取到一系列权力，如可以监督总督执行法律的情况，取得某些官吏的任命权（如收税官或财务官等等）。在王家殖民地上，议会上院通常是由总督的参事会兼的。一般法案必须由议会上、下两院通过，然后才提交总督批准。

在个别的业主殖民地和自治殖民地，议会权力完全凌驾于总督之上，总督处在议会的充分控制之下。

在王家殖民地，上院（亦即参事会）由总督提名，英国国王任命。下院则一律由选举产生，三个类型的殖民地都是如此。在大多数殖民地上，只有土地所有者或拥有其他财产的人，才能有资格当选民，仆役及雇佣工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当然，契约奴及奴隶更享受不到这个权利。比如，在弗吉尼亚殖民地，选民必须有 100 英亩未垦地或 25 英亩已垦地。在佐治亚，只有拥有 50 英亩土地或相当于这些土地的价值其他财产的人，方能参加选举。但是，在地广人稀的北美殖民地上，一般劳动者取得土地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在有些殖民地，如罗德艾兰殖民地，一切人都可以从殖民地当局领取小块土地。因此，北美殖民地的选民人数并不像人们想象那样少，一般自由小农都享有选举权。

但是，各殖民地的议会一般地都被控制在上层分子手中，往往是屈指可数的富人或名门贵族手中。

（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杰弗逊和富兰克林

英国统治阶级在北美经营殖民地的目的在于把殖民地变为他们剥削的对象，变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及廉价的原料供应地。为此，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660 年，颁布了“列举商品法”，规定：殖民地上的某些商品如烟草、砂糖、棉花、靛青等只能输往英国，如要输往外国，必须先在英国卸货，由英国商人经手再输往外国。颁布这项法律的目的，显然是想把北美殖民地变为英国工业原料供应地，使英国工业资本家买到廉价原料。1663 年，又颁布“主要商品法案”，规定：一切从欧洲输入北美殖民地的商品（只有少数例外），首先必须在英国靠岸卸下，由英国政府征税，然后装船运走，其目的在于保护英国商品在北美的市场，以便与欧洲外国商品竞争。这项法律是把殖民地变为英国独占的商品市场的第一步。此后，英国又在殖民地设置税关，以征收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的商品入口税。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英国工业家感到殖民地工业发展甚速，殖民地商品有与宗主国商品竞争之势，因而英国政府又开始实行限制殖民地工业的政策。1669 年，禁止北美由一个殖民地将羊毛和毛织品输往另一个殖民地去，以便保护英国羊毛产品在殖民地的销路。翌年，英国国会又取消英国羊

毛织品出口税，使其有力量与殖民地生产的毛织品竞争。由于北美的波士顿、纽波特和纽约等城市发展为制帽业的中心，到 1732 年英国政府又颁布“制帽条例”，禁止由一个殖民地出口帽子到另一个殖民地去，并且规定帽业作坊不许使用两个以上的徒弟。1750 年，英国国会又通过“制铁条例”，规定殖民地的铁块、铁条输入英国时可以豁免入口税，同时却禁止殖民地建立制钉、制铁板等工业。

但是，在 1763 年以前，英国在北美大陆及世界其他地区忙于对法战争，因之无力严格执行这些政策。结果，北美殖民地的工商业者多半置英国法律于不顾，照旧生产英国所禁止的商品，并且违背英国法律而进行大规模的走私。因此，北美的工商业发展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阻碍。到 18 世纪 60 年代，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已经相当繁荣了。虽然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整个工业中仍占压倒的优势，但是已经出现分散的手工工场。一些商人把羊毛、亚麻及棉花等原料供给家庭手工业者，叫他们加工为纺织品，然后付出报酬。这样的家庭手工业者实际上已经变成受这些商人剥削的工资劳动者了。这种分散的手工工场形式在北部殖民地上越来越多起来。但是也出现较大规模的集中的手工工场：锯木厂、酿酒厂、铁厂、玻璃工场等。新英格兰及中部殖民地的工业技术有的已达到欧洲的先进水平。铁制品不仅输往南部殖民地，而且也行销于西印度群岛。生铁和铁条的出口量在 1745 年为 2000 吨，到 1771 年又增至 7500 余吨。在工业中有显著发展的是中部和北部的造船业，其生产出来的船只，质好价廉，以致连英国都大批购买殖民地的船只。1775 年，英国海上贸易所用船只，有 30% 是从北美购到的。而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有 75% 是靠北美制造的船舶进行的。新英格兰是造船业的中心，1772 年它制造的船只占全殖民地的总数的 68%。新英格兰的捕鱼业也发展到相当可观的地步。商人雇用水手从事大规模的捕鱼，渔船有时远航至南美和非洲海岸。18 世纪 16 年代，新英格兰的捕鱼业每年总收入平均为 255,000 美元。殖民地商人进行大规模的走私，在独立战争前夕，对外出口额增加到 2000 万美元。1775 年北美殖民地从事运输货物的船只有 2000 艘，水手为 33,000 人。

诚然，在整个经济中，农业仍占很大的优势，国外贸易也是入超的，但是殖民地工商业的发展已达到足以威胁宗主国的程度了。

随着农业、工业及商业贸易的发展，原来处于隔绝状态的各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愈益加强。公路的铺设及邮政制度的确立，也促进了这个联系。13 个殖民地形成了统一的市场。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各殖民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频繁了，共同的文化形成了。在这个基础上，各殖民地居民之间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共同利害的感觉。因此，到 18 世纪中叶，在北美英属殖民地已经成长了一个新兴的民族——美利坚民族。

随着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民族自觉也增长了，这在杰出的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思想中表现出来了。杰弗逊（1743～1826 年）出身于弗吉尼亚一大贵族奴隶主家庭。但是他自幼受到新型教育，曾博

览群书，并且接受了欧洲先进的思想，因而成年以后便成为殖民地上罕见的学者及思想家。

在哲学上，杰弗逊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认为宗教纯粹是个人的私事，反对国家干涉宗教信仰，要求信仰自由。他推翻了道德上的宗教根据。他是性善论者，承认在人的意识里存在着与生俱来的道德原则。他以为人之为恶，只是坏的社会制度和愚昧所造成的，因而他主张用教育去启发人们原有的“慈善心”。这样，杰弗逊仍不免为一位唯心论者。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在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发挥了“人民主权”思想，他认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委托给它的，因此，一旦它实行暴政，并且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时，人民有权用革命手段推翻它而代之以新的政府。杰弗逊的这个思想，成为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有力武器。他还相信人们生来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他认为这是人的自然权利，任何政府都不能剥夺或干涉人民的这些权利。他对普通人民抱着无限的信任，主张一切问题都应诉诸人民的投票表决，因为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正确的。

杰弗逊憎恨一切传统的力量，要求消灭传统的拘束，他指出任何一代人都没有权力为后一代人制定法律，后一代人不应受前一代人所制定的法律的拘束。一个世代是 19 年，他提倡每隔 20 年即复查一次宪法，以便使宪法能符合当代人民的要求。他特别提出革命的必要性。他说过：“自由之树必须不断地用‘爱国者’及‘暴君’的血来灌溉。”1787 年他在给麦迪逊的一封信里写道：“正好像在自然世界中雷雨是不可缺少一样，在政治世界中，起义也是必要的。”

杰弗逊反对奴隶制度，认为它是一种罪恶，违反人的自然权利。他要求废除这个可耻的制度。他也同情印第安人的遭遇，严厉地谴责白人“剿灭”印第安人的罪行。

在独立战争期间，杰弗逊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与杰弗逊享有同样声誉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便是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年）。他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贫困的小商人家庭，幼年当过印刷厂的学徒工。但是他一面工作一面勤勉自学，因而不久就成为一位知名的学者及政论家。他的学习兴趣非常广泛，从自然科学到政治经济学各方面，无不通晓。他对电学颇有研究，他发明了避雷针。他从事科学研究，不单纯是从兴趣出发，同时也是为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以增进人民的幸福。

富兰克林对于自己的社会思想虽然没有作系统的发挥，但是从他的著作及言论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倾向来。他出身于下层人民，早年就与贫困作斗

自然神论是为了反对基督教迷信思想而产生的一种隐藏的无神论。自然神论者虽然仍以上帝来解释宇宙的起源，但是却主张宇宙遵循自然法则而运行，上帝是干涉不了的，自然神论者把上帝当作非人格神，从而接近无神论。

争，因此他歌颂劳动，轻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他曾提出过一个问题：社会的贫困是什么造成的？他回答说：主要是因为“爱好劳动的人们必须把自己劳动的第一批果实分给——这在他们是迫不得已的——寄生的、游惰的人们”。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于剥削者的有力谴责，虽然他还未弄清楚当代的社会制度的本质。

富兰克林赞颂农业，而反对工商业。他认为北美这样有广阔处女地的国度里，农业是最能使人民生活安定和富裕的经济部门。1765年他写道：一个国家致富，道路只有三条：第一条是像古代罗马帝国那样靠战争去征服和掠夺邻国，这是强盗的行径。第二条是依靠商业，一般说来这是欺骗。第三条便是农业，这是人们增加财富的唯一正当的方法。但是后来他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认识到商业交换的必要性。而且他也赞成亚当·斯密的工商业自由的主张，这也是因为他看不惯英国对于殖民地工商业的限制。但是与一般资产阶级学者不同，他认为“个人幸福是政治社会的最终目的”，他反对使工人挨饿的工资制度，因为它破坏个人幸福。

富兰克林反对奴隶制度，要求废除它。他也痛恨种族歧视，他主张黑人、印第安人应该享受和白人同等的权利。在驳斥一些人对印第安人的轻视态度时，他特别推崇印第安人的文化，认为印第安人的文化水平很高，他们有合理的社会制度（印第安人过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有高尚的品格。

在政治主张上，他赞成实行普选制，一院制国会。

在对英态度上，他坚持殖民地的利益，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但是他不愿与宗主国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流血革命，希望殖民地人民忍耐和等待。具体言之，他主张殖民地统一，并且在英帝国范围内实现殖民地的自治。但是在独立战争发生后，他的态度突然转变了，坚决拥护美国独立，并且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支援独立战争。

从富兰克林的总的思想倾向来看，他也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三）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尖锐化

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统治阶级突然开始加紧推行其殖民政策。原因是：第一，长期的英法战争在1763年结束，英国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北美殖民地了。第二，在英法战争期间，殖民地的经济迅速发展，殖民地的经济独立性也增强了，这对于宗主国是一个威胁。

1763年，英国加强了制裁北美殖民地走私的措施，派许多军舰到北美沿海巡逻。这样一来，北美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大受影响，水手失业者剧增，往日热闹繁华的北部中部港口，开始冷落了。

同年，英国政府又限制北美殖民地居民向西迁徙，这个措施系着眼于英国毛皮商人的利益。英国毛皮商人在西部未开发的土地上与当地的印第安人进行广泛的、有利可图的毛皮贸易。他们用低价从印第安人手中收购珍贵的

毛皮，然后运到欧洲高价出卖，大获其利。但是，东部各殖民地人民西迁造成印第安人被驱逐的局面，大大影响了英国毛皮商人的这种赚钱的贸易。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颁布这个禁令的原因。这个禁令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北美殖民地各个阶级的极大不满。劳动人民为了谋生，多半希望到西部去；南方奴隶主也想到西部去发展种植场奴隶制经济；土地投机商人热切地希望到西部去从事土地投机事业。但是，现在他们的希望全部破灭了。因此，从这时起，北美殖民地上几乎所有居民都不满英国的殖民统治。

但是，英国统治者犹以为未足，1765年以后，又实行一系列加重殖民地人民负担的征税政策。英国在连年的对法战争中，由于军费浩繁，国债激增。为了清偿国债，英国政府便在增税方面打主意。此外，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也需要巨款。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决定加强对于北美殖民地的赋税榨取的原因。

1765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印花税法”，规定：凡殖民地的商业契约、广告、历书、新闻纸以及一切证明文件，都必须贴上印花。印花税很重，单是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就需要纳两英镑的印花税。英国政府估计这项印花税每年将带来6万英镑的收入。

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征收印花税的政策是一种新的榨取政策。在这以前，英国政府只能在殖民地上征收关税，其他赋税都由殖民地当局征收，而现在英国政府竟开始征收关税以外的税了，因而殖民地人民担心此例一开，将来英国政府进一步征收其他苛捐杂税都是可能的，此其一。印花税涉及的范围甚广，它直接威胁殖民地上每一个人的生活，此其二。在殖民地人民看来，唯有殖民地人民代表参加的议会，才有权力征收殖民地的税，英国国会并无殖民地人民的代表参加，所以它向殖民地人民征收印花税，就是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此其三。因此，两年来在殖民地人民心中郁积起来的愤怒，因印花税法的颁布而爆发了。商人、种植场主、农民、技工和工人都行动起来，他们到处开会，举行示威，强烈地抗议英国的征税暴政。

1765年10月，在纽约举行了九个殖民地的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及其不满原因的宣言”，在“宣言”中否认了英国国会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权利，指出：不得人民的同意，或者不经过人民的代表的同意，就不能向人民征税，这是天经地义的原则，在英国国会里并没有北美人民的代表，所以英国国会向他们征税，是不合理的。在弗吉尼亚议会里，代表帕特里克·亨利猛烈地抨击英国政府，他说：“凯撒有他的布鲁塔斯”，查理一世有他的克伦威尔。他高呼：“英国国王已经堕落为暴君了，从而失去了使臣民服从自己的一切权利。”

殖民地人民不但进行口头上的抗议，而且还组织起来采取实际行动。在1765年反印花税法的斗争中形成了群众性的组织“自由之子”和“自由之

布鲁塔斯是暗杀古代罗马皇帝凯撒的人，克伦威尔是处死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人。

女”。参加者多来自劳动阶层：手工业者、工人、农民、水手、渔民及贫民。领导这些组织的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其中最知名的萨缪尔·亚当士便是一位新闻记者，他早在 1743 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发表过激烈的言论，无情地攻击统治阶级。他同情劳动人民，重视劳动人民，他曾宣称：手工业者和农民是“两大可敬的等级”。在反印花税的斗争中，他不倦地写文章，散发小册子，去煽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他很能深入群众，不但在商人政客中间进行活动，而且也到码头上、工厂里去进行宣传鼓动。他不但有丰富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知识，而且擅长组织领导工作。他锐利的笔锋，像匕首一样刺中了敌人的要害。英国国王的总督伯尔纳曾这样形容他：“该死的亚当士，他的笔锋的每一划，都像带角的蛇一样”。

“自由之子”在亚当士等人的积极领导下活跃于各地，他们到处散发宣言、抨击文章，举行群众示威，并且采取各种手段去破坏印花税的征收工作。他们在波士顿、纽波特和纽约等城市捣毁了印花税征收机关，驱逐税吏。1765 年当风闻英国将派军队和舰队前来镇压时，“自由之子”便决心以武力对付，他们成立军事组织，秘密准备武装斗争。到 1766 年初，康涅狄格殖民地上的“自由之子”武装了 1 万名会员。麻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两个殖民地有 4 万人武装起来了。但是，殖民地的上层分子害怕人民运动，他们宁愿采取消极的斗争方式——抵制英货。

在汹涌澎湃的殖民地人民运动面前，英国统治阶级大为震惊，所以便在 1766 年 3 月被迫撤销印花税法。但是，他们还是心有所不甘的，所以在 1767 年英国国会又通过所谓“唐恩森德法案”，宣布对输进殖民地的玻璃、纸张、铅、茶等课以入口税，企图用这笔收入去支付殖民地官吏及军队的薪金。为了镇压殖民地人民运动，1768 年又派军队到波士顿驻扎。

这样一来，又激起殖民地人民运动的高涨。在纽波特附近，一艘英国税关巡逻船被群众焚毁。在费城，当英国官吏没收漏税货物时，一群人上前把英国官吏殴打了一顿，夺回货物。在纽约，有三个人由于告发走私而被群众涂上柏油，插上羽毛，拖到大街上示众。

波士顿成为群众斗争的中心，居民对于驻在该市的英军进行顽强的抵制，拒绝提供宿营的房舍，并时常与之发生冲突。1770 年 3 月 5 日，波士顿居民与英军的冲突演为流血事件，居民中有五个人被英军惨杀，数名受伤。在殉难者当中有一个逃亡黑人奴隶阿塔克斯。为了抗议英军的暴行，群众为殉难者举行了庄严的葬礼，并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

波士顿流血惨案发生后，反英运动像火上浇油一般席卷各地。愤懑的心情激动着每一个革命居民，群众到处举行大会抗议英军的暴行。新英格兰的民兵表示要用武力驱逐英军。在人民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英军仓皇撤出了波士顿。英国政府再度被迫让步，于 1770 年取消了“唐恩森德法案”，只保留了一项茶叶入口税（每磅茶叶入口税为 3 便士），象征地表示英国政府仍有权向殖民地征税。

然而殖民地人民并没有由于英国政府的让步而放松了警惕。他们为了准备未来的战斗,进一步加强了革命组织。在萨缪尔·亚当士的倡议下,到1773年,麻萨诸塞等六个殖民地都成立了“通讯委员会”。这些“通讯委员会”把各地人民密切地联系起来,组织了群众的力量,统一了各地的步调。它们所发出的指示和命令,立刻可以变成群众的革命行动。

同时,殖民地人民对于英国保留茶税一事异常愤慨,所以从1770年起又发起不饮茶运动,以示抗议。当时也有一些波士顿商人从荷兰走私运来大批茶叶,因此英国的茶叶法也未发生多大效力。

这时正值英国东印度公司濒于破产,为了帮助公司卖掉它所储存的茶叶,以缓和公司的财政困难,英国政府乃在1773年命令公司将其茶叶直接运到北美,不收入口税,并允许不经过殖民地入口商之手而直接卖给零售商。据估计,这种办法将使公司的茶叶价格比走私进口的茶叶便宜50%。

但是,在反英运动的高潮中,殖民地人民认为自由比喝便宜茶叶更为重要。各地群众大会都表示决心不许东印度公司的茶船靠岸卸货。但是到达波士顿的茶船拒绝群众的要求。因此,1773年12月16日夜里,波士顿的群众组织——波士顿茶团——在夜色苍茫之中上了茶船,把大量茶叶倾倒入海中,公司因此而损失的茶叶值15,000镑。

倾茶事件发生后,英国统治阶级暴跳如雷,英国政府在1774年颁布了一系列高压法律,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封锁波士顿港口,禁绝其对外一切贸易;第二,任命北美殖民地英军总司令盖治将军为麻萨诸塞殖民地(波士顿港即在这个殖民地上)总督,并且调军队前往波士顿进行镇压。

波士顿被封闭后,立刻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企业纷纷倒闭,船只绝迹,成千上万的工人、手工业者、水手和渔民失去工作而飘泊于街头。但是,人民并没有屈服于英国的淫威之下,没有一个工人响应英国的号召去参加英国兵营的修筑工作,也没有一个农民把粮食出卖给英军。与此同时,外地的人民都不约而同地主动支援波士顿人民的斗争。远处如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的居民都不惮长途跋涉,运小麦、面粉及肉类到波士顿,以救济当地的失业者。

第二节 独立战争的过程

（一）武装冲突的开始到《独立宣言》的发表

为了应付英国的高压政策，1774年7月17日麻萨诸塞立法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13个殖民地的代表会议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各殖民地的积极响应，同年9月5日代表会议在费城开幕，史称第一届大陆会议，有13个殖民地代表参加（佐治亚殖民地的代表在总督的阻挠下未能参加）。在会议中，资产阶级奴隶主温和派占优势，因此它对英国压迫者采取了妥协性的步骤：向英国上请愿书，要求取消它对殖民地的高压措施，并且表示在英国接受这个要求之前，殖民地将拒绝英国商品入口；但是在另一方面，请愿书又表示愿意继续效忠于英国。

当大陆会议希望与英国和解并且哀恳英国让步的时候，殖民

地广大人民已经摩拳擦掌准备战斗了。麻萨诸塞的居民更为积极，“自由之子”在这里特别活跃，他们在群众中间不停地进行宣传、组织和动员工作。民兵组织起来了，他们热心地进行操练。武器弹药也从外地成批成批地运进来，粮食也准备得很充分。

麻萨诸塞人民积极备战活动引起了英军当局的注意。总督盖治将军发现在距离波士顿不远的康科德地方藏有民兵的大量军火武器，乃在1775年4月18日派800名英军前往夺取。就在这个紧急关头，银匠勒威尔和工人戴维斯探听到这个消息，于是便骑马飞奔，报信给当地居民。不旋踵之间，附近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就武装起来，准备与前来夺取军火的英军决一死战。177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顿附近发生遭遇战，武装群众从墙后、屋角和栅栏后面开枪射击英军；英军措手不及，死伤和被俘者将近300人，其余的人狼狈逃回波士顿。民兵一共只损失99人。

列克星顿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殖民地人民。三天之内，这一支民兵队伍就壮大到两万余人。他们并没有满足于已得的战果，他们乘胜把波士顿团团包围起来。

列克星顿的枪声传到各地，人民运动的浪潮顷刻之间就淹没了全部殖民地，群众到处争先恐后地进攻和夺取英军的堡垒、兵工厂及仓库。各地的群众大会纷纷表示要为维护自由而奋战到底。战斗的消息传到纽约时，这里的小店主、技工和工人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夺取军火库里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把全城都占领了。纽约城就这样落到起义人民的控制之下。

为了应付这个新的局面，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10日开会。在会上，占多数的仍旧是温和派。他们所面临的是广大群众已经拿起武器与英军展开战斗的革命形势。各地人民一致要求大陆会议能担当领导武装斗争的任务，并且支持人民自发的军事行动。但是大陆会议对于群众的这个合理的

要求，无动于衷。只有到后来当人民的自发武装斗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大陆会议才勉强承当了指挥殖民地民兵作战的任务。会议在 1775 年 6 月，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指挥围攻波士顿的人民武装。但是这种军事行动在大陆会议看来，仅仅是压迫英国对殖民地让步的手段而已。换言之，一旦英国作出让步，放松对殖民地的压迫，它仍愿意放下武器与英军握手言欢，言归于好。这个态度从下面事实中可以窥见：1775 年 7 月大陆会议向英国国王提交一个请愿书，仍要求和解。在火线上指挥殖民地武装队伍作战的资产阶级奴隶主出身的军官们竟声称：“和我们的祖国和解是每一个美洲人的衷心愿望。”华盛顿本人也抱首鼠两端的态度，他对待被俘的英国军官待以上宾之礼。而且殖民地上绝大多数人也没有想到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的问题。只是到 1776 年战争有了进一步的开展之后，要求独立的声浪才开始在广大群众中间传播起来。这里，汤姆士·潘恩所写的鼓动文章起了巨大的作用。潘恩本来是英国一位穷苦劳动者，他是在 1774 年北美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紧要关头来到北美的。最初，他也和殖民地上广大居民一样，希望和平解决与英国的争端。他事后写道：“我没有想到发生战争的可能，也没有想到美国的独立。”但是不久他就认识到：北美人民要想永远摆脱压迫实现自由，就必须通过革命战争脱离英国的统治。1776 年 1 月，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常识》，大胆地提出了独立的要求。他在《常识》里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英国的世袭君主制，接着便力陈美洲人民脱离英国统治的必要性。他指出：一切争论都是没有用的，惟有武力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前的问题不仅涉及一城一省或一国，而是涉及整个大陆；它不仅影响一个时代，而且也影响子孙万代。他特别批判了依赖英国的思想，痛切地阐明英国统治对于北美人民的害处。他写道：英国过去之保护北美殖民地，完全从本身的利益着想，并不是为了爱护北美人民。他指出独立的好处，因为这样做不但给美洲人带来自由，而且还能使他们享受经济繁荣，相反地，如果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他以下面的呼吁激励了群众的斗志：“啊！你们爱护人类的人们！你们不但敢于反抗暴政，而且也敢于反抗暴君。站起来吧！旧世界的每一块土地都被压迫者蹂躏遍了。自由在地球上到处遭到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就把它赶走了。欧洲人把它当作陌生人，而英国警告叫他离开。啊！接受这个亡命者吧！让我们趁早替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常识》一出版，马上就被人们抢购一空，在两个月内就销售 12 万册以上。从前线的战士到后方的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读到它，没有一个人不因它而激动起来。这样，在潘恩的影响下，独立已经成为广大人民异口同声的要求了。

早在 1776 年 3 月，北卡罗来纳的议会就训令它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提出独立的建议。5 月 10 日，大陆会议建议各殖民地成立独立的州政府。弗吉尼亚等殖民地接受这个建议，一个接一个宣布独立。弗吉尼亚的议会首先发

表了“权利宣言”，该宣言一共有 16 条。6 月 7 日，弗吉尼亚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在大陆会议上提出一项议案，建议马上宣布独立。7 月 2 日，大陆会议通过了这个议案，并且指定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士、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在 7 月 4 日被通过，并且向全世界公布。

《独立宣言》出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杰弗逊的手笔，它不但体现了杰弗逊本人的民主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北美广大人民的内心要求。宣言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发挥了人民主权的思想，并且从理论上阐明美国人民举行革命及宣布独立是正当的。它写道：“我们相信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他们被他们创世主赋予某些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当中设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坏这个目的，那末，人民便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而建立新政府。把新政府建立在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的原则之上，并用符合于这种原则的形式组织它的权力……”众所周知，17 世纪英国大思想家约翰·洛克曾把财产权利列为自然权利之一，而且弗吉尼亚的“权利宣言”也提出了财产权利。这显然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但是，杰弗逊却用追求幸福的权利去取代财产权利，从而赋予这个宣言以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宣言》的第二部分列举英国国王对于北美殖民地人民施行的种种暴政，最后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从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必须指出：杰弗逊在宣言原稿中还有用严厉的口吻谴责奴隶制度及奴隶贸易的词句：奴隶制度是“向人性本身进行的残酷的战争”，它侵犯了黑人的“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只是由于大陆会议上的奴隶主代表的反对，这些词句才被删掉。毫无疑问，《独立宣言》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宣布人民的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这个宣言比法国的“人权宣言”要早 13 年，所以马克思称它为“第一个人权宣言”。

《独立宣言》的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的革命斗志，人们在它的激励下，热情洋溢地走上战场，为争取独立这个伟大目标而战。

（二）萨拉托加大捷

独立战争开始时，英国是一个头号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及富源，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及武器精良的陆军。此外，它还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相反地，北美殖民地的工商业都比英国落后，在物力财力方面，与英国相比，都是望尘莫及的。北美人民就是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与英国侵略军战斗的。

在华盛顿受命为总司令的时候，斗志昂扬的北美民兵队伍已经把波士顿围得铁桶似的。困守波士顿的英军终于不支，到 1776 年 3 月退出该城，同时遗弃了两百门以上的大炮、数千支枪、大量军事物资。

1775 年秋，美军在围攻波士顿的同时，举行了对加拿大的远征。这次远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英军利用魁北克为基地夺取哈得逊河流域；也是为了煽动加拿大的法国人起来举行反英起义。1775 年 9 月，美军分两支北上，一支在蒙哥马利率领下越过张伯伦湖，进入加拿大，11 月拿下了蒙特利尔。另一支由阿诺德率领，12 月底两军会师，联合进攻魁北克。蒙哥马利战死，阿诺德继续督军攻打。由于英国军舰开到，也由于军中流行疫病，在进攻魁北克的战役中美军遭到惨败，损失五千多人。到 1776 年 6 月，美军完全撤出加拿大。这次远征虽然失败了，但在此后二年内英方不得不驻屯重兵于加拿大，这就相应地削弱了英军在其他战场上的兵力。

1776 年 7 月，英军占领了纽约附近的斯他登岛。华盛顿乃把军队从波士顿调到纽约附近，结果与英军发生战斗，美军大败，9 月纽约落到英军手中。华盛顿的部队退到德拉瓦河的彼岸——宾夕法尼亚境内。12 月 25 日，华盛顿部队突然转入攻势，又渡过德拉瓦河，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驻在特灵顿的英军，俘获敌人上千名。美军乘胜前进，又在 1777 年 1 月于普林斯顿一带大破英军，迫使英军退到伯灵顿。

1777 年初，英国统帅部制定了一个战略计划：以纽约和加拿大为根据地，夺取哈得逊河流域，以便切断美国北部与中部南部之间的联系。按照这个计划，英国当局决定派出三支纵队最后在欧尔巴尼会师：第一支由柏高英将军率领从加拿大出发经过张伯伦湖；第二支在巴利·圣·列格尔中校率领下也从加拿大出发经过安大略湖和摩瓦克河；第三支由克林顿将军统率，从纽约城启程，溯哈得逊河北上。这个计划从战略上来看，有严重的缺点：第一，英国兵力分成三路，使得美方有可能集中兵力予以各个击破。第二，两支纵队从加拿大出发到目的地，路途遥远，必然会出现运动及供应上的困难，加之长途跋涉，势必造成士兵的疲惫不堪，这就使得美军有可能“以逸待劳”，从容不迫地歼灭敌人。而且，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彼此配合得很不好。在时间上，柏高英的队伍出发过早，没有等待另外两支纵队同时行动。而且，克林顿将军在离开纽约北上之前，曾要求英军最高统帅豪埃将军派增援部队，但是豪埃将军拒绝了这个要求。

1777 年 6 月，柏高英的部队首先自加拿大出发，7 月攻占了提康得洛加，然后继续前进。但是在队伍抵达距哈得逊河 20 英里的地方时，遭到附近美军的一系列袭击，以致行动受到牵制。结果英军费了三个星期的时日才攻下爱德华要塞。但这时英军在供应上又出了问题，于是柏高英便派出军队到附近大肆掠劫。当地农民在美军军官约翰·斯塔克的号召下，纷纷起来抵抗，

假如英军夺取哈得逊河流域就会把美国土地切成两半，从而造成对美军不利的局面。

弄得英军狼狈不堪。

圣·列格尔的队伍出发较晚，当进军到摩瓦克河附近时，在当地居民的狙击下，无法继续前进，因而这支纵队只好退回加拿大。

当柏高英队伍在爱德华要塞一带因供应不给而无计可施和圣·列格尔在摩瓦克河沿岸不断挨打的时候，克林顿才最后领兵出动。在他的队伍到达距欧尔巴尼 60 英里的地方之前，柏高英部队就退到萨拉托加了。当英军来到萨拉托加尚未来得及安营扎寨，新英格兰的农民就个个手持武器从四面八方赶到萨拉托加，把英军围得水泄不通。武装农民越聚越多，数量为英军之四倍。弹尽粮绝的英军已经无路可走，于是不得不于 1777 年 10 月 17 日俯首请降。投降的英军为数 5000 人，在答应以后不再拿起武器之后，被放回本国去了。

美军的萨拉托加大捷，意味着英军夺取哈得逊流域的计划破产，而英军如果不控制这个流域，它是无法征服美国的。同时，这次大捷也促成法国以美国盟友的资格参战。因而，这个大捷实在是独立战争中美军转败为胜的重大转折点。

美军之所以能转败为胜，是一系列因素促成的。首先，这是一场争取解放的正义的战争，广大工人、农民及黑人怀着高度的自觉参加战斗，他们认识到自己未来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战争的结局，因而他们都能踊跃杀敌，并且能够忍受艰苦，不怕牺牲。尽管他们的武器及装备远远不如敌人，但是他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他们由于粮食不足，常常枵腹作战，很少开小差或临阵脱逃。据华盛顿描写，在铁炉谷作战的美军，连一件遮体的好衣服也没有，甚至鞋子也穿不上，大家都赤着脚在严寒及大雪中行军，他们所经过的道路上往往印满了破裂的脚所流出的血的痕迹。但是士兵都甘之如饴，毫无怨言。美国民兵为了歼灭敌人，也发挥了创造性。1775 年在包围波士顿时，民兵队伍缺少子弹，他们揭下屋顶上的铅板，拿掉百叶窗上的铅锤，用来制造枪弹。

其次，殖民地人民军在与敌人战斗中还创造了新的作战艺术——散兵战术。他们以分散的、流动的队伍，隐藏在各种障碍物后面，随时随地打击敌人。而英军仍旧沿用古老的、直线的战斗队形，运转不灵，处处挨打。这种人民战术在独立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华盛顿的个人作用也不可忽视。他是美国当时数一数二的富人，也是一个大奴隶主。他早年曾当过西部土地测量员，在英法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曾指挥殖民地民兵作战，为英军立了不少功劳，并且积累了许多战斗经验。在这次担任美军总司令后，归他指挥的都是劳动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散漫的队伍，流动性很大，随时参军，随时退伍，而且多半不守纪律，不服从上级指挥。华盛顿发现这些弱点后，便着手改编，规定服役期限为一年，并且约束士兵遵守纪律。改组后的军队在革命战争中与人民武装相配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华盛顿作为军事统帅的另一个长处，便是他能沉着指挥作

战，很少惊慌失措。这对于美军之克敌致胜作用很大。

（三）欧洲诸国的援助。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争爆发伊始，美国革命领袖就认识到：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外国援助。他们深知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过去在争夺海上霸权及殖民地的斗争中，都败于英国之手，都吃了很大的亏，所以时时刻刻想寻找机会恢复过去被英国夺去的殖民地及海上贸易地位。因此，他们决定利用这些国家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以促进革命战争的胜利。

早在 1776 年 3 月，大陆会议就派西拉斯·狄安去法国商谈援助事宜。同年 9 月，即宣布独立后，又派赫赫有名的学者富兰克林和杰出思想家杰弗逊为特使，去协助狄安。不过，杰弗逊未能成行，他的任务由当时正在伦敦的阿瑟·李代替。大陆会议训令他们抵法后竭力争取法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及与美国订立商约。

1776 年 12 月，富兰克林到达巴黎。他的人格和外交词令具有很大的魅力。他表示美国人决心战胜英国，这在法国军官中引起了共鸣，因为法国军官都迫不及待地想报七年战争之仇。但是，富兰克林的努力成就不大，美军在战场上的初期失利，使得法国政府不相信美国的实力，不敢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也不敢与美国缔结商约。当时，法国执行两面的外交政策：一方面秘密以金钱及武器援助美国，另一方面在英国面前表示严守中立。但是法国对美国的援助还是很可观的。到 1776 年 10 月以前，狄安已经从法国交涉到 2 万人的服装，3 万人的武器及大量弹药。法国还在其他方面支援美国，比如掩护美国的私掠船，在法国船坞里为美国制造军舰等等。

1777 年萨拉托加大捷扭转了法国的态度。1778 年 2 月 6 日法国终于与美国缔结法美同盟条约及通商友好条约，承认美国独立，承担了军事援助的义务，并且约定：一方不得到另一方的同意，不得与英国讲和。

1778 年 6 月 17 日，法国战舰与英国战舰在欧洲沿海发生战斗，于是英法不宣而战。1779 年，西班牙在法国的劝诱下参战，荷兰到 1780 年也参加了战争。

法国参战后，英国便在海上任意搜索中立国的船只，这就引起了普鲁士的抗议，于是普鲁士就怂恿俄国在 1780 年组成武装中立同盟，以抵制英国对于中立国船舶的侵犯。不久，丹麦、瑞典及奥地利也加入了这个武装中立同盟。

这样，到 1780 年美英战争扩大为国际性的战争。对于法、西、荷等国来说，这是争夺商业殖民霸权的战争，对于英国来说，这是反革命的战争，唯有对于美国来说，这是正义的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完全陷于孤立。

法、西、荷参战后，战争便从北美扩大到西印度、东印度及欧洲去了。

法国开始派军队到印度去，企图驱逐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西班牙开始攻打直布罗陀。法国又把大批军舰及军队派到北美大陆及西印度去。西班牙军队也在北美登陆。英国海军到处受到法、西、荷诸国海军的攻击，从而丧失了海上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美国领袖们不但寻求外国官方援助，而且也向欧洲各国进步人士及广大人民呼吁。有时通过私人通信，有时派人去进行宣传，也时常由官方向欧洲各国人民发表呼吁书，如大陆会议就曾向爱尔兰人民发出过这样的呼吁书。结果，同情美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欧洲先进人士争先恐后地组织志愿军，奔赴北美，参加独立战争。在这些志士中间有法国的拉法叶特侯爵、洛艾利侯爵及未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还有波兰的普拉斯基伯爵和克修斯古等人。当时，拉法叶特年方 19 岁，他自己出钱购买一艘船，满载了军事供应品，并且携带十几个军官，不顾政府的反对，远渡重洋来到北美。他参加了华盛顿的部队，担任少将职务，在战场上指挥作战，屡立战功。但是他拒绝领取薪金报酬，因而博得了美国人民的敬佩和感荷。洛艾利侯爵也是一位年轻的、富裕的贵族，他来北美之前，放弃了贵族头衔，并且慷慨变卖自己的财产，用得来的钱装备骑兵。普拉斯基是波兰的一位革命家，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他正侨居巴黎，在狄安和富兰克林的帮助下，前来北美参加革命军队。但是，他不幸在一次战役中壮烈牺牲。克修斯古是小贵族出身的波兰革命家，在萨拉托加战役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还有一些欧洲的职业军官也在美军中服务。比如，普鲁士军官司徒本男爵就曾帮助华盛顿训练军队，他还在 1779 年为美军草拟了“纪律章程”。

国际援助使战局愈来愈有利于美国。法国及西班牙之参战，迫使英国把大部分舰队从北美海岸调往地中海、非洲、印度及加勒比海去，这样一来不但削弱了英国对于北美海岸的封锁，而且也使英国在北美沿海一带往来调动军队更加困难了。

1777 年以后，英军完全放弃了夺取哈得逊河流域的战略计划，决定把军事行动的重心移向美国南部。在 1778 年底以前，英军进入乔治亚，并且占领了萨凡纳。在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后，它便北上侵入南卡罗来纳，包围了查理斯顿。1780 年 5 月，英军终于占领了查理斯顿，接着继续北上，同年 8 月在坎姆登附近大破美军。

英军虽然在美国南部接连取得一些胜利，并且占领了不少地方，但是它却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英勇不屈的美国人民退到卡罗来纳腹地的沼泽及山地中，以这里为基地展开了游击战争。他们分成小股队伍，从 20 人到 100 人，经常神出鬼没地突然袭击英军，在完成的任务后，迅速地返回基地。英军不惯于这种战斗，他们经常处在惊恐之中，甚至一听到游击队领导人马利翁的名字，就吓得魂不附体，望风奔逃。游击队也能从事较大规模的战争。1780 年 10 月，他们在国王山战役中就击溃了佛格逊统率下的英军。1780 年，格林将军任南部美军司令，他善于依靠广大人民，能够用正规军与

分散的人民武装——游击队配合作战。

当英军在卡罗来纳等地不断挨打之际，另一支英军在康瓦利斯的指挥下，于 1781 年 5 月侵入弗吉尼亚。入侵的英军所向披靡，并且在沿海一带地方肆意蹂躏。1781 年 8 月，当康瓦利斯的部队攻下约克镇，准备在这里巩固阵地的時候，华盛顿率军从北方赶到，在约克镇附近，和拉法叶特的部队会合，包围了英军。当时英军本想与英国舰队取得联系，但是被法国派来的两支强大的舰队切断了这个联系。陷入重围并且失去外援的 7000 英军，在康瓦利斯将军的带领下于 1781 年 10 月间，向美军投降。康瓦利斯部队的投降，意味着英军主力在整个北美大陆上的瓦解。

1783 年 9 月 3 日，美、英两国在巴黎订立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且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割让给美国。

（四）美国人民为争取政治民主而斗争

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民不但与英国军队进行殊死的战斗，而且也为了争取国内的政治民主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参加这个斗争的有广大农民、工匠及小店主，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斗争的主力是农民，斗争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些统称为民主派。

民主派斗争的目标，首先是普选权，要求取消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其次是代表权的平等，要求议会中的代表席位与选区的人口成正比例。再次便是要求成立由人民直接选出的一院制议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的意志充分反映出来，才能使人民代表在政府中起作用。最后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使民选的议会的权力高于行政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把相当大的权力保留给各州。这是因为美国人民从过去的经验中认识到：一切政府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从而相信：“统治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站在人民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的对立面的便是保守派，保守派代表美国大资产阶级（大商人）、大奴隶主的利益。保守派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是害怕人民仇恨人民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他们主张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以保障有产阶级的财产安全；加强中央集权，缩小地方的权力，以便更有效地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们反对人民享有选举权，这是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参加各级政府。他们要求成立两院制议会，以便利用上院权力去限制下院的权力。在席位分配上，他们也希望以有利于上层分子的方式进行分配。

人民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首先表现在争取制定民主的州宪法上面。

在 1776 年到 1780 年间，大多数州都召开了制宪会议，制定了州宪法。只有在康涅狄格和罗德艾兰二州没有制定新的州宪法，而是把殖民地时代的特许状保存下来作为自己的州宪法，直到 19 世纪上半期，二州才分别在 1818

年和 1842 年制定新的州宪法。在制定州宪法的过程中，民主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在佐治亚，民主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发展到相当尖锐的地步，以致一个时期出现两个立法机关、两个行政机关互相对立的局面。

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农民与东部大商人之间的斗争，早在 1776 年就已达到顶点，斗争的结果是西部农民和东部工人在州议会里取得多数席位。因此，州议会在农民和工人代表的强大压力下，制定了一个比较有民主主义精神的州宪法。它规定一院制的州议会，扩大了选举权。它采用了民主的选区制度——各选区选出的议员名额与各选区的人口成正比例。又成立了一个检察委员会，以监督州政府的的活动。因此，这部州宪法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保守派詹姆士·威尔逊就因为反对这个州宪法而在 1779 年遭到人民群众的袭击。但是，保守派不甘心失败，他们在 1789 年发动政变，在翌年选出一个制宪会议，制定了一部两院制的新的州宪法，规定了选民的财产资格：即必须是纳税的人（也就是有产阶级），并且特别为担任官职的人规定了很高的财产资格。

在麻萨诸塞，斗争也很激烈。最初民主派得势，他们制定了一部民主的州宪法，但是代表大商人利益的保守派施展阴谋诡计，达到了废除这部民主宪法的目的，并且在 1780 年制定了一部极不民主的州宪法。它规定了两院制议会，把选举的资格规定得很高，选民必须有价值 60 镑的财产；州议会下院议员的财产资格被定为 100 镑的不动产或价值 200 镑的其他财产，上院议员则为 300 镑的不动产。因此，正如莫理逊所指出的，“1780 年的宪法是一部律师和商人的宪法，目的在于加强政府效率及保护财产以防止民主海盗的侵犯。”

在弗吉尼亚，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在制定州宪法的问题上，东部种植场主与西部的农民之间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斗争的结果，保守派占了优势，因此在他们一手包办之下，制定出一部极不民主的宪法：两院制议会，选民的财产资格和殖民地时代一样，而且每郡不论人口多寡，均选出两名下院议员，这很不利于西部农民聚居的郡，因为西部人口多，而且越来越多，这就使东部种植场奴隶主在下院中占优势。

在南卡罗来纳，以沿海地区的种植场奴隶主与城市商人为一方，内地的农民与工匠为另一方，进行了几乎无休止的斗争。这个州甚至一个时候出现“平等派”推翻“富裕与天才”的贵族的可能。后来保守派花了好大力气才取得优势，并且制定了一部毫无民主气味的州宪法。规定：有选举权的只限于拥有 50 英亩土地的男子，州参议员必须有价值 2000 镑的财产，州长必须有 1 万镑的财产。

在纽约，1776 年 7 月召开州制宪代表会议，会议上保守派势力远远超过民主派势力，因此会议制定的州宪法带有很浓厚的保守色彩。第一，设置两院制议会，上院权力比下院权力大；第二，州的行政权力比立法权力大，如

州长对于立法机关的立法有否决权；第三，选举权只限于拥有价值 20 镑的土地或拥有房租收入达 40 镑的出租住宅的人，而且必须是纳税的。

这样，在绝大多数州，人民的斗争都以失败而终。新制定的州宪法一般都规定了两院制议会及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劳动人民的选举权被剥夺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压力，由于民主派坚持斗争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州宪法，都在开头部分附上“权利宣言”或“权利法案”，里面列举了人民所享受的一系列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请愿自由、私人住宅不可侵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得任意捕人等等。新罕布什尔和麻萨诸塞都在议会里设置了公众席，为的是让选民行使对立法者的监督权。美国各州州宪法前附加的“权利宣言”或“权利法案”，后来成为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发表的《人权宣言》的蓝本。不过总的说来，美国人民在制定州宪法的斗争中失败了，因此大资产阶级大奴隶主掌握了各州的政权。

但是，美国人民在制定全国宪法的斗争中却取得了胜利。

在制定全国性宪法时，民主派与保守派之间进行了更为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中央集权的问题。1776 年大陆会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委员会中保守派占多数，因此委员会所提出的宪法草案体现了保守派的观点。但是民主派控制了大陆会议，他们反对这个宪法草案，对它作了重大的修改，结果，在 1777 年 11 月 15 日大陆会议最后通过的宪法，基本上反映了民主派的主张。这部宪法称曰“邦联条例”（全名为《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各州的批准花去了三年时间，到 1781 年才最后批准了它，于是才开始生效。按照邦联条例的规定，美国的国家组织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各州保留了很大的独立性：宪法给各州保留征税、征兵及发行纸币的权力。各州也有权规定进出口税。国家有事时，中央政府只能请求各州提供军队。中央需钱时，只能向各州摊派款项，作为维持中央机构的经费，而且各州可以拒绝提供款项。

第二，中央最高机构是一院制的邦联议会，每州选出二至七名代表，但每州代表在投票时，只能投一票；中央不设置总统这样的国家元首，只是在议会下面设立一个诸州委员会，由 13 名委员组成，每州派出一个委员，在议会休会时管理经常性事务。没有设置总统这一点，反映了美国人民对于英国国王的仇恨及厌恶心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任何国家元首都和英国国王一样是压迫人民的象征。

第三，中央权力极小，邦联议会只能宣战和媾和，派遣对外使节，调整各州的争端和掌管邮政。它无权管理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它只有在各州的同意下，才能与外国订立有关贸易的条约。它完全依靠各州维持国家秩序，无权干涉各州内部事务。即使某一州发生内战，它也只能作壁上观。

这样看来，依照邦联条例，美国这个国家恰像由 13 个独立国家所组成的松懈的国际同盟。

邦联条例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主要是民主派坚持的结果，但是也与各

州统治阶级的态度不无关系。第一，南方奴隶主与北方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制度的不同，利害亦不一致，南方奴隶主害怕中央权力太大，会把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强加于己。第二，小州的统治阶级害怕大州利用中央权力侵害自己的利益。

平心而论，主要反映了美国人民和民主派思想的邦联条例的缺点是洞若观火的，因为根据这部宪法而建立起来的美国，实际上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地理上的概念。这对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是颇为不利的。这说明了美国民主派在政治上的幼稚。不过，根据邦联条例建立的美国国家组织，虽然对美国的前进发展不利，但是实施邦联条例的八年，也并不像有些历史家（如费斯克）所说的那样是个一团糟的“危机时期”。诚如比尔德所指出的，在这个时期仍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个新国家在稳步地恢复秩序及繁荣。第一是对外贸易有所发展，运往英国的出口货物数量在 1784 ~ 1788 年间一直在增长着。美国与西印度群岛甚至东方的贸易也有所增加。到 1789 年，美国贸易达到了革命前曾经达到的规模。第二，工业企业也有显著的发展，出现了呢绒工厂、造纸厂、火药工厂、玻璃制造厂。因此，富兰克林在 1787 年初宣称：国家是如此繁荣，以致应该作感恩祈祷。18 世纪末的一位历史家亨利·道逊根据大量的研究材料得出结论谓：所谓“危机时期”的混乱，主要是一种虚构的说法。

（五）美国人民为社会经济的民主改革而斗争

在反英的独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民在争取政治上的民主的同时，也在社会经济战线上展开了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参加这个斗争的有农民、黑人奴隶，领导斗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个斗争有以下三个内容：

第一，向大地产制及封建残余开火，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斗争。

向半封建的大地产制开战，是与美国人民反对效忠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当美国人民军队在战场上英勇地打击英国侵略军的时候，人民群众也不得不和内部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所谓内部敌人就是效忠派或托利党人。

参加效忠派的有英国驻在殖民地上的官僚、军官、法官以及与英国有联系的大地主。这些效忠派处处与人民为敌，从内部破坏反英战争。这些人犯下了擢发难数的罪行，因而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各地群众自发地起来和效忠派作斗争，他们一方面协助革命政府揭发检举效忠派，另一方面也亲自动手惩罚他们，轻则以涂柏油、插羽毛和浸水等办法对付他们，重则处以死刑。

另一种惩罚办法便是没收效忠派的土地财产，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大地主。这个办法是汤姆士·潘恩提出来的。同时，直接受大地主剥削的佃农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个要求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这是因为他们想乘机夺取大地主的土地。结果，在 1778 年，革命的最高机关——大陆会议建

议各州没收效忠派的土地。在大陆会议的建议下，各州都采取了这个行动。如威廉·帕波列尔在缅因州沿海 33 英里的地产，菲利普斯在纽约州的 300 平方英里的地产，宾恩的价值 500 万美元的大地产，都被没收了。各州不但没收了效忠派的土地，而且也没收了英王在北美遥领的大片土地。没收来的土地如何处理呢？最民主的方法应该是把它们无代价地分配给这些大地产上面的广大佃农。但是大资产阶级决定采取了拍卖的办法，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以充反英战争的经费。

不过，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有几个州的议会实行了把土地分成小块廉价出卖的办法。比如，在纽约州，出卖土地的单位不许超过 500 英亩以上；在北卡罗来纳，以 100 英亩为单位廉价出售。这种办法显然有利于劳动人民。在南部诸州及纽约州，还把一部分土地送给参战的士兵。此外，有许多州把优先购买权送给农民“占地人”。因此，有不少土地转到一般农民手中。比如，罗格尔·摩理斯的大地产卖给 250 个农民。得·兰西的大地产被分割成 275 块小块土地卖给农民。在纽约州达切斯等地区，原先的地主庄园上的佃农也成为小土地所有者。

以上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半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但是在拍卖的过程中，还是有大量土地落到大商人及土地投机商手中。他们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抢购土地。如有些州，大商人用廉价抢购士兵的土地券（这是革命政府发给参加独立战争的士兵的证券，持券可以领取土地），然后用这些土地券抢购土地。在另一些州，大商人利用他们手下的仆人及监工的名义套购了不少土地。纽约南部地区大部分效忠派的土地都转到富商、地主、军队承包商及土地投机者手中。在这些土地落到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手中之后，他们继续实行租佃制的剥削。而且革命人民也未过问一些未参加效忠派的某些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而让他们照旧保留了土地财产及半封建租佃制。只有到 1850 年，在佃农运动的冲击下，封建地租才逐渐消灭。因此，在独立战争期间打击半封建土地关系是不彻底的，一部分半封建租佃制还是安全无恙地保存下来。

与进攻半封建大地产的同时，民主主义者也起来向其他封建残余发动了攻势。

杰弗逊在弗吉尼亚领导了对于长子继承制及嗣续限定法的进攻，他在 1776 年草拟了一项法律，由州议会通过，它取消了嗣续限定法。此后土地的继承成为无条件的了，即使身份很低的人也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根据这项法律，弗吉尼亚至少有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的地区的土地继承从嗣续限定法下面解放出来。在十年内，其他州也取消了嗣续限定法。同样在杰弗逊的鼓动下，长子继承制也在 70~90 年代之间，在许多州被清算了。嗣续限定法及长子继承制的废除，对于大土地所有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第二，为废除黑人奴隶制度而斗争。

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也提高了黑人奴

隶的觉悟，他们为了争取解放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参加独立战争。战争爆发后，黑人奴隶相信打倒英国殖民统治者之后，自己就可以得到解放。因此有许多黑人踊跃参加战斗。早在 1776 年 1 月，华盛顿就允许黑人服兵役，从此以后，在美国武装部队中就出现了黑人联队以及黑、白人混合联队。黑人士兵在战争中表现了很大的勇敢，有不少人得到政府的表扬和嘉奖。参战的黑人奴隶一般都得到解放。二、逃亡。仅仅在 1778 年这一年，只是在弗吉尼亚一州，逃亡的黑人奴隶就有三万多人。南卡罗来纳州在独立战争爆发时，奴隶总共有 11 万人，但是有 25,000 人逃走了，虽然其中有不少人被抓住弄死了。三、请愿。具有代表性的请愿行动出现在 1779 年，一群黑人向新罕布什尔州议会提出一份请愿书，在请愿书中表示：在上帝眼中，黑人和白人是完全平等的，所以黑人也应享受和白人一样的人身自由。1779 年又有一批黑人向康涅狄格州议会请愿，他们说：“我们具有和主人同等的才能”，而且人类有共同的祖先，因此，让我们成千上万个黑人处在奴隶状态下是不符合美国当前的法律的。四、起义。1774 年在波士顿的黑人奴隶中出现了一次范围广泛的起义密谋。1775 年 7 月 7 日在南卡罗来纳的三个郡——皮特、波福特、克拉文——发生了奴隶起义密谋。7 月 8 日，有两个人出卖了密谋，结果参加者有 40 人被逮捕。

不仅黑人本身，而且白人民主义者也为消灭奴隶制度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潘恩、富兰克林和杰弗逊都反对奴隶制度，并且呼吁废除它。富兰克林特别指出废除奴隶制度的必要性。他说：“和自由的工资劳动制度比起来，奴隶劳动是浪费的，而且奴隶制度是工业发展的障碍。”他也驳斥了关于黑人的智慧比白人低劣的谬论。杰弗逊反对奴隶制的态度更为坚决，他早在 1769 年就建议弗吉尼亚的议会宣布解放这个殖民地上的奴隶。后来他在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原稿中，又谴责奴隶制度。1779 年他正式向弗吉尼亚议会提出了关于逐步解放奴隶的法案。

但是，由于南方奴隶主的疯狂反对，通过立法手段解放南方奴隶的努力均归失败。南方各州都把奴隶制度保存下来了，而且还在 1787 年联邦宪法中被肯定下来。诚然，这部宪法的制定者伪善地没有在宪法中使用“奴隶”字样，但是却含蓄地认可了这个制度。比如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各州在联邦众议院中的代表人数，与各州自由人口成正比例。同时又规定：自由人以外的“其他人”按五分之三计算。这里所谓“其他人”，就是指奴隶而言。

不过，奴隶制度在北方诸州被废除了。1774 年，罗德艾兰州议会宣布嗣后一切奴隶入境，均成为自由人。1781 年，麻萨诸塞州也废除了奴隶制。北部中部其他诸州也都在这个时期内宣布奴隶解放。

至于在 13 州以西的广大地区内如何处理奴隶制呢？1787 年颁布的“西北法令”划俄亥俄以北的西部地区为自由区，于是奴隶制度在西北也被明令禁止了。

但是，奴隶制度在中部北部的废除及在西北部的禁止，并不是出于资产

阶级的慈悲心肠，而是因为在这些地方，自然环境不利于奴隶制，而且奴隶制本身已接近消灭了。

第三，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部土地问题而斗争。

如所周知，在美国独立以前，只有 13 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至于这个山脉以西，则在 1763 年被英国划为禁区。及至独立战争爆发之后，弗吉尼亚组织了一支武装远征队，到西部夺取了大片土地。其他一些州也有占领西部土地的要求。但以马里兰为首的几个州起来反对，马里兰州主张由大陆会议处理西部土地，任何州均不得染指。后来马里兰以不批准邦联条例为要挟，因此到 1781 年以前，所有的州都先后放弃了对于西部土地的要求，于是西部土地成为由中央政府管辖的国有土地了。

在广大西部土地如何处理的问题上，美国人民的态度是明确的，他们要求以民主方式处理，也就是说，无代价地分配给劳动者去耕种。但是，当政的保守派不顾人民的要求，而实行拍卖土地的政策。邦联议会在 1785 年通过的土地法令规定了拍卖西部土地的办法：西部土地由邦联政府出售，出售最小单位为 640 英亩，售价 640 美元，必须在一个月內付款，概不零售，这个土地法令反映了保守派的主张，它剥夺了广大农民劳动者购买土地的机会，而只便利了资产阶级的购买。不过到 1796 年新土地法令颁布以前，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按照 1785 年的土地法令出卖过一块土地。

在战争期间，大陆会议曾向每一个士兵发给土地券，持土地券者，在战后都可以到西部领到小块土地。但是广大士兵都出身于贫苦的劳动者，都急待钱用，因此多半等不到领取土地就把土地券贱价出售了。结果到处钻空子的商人们用廉价收购了大批这样的土地券，并且用它们到西部领取大量土地，而士兵领到西部土地者简直是凤毛麟角。

这样，美国政府在 18 世纪末建国之初，并没有用民主方式解决西部土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劳动人民便只好自己动手去解决土地问题，那就是：成群结队到西部去非法“占地”。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劳动人民到西部——俄亥俄、肯塔基、田纳西一带去占地者，达 221,000 人。

“占地”是美国人民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部土地问题而斗争的重要表现，他们在占地后，不得不与前来驱逐他们的政府军队作艰苦的斗争。1784 年春，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派兵到西部去驱逐“占地人”，将 500 名左右的“占地人”驱走，放火烧掉他们所建立的家园。

第三节 战后的阶级斗争

（一）谢斯起义

独立战争给大资产阶级造成发财的机会，丧心病狂的奸商们利用战时的困难，不择手段地掠夺人民。

大陆会议在战争爆发后，无限制地发行纸币，结果，纸币大大贬值。到1780年，一美元的购买力只有1776年的四十分之一。纸币贬值引起物价上涨，恶化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使得大商人有可能从囤积居奇中大发横财。许多奸商买空卖空，一转手之间就获得难以计算的暴利。商人们在军事供应方面更取得惊人的利润。波士顿的奥蒂斯·安得路斯公司在七个月内卖给政府价值20万英镑的布匹，赚得了100%到200%的高额利润。它收购的面粉每桶只花5美元，但却以每桶30美元的高价出售给军队。还有许多大商人不顾民族利益，而与英国侵略军作交易，从中牟取暴利。

与资产阶级大发战争财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人民由于战争而更加贫困。战争期间在英军的蹂躏下，农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由于军队复员，粮食的需求大减，价格随之下降从而农民的收入减少了。农民陷入负债者，不可胜数。到1786年在债务的重压下，大多数农民处在破产的边缘。有许多农民由于到期无力偿还债务而被捉将官里去，备受囹圄之苦。这一切，推动广大农民走上斗争的道路。1786年，谢斯起义爆发了。

起义发生在麻萨诸塞州，为首的是丹尼尔·谢斯和路克·戴伊。谢斯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但是战后解甲归田，穷得一文不名，甚至不得不把拉法叶特赠送给他的剑卖掉，以换取糊口之资。戴伊也是一个参加独立战争的战士，并且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1786年秋，这两个人在康科德集合了一批武装的农民，准备攻打波士顿。政府迅速行动，派军队火速前往镇压。在一次激战中，谢斯的起义队伍被击败，结果被迫撤出麻萨诸塞州。但是这只是暂时受挫，不久起义者重振旗鼓，声势越来越大，武装起义队伍最盛时达到15,000人。在日益扩大的起义的震动下，统治阶级惊骇万状，他们决定动员全部人力财力和物力去扑灭起义。他们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镇压的方策。商人、银行家、种植场主和工业家们纷纷献出巨款，以充镇压起义的军费。代表会议决定从各州调集雇佣的队伍。1787年1月，当谢斯起义军来到斯普灵菲尔德夺取了兵工厂之后，政府开始与之举行和谈，为的是争取时间以等待援军的到来。当时起义者中间有不少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现在又看到政府提议谈判，认为政府已经无力镇压了，于是便松懈起来，遂为敌人所乘。当政府援军开到时，政府马上停止谈判，并且下令大举进攻，把起义队伍包围起来。政府当局本想把起义队伍一个不留地斩尽杀绝。但是政府军队中的广大士兵拒绝这样做，因为他们同情起义。结果，谢斯等人突围逃了出来。他们本想重整队伍，再度与政府军一决雌雄，但是这时起义队

伍已经元气大伤，只有少数人继续追随他。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这样以失败而终。

这次起义之所以归于失败，原因有二：第一，城市的工匠和乡村的农民之间没有建立联盟。如波士顿的工人就反对谢斯起义，谴责起义者为叛乱分子。他们甚至劝州长对“农村平权主义者”采取严厉措施。第二，敌人力量强大，远远超过了起义者的力量。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及财产，大资产阶级在起义者面前表现得团结一致。他们拿出将近两万美元来支持政府的镇压行动。有的富翁，如斯万和希金逊，还亲身参加镇压起义的军事行动。

统治阶级总算把起义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对于人民的革命行动的恐惧心理，久久未能消失。他们希望加强国家机器，以便有力量防止和镇压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人民运动。因此，他们迫切要求废弃邦联条例，另外制定一部新宪法。

（二）1787 年联邦宪法

本来美国大资产阶级早就不满于邦联条例，要求制定新的宪法，以便加强国家机器。提出这样要求的有以下几个集团：

第一，大陆会议曾发行大量公债，购买公债的主要是大资产阶级。这些公债券持有者指望政府能够在战后清偿债务，但是当时的邦联政府根据邦联条例没有征税的权力，这个权力保留在各州手中，从而偿还公债就大成问题。因此，公债券持有者迫切要求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征税权。

第二，战后，英国商品像潮水一般涌进美国市场，在战时发展起来的美国工业企业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是邦联政府无权实行保护关税所致。因此，工业企业家也强烈地要求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以保护他们的幼稚的工业。

第三，松懈的邦联国家组织也特别损害美国商人的利益，就国内贸易来说，各州都有自己的货币系统，货币很不统一，也出现伪造的货币，这对于各州之间的贸易很为不利。此外，各州都有自己的关税系统，都对从邻州进口的货物征收关税，这对于州际贸易也起了阻碍作用。就国外的贸易来说，特别是最活跃的新英格兰商人，在英国港口备受歧视、凌辱，因为邦联议会无权与外国缔结商约，无权保护本国商人在国外的利益。因而商人也要求制定加强中央权力的新宪法。

第四，美国的债权人——多半是资产阶级——也感到当前的美国国家组织情况不利于自己。当时有些州任意大量发行纸币，因此纸币贬值，这就使得债权人在收债时吃亏不小，而中央政府无权禁止各州这样做。

第五，军队里的军官及士兵在战争期间领到土地券，不过士兵手中的土地券一般地被土地投机商收购去了。有土地券的军官及投机商人在西部领取土地时，往往受到边地上的印第安人的袭击。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用武力保护他们。

第六，在战争期间，如前所述，各州所制定的州宪法大多附有“权利法案”，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宾夕法尼亚的宪法民主主义色彩更为浓厚。这使得各州的统治阶级寝食不安，他们认为惟有加强中央权力，才能限制各州人民争取到的这些民主权利。

不过到 1786~1787 年谢斯起义爆发之前，也并不是所有的统治集团都同意加强中央集权。当时南方种植场主经营的是农业，需要购买英国工业品，所以要求自由贸易，反对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因此他们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去保护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小州的统治阶级也对强大的中央集权存有戒心。

但是，谢斯起义像晴天霹雳一样，震动了所有的统治集团。他们一致感到在邦联条例下面的邦联政府力量太弱，不足以有效地镇压人民起义和保卫剥削者的利益，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因此，南方种植场主及小州的统治阶级丢弃了以前的顾虑，而同意废除邦联条例，制定新宪法，以加强国家机器。

1787 年 5 月 25 日，亦即在镇压谢斯起义后不久，就在费城召开了一个制定宪法的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开到 9 月 17 日。出席会议的 55 人中，有 40 个人拥有公债券，14 个人是土地投机者，24 个人是放债人，15 个人是奴隶主，11 个人从事商业、制造业及航运业。他们在政治态度上大都是保守派，为首者是汉米尔顿。只有两个民主派参加，那就是富兰克林和路德·马丁。

会议虽然在一些琐碎问题上有所争辩，但是在重大问题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在加强中央政府权力上，态度一致，与会者绝大多数人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使其有力量偿还国债，有力量保护私有财产，有力量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以防止和镇压人民起义，有权力征税及调整国外及各州之间的贸易。第二，与会者大多数在反对民主反对人民的态度上也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民主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必须用宪法加以限制。代表杰利甚至声称：国家所蒙受的不幸都来自“过度的民主”。兰多福也认为美国过去几年出现的麻烦事，都来源于“民主的狂暴及放荡”。一些代表的发言，明显地暴露出他们对于人民的仇视。比如代表汉米尔顿叫嚣道：“一切社会都分为少数人和多数人。前者是富裕的，出身名门的，后者是人民群众，他们很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有少数人仇视群众到这样程度，以致竟敢于主张建立君主制。迪金森说：“一个有限制的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之一。……肯定地说，从来就没有从任何共和制度中得到同样的好处。”这些人都瞩目于华盛顿，想拥戴他为美国国王。但是，华盛顿拒绝接受，他坚决反对建立君主政体，这是因为他曾经长期领导反对英王的战争，从内心中仇恨君主制。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眼光远大，认识到建立君主制是美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但是不管怎样，华盛顿之拒绝接受王位，说明他具有伟大的政治家风度及胸怀。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的结果，终于制定了一部新宪法——联邦宪法。宪法

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如下：

第一，新宪法的总的精神是：联邦政府（亦即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联邦政府获得如下权力：征税、征兵、发行货币、规定度量衡、制定工商业政策、主持军事外交及领导对外战争、邮政、管理对外贸易。国会还有偿付国债的权力。但是这部宪法还不是一部中央集权的宪法，各州仍保留相当大的独立性。凡宪法未明文划归中央政府的权限，仍保留给各州政府。比如关于工厂和劳工的立法，颁发公司执照，对宗教团体的监督，以及有关人民的卫生、安全和福利的措施，都在各州政府的权限之内。

第二，以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统是选民间接选出的，就是说，先由各州议会选出复选人，然后再由复选人选举总统。总统任期四年，他享有执行法律的权力，亦即行政大权；也有指挥武装力量的权力，他是军事最高统帅，在战时可以行使独裁大权。他和他所任命的内阁部长（及国务卿）不向国会负责，国会的不信任不能促成总统和内阁的辞职。总统可以否决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只有议会的两院重新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他的否决才不发生法律效力。总统有权签订国际条约，但条约的批准须经过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的同意。可见，总统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他享有行政、军事大权及部分的立法权。无怪乎杰弗逊称美国总统制为君主制的“新版”。加强总统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及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宪法还特别规定：总统在各州的请求下，可以派军队去各州镇压叛乱。

第三，国会由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由各州议会选出，每州派两名，任期六年，每二年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改选。众议院议员由选民直接选出，每州所选出的众议员人数与该州的人口成正比例，众议员任期为二年。法律只要由国会两院通过，总统批准，即可生效。但是一切征税法案均应由众议院提出。国会有权直接向国民征税，征收关税及国产税。这对于国债券持有者大有好处。国会有权调整国外及州际贸易，这样就可以消除州际关税壁垒，从而有助于创立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国会也有无限权力征兵，也有权在紧急时期调动州民兵，这样一来就可以镇压任何地方的人民起义。

第四，选举众议院议员的选民资格，宪法没有明文规定，而是留给各州自行处理，实际上各州宪法对此都有规定。但是，联邦宪法没有对于任何联邦官职加以财产资格的限制。实际上，在制宪会议上，代表平克尼曾主张总统的财产资格至少必须规定为 10 万美元，联邦法官、众议员、参议员至少为 5 万美元。但是富兰克林反对，他说他不喜欢任何倾向于“贬低普通人民的精神”。因而为联邦官员规定财产资格的企图被击败了。

第五，设置高等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法官由总统任命，并取得参议院的同意，其任职是终身的。高等法院有解释一切法律和条约的权力，如

它认为某项法律违反宪法时，可以宣布其无效。在美国建国后，它常常利用自己的职权废除一切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立法，因而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特别反动的角色。

第六，整个宪法贯串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为了抵制人民群众对政府机构发生影响，制定宪法的保守派把政府机构分为三个部分。他们知道，在政府机构中，唯有国会的众议院议员是各州选民直接选出的，因此，人民群众对于众议院的影响是可以预料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保守派看来，为了限制众议院的活动，就必须设置参议院，这样就可以减少人民对政府的影响，因为参议员是各州立法会议选出的，距离人民更远一层。关于设置参议院的用意，麦迪逊是直言不讳的，他说：“设置参议院是为了保护财产而防备大众，是为了保护少数富裕者对抗大多数。”但是，这样保守派还不放心，他们害怕万一人民对国会发生影响，于是又设置总统以限制国会的权力——他有权力否决国会的立法。对于国会及总统还不放心，还害怕它们受到选民群众的影响，于是，制定宪法的保守派又设置一个高等法院，用它去限制国会和总统的行动。

但是，还必须看到：这种三权分立的原则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可以使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互相牵制、互相均衡，以防止任何一个权力机构流于专权。如上所述，固然总统可以限制国会的活动，最高法院可以限制国会及总统的权力，但是反过来，国会也可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参议院甚至有弹劾总统及审判总统的权力；总统及参议院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方面的决定权，也可以对法官起制约的作用。三个权力机构之间的这种互相制约、均衡的作用，可以防止出现独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建国二百多年以来从未发生军事政变及政治动荡，与宪法所确立的三权分立原则不无关系。

第七，1787年宪法对于人民的民主权利，只字未提。

如此可见，它主要体现了大资产阶级大种植场主的意愿和要求。

但是，这部宪法也有其进步的一面：第一，它使美国成为一个更为统一的国家，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它确立了共和制度，这个制度比起君主制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如果估计到当时世界上包括欧洲在内正在盛行君主制度，而唯独美国建立了共和制这一点的话，不能不说美国联邦宪法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可以说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还应该指出：美国这部联邦宪法也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为世界各国宪法提供了一个重要蓝本。

宪法颁布之后，各州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民主派分子尖锐地反对这部宪法，认为它扼杀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他们认为这部宪法给联邦政府的权力太

实际上，联邦宪法中没有一字提到司法机关拥有这个权力，只是在1803年（当时马歇尔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以后，司法机关才篡夺了这个权力。

大了，它违反“统治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原则。乔治·梅逊说：新宪法毫无可取之处，在这部宪法下，总统将会“一步登上美国王位”。

虽然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宪法终于得到各州的批准。它之所以得到批准，原因如下：第一，拥护宪法的保守派大力宣传，他们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纽约一家报纸上连载的，由汉米尔顿等人写的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还印成一部单行本，标题是“联邦党人”。这些文章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而且在群众中最孚众望的华盛顿及杰弗逊也赞成新宪法。这都对群众发生了不小的影响。第二，拥护宪法的人还对各州批准宪法的代表大会采取收买、贿赂及恫吓的手段，这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第三，麻萨诸塞州的保守派向反对宪法的民主派让步，向他们许诺，一旦批准宪法，将对宪法作新的补充，这就是说，把“权利法案”作为修正案加进新宪法中去，以便保证人民的一系列民主权利。麻萨诸塞州、马里兰州及弗吉尼亚州之批准宪法，就是保守派让步的结果。

为了履行诺言，国会在 1790 年通过了十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规定了一系列自由：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及建立陪审员制度等等。

*

*

*

北美独立战争是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从性质来说，它不但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也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从而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列宁指出：“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由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

领导这次革命的是殖民地上的资产阶级和奴隶主，但是革命的战斗力量是普通劳动人民——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及黑人。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才把战争引向最后胜利。

这次革命取得的成果是很大的：第一，赢得了独立，这就使得北美人民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为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二，美国人民不但赢得了一个共和国，而且也迫使新国家的统治阶级把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加进新宪法中去。第三，在社会经济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打碎了半封建的租佃制及大土地所有制，埋葬了中部北部诸州的奴隶制，禁止了西北地区的奴隶制，也消灭了封建残余——长子继承制及嗣续限定法。

但是，这些民主成果距离美国人民的要求尚远，他们为之而奋斗的其他一系列民主改革都以失败而终。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革命没有实现普选制，穷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享有选举权的只限于有产阶级；第二，没有摧毁南部的奴隶制度，南方黑人奴隶制度保存下来，黑人奴隶继续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第三，半封建的租佃制及大土地所有制虽然遭到沉重的打击，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86 页。

但是还有一部分残存下来；第四，西部土地问题未获民主解决。

正因为这一系列民主改革没有完成，所以美国这次革命很不彻底，够不上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是资产阶级革命。

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最突出地表现在南部奴隶制的保留上。南方奴隶制不但保留下来，而且到 19 世纪上半期还进一步扩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内战。

这次革命虽然很不彻底，但是却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革命传统。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与英军的英勇作战及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永远是鼓舞美国人民为争取解放和民主而斗争的强大动力。

第五章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与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建立联盟为特色的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法国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与人民建立联盟的条件下完成的。与披着宗教外衣的英国革命不同，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抛开了宗教外衣，直接在政治战线上作战。与以资产阶级和贵族间的妥协而告终的英国革命不同，法国大革命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贵族被消灭和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这些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特点。

第一节 革命的背景。革命的爆发

（一）革命前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革命前的法国还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但是，在 18 世纪，在法国封建社会的母胎中，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已经大量出现了。在手工工场发展的基础上，法国若干工业部门已初步采用机器了，而且有些法国人自己也发明了机器。

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也很繁荣。对外贸易总值在 1716 年为 21,490 万利弗尔，到 1788 年增至 115,350 万利弗尔。由于贸易发达，法国拥有当时欧洲全部货币的一半。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法国首都巴黎已经是一个拥有 55 万人口的大都市。

但是，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却受到旧的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严重阻碍。

在工业中，封建的行会制度仍旧存在。在这个制度下，对于手工业作坊使用的工匠及学徒的数目，生产技术及生产规模都有规定和限制。这就妨碍了手工业作坊向手工工场的过渡。而专制政府又竭力维持这个制度，因为政府可以通过行会制度榨取手工业者。比如：工匠及学徒升级时都要向政府纳税。同时，在路易十四时代颁布的工业法规继续有效。督察官可以根据工业法规的规定，动辄借口产品不合格而把产品没收，销毁或者实行罚款。这对于工业技术改进及工业进步起了同样的束缚作用。作为封建割据的残余，国内各地还有许多征收商品通行税的关卡。此外，各省还保留不同的法律及司法系统，度量衡也不统一。地方行政区划也很紊乱；法国很早就划分许多省，但是后来全国又分成司法区、军区以及总督管区。这些划分与省的划分，互相重叠。这些都不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

但是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最严重的障碍是农业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封建地主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农民经常处于赤贫状态，这就限制了农民的购买力，以致法国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异常狭小。因此，土地问题是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关键。

在新兴资本主义与旧的封建关系之间的尖锐矛盾的基础上，阶级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

革命前的法国还保持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全国居民被分成三个等级，僧侣构成第一等级，贵族构成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前身以及广大农民均属第三等级。第一、二等级是特权等级，是封建统治阶级，第三等级是被统治阶级，处于无权地位。

作为第一等级的僧侣，在法国是指天主教僧侣而言。天主教是法国的国家宗教，天主教教会是法国国家教会。天主教僧侣是专制制度的精神工具，是封建主义的重要支柱。他们宣传宗教迷信思想，从思想意识上麻痹人民，

使其盲目服从君主的残暴统治，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各级学校都受教会管辖，神学是必修课。僧侣大力推行蒙昧主义，压制科学，扼杀知识。他们迫害一切有“异端”思想的人。伏尔泰愤怒地指出：这批宗教迫害狂剥夺人的一切，直至人的思想，力图从人的灵魂中搜索出什么来。

天主教会本身就是大封建主。天主教僧侣占全国人口的二百分之一，但是教会土地却占全国土地的十分之一。教会也和一般贵族一样残酷榨取农民的封建地租，此外还全力勒索农民的什一税，同时却享有免税权。但是高级僧侣与低级僧侣地位相差悬殊。高级僧侣多出身于贵族，全国 143 个主教，全是显贵出身，通常住在宫廷享乐，离开他们的主教、大主教管区很远。但是低级僧侣如乡村牧师，副牧师则大都出身于平民，待遇菲薄。因此他们对高级僧侣心怀不满，在思想上同情第三等级。

作为第二等级的贵族，又分为两个集团——“带剑贵族”和“穿袍贵族”。“带剑贵族”中的大贵族有 4000 家，他们离开自己的领地而住在凡尔赛，出入宫廷，与国王一道享乐，靠领取年金而过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们靠特权垄断了政府及军队中的重要官职。这些大贵族穿的是绣金绣银的华丽服装，坐的是漂亮的马车，甚至仆人也穿盛服。他们成日价沉醉在狩猎、宴会、观剧等娱乐中。

至于“带剑贵族”中的中小贵族则终年住在乡间，他们直接靠榨取农民而生活。他们的生活虽然远不如大贵族富裕。但是他们同样贪婪残酷，他们无情地剥削农民。

“穿袍贵族”主要出身于资产阶级，这个头衔是他们用钱买来的。法国的各级法院的法官主要为这些贵族所独占，并且可以父子相传。他们许多人靠接受打官司者的贿赂而发财，购置大地产。巴黎法院法官的收入有的可以与大贵族相等，但是他们仍不满足，因为他们无权出入宫廷。国王的法令、敕令只有经过巴黎法院的注册才能生效。因此巴黎法官时常运用这个注册权来对抗国王政府。

属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有雄厚的财力，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因之成为第三等级的领导阶级。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他们的物质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的财产时常受到国王政府的侵犯，他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受到严重的阻碍。大贵族在专制君主的保护下享有种种特权，坐吃山空，无所事事，耗费大量国家金钱，而国家却把财政负担转嫁到第三等级身上。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所不满的。因此他们一般都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

不过资产阶级也有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分。二者的利益和要求迥然不同。

大资产阶级包括包税人、军火供应者、国家特许公司的重要股东。他们

在路易十五在位初年，法院又恢复了注册权。

与专制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当然不愿意推翻国王政府。但是同时，不负责任的官僚制度的弊害和专制君主的专横，也不利于他们的经济活动，他们的财产随时有被专制政府侵吞的危险。而且有一些包税人把相当数量的资本投到工业企业中去，而手工工场均在旧制度下处处受到阻碍。因此这些人对旧制度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切便决定了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他们反对革命，而只是希望通过改革限制一下专制君主的权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及消除旧制度中的某些弊害。

中等资产阶级，包括手工工场主、中等商人和海运业者。与大资产阶级不同，他们与旧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认识到旧制度对自己的发展不利。因此他们要求取消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甚至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关系。

处在资产阶级下面的城市居民便是小资产阶级，其中有小商人及小作坊主人，他们参加劳动，同时也是独立经营者。因此他们既反对大资本，也与无产者有矛盾。不过，他们更仇恨僧侣贵族及专制政府，因为特权等级的特权和专制政府的苛捐杂税最使他们难以忍受。

比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更为低下的便是无产阶级前身——手工工场工人、作坊工匠及城市贫民。

手工工场工人及作坊工匠，全国共有 60 万人，他们备受资本家及作坊主人的剥削，生活极为艰苦。城市贫民在巴黎及其他大城市，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阶层，如街头小贩、流浪音乐家、临时工、失业者、乞丐等人，他们挤在大城市的偏僻角落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些无产阶级前身虽然仇视富人，但是他们认为自己主要敌人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君主政体及特权等级，因为他们不仅苦于贫困，而且也苦于官吏和督察的专横跋扈，苦于政治上的无权。

农民是第三等级中人数最多的集团。但是一般说来他们不是土地所有者，土地属于国王、僧侣和贵族，他们为了使用土地，必须向地主缴纳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除封建地租外农民还必须向地主缴纳各种苛捐杂税。

除受地主剥削外，农民还必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向国王政府缴纳三种税：所得税（即对于农民的一切收入所征收的税）、人头税和念一税（二十分之一的土地税）。

在层层剥削下，在缴纳上述一切租税之后，农民已经所剩无几，有时收获物只够缴纳租税。法国农民的贫困和痛苦可想而知。因此，一到荒年，有几十万农民外出讨饭。

到 18 世纪 70、80 年代，地主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这在历史上称为“封建的反动”时期。当时地主不但竭力提高农民的封建地租，而且还强占农村的公共土地——森林、池塘、草地，变这些为他们的私有财产。1770 年至 1789 年在许多省份地主夺取了三分之一的公共土地，这更加重了农民的贫困。

诚然，在革命前夕，法国农民已经开始分化，出现富裕农民和贫农，但

是他们都同样处在地主的封建剥削之下。

总之，到 18 世纪下期，法国社会阶级矛盾已发展到异常尖锐的地步。虽然在第三等级内部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但是主要矛盾是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有用革命才能解决。

（二）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

1774 年，路易十六登上法国王位。他是一个典型的昏庸之主，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在宴会和打猎时，精神百倍，在政府会议上则昏昏欲睡。他的庸懦，使得国家大权落在王后玛丽·安东尼特手中。她是奥地利帝国的公主，为人轻佻浮华，贪图享乐，但同时却爱弄权势，倚仗王室势力作威作福。

就在路易十六这种昏天黑地的统治下，法国专制制度陷入严重的危机。危机表现在许多方面：中央六个大臣各自为政，办事互相掣肘；各级统治机构庞大臃肿，冗官闲职多而办事效率差；地方行政组织一片混乱，机构重叠。更严重的是：财政已濒于破产。在路易十六在位的 15 年间，国家债务增加了三倍，到 1789 年革命前夕，已达 45 亿利弗尔。财政危机主要是专制政府的庞大支出所造成的。诚然，专制政府对于人民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直接税有军役税、人头税及念一税，间接税有盐税、酒税及内地关税。但是，支出远远超出税收之上。宫廷便是一个巨大的销金窟，国王及王后荒淫无耻、挥霍无度的生活，耗费了国库的巨额金钱。国王对于大贵族的赏赐，也在支出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比吉内公爵的女儿结婚，国王一赏就是 10 万利弗尔。为了替波令雅克夫人偿债，国王一下子就拿出 40 亿利弗尔。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军事警察机构，每年也得付出巨数款项。参加北美独立战争的耗费更大，据估计，法国付出的战争费达 20 亿利弗尔。造成财政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第一、二等级享有免税权，因而造成国家收入的减少。

专制主义危机的另一个表现便是人民运动的发展。人民群众的不满日益加深，人民群众已把国王专制政府及特权等级看成是不共戴天的仇寇，农民起义连续爆发，城市“饥饿暴动”也是迭次出现，全面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

针对危机，专制政府不能不采取对策。为了摆脱财政亏空，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国王路易十六在 1774~1787 年间先后任命屠阁、内克、卡伦等人为财政总监，进行几次改革。改革的内容不外是向僧侣、贵族征税，取消某些贵族特权，废除一些对于工商业的限制，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这些改革都在特权等级的反对下流产了，而这些财政总监也先后被免职。

军役税在北方是按每家的全部收入征收，在南方按不动产（土地）征收。人头税始于 1701 年，念一税开征于 1749 年。

间接税的征收采取包税制，由包税人（都是大商人）负责征收，他们从中饱以肥己。

1787年，国王又听信王后的推荐，任命土鲁斯大主教洛默尼·得·布里昂为财政总监。布里昂本来是反对改革的，但是他上台后，为了应付紧迫的财政困难，也不得不走上改革的道路。他要求僧侣及贵族负担土地税，还下令征收印花税。但是当他把征收土地税及印花税的法令提交巴黎高等法院去注册时，遭到后者拒绝。巴黎法院在拒绝注册的同时，还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征税问题。三级会议是中世纪法国的三个等级的代表会议，已经一百多年未召开了。法院要求召开这个会议，是希望由会议中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同意增加第三等级的赋税负担，以便解决财政问题。这个要求政府不但拒绝，而且还把法官们流放到特罗瓦。这就激起各省法院的抗议。法院的态度本来是维护特权等级的利益的，但是他们的抗议却得到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同情，因为后者把法院看成是专制君主的英勇的反抗者和人民的保卫者。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提出请愿书，要求把法官们从流放地召回。政府让步了。1787年9月，法官们从流放地回来了。政府妥协，答应取消土地税及印花税，法院同意特权等级负担念一税。

但是，不久法院与政府之间又发生了斗争，1788年1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政府取消“逮捕密札”。到5月，又发表宣言，宣布自己是基本法律的监护人，显然最高法院想提高自己的权力，以限制国王的权力。这就激怒了政府，国王下令逮捕两名法官。5月8日政府宣布实行司法改革，设立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全能法院”，取消旧有的法院注册敕令法令的权力，而由“全能法院”行使这个权力。这立刻引起了高等法院的反抗运动，法官们到处煽动，把不满王权的大资产阶级及人民群众也吸收到运动中来。在多斐内省，第三等级反政府的活动特别积极。1788年6月7日，这里的居民与政府军队发生冲突，他们掀起屋瓦把军队赶走。为了缓和群众的斗争，8月8日政府宣布取消“全能法院”。8月24日，国王把布里昂免职，重新起用内克。

内克上台后，认识到为了解决财政问题，除了召集三级会议外，别无他法可想。因此他便在取得国王的同意后，宣布在1789年5月4日召开三级会议。

消息传出之后，第三等级的反应很热烈。他们希望这个会议能促成法国的改革。但是不久（1788年9月25日），巴黎高等法院发布一个决定，内称：三级会议必须“按正规召集，并且依1614年所遵循的方式组成”。这就是说，三级会议的三个等级的代表人数相等，并且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这个决定显然不利于第三等级。因此这个决定公布后，资产阶级立刻起来表示反对。过去一两年中，在反对专制王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跟着这些法院贵族走的，但是自从法院发布这个决定后，他们就与法院贵族决裂了。为了反对高等法院的决定，资产阶级组成了“爱国党”，要求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并且要求以人为单位进行表决，而不以等级为单位。在爱国党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势下，贵族屈服了。1788年12月5日，高等法院宣布收回9月25日的决定，同意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接着国王也同意了。

但表决以等级为单位抑或以人为单位的问题尚未解决。

从 1789 年年初，就开始了三级会议的选举。资产阶级开展了积极的竞选运动，他们所发出的小册子、呼吁书及论文遍于全国各个角落。

当时法国广大人民正处在极端困窘的境地。1786 年英法订立的商约，减低了英国商品的人口税。结果英国商品在法国市场上泛滥，促成了法国的经济危机：许多企业倒闭，工人失业问题极为严重。同时，1788 年由于自然灾害，发生严重的农业歉收，这一年冬天气候奇寒，以致许多人陷于饥寒交迫之中。因此广大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很高，对于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寄以很大的希望，期待它能改善人民的处境。为此，群众热烈参加选举运动，并且纷纷集会草拟“陈情表”，表达人民的愿望，希望当选的代表们能把他们的愿望带到三级会议。全国一共有 6 万份这样的“陈情表”，人民的心情可想而知。

全国以司法区为单位进行选举。僧侣和贵族在司法区的首府分别组成僧侣选举大会及贵族选举大会，由这些大会直接提名选出代表参加三级会议。第三等级的选举资格有限制，只有年满 25 岁并且年纳 5 利弗尔税的人方有选举权，而且雇佣劳动者除外。同时第三等级代表的选举程序也比较复杂。在城市中，选举采取三级制，即居民大会每百人中选两名代表，由这些代表在市政厅再组成全市选举大会，由这个大会选出代表出席司法区的大会，最后由司法区大会选出出席三级会议的代表。在乡村采取二级制，居民按教区组成选举大会，每百户选出一个代表与城市代表共同参加司法区的选举大会。第三等级的这种选举办法是有益于资产阶级的，因为在司法区大会上资产阶级可以操纵选举，而且资产阶级有文化知识素养，他们发言动听，可以迷惑选民。

选举的结果，在僧侣等级的代表中，乡村牧师占上风，他们在 300 名代表中占 200 多名，而且少数高级僧侣中还有些人已经接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贵族代表中，乡村贵族居多数，而大贵族中也有 90 名是自由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拉法叶特。

第三等级代表中人数最多的是律师，此外也有商人、银行家、工业家、学者（如天文学家巴伊、作家服尔内）。在第三等级代表中也有背叛特权等级的人物，如米拉波伯爵、西耶士神父。第三等级代表中几乎没有一个劳动者。

（三）从三级会议的召开到巴士底大狱的陷落

在 1787~1789 年，法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形成。如前所述，在专制王权与法院贵族之间发生尖锐的斗争，这说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裂了。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剥削下，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人民铤而走险，他们的反抗斗争席卷全国。

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三级会议于 1789 年 5 月 5 日在凡尔赛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共有 1139 人，其中第一等级 291 人，第二等级 270 人，第三等级 578 人。掌玺大臣在致词中强调三级会议只能讨论三个问题：第一，税收问题；第二，关于限制新闻出版的法律；第三，关于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问题。他要求大家不得讨论其他方面的改革。这样，专制政府一开始就为三级会议定了调子。

5 月 6 日，三级会议在审查代表资格的问题上发生争执。僧侣及贵族代表主张三个等级的代表分别在自己的会议厅内审查本阶级的代表的资格。第三等级代表要求三个等级代表集合在一个会议厅内共同审查代表资格。

由于第三等级的代表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顾虑重重，态度不够坚决，以致关于审查代表资格问题争执了一个多月也未获解决。后来只是由于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第三等级的代表才增加了勇气。6 月 10 日，他们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宣布由第三等级代表审查三个等级全体代表的资格。他们向两个特权等级的代表们发出邀请书，请他们前来接受审查，同时还声言，如果拒绝前来接受审查，就要丧失代表的资格。6 月 12 日，第三等级代表正式开始审查工作：按选区依次唱名进行。到 6 月 13 日，有三名低级僧侣前来参加第三等级代表的会议，于是其余的僧侣动摇了，在以后数天内又有 16 名牧师前来参加。

到 6 月 17 日，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在巴黎群众强有力的支持下，又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这一天，他们以 490 对 90 票通过关于宣布自己为国民会议的决议。换言之，他们宣布自己为全国最高代表机构。在国民会议宣布成立之后，它马上以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资格，宣布征税为不合法，国家必须保证偿付国债（因为债权人是资本家）。国民会议还宣布国王无权否决国民会议的决议。国民会议的这些勇敢的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 月 19 日僧侣等级以过半数的票议决加入国民会议。只有贵族等级顽固地拒绝参加。

6 月 19 日晚上，国王在亲王、大贵族、大主教、法官等的支持下，决定下令关闭国民会议开会用的会议厅，妄想用这种拙劣的办法去破坏国民会议。第二天早晨，当国民会议的代表们来到会议厅大门前时，发现大门已经锁上，周围布满了武装人员。当时正下大雨，国民会议的代表们在群众的簇拥下，来到一个室内网球场，大家在网球场上庄重地宣誓：在制定法兰西宪法之前，决不解散。当代表们宣誓时，周围的群众热烈高呼：“国民会议万岁！”

6 月 23 日，国王宣布国民会议为非法，其一切决议均无效，并命令三个等级代表分别开会。当典礼大臣得·布累来到国民会议要求代表们服从国王的命令时，代表米拉波厉声回答道：“告诉你们的主人罢！说我们是依照人民的意志而留在这里的，只有刺刀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离开。”国民会议又通过决议：坚持它所通过的一切决议。为了防止国王利用“逮捕密札”来逮捕国民会议的代表，在米拉波的提议下，国民会议又通过关于国民会议代表人

身不可侵犯的决议。

6月25日，有56个贵族代表也加入了国民会议。27日，第一、二等级的代表全部参加了国民会议。当然，第一、二等级代表中的顽固分子之所以参加国民会议，是想控制国民会议以免它有越轨行动。

7月9日，国民会议又宣布为制宪会议。当时国民会议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满以为只要制定一部宪法，政权就唾手可得。米拉波幻想“这次大革命无须暴力和眼泪”。

但是，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反动势力决不肯自动让出政权。他们决定用武力解散制宪会议。由于当时巴黎驻军都同情第三等级代表，这些反动派决定把外省军队调来。早在6月20日的夜里，国王就已经下令调动军队。不久，有3万瑞士和德意志雇佣兵部队开到巴黎。7月11日国王下令把内克免职，起用反动分子得·布勒杜伊男爵为财政总监，并以老元帅得·布罗伊厄主持军队。布勒杜伊男爵一上台就狂叫：“如果需要焚毁巴黎，我们就把巴黎烧光。”这说明国王及其亲信是准备蛮干下去了。制宪会议面临着被武力解散的危险。

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巴黎人民奋起承担了保卫制宪会议的任务。7月12日白天，当内克免职的消息传到巴黎时，群众的愤怒爆发了。一个叫做卡米尔·德穆兰的青年在街头站在桌子上对群众振臂高呼：“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迟延了，内克被免职，这是一次警钟，要发生屠杀爱国者的圣·巴梭罗米日事件了！今天晚上，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要从练兵场开出来杀我们！我们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人群用欢呼声来支持他。接着出现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越来越大，但是正当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在大街上行进时，遭到龙骑兵的袭击，有两人被打死，一个老人被砍伤。群情激愤，到处喊出“拿起武器”的呼声。群众四处寻找武器，甚至抢军火商店，打铁工人也在加紧制造步枪。7月13日清晨，全市教堂警钟齐鸣，手工业者、工人和小商人，妇女和老人都涌上街头，他们手持各式各样的武器：有短刀、手枪、斧头甚至石块去进攻王家雇佣军。军队在起义者的进攻下，步步后退，一部分士兵转到起义者方面来。

为了进一步武装自己，在13日这一天巴黎群众又攻入伤兵院，占领了伤兵院中的军火库，从军火库中夺取28,000支步枪及几门大炮。同时，巴黎劳动人民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时间内造出5万支刺枪。起义者在武装起来以后，便开始行动起来，到13日夜里，巴黎绝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起义者控制之下，只剩巴士底狱还未攻下。巴士底狱是专制暴政的象征，因为其中监禁着许多无辜的人民。同时它也是巴黎市的一个重要堡垒，里面驻扎着军队，他们的大炮正对准圣安东区。而且大狱里还有火药库。因此攻陷巴士底大狱就成为巴黎人民的首要目标了。

圣·巴梭罗米日事件：指1572年8月24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屠杀新教徒的事件。

7月14日上午9时起，“到巴士底去！到巴士底去！”的口号响彻了巴黎全市。各区的群众扛着步枪、长矛和大刀奔赴巴士底大狱。巴士底大狱的守军只有120名左右，但是大狱的围墙高达30公尺，上面有8座炮塔，周围环绕着25公尺宽的护城河，一时很难攻下。但是英勇的起义人民一再向堡垒猛攻，在守军的炮火下有百余人壮烈牺牲。经过四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这个堡垒。起义军处死守军指挥官德洛内。

巴士底大狱的攻陷，是巴黎人民的伟大胜利。国王在胜利的人民面前，被迫下令把军队从巴黎撤走。他的解散制宪会议的阴谋破产了。

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的胜利，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这一天巴黎人民的英勇行动，博得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热情的赞扬。

第二节 君主立宪派执政——革命第一阶段

（一）《人权宣言》

由于巴黎劳动人民7月14日起义的胜利，制宪会议被拯救了，国王屈服了，他不得不承认制宪会议的合法地位。制宪会议成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会议代表的成分很复杂，其中既有僧侣和贵族，也有大资产阶级分子和自由主义贵族，还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过其中占优势的是大资产阶级分子和自由主义贵族，他们构成君主立宪派。同时，他们都属于斐扬俱乐部，因此又称为斐扬派。由于立宪派在会议中占优势，所以他们成了执政党。

大资产阶级也夺取了巴黎市政权。在7月13日巴黎人民在街头浴血奋战之际，他们的代表人物就乘机驱逐了巴黎市政府的国王官吏，而把巴黎改为自治市，成立了由各区选民代表所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决定组织资产阶级国民军，规定每区出800人参加国民军。7月15日，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贝野被选为委员会主席。同一天任拉法叶特为国民军总司令。为了防止劳动人民参加国民军，特意规定国民军士兵要有一套华丽的军装，武器也要自备，因之只有资产阶级分子有资格参加国民军。国民军士兵都佩带三色帽徽（红蓝白），以后三色旗成了革命的标志。

在外省，大资产阶级也夺取了各大城市的市政权。他们推翻了旧政权，而代之以新选出的市自治机关，并且成立了资产阶级国民军。

在革命炮火中夺取了政权的大资产阶级，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因此制宪会议在拉法叶特的建议下，决定起草《人权宣言》，并且在8月26日正式发表。

《人权宣言》是这次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里面阐明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明确宣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人权宣言》首先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这样，法国资产阶级上台伊始就提出了保护人权的革命口号，这个口号是直接针对革命前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下的公开的不平等及公开的人压迫人的现象而提出来的。当然，资产阶级之保护人权，首先在于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因为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权利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正因为如此，《人权宣言》的发表，也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且成为人民积极参加革命的推动力量。

《人权宣言》还宣布了资产阶级的法制原则。宣言第六条宣称：“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过其代表去参加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这些话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封建制度下，法律是

国王个人意志的体现，而且法律也是压迫人民的工具。

在国家制度方面，针对封建社会的君权及贵族担任官职的特权，《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并且宣布一切公民“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或才能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更重要的，它宣布了“分权”的原则。所谓“分权”就是指“三权分立”，这是孟德斯鸠提出的资产阶级国家组织原则，其矛头是直接指向专制君主制的，目的在于剥夺君主的立法权及司法权，从而限制君主的权力。

宣言也庄严宣布“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这一条也有其反封建反专制的意义，因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面，人民的这些自由都被剥夺了。

因此，《人权宣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进步的革命文件。但是我们在肯定它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阶级局限性，因为《人权宣言》在宣布“人人平等”的同时，又宣布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从根本上把资产阶级宣扬的所谓“人权”完全变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权利。

（二）农民运动与制宪会议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立法

在革命前的几十年中，法国农民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7月14日巴士底大狱的攻陷，成为法国农民全面起义的信号，农民多年来郁积的愤怒爆发了，在短短几天内，农民起义就席卷了许多省份，许多贵族吓得丧魂落魄，丢下庄园，狼狈逃亡城市或国外。

农民起义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巩固了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的胜利，因为巴黎人民所摧毁的是专制制度，而外省农民所破坏的是封建制度。

农民起义不单是针对地主，同时也针对投机商、包税人、作恶的法官以及一切榨取人民不劳而获的人。在阿尔萨斯省，农民在攻毁贵族宅第及修道院时，也袭击了犹太商人。7月底，阿尔萨斯的犹太商人成百地逃往巴塞尔去。

面对汹涌澎湃的农民武装起义浪潮，刚刚掌握政权的大资产阶级惊慌失措了，一些城市的常设委员会派国民军前往镇压。7月29日，科马丹堡附近的农民起义者遭到残酷的镇压，被打死20人，被捕60人。另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在克吕尼附近被镇压，死难100人，被捕170人。马康城的“常设委员会”变成了法庭，它处死了20名起义者。有时好几个城市的国民军采取联合行动镇压农民起义。

但是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下去。1789年8月初，在农民起义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形势下，制宪会议赶忙采取对策。8月4日，制宪会议连夜开会讨论农民问题，气氛极为紧张。在农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许多贵族代表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让步。贵族诺亚伊子爵建议：为了使农民放下武器，应采取如

下措施：第一，取消特权等级的一切免税特权，全国人民都应按其收入的比例纳税。第二，取消农民的封建地租，但应由公共团体（城乡政府）出钱向地主赎买。第三，封建劳役及农奴制残余应无代价地废除。接着另一个贵族（法国最大的地主之一）厄基养公爵发了言，他支持诺亚伊子爵的提议，他说：“人民毕竟要想摆脱若干世纪以来加于他们头上的束缚，虽说暴力是犯罪行为（一如其他暴力侵略行为一般），可是我们得承认人民在其久被牺牲的困苦中起而暴动却是可以原谅。”布列塔尼省的代表勒居赛·得·克朗加尔在发言中甚至主张烧毁封建契券。随后许多僧侣及贵族代表先后跑到台上表示要放弃自己的旧日特权：什一税和领地上的司法权、狩猎权、渡河税等等。据说这一夜之间大家所放弃的特权共达 150 种之多。

在 8 月 5 日～11 日，制宪会议正式用书面形式重新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特权的一系列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实际上只是欺骗，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质性的好处。第一，取消什一税，但必须用钱赎买，在赎买之前，必须继续交纳。第二，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但是封建义务中的主要部分——封建地租——必须由农民出钱赎买：拿出相当于每年地租的 30 倍的钱。只有次要的封建义务，亦即与人身依附有关的义务及苛捐杂税无需出钱赎买。而且还规定许多苛刻的条件，如同一领地上的农民在赎买封建义务时，对于向地主缴钱有联带的责任，换言之，只有大家一致付清代价后，封建地租才能取消；而且，假若领主反对，也不能赎买。这些规定使得赎回封建义务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

制宪会议明知道农民是不会满意的，为了预防农民暴动，它在 8 月 10 日还特意制定了关于检举破坏社会治安的法律，它规定由各城市的常设委员会担负维持秩序的责任，任何集会，必须立即驱散。

但是这项法律阻止不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不满制宪会议的措施的农民继续斗争下去。许多地方的农民拒绝缴纳封建地租，农民的反抗运动持续了三年之久。国民军不断出击镇压，但是农民运动并未稍戢。

（三）10 月 5 日至 6 日的运动与制宪会议的反民主措施

1789 年 10 月 5 至 6 日运动，在法国大革命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次运动是巴黎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爆发。

8 月 5 日至 11 日的法令虽然在制宪会议上通过了，但是国王拒绝批准，他说：“我永远不会同意剥夺我的僧侣等级和我的贵族等级，我决不批准那些剥夺他们的法令。”同时，他也不肯在《人权宣言》上签字，这都使巴黎群众非常不满。

其次，制宪会议在通过《人权宣言》后，就着手制定宪法。在 7、8 月人民运动之后，大资产阶级对人民力量比对专制王权及贵族还要害怕，他们希望加强王权及贵族的权力，借以制止人民革命的进展。在讨论宪法草案

时，宪法委员会的报告人穆尼埃等人提议仿照英国创立由国王任命并可以世袭的上院，这意味着想加强贵族的势力。他们也主张国王有绝对的否决权。关于设置上院的建议，在巴那夫等人的反对下，被击败了。关于国王的否决权问题，巴那夫等人也反对，但是后来让步了。同意国王有搁置的否决权（而不是绝对的否决权）。9月11日，关于国王的搁置的否决权的决议获得通过。决议规定：国王在四年内有延缓执行法律的权力。制宪会议对国王的这种妥协态度，更加深了人民的不满。

人民群众的不满，还有经济上的原因。革命爆发后，贵族们成批地离开巴黎逃往国外，靠贵族生活的假发匠、鞋匠及缝工等等因之陷于失业，生活大成问题。同时，面包价格上涨，而且到9月，巴黎居民为了购买面包，不得不在面包店前排队等候。经济上的原因，加深了人民的不满。群众异口同声地要求到凡尔赛去举行游行示威，迫使政府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

10月5至6日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宫廷的挑衅行为。国王和封建贵族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秘密筹划推翻革命政权——制宪会议。在王后的主谋下，国王决定调外地军队到首都附近，以使用武力制服制宪会议。9月底，一支雇佣军团被从佛兰德尔调到凡尔赛。10月2日，御林军在凡尔赛宫设宴欢迎佛兰德尔军团的军官。国王和王后也出来应酬。反动军官们在宴会上狂欢痛饮，在酒酣耳热之时，情不自禁地公然把象征革命的三色帽徽泼到地上用脚踏踏，同时向国王祝福，唱歌歌颂他。10月3日，这件事传到巴黎，人民群众愤慨万分，革命报纸《巴黎新闻》和《人民之友》揭发了贵族的阴谋，谓其目的显然在于推翻制宪会议。人民的领袖马拉号召巴黎各区人民武装起来，带大炮到凡尔赛去。当时正是巴黎人民生活最艰难的时刻，当他们听说凡尔赛的反动派行欢作乐时，再也忍耐不下去了。10月5日，暴动在巴黎开始了。首先是一大群妇女集合起来，她们多半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妻子。她们拥进市政厅，要求面包。后来她们决定到凡尔赛去，人数有六千名左右，领导这群妇女的是7月14日的英雄马伊雅。后来又有两万名左右的男子也向凡尔赛进发。不久，国民军也集合起来，涌向广场，高呼：“到凡尔赛去！”国民军也要求总司令拉法叶特一同前往，否则就要吊死他。声势浩大的群众队伍，在当天下午就到达了凡尔赛。在操场上严阵以待的佛兰德尔军团不但不向群众开枪，反而表示了友好的态度。妇女们当即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到制宪会议，控诉物价昂贵生活困难及国民军帽徽受侮辱的事件。制宪会议的代表罗伯斯庇尔表示支持群众的行动。

群众示威的雄伟场面，吓坏了国王，为了缓和群众的情绪，他不得不批准了制宪会议的各项法令及《人权宣言》。

但是到10月6日清晨，巴黎群众不顾御林军的阻拦，突然闯进王宫。其中有一个人被御林军开枪打倒，这就激起了群众的义愤，他们开始与御林军搏斗，打死了几名御林军，把头挑在枪矛上。惊骇万状的国王和王后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头皮走出阳台与群众见面。群众怒吼：“国王回到巴黎去！”

国王知道群众力量不可抗拒，不得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当时制宪会议也表示它不能和国王分离，所以也决定迁回巴黎。10月6日下午1时，群众簇拥着国王全家，连同制宪会议代表一道，向巴黎出发，夜晚10时，才抵达巴黎。

10月5至6日运动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因为此后国王及制宪会议完全落到巴黎群众的直接控制之下，国王解散制宪会议的阴谋再也不能得逞了。总之，这次运动粉碎了宫廷的反革命计划，因而巩固了革命。

但是制宪会议中的大资产阶级立宪派却为这次运动所吓倒，它不但不感激群众对制宪会议的援助，反而把群众视同仇敌。制宪会议在10月8日发出了逮捕群众领袖马拉的命令，因之，马拉不得不转到地下活动。10月21日又通过戒严法，禁止群众集会。

为了防止群众参与政治，立宪派控制下的制宪会议，又在10月至12月间制定了关于限制选举权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全国男性公民被分为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只有积极公民才有资格参加选举和参加国民军。凡属法国人年满25岁，在某一地区已经住满一年，每年纳相当于当地三天工资的直接税者，而且不是私人雇工者，才算是积极公民；不够这个标准的人都被划在消极公民的范围之内。根据1791年5月18日所公布的调查结果，在全国大约2600万人口中，积极公民只有429.8万多人，成年男子中没有这种资格的人大约有300万。法律还规定：积极公民中每100人得推选复选人一名，纳直接税相当于十天工资的人才才有资格被选为复选人。凡主教、国会议员及省级官吏都由复选人选出。只有年纳54利弗尔直接税，并且拥有某种土地所有权的人，才有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权利。1791年8月27日在人民的压力下取消了当选国会议员必须年纳54利弗尔的税的规定，但是同时却提高了复选人的资格：必须年纳直接税相当于100~400天工资的人才能取得复选人的资格。

制宪会议中的民主主义者，如罗伯斯庇尔和格累瓜尔神父，都反对这项法律，但是抗议无效。马拉愤怒地指责富裕的贵族。德穆兰指出：按照这个规定，连卢梭也没有当选的资格了。

大资产阶级的制宪会议仇视人民群众的态度，更明显地表现在1791年6月14日通过的列·霞白利法案中。法案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禁止工人罢工，并且对于违反这项法律者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办法：为首者罚金1000利弗尔，判徒刑三个月。会议几乎一致通过了这个法案。

这样，大资产阶级刚一掌权，就与人民为敌了。但是，他们更关心的还是改造法国的旧制度，创造一系列新的制度，以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四) 制宪会议改造法国的措施。1791年宪法

为了改造法国旧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制宪会议在 1789 ~ 1791 年间做了大量的工作。

1790 年 6 月 19 日，制宪会议通过法令，废除世袭贵族以及亲王、公爵、侯爵、伯爵等头衔，取消了等级制度。

1789 年 12 月 ~ 1790 年 1 月又通过法令，取消了旧的地方行政区、司法区及税区等等，而把全国划分为大小几乎相等的 83 个省，在省的下面设置州、县和公社。新的行政区划消灭了旧的封建割据的残余。同时，制宪会议也废除了内地关卡及地方的苛捐杂税，这就消除了工商业发展的障碍。

1791 年 2 月，制宪会议又颁布了取消行会及其特权的法令。在这以前又取消了工业生产方面的政府法规。1791 年又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制宪会议也实现了司法的改革，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法官都从积极公民中选出，从而使资产阶级垄断了司法权。还建立陪审制度，以防止法官的专断。最高司法机关是大理院，它是全国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是审理高级官员的机关。这些司法机关都独立行事，这就消灭了革命前国王独揽司法大权的弊病。

更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关于天主教会的立法。制宪会议在革命初期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便是财政拮据。这是因为制宪会议虽然只取消了间接税而保留了直接税（土地税、收入税及工商业的收益税），但是在征收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多人抗税。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制宪会议便向天主教会开火，这是因为天主教会拥有大量地产（占全国土地十分之一），约值 30 亿利弗尔。早在 1789 年 11 月 2 日，制宪会议就通过一项法令，宣布教会地产归国家所有，国家则应负责供给宗教费用，以维持教会生活和救济工作。没收教会地产，完全着眼于财政问题，并不是出于对天主教会的仇视。

1790 年 5 月 15 日制宪会议又颁布法令，规定教会土地分成小块进行拍卖，付款期限定为 12 年。颁布这项法令，制宪会议的目的有三：第一，增加财政收入；第二，为资产阶级购买土地创造机会；第三，诱使农民购买教会土地，以缓和反对地主的斗争。

但是 1790 年 6 月，制宪会议把付款期限由 12 年缩短为四年，并且改小块为大块出卖。在这个情况下，大部分土地为资产阶级买去，只有一小部分土地落到富农手中。因此，农民运动并未减弱。截至 1791 年 11 月 1 日为止，拍卖教会的土地所得的收入达 15 亿利弗尔。

制宪会议在拍卖教会地产的同时，又发行了一种特殊的债券——“指券”，号召人民来购买“指券”，凡买到“指券”的人，有权利取得教会土地。这等于国家借债，用土地偿还。但是，“指券”不久就以货币的资格流通在市面上，成为一种公认支付手段。后来，制宪会议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无限制地发行这种“指券”，结果，“指券”大大贬值，造成物价上涨，因之，群众生活恶化了。

没收教会土地之后，下一个合乎逻辑的行动便是改革教会。1790 年 2 月

13日，制宪会议通过法令，宣布封闭修道院及其他教会机关，修士可以还俗。1790年7月12日通过的《僧侣法》以及8月至11月间通过的若干有关改革教会的法案规定：以前由教会掌管的一切世俗事务，如生、死及结婚的登记，现在转交国家管理；法国天主教会脱离罗马教皇的统治，而归国家统治；主教及牧师通过选举产生，不再由教皇任命；僧侣必须宣誓效忠于宪法，并且从国家领取薪金。这样，制宪会议实现了政教分离。

当时一般僧侣是愿意接受《僧侣法》的，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教皇在1791年3月10日和4月11日发出两道密谕，谴责了《僧侣法》。于是法国僧侣才拒绝宣誓，甚至原来同情革命的下级僧侣也拒绝宣誓。拒绝宣誓的僧侣大部分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由于他们在落后的农民中间有长时期的影响，许多地方的农民在他们的煽动下，参加了反革命叛乱，此是后话。

制宪会议在改造法国方面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便是制定宪法，这部宪法颁布于1791年9月。

1791年宪法虽然宣布“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但实际上却不让人民享有政治权利参加政府。它保留了君主制，同时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以保证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政治组织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上的，它规定：行政权属于世袭的国王，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司法权属于各级法院。作为行政元首的国王，有权任命各部行政大臣，但是他无权管理地方政府、陆海军及僧侣。而且中央行政事务一概委之于各部大臣，国王之一切行政措施，非经大臣的副署，不能生效。此外，国王不经立法会议的同意，既不能宣战，也不能媾和。国王对于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有延搁的否决权，可以停止法律实施四年，但是否决权不能用于财政法案。国王不能任意动用国库款项，王室有固定的经费，每当新国王即位时，即由立法会议通过经费的数目。这次立宪会议所通过的数目为25,000万利弗尔。

宪法又规定：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它是一院制的，每两年改造一次。开会地点及会期由自己决定，国王不能随便解散它。立法会议有权监督各部大臣，得直接要求他们报告每年财政收支状况，有权将大臣提交法院审判。立法会议也掌握外交大权。

可见，宪法虽然保存了君主制，但是对王权作了严格的限制，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宪法最明显的缺陷，在于没有明文规定《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公民的一系列权利，也在于它保留了殖民地上的奴隶制度。

但是总的说来，这部宪法是一部进步的资产阶级宪法，因为在18世纪末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保留封建专制制度的情况下，它宣布在法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五）第三等级内部的分裂与民主运动的发展

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爆发前后，第三等级本来是团结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把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团结在一起，人民群众全力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君主及特权等级的斗争。但是在资产阶级上台后不久，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他们通过1789年8月5~11日的立法，把农民的封建义务保存下来。这就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因而开始了第三等级的分裂——资产阶级与农民分裂了。等到1789年10月5~6日事件后，资产阶级制定了关于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法律及列·霞白利法，又引起了资产阶级与城市劳动人民的分裂。在这个基础上，1790~1791年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民主运动，去对抗资产阶级。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广大劳动人民团结在他们周围。这个民主派领袖主要有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敦。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年）于1780年毕业于索波恩大学法律系，在求学期间，好学深思，特别醉心于卢梭的民主思想。1782年回故乡操律师业，专门替受欺压的劳动人民辩护，勇敢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1789年他当选为三级会议的代表，后来在制宪会议里一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坚决反对1789年10月通过的戒严法及关于划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法律，他说：“假如国民中的一部分人享有大权，而另一部分人成为被统治的臣民的话，那末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意味着贵族政体的建立……这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你们是想使刚刚从封建贵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落到富人贵族的压迫之下。”他同时提出普选制的建议。他在许多言论中表现对人民的同情而反对富人。他说富人自私、虚荣、骄傲，并且认为富人往往为了自己的个人私欲而损害社会利益。

让·保尔·马拉（1743~1793年）本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很早就学术上有成就，因而驰名海外。1774年他发表了一部著作《奴隶制枷锁》，尖锐地批判了英国的宪法，他号召英国人民起来为消灭君主制度及腐化的国会制度而斗争。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后，马拉毅然决然抛开了学者的安静生活，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去。他一开始就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以锐利的眼光揭露《人权宣言》的本质，指出它不过是富人安慰穷人的诱惑物而已。他相信人民的力量，他说：“能够完成革命的只有社会上的下层阶级，如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一言以蔽之，就是富人们称之为恶汉们的那样的下层贫民。”

乔治·雅克·丹敦（1759~1794年）原是个律师，他也是攻击君主制及贵族，鼓吹民主政治的有力人物。法国舆论之趋向共和主义，和丹敦的宣传有莫大的关系。丹敦热情洋溢的演说，有力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民主运动的根据地主要是两个俱乐部，一个是雅各宾俱乐部，另一个是哥德利俱乐部。

雅各宾俱乐部出现在 1789 年 10 月 5 至 6 日运动之后。最初这个俱乐部的成分很复杂，有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贵族分子，有工商业资产阶级分子，也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劳动人民。但是到 1791~1792 年，前二者先后退出，于是这个俱乐部就成为团结民主主义者和劳动人民的组织了。罗伯斯庇尔便是雅各宾俱乐部的著名的领袖。

哥德利俱乐部是马拉等人在 1790 年夏创立的，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团体，其目的是向巴黎民众灌输政治知识，争取民主及保卫人民的利益。由于人会费很少，贫民及消极公民参加者甚多，因而这个俱乐部成为下层民众势力的中心。

这个民主运动最初主要是在反对制宪会议的反民主措施的斗争的基础上展开的。不久这个民主运动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要求废除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制。最早提出共和思想的是律师弗兰索瓦·罗伯尔，他在 1790 年秋在《国民新闻》上写道：“让我们从我们的概念和我们的宪法中除去‘国王’这个名词吧！”此后，共和思想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者。

但是，共和思想只是在 1791 年“国王出走”事件发生后，才深入人心。

1789 年 7 月 14 日革命的爆发，推动了第一批贵族逃亡国外。7 月 16 日，国王之弟亚多瓦伯爵等大贵族就逃到意大利的都灵。7 月下旬各省农民运动兴起后，出现又一次封建贵族逃亡国外的浪潮。10 月 5 至 6 日运动也促进了另一批反动分子——贵族和僧侣的逃亡。1790 年制宪会议取消贵族头衔及等级特权后，又有一些贵族逃往国外。到 1791 年 6 月，德意志境内的科布棱茨成了逃亡分子麋集的中心，亚多瓦伯爵也从意大利来到这里。这些流亡贵族在逃到国外后，便积极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他们进行的第一个活动，便是策动国王逃离巴黎出国。

在革命爆发以来，路易十六耍尽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他进行垂死的挣扎，当挣扎失败后他就一方面在外表上表示屈服，另一方面暗中从事反革命的阴谋活动。1789 年 10 月 5 日他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批准了《人权宣言》，但是在当天晚上他就想逃跑，只是未遂罢了。在庆祝攻陷巴士底大狱一周年大会上，他宣誓效忠于革命的祖国，但他紧接着便暗地里写信给逃亡贵族，鼓励他们说：“要相信我，一切还都有办法。”1791 年 4 月 19 日他公开通告欧洲各国政府表示自己拥护革命是出于自愿，决不后悔；但同时他又秘密派人出国，通知各国君主们不要相信他的公开声明，并且派遣密使到西班牙宫廷求援。

路易十六一直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1791 年 6 月 20 日，在逃亡国外的反革命分子的策动下，路易十六偕同王后偷偷离开巴黎，企图逃往科布棱茨，以便勾结欧洲反动君主共同扑灭法国革命。但是他们坐马车来到圣莫内奥尔附近就被一个邮政局长德鲁埃认出来了。由于国王的马车跑得很快，德鲁埃连夜追赶，走到发楞附近才追上他们，当即把马车拦住。结果，国王等人在群众押送下，返回巴黎。沿途的老百姓都以忿怒的眼光注视国王。

国王逃亡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立即爆发了反君主制的运动。在巴黎，酒商珊特尔已武装了两千名穷苦劳动者，准备战斗。人们到处撕毁国王的画像。招牌上及街头上的“王家”字样都被涂去。许多地方的群众提出请愿书，要求惩罚国王和废黜他，要求成立共和国。

但是，制宪会议中的大资产阶级代表却替国王辩护，硬说路易十六是被人拐走的，借以掩饰国王的罪行。制宪会议还在7月15日通过了一个恢复国王名誉的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激怒了巴黎群众。哥德利俱乐部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并且号召大家不要承认叛徒国王的权力。雅各宾俱乐部积极支持这个号召。7月17日，在练兵场上集合了将近一万巴黎居民，他们举行示威，要求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但是，制宪会议及巴黎市政厅下令镇压，国民军在拉法叶特的指挥下，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结果有五十多人死伤。

练兵场的屠杀，说明大资产阶级立宪派已经公开站到王党方面而与人民为敌了。立宪派之所以这样竭力维护王权，也是从他们本身利益出发的，立宪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的话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791年6月发楞事件后仅仅20天，就在制宪会议上说：“让我们结束这场革命吧”，因为“在自由的线路上再进一步，就会是王权的毁灭，在平等的线路上再迈出一步，就会是财产的毁灭”。

大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手制造的练兵场大屠杀，标志了大资产阶级与以资产阶级民主派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分裂，并且播下了1792年8月10日革命的种子。

（六）对外战争的开始。立法会议

1791年9月30日，制宪会议解散，第二天（10月1日）按照宪法选出的立法会议开幕了，于是法国正式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

立法会议是由积极公民选出的，因此绝大多数的议员是资产阶级代表。同时，与制宪会议不同，几乎没有一个拥护旧制度的贵族或僧侣的代表。会议一开始就划分三个不同的政治派别：第一是君主立宪派，占264席；第二是中间派，占345席；第三是左派，占136席。立宪派代表自由贵族、大金融资产阶级利益，他们拥护宪法，反对进一步改革，中间派的态度依违于立宪派与左派之间，无一定的主见。左派又分为两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前者代表吉伦特省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中主要人物有布里索、微尼奥等人。吉伦特派比立宪派前进了一步，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革命成就，希望法国进一步民主化，甚至有的人支持人民争取共和国的斗争。但是他们忽视人民的要求，所关心的只是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因此他们害怕人民。雅各宾派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实行民主和把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他们有坚决的革命毅力，有远大的政治眼光，深知为了与革命敌人进行斗争，必须发动和团结人民。

在立法会议中占优势的是立宪派，因为他们比左派人数多，而且还得到中间派的支持。在这个情况下，立宪派组成了内阁。但是，雅各宾派在立法会议外面拥有很大的势力，因为有广大群众支持他们。吉伦特派则有外省工商业资产阶级作后盾。

在立法会议开会后，法国面临着三个重大问题。第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政府无限制地发行“指券”，造成通货膨胀，结果物价扶摇直上，特别是日用品及粮食价格的上涨最甚。投机商人之囤积居奇，更助长了物价的腾贵。这种情况，首先打击了最贫苦的阶层——工人、手工业者、贫民及贫农。1792年1月间，在巴黎发生了贫民的骚动，群众在骚动中打破食品商店或食品仓库的门窗，强迫商人按照过去的价格出售食品。群众还向立法会议请愿，要求规定食品固定价格，制裁投机商人。但是立法会议对于人民生活漠不关心，对于请愿置之不理。

第二，反革命叛乱日益猖獗，拒绝宣誓的教士和反革命的贵族，在国内许多地方制造骚乱。早在1791年8月，他们就在万第省发动叛乱。1792年2月，他们又在洛最尔煽动暴动。1791年10月，反革命贵族在亚威农的一次暴动中杀害了市长。最猖狂的是反革命亡命者在国外的活动。到1791年年底，这类亡命者已有两万人。其中在科布棱茨的亡命者甚至武装起来，随时准备攻进法国来扼杀革命。

面对这种形势，立法会议中的立宪派是无动于衷的，因为在他们眼中，最可怕的是人民的民主运动，而不是反革命活动。吉伦特派议员则坚决主张采取严厉措施来对付这些革命的敌人。布里索建议逮捕逃亡贵族，反对采取姑息政策。伊斯纳尔说：“从今以后，任何调解的办法都没有用处；请问，以前一再宽宥，结果怎样？你们越宽大，敌人越猖狂，只有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才会停止破坏活动。”在吉伦特派的要求下，立法会议通过了两项重要法案：1791年11月9日的法案规定：聚集在边境以外的法国人都有阴谋叛国嫌疑；如果这些人到1792年1月1日仍不散，即以阴谋叛国论罪，可以处以死刑；经缺席判决以后，他们的财产的收益，将由国家来处理。11月29日的法案要求进行反抗的僧侣必须举行公民宣誓，否则取消其年金，并被认为是违法作乱的嫌疑分子。如果他们再拒绝宣誓，即加以严格监视；在他们所在的公社发生宗教骚乱时，即将他们解到省的首府；如果他们参加骚乱进行反抗的宣传，即予以扣押。但是，国王否决了这两项法案。立宪派支持了国王的这个行动。

第三，外国武装干涉的威胁。法国大革命对邻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法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处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比利时人民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在西部德意志，发生了强大的农民反封建运动。在英国，资产阶级急进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工人群众都热情地歌颂和同情法国革命，并且在本国发动一个以要求普选制为内容的急进运动。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各国封建统治者的惊恐，他们惶惶然不可终日。他们认为只有扑灭法国革命，才能拯

救自己。同时，法国流亡贵族也派代表出入各国宫廷，鼓动君主们武装干涉法国革命。法国国王更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国武装干涉上。他加紧与各国反动君主勾结，他在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信中说：“在我刚给奥国皇帝、俄国女皇、西班牙国王与瑞典国王的信中已经说明：有暴力为后盾的全欧洲列强会议是制止法国乱党的最好办法，这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所希望的秩序，并使危害法国的罪行不会殃及欧洲各国。”

1791年8月27日，在俄国和英国的怂恿和支持下，普鲁士国王与奥地利皇帝在皮尔尼茨（在萨克森）发表了一项联合宣言，号召欧洲各国君主共同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恢复法国国王的“君主统治”，并且扬言要派军队惩罚“罪犯”，主持“公道”。

在这个外国干涉的威胁面前，法国立法会议里面的各个党派抱不同的态度。立宪派有一部分人反对战争，主张妥协，因为这些人愿意保持现状，害怕发生战争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立宪派另有一些人同国王态度一致，他们主张战争，他们的打算是：如果对外战争胜利，则会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可以把国内革命镇压下去；如果战争失败，革命就会被外国武装干涉者扑灭，就可以恢复国王过去的权力和地位。吉伦特派也同意战争，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借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斗争的目标。他们还希图利用战争的机会使自己掌握政权，并且通过战争来为法国资产阶级开辟国外市场及扩大海外殖民地。他们的内心动机虽然如此，但是他们却使用了许多漂亮的词藻来为自己的主张作辩解。他们说什么要使自由摆脱专制的罪恶，战争是必需的；法国应该用革命战争去解放全欧洲。吉伦特派的谋士布里索还说：“要攻打他们（帝国之诸侯）还须考虑吗？为了我们的光荣，为了我们的信用，为了巩固革命而使之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使我们非这样干不可。”但是雅各宾派坚决反对吉伦特派的主张。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他不是立法会议议员）在雅各宾俱乐部里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法国人民奋起抗战，打退外国干涉者，固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进行对外战争之前，必须消除国内敌人，因为国内敌人会从内部破坏抗战。他公开指出在科布棱茨与宫廷之间有勾结。他认为在打倒国外那一群贵族之前，首先应该镇压国内的贵族。他嘲笑吉伦特派把革命传播到国外去的想法是幻想。他说：“武装的传教士是谁也不欢迎的。”他认为用武力强迫外国人民接受法国的宪法的思想是荒谬的。他反对“输出革命”。指出：法国缺乏战争准备，军官都是贵族，队伍也不完备，国民军没有武器及装备，因而战争不会取得胜利。他又说：即使战争胜利，对革命也不会有好处，因为那时野心勃勃的将领会消灭自由，消灭革命果实。他预料会出现军事独裁。总之，他反对吉伦特派的貌似革命的主张，认为这个主张带有冒险性，不符合真正的革命任务。

但是，吉伦特派的革命口号及革命词句迷惑了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的拥护。狡黠的路易十六完全支持吉伦特派的主张，同意立即进行战争。他罢了立宪派内阁而任命吉伦特派组织内阁。他是想通过战争，引狼入室，借刀

杀人，利用早就勾通了的国外武装干涉军绞杀革命。

1792年4月20日，吉伦特派内阁对普、奥宣战。尽管法国首先宣战，但是这次战争对于法国来说，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因为它是法国人民保卫革命反对外国干涉的战争。4月28日，法军向奥地利发动了攻势。当时，奥国对于战争准备是不够的，普鲁士还需要两三个月时间才能加入奥国方面作战。而法军数量也远远超过奥军——对抗法方10万大军的奥军只有35,000人在比利时，6000人在布来斯高。尽管法军大部分是由志愿军组成，军事素养很差，如果法军将领指挥有方，勇敢坚决地进行战斗，很可能打败奥军而胜利地结束战争。但是法国军官既无指挥能力，又敌视革命，他们行动畏缩迟钝，借口没有准备好而延缓进攻，负指挥全责的拉法叶特更是消极作战。更严重的是，国王及王后本身就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王后甚至把法国的军事机密及作战计划提供给奥军。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法国军队一与奥军遭遇，就四散奔逃。结果，法军步步败退，许多将领叛国投敌。战争的失败，责任虽然不在吉伦特派身上，但是路易十六却借口吉伦特派无力领导抗战而强迫吉伦特派内阁辞职，命令立宪派组阁。到7月6日，普鲁士也开始军事行动。普奥联军很快地踏上了法国领土。7月26日，普奥联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在从科布棱茨发动进攻时，以奥皇及普王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是由一个法国反革命逃亡贵族起草，由联军总司令宣读的。宣言首先诬蔑和攻击法国人民的革命行动，说他们扰乱了法国的秩序，侮辱和侵犯了法国国王及其家族。宣言接着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表示要“结束法国内部无政府状态，制止对王位和教会的攻击，重建合法权力，恢复国王被剥夺了的安全和自由”。它还扬言：“如果国王、王后及王族稍受侵犯，如果他们的安全、尊严与自由不能立即得到保证……将予巴黎全城以军事处分及彻底毁灭。”封建干涉军这种威吓，并没有吓倒法国人民，它只能激起法国人民的义愤。

国难当前，法国人民奋起抗战。在巴黎近郊工人的压力下，立法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募集志愿军两万人来保卫巴黎。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敦等进行积极的宣传活动，号召法国人民为拯救祖国而战。在群众的强烈要求及雅各宾派的推动下，立法会议在7月11日通过了“祖国在危殆中”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凡是能手握武器的男子都必须应征。几天之内，巴黎应征入伍的义勇军就达15,000人。各地人民纷纷组织义勇军，开赴巴黎。马赛人民成立了一支516人的义勇军，步行27天到达巴黎，他们沿途高唱“莱茵军歌”前进，这首歌据说是斯特拉斯堡的驻军军官卢日·得·里勒于1792年作的。这首歌传到马赛后广为流传，马赛义勇军又把这首曲调铿锵有力、歌词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从南方一直带到巴黎，此后它就以《马赛曲》闻名于世。

(七) 1792年8月10日革命

前线的军事失利、宫廷的通敌以及将领们的叛变行为，都引起了人民的极度不满，他们把仇恨都集中在君主及王室身上。1792年6月末7月初，在巴黎及外省出现了反对君主制的运动。人们认识到：为了组织抗战及拯救祖国，就必须推翻君主制，宣布共和国。大城市如马赛、第戎、安热等，都提出请愿书，要求国王退位。领导这个运动的便是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早在7月25日，他就提出了斗争的纲领目标：废黜国王，立即解散立法会议而代之以由全体公民（包括消极公民在内）选出的国民大会。因为在他看来，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是违反民主原则的，因而由积极公民选出的立法会议也是不正当的，他认为只有在普选基础上选出的国民大会才是真正的民主的代表机关，才能担负起革命在新阶段的任务。同时，罗伯斯庇尔加紧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他和马拉在巴黎各区公所展开积极活动，经常吸收各区的消极公民参加区的会议，允许他们加入国民军，发给长矛。此外，巴黎各区的群众还与从马赛开来的义勇军发生联系，共同酝酿起义。在罗伯斯庇尔的推动下，成立一个秘密指挥部，负责起义的准备工作。8月8日，秘密指挥部决定在9日夜间发动，并且布置好各个负责人的具体工作任务。

8月9日夜半，警钟响了，来自巴黎各区的起义者马上集合。起义者首先占领了巴黎市政厅，驱逐了旧市政府人员，成立了新的革命市政府——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由288名代表组成（巴黎48区，每区选出六名代表），这些代表都是消极公民，因此巴黎公社实际上落到劳动人民的控制之下。

8月10日清晨，两万巴黎起义的劳动人民（其中也有马赛义勇军）在巴黎公社的领导下，向国王的住宅——杜伊勒里宫推进，守卫皇宫的国民军的大部分及炮兵全体都投到起义者这边来，只有瑞士雇佣兵及侍臣们进行抵抗。他们向起义群众扫射，起义者向他们发炮，终于占领了王宫。在争夺王宫的战斗中，雇佣兵死了600人，起义群众死伤达500人。路易十六带领全家仓皇离开皇宫，到立法会议去避难。巴黎公社的委员出席了立法会议，在他们的压力下，立法会议不得不宣布废除1791年宪法，国王退位，实行普选制，并且在最近召开以普选制为基础的国民大会。最初，立法会议想把路易十六留在卢森堡宫，但是巴黎公社坚持逮捕他，并把他监禁在丹普尔堡中。

8月10日革命就这样胜利了，君主制在革命中被推翻了。同时，立宪派内阁也垮台了。立法会议建立了新的行政机构——行政委员会，委员们绝大多数是吉伦特派。

当时立宪派将军拉法叶特妄想负隅顽抗，但是他众叛亲离，知道大势已去，便逃到国外。

革命是胜利了，但是法国人民还面临着外国强大敌人的威胁，这时，号称10万的普奥联军和由1万名逃亡贵族组成的反革命军团正在法国领土上进军。8月23日，隆威要塞司令不战而降。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立法会议和行政委员会已失去一切威信及领导作用，担负起领导法国人民抗战的重

任的是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的领导下，法国全民都武装起来，法国的战争成为名符其实的全民的抗战。巴黎人民也积极投入保卫工作，他们修筑工事，铸造大炮，为了战争的胜利，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9月1日，凡尔登要塞陷落了，于是通往巴黎的大门打开了。在这个紧急关头，警钟敲响了，巴黎有6万人武装起来开赴前线。当时，丹敦用洪亮的声音发出了号召：“警钟响了，但这并不是警报，这是对祖国敌人的威胁。要战胜他们，就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一定会得救。”革命军队虽然训练不足，武器极差，但士气高昂，战术灵活。1792年9月20日，双方在瓦尔米高原进行激战。法国士兵高唱《马赛曲》，高呼“民族万岁”的口号，顽强阻击，击退敌人两次冲锋。敌军动摇了，后撤了，接着便是四处溃逃。瓦尔米大捷是革命的法国对外国武装干涉军的第一次胜利。它大大鼓舞了法国革命人民的斗志。法国开始转入反攻。不到两个月，敌军全部被逐出法国，革命的法国得到了拯救。

巴黎公社在组织抗战胜利的同时，也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它下令封闭了反革命的报纸，逮捕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及嫌疑分子。在巴黎公社的直接压力下，立法会议被迫在8月17日颁布法令，成立非常法庭，以审问反革命分子。8月28日，在公社的指示下，立法会议下令搜查住宅，逮捕嫌疑犯三千人左右，其中有不少拒绝宣誓的僧侣。9月初，当凡尔登陷落，敌军进逼巴黎时，巴黎到处传说：关在监狱中的反革命分子阴谋与外国干涉军里应外合举行暴乱。因此巴黎群众和准备开赴前线的志愿军，便冲进监狱，在五天之内处死大约一千一百人至一千四百人之多。

巴黎公社也对立法会议施加压力，强迫它实行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8月15日，立法会议通过法律，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允许贫苦农民用分期（15年）付款的办法购买。立法会议被迫减轻农民为赎回封建义务而应缴纳的款额。最后在8月25日，立法会议又议决废除一切法律上不能确证其有据的封建权利。

巴黎公社的这些举措虽然只满足了农民的部分要求，但却引起了吉伦特派的反对。8月30日，吉伦特派坚持要立法会议宣布解散巴黎公社。但是他们的企图失败了。

第三节 吉伦特派执政——革命第二阶段

(一) 宣布共和国与对路易十六的审判

早在 1792 年 8 月下旬就进行了国民大会的选举，9 月 21 日，即瓦尔米大捷后第二天，国民大会开幕。在这一天，雅各宾派分子科洛·得巴提议废除君主制。格累瓜尔发言支持这个议案，他说：“宫廷是罪恶制造所，是腐化之源，是暴君之巢穴，国王的历史便是国民受残害的记录。”他又说：“这些朝代只是些吸吮人民膏血的残害人民的家世而已”，他的话博得热烈的赞同，于是国民大会在狂欢和如雷的掌声中通过了废除君主制的决议。第二天宣布成立共和国，并决定以 1792 年 9 月 21 日为共和日。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国民大会的代表一共为七百余人。国民大会的选举是在广大人民爱国主义及革命热情的高潮中举行的，所以在国民大会的代表中找不出一个拥护君主制的人。同时，消极公民虽然取得了选举权，但是他们并不热心投票，贫民们不愿把工作丢开去做他们素来不习惯的事情——参加投票。工匠和工人即使前往投票，也往往被迫按照企业主的意志去投票。在选举中，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占上风。因此，当选的国民大会的代表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只有两名工人。以党派来说，国民大会可以分为三个派别：第一，吉伦特派，占 165 席。他们站在工商业资产阶级立场上，对于劳动人民抱敌视态度；主张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认为凡是妨碍业主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是坏的，干涉个人行动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强调经济自由。因此，他们反对革命进一步发展，其领袖布里索就说过：“这次革命应该停止了，否则它将引起一切都被推翻的危险。”第二，雅各宾派，约占八十席，其中有罗伯斯庇尔、马拉、圣·鞠斯特、丹东、科洛·得巴等。马拉从 1792 年 7 月起即攻击财产的不平等，认为这是穷人受奴役的源泉。他愤怒地谴责富人，说他们一餐之费可以养活 1 万家人。罗伯斯庇尔也反对财产上的不平等，他曾说过：“诸位立法者，倘使你们的法律不以温和而有效的方法去限制财产之极度不平等，那末你们对于自由就不会有什么贡献。”他主张限制财产权。他们的政治理想便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在平等及大众利益的原则上建立共和国”。雅各宾派有政治上的远见，也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认识到，要想打败国内外革命的敌人，就必须依靠广大群众，从而也就不能不倾听他们的意见，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三，沼泽派，占 500 个席位。这是个中间派，没有固定的政治主见，但是最初是附合吉伦特派的。

在这三个派别中间，雅各宾派有巴黎及外省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而且 1792 年 8 月 10 日的革命也是在雅各宾派领导下取得胜利的；但是这次革命却使吉伦特派获得了政权：国民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时，被选入执行委员会的都是吉伦特派分子。这是因为法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似乎证明吉伦特派所坚

持的战争政策是正确的。

最初，为顾全大局，雅各宾派要求与吉伦特派合作。他们认识到：为了与欧洲反动君主的武装干涉军作斗争，革命内部团结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吉伦特派不愿与雅各宾派合作，他们极力想把最得人心的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从国民大会中排挤出去，以便由自己控制国民大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便全力攻击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对他们尽其诬蔑之能事。他们说马拉制造了9月的屠杀，要求逮捕马拉。他们又说罗伯斯庇尔想成为独裁者。罗伯斯庇尔有力地揭露了吉伦特派的卑鄙动机，他说：“你们所希望的是一个仅仅为了富人的共和国。”因此，他们对于罗伯斯庇尔的攻击，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于是他们便转而想消灭雅各宾派在巴黎公社内的势力。执行委员会便在1792年10月下令改选巴黎公社，希图借此来消除公社中的民主分子及雅各宾派。但是12月初改选的结果，更为激进的民主分子当选了：肖美特和阿贝尔这两个平民的代表，分别当选为公社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这样，吉伦特派的阴谋又失败了。

吉伦特派还想用武力来对付国民大会中的雅各宾派。1792年10月，在吉伦特派的策动下，有几个省派了省警卫队16,000人到巴黎来，借口为了保卫国民大会，以防备所谓“破坏秩序者”和“无政府主义者”。11月3日，这些警卫队在巴黎街上游行，并且高唱：

要取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敦的脑袋，
并且要取一切拥护他们的人的脑袋，
并且要取一切拥护他们的人的脑袋！

但是，马拉等人深入警卫队的营房，向士兵宣传革命道理，使他们深受感动。结果，警卫队士兵成了雅各宾派的朋友。12月底，他们组成了“83省联谊社”，这是一个拥护雅各宾派的军人组织。吉伦特派的计划落空了。

在1792年最后三个月内，在如何处理国王的问题上，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本来在国民大会开幕后不久就应该把审讯国王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一心一意想拯救国王的吉伦特派却制造种种借口拖延下去。迟迟到10月16日，法制委员会才奉命研究审判路易十六的手续问题。11月7日，梅伊埃代表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驳斥了根据1791年宪法不能审判国王之说，指出：国王自己违反了宪法，从而就不能受该宪法所给予的保护，因此对他进行审讯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他建议由国民大会任命三个专员搜集路易十六犯罪的证据并且起草起诉书。对于这个报告，国民大会于11月13日开始讨论。在讨论中，一些人反对审判国王，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法的。雅各宾派分子圣·鞠斯特的发言有力地驳倒了这些人的论据。他指出：就法律而论，国王是不能受审判的，但是现在所要处理的并非一个法律案件，而是一个政治事件。因为他曾与人民进行了战争，是人民的敌人，对他只能适用一个法律，即战争法。但是，吉伦特派还是千方百计地把对于梅伊埃的报告表决拖延下去。

1792年11月20日，发现了路易十六的新的罪证。他在杜伊勒里宫的墙壁里秘密收藏的铁柜被发现了，铁柜里面的大量文件证实路易十六与亡命者的密切联系。在这个情况下，吉伦特派要想继续阻止审判国王，已经不可能了。11月21日，国民大会成立了一个12人委员会，负责整理铁柜中的文件。12月2日，巴黎48区的代表来到国民大会，强烈要求从速审判国王。12月3日，罗伯斯庇尔说：“路易应该死，因为共和国必须生！”他坚持主张审判国王。

在这个形势下，吉伦特派只好玩弄诡计。诡计多端的蒲佐在发言里表示：在国民大会里有人渴望在推翻君主制之后，在某种名义的掩饰下重新建立君主制——独裁。这里他显然暗示雅各宾派想建立罗伯斯庇尔的独裁。吉伦特派是想用这个手法转移一般人对国王问题的注意。

此外，吉伦特派还采取一系列其他战术，以图延宕对于国王的审判。只是经过许多天的激烈争辩后，国民大会才在1793年1月14日决定以记名投票的方法来确定国王是否有罪，是否处以死刑的问题。投票结果表明：国民大会除少数弃权者外，一致认为国王有罪，主张无条件处死刑者居多数，结果通过了对路易十六立即执行死刑的决议。罗伯斯庇尔在说明自己投票赞成的理由时说道：“我不承认杀害人民和宽恕暴君那样的人道主义；鼓励我在制宪会议中要求（即使是徒劳的）废除死刑的感情，正是那逼使我今天主张把死刑应用到我的祖国的暴君的感情。”

1793年1月21日，是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日子。是日天雨，沿途戒备森严。囚车于清晨8时离开丹普尔堡，10时到达刑场——革命广场（今改为协和广场）。10时10分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毙命。观众高呼“国民万岁！”

（二）扎克·卢与忿激派

吉伦特派的社会经济政策之招怨于人民，更甚于其对于国王的袒护。

吉伦特派政府的对外战争，带来了财政上的亏空。1792年12月国库收入仅3900万利弗尔，而单单战费一项即需2.28亿利弗尔。针对这个财政问题，吉伦特派政府所采取的对策，应该是让有产阶级分担战争费用，向他们征收新税。但是，吉伦特派政府是不肯触动有产阶级的利益的，它宁愿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即无限制地发行“指券”。到1792年10月5日，以教会财产的担保而发出的“指券”已达25.89亿利弗尔。经收回而焚化者为6.17亿利弗尔。故当时流通的“指券”为数19.72亿利弗尔。10月17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增发“指券”的法案，因而其流通额增至24亿的限度。此后继续增发。雅各宾派马拉、圣·鞠斯特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问题的其他办法，如停止发行“指券”而用强制及累进法摊募公债，用实物缴纳土地税等等。但是吉伦特派政府对于这些建议一概置之不理。

“指券”泛滥的结果，必然是急遽贬值。到1793年1月，“指券”跌

价到只等于票面价值的 60%到 65%，到 2 月又跌至 50%。因此日用品价格腾踊，特别是粮食价格涨得更猛。再加上奸商之囤积居奇，时常出现市场上粮食绝迹的现象。粮价上涨及购买困难，首先打击了工人、手工业者。工资劳动者平均每日所得，在乡间为 20 苏，在巴黎为 40 苏。可是有些地方面包已涨至每磅 8 苏。当时法国农业收成颇好，粮食并不匮乏，但是在市场上往往买不到。这是因为地主及农民不愿用粮食换取日益贬值的“指券”。大城市缺乏面包。1792 年 9 月底，卢昂城所存面粉仅足三天之用，市府不得不征调军粮仓库所存的谷物。

面对上述情况，吉伦特派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因为它害怕用政府权力干涉经济活动会危害财产权。

饥饿把群众推上斗争的道路。1792 年入秋以来，在巴黎及其他城市以及乡村已经开始出现人民的骚动。9 月底，在奥尔良有九家商店被抢。到 10 月，骚乱蔓延到凡尔赛、埃丹倍、蓝布伊耶，11 月又波及及其他各省。许多地区的群众要求限定物价。12 月初，有 12,000 人向图尔进发，要求限制价格，后来市政府及省政府答应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才解散。12 月 29 日，国民大会派往欧尔 - 埃 - 洛瓦省的三个特派员被 6000 武装民众包围，群众表示：如果他们不批准限价，将把他们抛入河中或吊死他们。

对于人民群众要求限价的呼声，吉伦特派置若罔闻，并且推行了严厉的镇压政策。

雅各宾派虽然反对对限价运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但是并不支持限价。当 11 月 29 日巴黎公社及各区要求限价时，雅各宾派拒绝发表意见。为此，群众不仅反对吉伦特派当权者，而且对于雅各宾派，也是非常不满的。

在群众骚动中，也出现了反映下层群众要求的党派，那就是忿激派。忿激派的领袖扎克·卢是一个步兵中尉的儿子，曾当过外省神学校物理和哲学教师，也当过教区牧师。1791 年 1 月他来到巴黎，他在巴黎接触了贫苦的手工业者、职业、帮工的生活，深刻地体会了下层人民的疾苦。他时常把自己的一些微薄收入（他当时是巴黎一个教会的代理牧师）分给他的最贫苦的教徒。但是，他懂得慈善事业不是解救贫民的根本办法，应该寻求更为现实的手段去消灭贫困，因此他勇敢地投身于政治运动。1792 年春，他在教会里发表演说，无情地攻击了高利贷者及富人，要求用死刑对付投机商人，并且严厉管制粮食贸易。从这时起，他就成为巴黎贫民的代言人。同年 12 月 1 日，他又发表一篇激烈的演说，毫不迟疑地攻击国民大会，称它专制跋扈。他要求国民大会制止囤积实行限价。华尔列是扎克·卢的战友。华尔列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并受过相当教育，但是他能挺身而出，替贫民说话。1792 年 8 月 6 日，他曾建议颁布制裁囤积者的法律。他在离国民大会不远的地方设立流动讲台，向群众作煽动性的宣传。他也攻击国民大会，对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他都加以谴责，说他们形成寡头政治，假借人民权力而专为他们自己谋利益。

忿激派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巴黎、里昂与奥尔良，忿激派分子都很活跃。里昂的忿激派提议设立特殊法庭来惩处囤积商人，主张取消私人买卖粮食，粮食归国家出售，并且要求国民大会对一切日用品实行限价。

忿激派并不要求取消私有财产，他们所要求的，是建立一个平等的共和国，使每个人都有同样不多的财产，希望借此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实际上，这种平均主义思想不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且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行不通的幻想。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反动的思潮，因为它对于生产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背道而驰的。忿激派之最后失败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对于忿激派及下层群众的社会经济要求，雅各宾派领袖们本来也是抱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限制价格是侵犯经济自由的。但是他们与吉伦特派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同情穷人的苦难。其次，他们有远大的眼光，认识到为了与国内外反革命作斗争，必须取得人民的支持，因而也就必须满足人民的物质要求。这里不能不提到罗伯斯庇尔的态度。他本来就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在8月10日的革命中，他直接接触了巴黎的群众，在巴黎公社中与他共事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从群众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也认识到在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因而他深知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依靠人民。

因此，雅各宾派到1793年春就逐步改变了对于忿激派的态度，同情他们的要求，并且与他们建立了联盟，共同反对吉伦特派。1793年5月4日，不顾吉伦特派的反对，罗伯斯庇尔提出的关于“粮食最高限价法案”获得国民大会的通过。不过，吉伦特派对于法案的实施百般阻挠。

（三） 1793年6月2日革命与吉伦特派的倒台

1792年9月20日瓦尔米大捷后，法国军队乘胜追击敌人，普、奥军队狼狈逃窜。蒙特斯契奥统率的法国军队于9月21日夜就进入萨伏依。安瑟姆麾下的法军则于9月29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尼斯。屈斯丁指挥的法军也在德意志境内胜利进军，并且在10月底以前攻占了美因兹与法兰克福。在北线，杜穆里埃部下的法军于11月6日在比利时境内给奥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史称热马普大捷。这次大捷，比瓦尔米大捷的意义还要重大，因为在受到这次打击后，奥军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就被逐出整个比利时。

西德意志、北意大利及比利时的居民把法国军队视为解放者而加以欢迎，当法军开到时，许多地方出现群众“箪食壶浆”欢迎法军的热烈场面。蒙特斯契奥在9月25日给法国国民大会的报告中说：“我军之前进有如凯旋一般。城市及乡村人民都来欢迎我们。三色旗到处树立起来了。”在美因兹，当地的民主主义者组织了“人民之友社”，其领袖便是学者乔治·佛斯特尔。萨伏依的居民甚至要求萨伏依合并于法国。

但是，在热马普战役后，法国吉伦特派当权者开始执行扩张政策。这里原因有二：第一，吉伦特派想扩大法国在欧洲的市场；第二，吉伦特派在国内实行“保守的社会政策”，招致了人民的不满，他们害怕一旦停战，士兵回国会带来新的不安的因素。吉伦特派分子克拉威埃的言论足资证明，他在1792年12月5日写信给屈斯丁道：“我们应当保持战争状态，士兵回来会增大全国的乱事而使我们失败。”罗兰也有类似的见解，他曾表示：“我们一定要使我国成千成万的军队前进，进到他们两足所能及之处，否则，他们一返国就会致我们于死命。”总之，吉伦特派政权之维持须靠军事胜利，一旦没有军事胜利，他们就要垮台。

对于军事行动，雅各宾派则抱另外的看法。罗伯斯庇尔主张“我们之军事行动应有适当限度”。但是他们没有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方案来反对吉伦特派的扩张政策。当时他们正集中精力于对国王的审判问题上，无暇顾及对外战争。

吉伦特派是用革命的口号来掩盖他们的扩张动机的。1792年11月19日及12月15日，国民大会先后通过了两个法令，前一个法令写道：“国民大会用法国国民的名义宣布，凡欲恢复其自由的人民，均将予以友爱与救助。”后一个法令写道：“在我们所踏入的国土内，我们应把一切有特权的人或暴君视为敌人。”这个法令要求法国将领在法军所占领的外国土地上立即取消什一税与封建权利以及一切奴役的制度。换言之，吉伦特派政府提出了用革命战争解放欧洲各国人民的口号。正是因为它提出了这个响亮的口号，所以法军才博得了欧洲人民的拥护。这是它在短期内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兰西共和国在军事上取得的空前胜利，使得欧洲封建统治阶级惊骇万状。他们把法国革命视为洪水猛兽，迫不及待地要求把它扑灭。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恶毒地咒骂法国革命人民，她说：“我们不应该让有德行的国王（指路易十六）成为野蛮人的牺牲品。法国君主政权的削弱将使其他一切君主制遭受危险。在我这方面我将全力表示反对。”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欧洲各国君主更加惶恐了，他们决定采取断然的步骤去对付法国革命。1793年2月，“反法同盟”成立了，其目的就是用欧洲国家的联合力量镇压法国革命，恢复法国的封建统治，以稳定欧洲的封建秩序。参加反法同盟的除普、奥两国外，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撒丁尼亚、那不勒斯和英国。英国是反法同盟中唯一的资产阶级国家，它之所以参加，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英国资产阶级想借欧洲封建诸国反法战争的机会，趁火打劫，破坏法国海外贸易，吞并法国海外殖民地和打击法国在海上称霸的意志。第二，法国革命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法国人民的革命行动，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极大恐惧，他们害怕英国人民在法国的影响下，起来推翻自己的统治。

第三，法军占领比利时，直接威胁英国本土。俄国之所以没有参加反法同盟，并不是因为它不想干涉法国革命，而是因为它想趁欧洲其他国家为了镇压法国革命而无暇东顾的机会，瓜分波兰的领土，以建立沙俄在东欧的霸权。沙俄虽然没有参加反法同盟，但是它却起了煽动欧洲封建国家干涉法国革命的极其恶劣的作用，它特别怂恿普、奥去反对法国革命。

反法同盟结成后不久，欧洲封建联军就大举反攻，法军步步败退。到1793年3月底，法军退出了整个比利时，数日后，莱茵河左岸的法军亦遭到同样的命运，到4月初，法国东北国境外只剩下一个被围的美因兹。于是法国又面临外国干涉的威胁。法军之如此迅速败退，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在吉伦特派将军杜穆里埃的包庇下，军需承包人肆意舞弊，以致士兵的衣服饮食都很坏，结果有许多义勇军离开战场回家。在1792年12月1日，法军约有40万人，到翌年2月1日，只剩下22.8万人了。过去法军之所以能够胜利，其原因之一便是军队数目超过了敌人。而现在则大大少于敌人。第二，过去法军之所以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及占领邻国大片土地，也是因为当地居民的支持及合作。但是，法国占领军的搜刮、征发及强迫居民提供力役的政策，引起当地居民的很大不满甚至反抗。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法军的弱点。第三，法国方面，政府与军事统帅之间矛盾重重，分歧很大。同时，法军分为正规军与义勇军，义勇军得到比正规军较高的待遇，以致造成二者的不和。

在前线危急的同时，法国国内又爆发了反革命叛乱，这是被推翻的封建贵族和天主教僧侣一手制造的。他们的目的便是配合反法同盟的攻势，从内部瓦解革命，以便达到扑灭革命的目的。规模最大的便是1793年3月10日在万第省发生的反革命叛乱。规模之所以很大，是因为有人数众多的农民在天主教僧侣的引诱下参加了叛乱。农民之所以参加反革命叛乱，主要是因为：第一，革命爆发以来，不但立宪派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吉伦特派亦是如此，以致农民对资产阶级政府大失所望，不满已达极点。第二，法国农民绝大多数信仰天主教，因而很容易接受天主教僧侣的煽动和蒙蔽。

总之，当时法国革命在国内外敌人同时进攻下有被扑灭的危险。

在国内外敌人步步进逼的情况下，雅各宾派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1793年3月10日，在丹敦的推动和建议下，组织了非常法庭，以与反革命叛乱分子作斗争。4月6日，国民大会在雅各宾派的压力下，解除了执行委员会领导战争的职务，而另成立公安委员会，由它负责领导战争。公安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虽然是吉伦特派分子，但是领导人却是雅各宾派丹敦。国民大会在雅各宾派的建议下，在4月6日又派13名代表分别到11个军团中去，他们

英国急进派庆祝法国革命的胜利，并且派代表团到法国，向法国国民大会递交祝贺信。国民大会主席格累瓜尔在答谢中说道：“皮姆、汉普登及席德尼诸人的影子在你们头上荡漾着，无疑地不久就会有一天法国人也会到大不列颠的国民大会来祝贺！”

的职权是监督军队的供应及作战。5月20日，为了筹措军饷，在雅各宾派的推动下，国民大会通过了关于向富人征借10亿利弗尔的债务的决议。

与雅各宾派相反，吉伦特派不是积极领导抗战及组织防御工作，而是把全副力量用于镇压人民运动。吉伦特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杜穆里埃将军在1793年3月末竟公然叛国投降奥军，并且企图勾结外国军队打回巴黎，镇压雅各宾派领导下的人民运动。

在巴黎，吉伦特派也向人民发动攻势。国民大会中的吉伦特派在4月13日曾下令逮捕马拉，把他送交法庭审判，但是巴黎公社、巴黎许多区和外省的雅各宾俱乐部都起来声援他。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法庭终于在4月24日把马拉开释了。在马拉获释后，群众把花冠给他戴上，把他抬在肩上送他回到国民大会。

吉伦特派知道巴黎公社是巴黎下层人民势力的重要堡垒，所以又决定打击巴黎公社。5月18日，在吉伦特派分子巴雷的建议下，国民大会组织了一个12人委员会，来负责调查巴黎公社的活动。12名委员全部是吉伦特派分子，他们在5月24日下令逮捕巴黎公社的副检察长阿贝尔。

在外省，吉伦特派也很猖狂，他们为了与人民为敌，竟在5月底与反革命贵族勾结在一起，在里昂发动反革命政变，杀死了几百个雅各宾派分子。在土伦、马赛他们也举行暴动。正当外敌入侵法国之际，吉伦特派的这些行动在实际上就是帮助了外国入侵者。

在这个情况下，法国人民再也无法容忍吉伦特派的统治了。为了挽救革命，必须推翻吉伦特派。早在1793年3月，忿激派就提出把吉伦特派逐出国民大会的口号。雅各宾派当时还不想侵害他们的代表权。但是现在吉伦特派的罪恶及危害作用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因此他们就决定用武装起义去推翻吉伦特派。

5月26日晚上，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出了举行暴动的号召，他说：“当人民被压迫时，当人民惟有自己可恃之时，还不愿鼓动人民起来的人便是懦夫。当一切法律已被破坏，专制达到极点，善意与廉耻被人践踏不堪之时，人民便应该起来暴动。现在这时机已到了。”5月27日，马拉也表示同意暴动。5月29日，巴黎的33个区代表集会于主教宫，会上决定组织秘密暴动委员会（九人）。5月30日，暴动委员会会议决于次日清晨以鸣钟为信号举行暴动。

5月31日晨，警钟响起来之后，在雅各宾派控制下的33个区的代表来到巴黎公社。但是，这一个白天过得很平静。到下午5时，巴黎群众代表挤满了国民大会大厅，他们向国民大会提出下面要求：逮捕12人委员会的委员，把22名吉伦特派代表送交法庭审判，逮捕嫌疑分子、清洗政府机关，选举权只送给穷人，向富人征税，面包价格规定为每磅3苏，向老年人、残废者和战士亲属发放救济金，贵族之任陆军高级军官者撤职。但是，国民大会只同意取消12人委员会。这样，5月31日的运动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当

天晚上，华尔列批评巴黎公社的肖美特和多布松太软弱。6月2日，传来了关于里昂吉伦特派分子屠杀了八百多个雅各宾派分子的消息。激于义愤的巴黎群众很快地就武装起来（达8万人），他们携带大炮，包围了国民大会。他们要求立即逮捕22名吉伦特派代表及12名委员会委员。当国民大会在犹豫的时候，武装群众准备开炮，于是国民大会乃不得不开除29名吉伦特派分子。（其中有12名委员会中的10名成员）。于是，国民大会落到雅各宾派控制之下，吉伦特派的统治被推翻了。

第四节 雅各宾专政——革命第三阶段

（一）雅各宾政府的土地法与 1793 年宪法

1793 年 6 月初雅各宾派刚刚开始执政时，法国情势十分危急。与法国革命为敌的欧洲反法联军正在从四面八方进犯法国，并且开始踏上法国国土。在东北部有普、奥联军入侵，在北部有英国海军包围敦刻尔克港，在西南方有西班牙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入境，在东南则有意大利的撒丁尼亚军队进逼。在 6 月 2 日革命后，英国宣布封锁法国所有港口，没收运送粮食驶往法国的中立国船只，目的在于饿死法国人。1793 年 5 月法国军队总数只有 397,000 人，他们缺乏枪械、装备、弹药及粮食，显然法国无力抵抗入侵的敌人。

国内敌人的来势也很凶猛。从巴黎逃出去的吉伦特派分子一个个都和保王党人勾结在一起，参加了叛乱。吉伦特派分子还制造白色恐怖，到处屠杀雅各宾派分子。他们特别仇恨马拉，7 月 13 日派女刺客夏绿蒂·科黛刺杀了马拉。反革命叛乱从万第省迅速发展到其他省份，全国 83 省中，只有 23 省继续效忠于国民大会。反革命叛乱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的援助有关系。到处有外国间谍和破坏分子在活动。

当时，在国内外敌人的夹攻下，法国革命大有夭折的危险。但是，领导革命的雅各宾派并没有被来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更没有向敌人屈服，也没有在瞬息万变纷乱如麻的局势面前惊慌失措，相反地他们坚决地、沉着地应付一切，一方面调动一切力量予国内外敌人以迎头痛击，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团结人民。

雅各宾党人知道：土地问题是革命中的首要问题，是占法国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农民所最关心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能调动广大农民参加保卫法国的战争。同时，他们也很了解法国人民是不满 1791 年宪法的，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颁布一部法国人民所欢迎的民主宪法。因此，雅各宾派上台后不久，就着手逐步朝着民主方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且颁布了一部民主主义宪法。

1793 年 6 月 3 日，即雅各宾派上台后第二天，国民大会就颁布了第一道土地法令，它规定已经没收的逃亡贵族的土地及王室、教会的土地，均分成小块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允许他们在十年内分期付款。同年 9 月 13 日国民大会又公布法律，对于无地的公民买地者予以一定的优待，他们可以从被没收的逃亡贵族的土地中买得价值 500 利弗尔的土地，在 20 年内分期付款，不收利息。结果，在法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在东部一带，确实有不少贫农买到土地。

雅各宾派之决定用民主方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是为了借此稳住可能被引诱而跟随吉伦特派参加各省叛乱的农民。

1793年6月10日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在最近200年内被地主贵族从农村公社夺走的一切公地，一概退还农村公社，如果农村公社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要求分配土地，则将这些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分配的时候，不分性别年龄及分配时本人是否在场，或暂时外出，凡在本公社住满一年的，都可以分到一份。所分得的土地在十年内不得因债务而被没收。在万第等省，由于农民为反革命分子所欺骗而对革命抱敌视态度，他们没有分到公共土地，这些土地仍为地主所有。但是在法国北部、南部和东部，农民在1795年都分到农村公社的土地。有数十万小农变成小土地所有者。

1793年7月17日国民大会颁布的土地法宣布：全部和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这一法令，是在罗伯斯庇尔等人的领导下，经过与国民大会的代表以及农业、商业及封建权利委员会的成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制定的。依照这一法令，凡属领主在过去向农民所征收的一切地租，即根据封建权利而产生的代役租，无论是常规的，还是临时的，都应无代价地取消。与封建权利有关的一切文契，均应在三个月内全部销毁，凡私藏这些文契者，判处五年苦役。

这样，在立宪派和吉伦特派手中迟迟未得解决的法国农民土地问题，终于在雅各宾派手中解决了。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的作用在于：第一，把农民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从而消灭了农民贫困的根源，这对于扩大法国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促进法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地起了巨大的作用。第二，法国农民从此以后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是基本上由农民组成的法国军队在抗击反法联军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团结人民，雅各宾派政府又在1793年6月24日通过一部新宪法。这部新宪法的基本原则是罗伯斯庇尔自己确定的。1793年4月24日及5月10日在国民大会的发言中，他就宪法原则作了如下的表述：实现人民的平等权利及保证人民参加政权。他相信：只有民主共和国，才是最好的统治形式。

在他草拟的宪法草稿中，他本来写进了一系列条款去限制财产权，这表明他是希望实现一定程度的财产平等的原则的。但是在最后定稿时，他又把这些限制财产权的条款删掉了，这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可能他不愿意使有产阶级反对雅各宾政府。

在宪法的前面附有《人权宣言》，这个《人权宣言》比1789年的《人权宣言》前进了一大步。它一开始就宣布“社会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宣言肯定人民享有劳动权、被救济的权利及受教育的权利。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平等、自由、安全与财产的权利。政府应该保障人民的出版、言论、集会及信仰的自由。它还宣布自由并不意味着自由地侵犯他人权利，人的行为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准则。宣言也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主张“一切公民都同样有资格担任公共职务”，有“协助制定法律和选举代表或公务员的平等权利”。最后，它郑

重地表示假如政府压迫人民或侵犯人民权利，人民就有反抗压迫及起义的权利。

宪法本文中具体规定了国家组织机构：立法会议是最高立法机构，一年选举一次，办法是直接选举，凡年满 21 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立法会议的一切立法都必须由选民在基层大会上批准。行政权属于执行会议，由 24 人组成，其产生办法是：每省以普选方式选出候选人一人，立法会议再从候选人中选出执行会议的成员。每年改选执行会议的半数。执行会议负责指导并监督全部行政事务。执行会议应在其成员之外任命共和国的全部行政长官。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平等、自由、安全、信仰自由、普通教育、公共救助、无限的出版自由、请愿权以及结社等权利。宪法还尊重老年，并以孝行为美德。

这样，1793 年的宪法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民主的宪法。不过，它保护了私有财产，因而它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但是，这部宪法并未付诸实施，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当时法国正面临着国内外敌人大举进攻，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如果实行广泛的民主，只能有利于敌人，而有害于革命。为了对付革命的敌人，必须有铁一般的手腕，统一而坚定的意志，强大而集中的管理，一句话，必须实行革命的民主专政。

（二）革命民主专政。革命恐怖

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从 1793 年 7 月起至 9 月止，革命民主专政体制逐步确立。在 7 月，国民大会的权力就已经开始强化了。它不但有最高的立法大权，而且也掌管行政大权，它所制定的法律由其下面的公安委员会执行。公安委员会成立于 1793 年 4 月 6 日，但是到 7 月 10 日就由国民大会把它改选，丹敦由于倾向于与吉伦特派妥协而被免职，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圣·鞠斯特和古东等人当选为委员。7 月 27 日，罗伯斯庇尔本人也参加了公安委员会，并且领导了它。公安委员会从属于国民大会，向它负责，可以说是国民大会下面的办事机关，掌握了军事、外交及行政大权，也有权发命令逮捕人。公安委员会的命令由国民大会的特派员执行，这些特派员都是国民大会的代表，有的人本身就是公安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被派赴各地，前方及后方，传达中央的方针及指示，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及组织人民抗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公安委员会下面有社会保安委员会，它负责警察工作，与内部反革命作斗争。

革命政府的支柱及左右手，除了巴黎公社及巴黎各区公所外，还有革命委员会、雅各宾俱乐部、各地的公社及人民协会。革命委员会遍于各地，它们是群众广泛参加国家工作及政治斗争的组织形式，它们是由各地的公社选出，专门对付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在革命专政中起了重大作用。雅各宾俱乐部有三千多个支部，分布于各地。它们有严格的章程，经常清洗自己的队伍，

开除嫌疑分子及投机分子。在俱乐部里，会员都是平等的，没有将军、部长、特派员之分。各地的公社都掌握在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及民主知识分子手中。人民协会是群众的政治教育的中心，在这里讨论一切重大政治问题。

在这些机关团体的帮助下，国民大会的命令及法令可以下达到全国各个角落，并且迅速地被执行。因此，法国中央集权到雅各宾专政时期达到空前彻底的地步。

雅各宾专政实际上把革命恐怖及打击敌人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这样做是出于客观的需要，因为当时法国革命正处在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为了粉碎革命敌人的猖狂进攻，只能诉诸革命恐怖。这样做也是人民群众施加压力的结果。巴黎群众的代言人俾约-瓦棱在9月初就提议政府逮捕嫌疑分子。国民大会在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标志着革命恐怖的开始。罪大恶极的王后玛丽·安东尼特被送交法庭受审，以勾通外国制造反革命叛乱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10月16日）。在6月2日革命中被逮捕的吉伦特派首领21人也在10月31日被押赴刑场处决，其中有布里索、微尼奥及焯赫一时的罗兰夫人。她的丈夫听到她被处死，便自杀了。

毋庸讳言，雅各宾派在施行革命恐怖的时候，在一些场合不必要地把恐怖扩大化了，杀人也过多了。根据“惩治嫌疑犯条例”，被列入“嫌疑犯”的不仅有王党分子及反革命分子，而且也有“冷淡而畏葸的人”，其中包括“并无其他过错而只是未能履行选举职责的人民在内”。这就扩大了打击面。更严重的是杀人过多。隆山、科洛·得巴及傅歇等人在镇压里昂反革命叛乱之际，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了好多人。他们嫌用断头机杀人太慢，而辅之以炮轰和集体枪杀。卡利叶在南特活活溺杀了两千多名叛乱的参加者。卡利叶有一次不经审判就下令处死两批人：第一批处死的24名中有两名年仅13岁，另两名年仅14岁。

雅各宾政府也用恐怖手段去推行社会经济措施：无情地打击奸商、投机商及囤积居奇者。这些果断措施也是在人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实行的。

当时法国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物价不断上涨，商人的投机活动极为猖獗。5月4日的限价法令，形同具文，因为奸商并不把它放在眼里，他们照旧任意抬高粮价，甚至囤积不卖，以致市场上粮食奇缺。

1793年6月25日，扎克·卢向国民大会提出请愿书，严厉谴责奸商，说他们是“自私自利者和骗子”。他指出：“当一个阶级可以毫无顾忌地饿死另一个阶级时，自由不过是空虚的幻想；当富人用垄断对其同类操生杀大权时，平等不过是空虚的幻想。”到7月下旬，巴黎粮食更缺，因为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各省的叛乱，断绝了对于巴黎的粮食供应。市面上时常发生骚乱，形势异常严重。因此，国民大会不能不在7月27日通过一项严禁囤积的法令，它规定：凡是藏有货物者，都要在一个星期内把所藏货物的数量报告市政机关，市政机关得派经济检查员核实报告的真伪，并监视商品的出售。商人不报告或报告不实者，一经查出，即处以死刑，其财产予以没收。

而包庇罪犯的官吏，亦一律处以死刑。对于告密者，将被没收的货物的三分之一送给他作为奖励。

到 1793 年 8 月底，由于天旱水浅磨房停工之故，又发生粮食恐慌。巴黎公社的阿贝尔加紧进行煽动，他不仅攻击粮食囤积者，而且攻击整个商人。这时正值各省叛乱的消息不断传来。9 月 2 日，传来了关于英军在 8 月 26 日占领土伦的消息。这些消息好像火上浇油，巴黎人民的愤怒再也按捺不住了。9 月 5 日，巴黎的手工工场工人、建筑工人、石匠及铜匠等等，在肖美特、阿贝尔的领导下，举行示威，示威者的旗帜上写着：“向暴君宣战！”“向贵族宣战！”“向囤积者宣战！”群众要求实行全面限价，要求用恐怖政策对待奸商，特别要求组织“革命军”到农村去监督征粮工作，他们高呼：“断头台应该跟着这个军队走。”

这次示威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当天国民大会就颁布了建立革命军的法令。革命军组织起来后，人数达 7000 人，其任务是到农村向地主、富农征发余粮，并且有权搜查粮食，对于隐匿粮食者，予以逮捕。国民大会又在 9 月 29 日颁布了全面限价法，为一切商品特别是日常必需品都规定了最高价格。最高价格的计算方法是：按 1790 年的售价提高三分之一，再加上运费和利润。如有违反限价的，对于买卖双方都要课以罚款，以奖给告发者，罚款数为违法出售价格的二倍，被罚者的姓名，须登记于嫌疑犯名册，送革命法庭惩处。情节严重的，处以死刑。但是同时，国民大会也对工人工资规定了最高限度，按 1790 年的工资提高 50%。

10 月间，国民大会又成立中央粮食和供应委员会，它握有管理经济的大权，有权征发粮食及处理粮食。巴黎公社在肖美特的领导下，把巴黎全市的粮食都放到政府的控制之下，派专员到处搜查藏匿的粮食。巴黎实行面包配给制，发给每个人面包证，凭证购买面包。其他城市也模仿巴黎的榜样。

这些措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在保证军需民食及消灭饥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必须指出：在与奸商的投机牟利及囤积居奇的行为作斗争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过火的倾向。比如在巴黎，挨户搜查囤积居奇的人员，往往把居民家中仅有的少量粮食都没收了。有一次，马拉区的检查员杜克罗格在一位有七口人要养活的公民家里发现 36 个鸡蛋，于是他立即把这些鸡蛋全部没收，然后分给 36 个市民。掌握革命军的阿贝尔派分子不但要求镇压投机商人及囤积居奇分子，而且也主张镇压一般奉公守法的商人，甚至街头小贩也不放过。阿贝尔本人在《杜先老爹报》上写道：“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我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商人。……我发现小商店也和大商店一样坏。”这样就把恐怖扩大到普通人民身上。1794 年 2 月 23 日，阿贝尔建议派革命军带断头机到农村去，以解决粮食缺乏问题，他号召用这个办法去改变“农村居民”的贪馋心。傅歇在执行征发粮食政策时，曾下令：不服从征发令的农民，要在公众场所被示众，在身上挂标明“人民饥荒制造者，国家

的叛逆”的牌子，倘若再犯，就把他拘留到和平时为止，除为其本人及家属所最必需的以外，其余财产一律没收。傅歇得意地表示：“在这里，谁也觉得富有是可耻。”这样，雅各宾专政政府不但大搞平均主义，而且把平均主义发展到荒谬的地步。这些过火的举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不过总的说来，雅各宾专政对反革命及奸商实行恐怖是应该肯定的。它把政治恐怖和经济恐怖结合在一起，因而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不但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奸商的罪恶活动，对于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组织战争

为了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进攻，雅各宾派还以非凡的革命毅力从事以下几项重大工作。

第一，组织人力。1793年8月23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全国总动员法令，法令写道：“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法国全体人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青年人则去打仗，已婚男子则制造武器和运送粮食；妇女则制作帐篷、衣服和服务于医院，儿童则将旧布改成绷带；老年人则到广场鼓舞战士们的勇气，宣传仇恨国王并为共和国呼吁统一”。这个法令发布后，受到举国上下热烈拥护，因此在短期内就募集到42万军队。

同时，雅各宾政府也对于法国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公安委员会把正规军和志愿军合并，统一了待遇。这就减少了摩擦，提高了战斗力。同时也更换了军官的结构，凡贵族出身或不受士兵信赖者，一律罢免，从士兵及中下层军官中简拔人材，把他们提到指挥岗位上来。如拉沙尔·欧什在1792年还是一个普通士兵，到1793年就被擢升为司令官。皮西格鲁原来也是普通一兵，到1793年也当上了将军。在军队中还实行公开批评缺点的办法。这个改革，收效很大，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第二，组织生产。革命政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发展生产。数万妇女日夜为前线士兵缝制军服和军鞋。大批科学家在政府的号召下，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都贡献给军火的研制工作，他们攻破了军火生产上的许多技术难关。由于科学家及工人的努力，法国迅速建立了许多军火工厂，赶制了大批枪炮弹药。在一年内就造出大炮1.3万门。枪枝的产量比战前增长四倍。

革命政府也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因为它认识到保证粮食供应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先决条件。在这里，雅各宾派也非常重视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农学家们试种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对法国农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革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终于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前线的捷报频频传来。1793年8月，马赛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了；9月底，万第省的反革命叛乱被平定了；10月初，吉伦特派的反革命叛乱的南方堡垒——里昂也被政府军攻下来了。10月、11月，又相继平息了其他省份的叛乱。国民大会的权力

在大多数省份恢复了。反革命势力虽然没有全部扫荡干净，但是他们已经无力公开活动而转到地下去了。

在抗击反法联军入侵的战斗中，也迭次取得胜利。法军在 1793 年 10 月里曾两度打败奥军，一次是在敦刻尔克附近，另一次是在瓦提尼（在法比边境上）。11 月底，公安委员会又派军队攻打陷入英军手中的土伦，12 月 18 日英军终于逃离了土伦。西班牙入侵军及意大利入侵军也都先后被打退了。1793 年年底，法国境内的敌军已被肃清了，于是，战争就转移到敌人领土上去。1794 年 6 月 26 日，在弗勒吕斯附近的激烈战役中，法军在朱尔旦将军的指挥下，予反法联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次战役中，法军还第一次使用了气球，这在敌军中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弗勒吕斯大捷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为法国军队开辟了通往比利时、荷兰及莱茵省的道路。

法国以一个国家的力量，竟能打退欧洲许多国家的联合进攻，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雅各宾派革命家有保卫法国革命的决心，目标明确，态度坚决，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决不半途而废，从不动摇。

第二，这些革命家能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从而能够发挥人民的潜在力量。

第三，法国军队的成分，也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法国军队主要是由刚刚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的农民组成的。农民为了保卫革命的果实而战，这便是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力量的源泉。

第四，采用新的人民战术，也是法国战胜敌人的原因之一。法军采用了灵活的散兵与密集的纵队相结合的战术，这比北美独立战争中的单纯的散兵战进了一步。法军采用了这种人民战术，有力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军队。当时欧洲反法联军的士兵多半是由被迫参军的农奴及雇佣兵组成的，因此士气低落。而且，这些军队都墨守成规，采用老一套的战术，缺乏机动灵活性，在进攻时，把部队沿战线排成几条长长的直线，而且还带有笨重的辎重队。

（四）雅各宾专政内部的斗争

雅各宾专政内部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最初，这个斗争主要表现为雅各宾派领导集团与忿激派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在 6 月 2 日革命后不久就开始了。斗争的焦点在于：雅各宾派认为革命的任务是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而忿激派则认为革命的任务不仅是实现政治民主，而且是实现经济上的平等。早在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时，忿激派就批评了它，说它对于向人民所许诺的幸福没有予以任何保证：“在宪法的哪一条中我们找到了对于囤积居奇的谴责？假如人们中间还有一个阶级能迫使另一个阶级陷于饥饿，那末这是什么自由呢？假如富人依靠其垄断而享有生杀予夺之权，那末这是什么平等呢？自由、平等、共和国——在现在只是空话罢了。”雅各宾派领袖不仅决

定打击忿激派，而且还采取了阴险的策略，在采纳了忿激派的要求（如实行限价及打击投机活动等）的同时，用全力镇压它。1793年9月5日，公安委员会罗织了扎克·卢的罪名（如诬蔑他是英国的奸细，又说他是盗窃）把他逮捕。不久，忿激派的其他领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1794年2月，扎克·卢在狱中自杀。这样，在雅各宾专政初期，忿激派就被消灭了。

忿激派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历史作用是不能抹煞的：第一，它是6月2日革命的战斗力量；第二，它对于雅各宾政府的有利于人民的社会经济措施起了推动的作用。

1793年下半年，尽管忿激派遭到镇压，革命阵营内部在基本上保持了团结，这是因为革命政府在社会经济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且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也加强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同仇敌忾。

但是到1793年末，特别是到1794年初，国内外敌人基本上被消灭或击退，于是革命内部的斗争才扩大化：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反对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领导集团的左、右两派，在这些派别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第一，右派或丹敦派。雅各宾政府只是在分配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活动，而没有触动私有财产本身，也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也就没有削弱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而且，尽管革命政府采取一系列限制资产阶级活动的社会经济措施，但是许多狡黠的商人利用战争的混乱而逃避政府的限制，他们照旧从事投机，而大发战争财。商人、工业家及富农一般地把商品藏匿起来，在黑市上以高价出卖，甚至大规模地进行国有财产的投机（贱买贵卖），对于供应不足的商品进行投机。商人在军事供应上也赚取了高额利润。

在革命政府人员中利用职权从事投机者，亦大有人在，他们一个个变成大腹便便的富翁。这些因革命而发财的一部分政府人员逐渐地形成一个派别，这就是丹敦派。这是雅各宾专政内部的右派，它代表了利用战争而发财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实行“温和宽大”政策，要求放松革命专政，反对革命恐怖政策，公开鼓吹“要爱惜人类的血”。他们反对限价政策，反对制裁投机商人。丹敦本人就是一个贪财好利的人，1789年他一无所有，但是革命后就变为一个富翁，所以他之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不足为奇的。

第二，左派。虽然雅各宾政府实行限价及其他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障劳动人民的最低生活，但是实际效果与主观愿望还有很大的距离。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好转。一方面限价遭到商人的破坏，另一方面工人的工资却因受限制而不能上涨。因此，下层群众继续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改善自己的状况。这些要求的表达者便是左派。1793年末，左派又发生分裂，它分裂为肖美特派和阿贝尔派。分裂的原因在于：肖美特派支持雅各宾领导集团，而阿贝尔派则反对雅各宾领导集团，要求推翻它。但是更为深刻的原因

是：肖美特派真正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有其自己的社会改造纲领，而阿贝尔派则是一群没有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为了夺取政权不择手段。肖美特派主张把工厂主遗留下来的手工工场归国家所有，要求国家剥夺不服从最高限价法律的商人的财产。肖美特是当时第一个看出这次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剥削代替了封建主剥削的人。肖美特派的根据地是巴黎公社。巴黎各区的劳动人民是跟他们走的。

阿贝尔则没有一贯的社会理想，他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为了博得人民的拥护，有时利用忿激派的口号，有时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以图蛊惑人心。比如，他们主张实行极端恐怖政策并且执行这样的政策。在社会经济方面，他们要求极端平均主义。此外，他们推行宗教上的冒险主义，主张立即消灭宗教信仰，认为这样做才算是彻底革命。他们强迫国民大会下令“信仰理性以代替天主教”。因之在许多地区教堂被封闭，或改为理性教堂。傅歇在推行这个反基督教运动方面表现得最为积极。他征发圣器解送巴黎。他颁布了坟墓世俗化的命令，规定：每座坟墓前面都要树立一个石碑，上面必须写：“死是永久的睡眠”。这种极端做法很不得人心。因为当时法国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都是笃信天主教的虔诚信徒，反基督教运动很自然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感。无怪乎农民中有许多人在反革命教士的欺骗下参加了反革命叛乱。阿贝尔派的宗教上的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些派别之间，到 1794 年春天就开始了尖锐的斗争：丹敦派攻击阿贝尔派的极端恐怖主义，阿贝尔派则攻击丹敦派的宽容主义。同时这两派也攻击雅各宾领导集团，丹敦派反对罗伯斯庇尔派所推行的打击奸商的恐怖政策，阿贝尔派则攻击雅各宾领导集团的恐怖政策实行得不彻底。1794 年 3 月 4 日，阿贝尔派企图在巴黎发动暴动推翻雅各宾派政府，但是巴黎公社及巴黎各区公所都不支持他们。阿贝尔请求肖美特支持自己，肖美特不仅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谴责了他想发动的暴动。结果，阿贝尔派的暴动计划流产了。不几天后，阿贝尔、隆山等人被逮捕了，3 月 24 日被送上断头台。政府还解散了革命军，因为革命军是阿贝尔派执行极端恐怖的工具。

阿贝尔派之所以没有得到巴黎群众的支持，也是因为这一年 2 月国民大会颁布了有利于人民的风月法令。这个法令是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圣·鞠斯特提出的，法令规定：没收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把它们无代价地分给穷人。尽管这个法令由于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阻挠怠工而没有被认真执行，但是这个法令本身提高了雅各宾领导集团在巴黎下层人民中间的威信。

雅各宾领导集团之所以提出风月法令，是与他们的社会思想一致的，因为罗伯斯庇尔等人是卢梭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穷人。同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与阿贝尔派斗争的一种策略，企图借此把巴黎群众从阿贝尔派那里拉过来。

在镇压阿贝尔派之后，政府又逮捕了肖美特，并且在 4 月 10 日以“对

抗国民大会”的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巴黎公社也被改组，罗伯斯庇尔的心腹被安插在公社机关，以代替肖美特派分子。

在阿贝尔派及肖美特派遭到镇压之后，丹敦派曾企图发动一个政变以推翻罗伯斯庇尔派，但是在发动政变之前他们就被逮捕了，4月5日被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镇压这三个派别，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一，镇压丹敦派加深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加强了资产阶级推翻雅各宾派政府的决心。第二，镇压阿贝尔派引起一部分巴黎劳动人民的不满，因为尽管阿贝尔派是一群野心家，但是他们在贫民中间仍有不少的追随者，在他们眼中，阿贝尔派象征着革命。第三，镇压肖美特派在巴黎劳动人民中间引起了更多的人的不满，因为肖美特派是下层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总之，消灭肖美特派和阿贝尔派，意味着雅各宾派与人民建立的联盟开始破裂，大大缩小了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

忿激派和肖美特派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平民运动的重要表现，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就其阶级成分来论，主要有工资劳动者、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店员，还有一些艺术家、音乐家及教师；其中虽然也混进一些不务正业的人，但是究竟是少数。

平民运动之所以不免失败，是因为：第一，它的成分复杂，要求亦不一，因而造成内部不团结。第二，平民中间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去当兵和参加国家机构，从而群众运动落到政府控制下面。第三，当时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客观的历史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把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的任务还远远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平民运动只能在客观上帮助资产阶级破坏旧的封建社会秩序。

（五）热月政变

如上所述，雅各宾专政在革命恐怖、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宗教问题上在不同程度上犯了极左的错误。出现这些错误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在革命群众运动中混进了少数政治野心家，如阿贝尔派。他们有强烈的权力欲，为了煽惑人心而不得不装出一付极左的面孔来，唱出各种高调。许多过火的事情就是他们干出来的。第二，雅各宾专政时期权力高度集中，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的国民大会是全欧洲最强有力的政府，它集中立法、行政及司法大权。建立这样的国家体制，是为了应付紧迫的需要，它在组织、领导抗战及粉碎内部反革命叛乱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因为权力这样高度集中的体制，很容易导致国家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及各级政府人员的滥用权力。过左的偏差及过火的行动出现的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面，反面意见及不同的意见无法反映到各级领导机构中去，从而政策中的偏差及流弊就得不到防止和纠正的机

会。

但是，雅各宾专政在法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第一，它从反革命国内外的夹攻中拯救了革命；第二，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并且为法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民主和自由。

雅各宾专政固然在法国革命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然而到 1794 年春天以后，雅各宾派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就为专政的覆灭铺平了道路。

第一，本来镇压肖美特派及阿贝尔派已经使法国劳动人民开始与雅各宾政府离心离德了。在镇压这两派之后，雅各宾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又进一步恶化了它与巴黎人民的关系。首先，放宽取缔投机的法律，原来对投机商的惩罚只有一个办法——死刑，现在取消死刑了。因此，投机活动又猖獗起来。其次，提高了限价的标准，在巴黎及其他城市，一切商品的法定价格都提高了。但同时，工人工资却没有相应地提高。不仅没有提高，而且 1794 年 7 月 23 日巴黎公社颁布新的法令，又降低了巴黎工人的工资最高限额。城市劳动人民为此颇为不满。对农民，雅各宾政府也实行极不得人心的政策。它颁布一道法令，要求农民把收获物的数量上报给政府，以备政府随时征用。于是农民也不满了。这样，雅各宾政府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使自己陷于孤立。

第二，雅各宾派在 1793 年秋冬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加强对敌人的专政及实行革命恐怖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恐怖，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但是到 1794 年春，国内外敌人对革命的威胁已经解除，革命已经安然无恙了，而雅各宾派领导人不但不取消恐怖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恐怖。这种恐怖不但施于不同政见者，而且也扩大到劳动人民身上。恐怖不是用来保卫革命，而是用来维持雅各宾派领导集团的统治地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罗伯斯庇尔说来，“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恐怖政策发展到极点，便是 1794 年 6 月 10 日通过的关于改组革命法庭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审判的程序大大简化，不但取消了预审制，而且在物证不足时，法庭可以按“意识上的根据”作出判决。法律还规定：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所有企图使用暴力或使用阴谋来破坏自由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而这样的阴谋分子不准许有辩护人。而且按照这个法律，惩罚罪犯的办法一律定为死刑。这个法律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古东提出来的，其用意是剪除一切反对罗伯斯庇尔派的人，以图巩固自己的统治。从 6 月 10 日起至热月政变时为止的仅仅一个半月内，就处死 2285 人，平均每周处死 326 人。每天将近有 50 人被送上断头台。加在被处死者身上的罪名一般都是“共和国的敌人”、“自由的敌人”、“祖国的敌人”等等。任何人，只要被扣上这样的“帽子”，就休想活命。这就弄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恐怖气氛笼罩全国。

实际上，上述情况都是罗伯斯庇尔独断独行所造成的。罗伯斯庇尔的独断独行，又是雅各宾专政的体制所造成的。

总之，一方面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个人专权和滥用恐怖，这就为一心一意想推翻雅各宾专政的政治集团提供了可乘之机。

早在雅各宾专政的初期，法国资产阶级就已经对革命政府以恐怖手段制裁资产阶级的非法活动心怀不满。但是在 1793 年年底以前，他们的不满尚未发展到想推翻雅各宾专政的程度。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上，革命专政内部还是巩固的、团结的，它得到人民的支持，要想推翻它也不那末容易，更何况当时他们还需要这个专政，如果没有这个专政抗击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封建制度就有复辟的可能，而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愿的。但是，等到 1794 年入春以后，情况变了：当时雅各宾派领导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支持，要想推翻它，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在法军迭次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封建复辟的威胁已经解除了，资产阶级不再需要雅各宾专政了。同时，资产阶级对于 1789 年以来的政局多变早就感到厌倦，而对于雅各宾专政下面的变幻莫测的政局更感到不安，他们要求有一个安定的局面，以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基于上面几种原因，资产阶级在 1794 年上半年就下定决心颠覆雅各宾派的统治。他们的政治上的代表就是沼泽派及丹敦派残余分子，而被打倒的、被镇压的吉伦特派及阿贝尔派残余分子也附合了他们。这些派别在 1794 年 4 月末及 5 月初就形成一个反对雅各宾政府的密谋集团。这个集团中的人分布在几乎所有的政权机关内部——国民大会、公安委员会及社会保安委员会。罗伯斯庇尔等人对此已有所觉察。到 6 月中旬，公安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在不同的程度上与这个密谋集团发生联系，在社会保安委员会里面，他们的势力更大。罗伯斯庇尔在 7 月初不得不退出公安委员会。但是他在国民大会、雅各宾俱乐部中还有很高的威信。

1794 年 7 月 26 日（热月 8 日），罗伯斯庇尔开始向这个敌对势力反攻，他在国民大会上公开揭发他们推翻共和国的企图。他要求改组公安委员会及社会保安委员会，要求惩办“共和国的敌人”。当场有人叫他举出他要惩罚的人的名字来，但是他又不明白答复。这就引起了许多代表的疑惧。密谋集团决定抢先下手。他们在当天夜里通宵开会，决定在第二天打击罗伯斯庇尔等人，并且拟出了行动的计划，分配了参加行动的角色。

7 月 27 日，所有代表都出席了国民大会，这是一个闷热的日子，大家都预感到将有暴风雨来临。中午 12 时，圣·鞠斯特走上了讲台，正准备发言指责“敌人的阴谋”，却为密谋集团中的领袖之一俾约-瓦棱阻止住了。接着以俾约·瓦棱为首的密谋分子便公开责难罗伯斯庇尔，说他是专制魔王。罗伯斯庇尔几次走上讲台想发言，都被拦阻了。这时突然社会保安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卢塞提议逮捕罗伯斯庇尔，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在场的全体密谋分子的鼓掌欢迎和赞同。国民大会乃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古东及圣·鞠斯特的决议。于是这些人都当场被逮捕了。

消息传出后，巴黎公社便号召巴黎人民起来拯救雅各宾派领袖。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巴黎各区公所派出武装人员及炮手把罗伯斯庇尔等人从监禁中救出来，一同回到公社。当夜罗伯斯庇尔等人开会决定马上举行武装暴动。但是巴黎群众没有起来响应。而密谋集团却纠集了资产阶级武装队伍，向巴黎公社进攻，结果重新逮捕了罗伯斯庇尔等人。第二天，这几个雅各宾派领导人都被送上断头台。这里顺便指出：巴黎劳动人民之所以在这次政变中袖手旁观，主要是因为他们几个月以来就不满罗伯斯庇尔，特别是7月23日关于降低工资标准的法令，更加深了他们的不满。

雅各宾专政之倾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来，法国一直处在政治动荡、干戈扰攘的机陞不安之中。这种局面之出现，在破坏旧制度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进入1794年以后，破坏旧制度的任务业已完成，建设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而动荡不安的局面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的，因此法国历史的发展要求结束这个局面，而只有推翻雅各宾专政，才能结束这个局面。这样，推翻雅各宾专政，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波澜起伏、曲折复杂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势力的顽抗及他们与英国及欧洲封建君主的勾结，广大人民之一再奋起斗争——这一切呈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雄伟、壮丽的惊心动魄的图景。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并且以自己的革命行动推动了革命前进，影响了革命的立法，争取到一系列民主成果，从而在革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人民群众的推动，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经历了立宪派统治，吉伦特派统治及雅各宾专政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雅各宾专政是革命最深入、最彻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但击败了外国干涉军，平定了反革命叛乱，从而保卫了革命，不但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在农村的统治，用民主方式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而且在对敌斗争中还使用了“平民方式”。因此，法国大革命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下期的美国独立战争。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深入彻底，固然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但是也与下面几个情况有关：首先，在革命前夕，资本主义与封建关系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比英、美革命前更为尖锐的地步；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之间的斗争特别剧烈，法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在封建主的剥削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也特别深重。压迫愈甚，反抗亦愈烈；革命开始后，法国受压迫的城乡广大劳动人民以更大的积极性投入革命斗争，因而革命的彻底是必然的。其次，领导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也比英、美更为成熟，他们长时期受启蒙思想熏陶，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宏伟目标。再者，在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面临的是比英、美革命时更为强大的敌人：贵族僧侣阶级（与英国不同，法国贵族没有分裂出新贵族）与欧洲反法联军勾结在一起共同干涉法国革命。因

此，法国资产阶级便不能不联合人民。资产阶级既然与人民建立联盟，就不能不满足人民的革命要求，实行比较深入的社会经济改革。

诚然，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不过是用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但是，这次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是不容怀疑的，它不仅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它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及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说整个 19 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度过的。因此，马克思称这次法国大革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第六章 1794 年到 1815 年的法国与欧洲。维也纳会议与神圣同盟

1789 年到 1794 年的法国大革命以急风骤雨之势摧毁了法国古老的封建制度。热月政变结束了革命冲击的动荡时期，迎来了巩固革命成果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但是热月党人及督政府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只有在拿破仑统治下，大革命的成果才得到真正的巩固，资本主义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只有通过拿破仑战争的洗礼，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才扩大到欧洲，为 19 世纪上期欧洲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播下种籽。

第一节 热月党和督政府的统治

（一）热月党统治时期的法国内政

发动热月政变及政变后上台的政治集团，史称热月党人。政变后就开始了热月党统治时期。雅各宾专政末期的极端的恐怖政策及其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为热月党人发动政变提供了借口。热月党领袖之一塔里安在政变后不久，曾在国民大会中发言说：“……是继续保持使人人自危的统治好呢，还是基于正义的统治好？革命政府应该作一个完成了革命的政府呢，还是作一个处在革命状态下焦虑不安的政府？……如果要求政府按照战争的方式去行事，那就等于要求我们继续骚动的行为，就等于要我们继续把法国当作一个战场，也就等于要我们用骚扰人民的办法来为人民尽职责。……每步一个陷阱，每室一个警察，家家有叛徒，杀人犯盘踞法庭，全体公民遭受着某些衙门的折磨，整个社会被分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两个阶级，一部分人扩大恐怖，一部分人深感恐怖，这一切就是恐怖统治的手段。难道这适用于一个正常的、自由的、人道的政府吗？”

热月党上台后马上就结束了恐怖政策，从8月5日起就从监狱里放出被雅各宾派监禁的嫌疑犯，仅在头五天内，就释放478人（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不该释放的有罪行的反革命分子）；11月1日还下令发还过去嫌疑犯被没收的财产；12月2日下令赦免同意在一个月内停止叛乱的万第人和硕安人。

但是，热月党人是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派，所以他们上台后便对雅各宾派进行无情的打击，并且消灭了法国人民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所取得的民主成果。它捣毁了雅各宾俱乐部，查封所有的革命俱乐部，禁止人民群众参加政治活动，逮捕和杀害幸存下来的雅各宾派官员和革命者，取消1793年宪法。它还取消了雅各宾专政时期对付投机活动的一切限制，正式取消限价法令。

同时，热月党人对于王党也是毫不容情的，坚决地镇压了王党的反革命叛乱。而且，热月党人对于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财务关系的一切变化，一律加以维护。1795年1月8日，热月党国民大会通过决议，把1月21日处死路易十六的日子定为国家节日之一。可见，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极力维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的。

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秩序，热月党人颇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而且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由于极端分子的偏激主张，文化教育受到忽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但是，热月党执政后，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狄波多在国民大会上提出一个关于教育的报告，并且驳斥了雅各宾专政时期极端分子的说法，他说：“他们（指极端分子）认为知识就是自由的敌人，而科学则是贵族政治；如果他们的统治是足够长久并且放开胆子去干的话，他们就会烧毁图书馆，杀掉所有的学

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无知是教育的敌人，就像贫穷是富裕的敌人一样。”热月党人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如建立国立博物馆，提高师范学校的地位，释放在押的学者，建立公共工程中心学校（后改为综合技术学校），建立工艺学校，在国立图书馆开设初级语言讲座，创办医学学校，设立天文局，恢复常设研究机构等等。在完成这些事情之前，首先恢复了法兰西学院。因此，文化教育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但是，热月党人统治时期，阶级斗争是相当尖锐的。热月党政府取消限价及对投机商的制裁，结果物价（特别是粮价）暴涨，巴黎市郊的工人又陷于饥饿困顿的境地。1795年4月1日和5月20日，巴黎劳动人民前后举行两次起义。起义者不但要求面包，而且还要求实行1793年的宪法。但是两次起义均告失败。在把起义镇压下去之后，热月党政府对起义者进行残酷的报复，白色恐怖一时笼罩全国。热月党政府不但要对付来自左面的人民运动，而且也要对付来自右面的保王党人的叛乱。1795年夏，有数千名王党流亡分子在英国海军的掩护下，在法国的基贝浪半岛登陆，举行反革命叛乱。热月党的国民大会派陆海军封锁了这个半岛，因之叛乱被镇压下去。

（二）督政府的成立。巴贝夫起义

在镇压保王党叛乱后，热月党人感到有必要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以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这部新宪法在制定后，于1795年8月22日被国民大会通过。这是一部完全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宪法。按照这部宪法，法国中央政府实行立法和行政分权的制度，立法权操于立法院手中，而立法院分为下院（500人院）和上院（元老院），下院的职权是提出法律，上院的职权是审议和批准法律。行政权交给督政府，督政府由五人组成，其产生方式是：由下院选出50人，再由上院从其中圈定五人，每年改选一人，每三个月由一人轮流任主席。督政府的职责在于监督法律的执行，并且享有宣战及媾和大权。督政府任命国务员，由国务员执行法律，并且向督政府负责。立法院议员的选举采取初选和复选的两重选举制。选举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在一个地区居住一年以上，纳人口税或土地税的人才具有选举权。只有每年的收入等于150~200天的工资的人，才有复选权。因此，在这个选举制度下，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当选为议员。宪法还规定：立法院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必须是以前为热月党所操纵的国民大会的代表。被选进督政府的五个人都是在土地和粮食等投机事业中发了大财的人。国民大会于1795年10月25日解散，根据新宪法选出的立法院开始工作。11月，以巴拉斯为首的督政府成立了。

热月党人所实行的彻底的经济放任政策，在督政府成立后发生了效果：法国工、农业蒸蒸日上，出现了创办工、商业企业的热潮。资本主义经济畅通无阻地向前发展。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给劳动人民带来贫困和苦难。物价不断上涨，

工人挣来的工资连糊口都维持不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恶化，把他们推上斗争的道路。于是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运动兴起了。

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对剥削制度的罪恶有很深刻的认识。同时，他的求知欲很强，阅读过有关文学、诗歌、科学、历史及哲学的大量书籍。因此他成为一位拥护贫民利益的思想家。但是，最初他是一位空想主义者，相信哲学可以创造“幸福”。到后来他才摆脱了空想，并且在1789年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他主张平分土地。雅各宾派之镇压忿激派，使他厌恶雅各宾派，因而他欢迎热月政变。但是不久他认识到这个估计是错误的，他发现热月党人是人民的真正敌人。此后，他就成为热月党政府的反对者。他办了一个报纸——《人民论坛报》，著文抨击热月党人的统治，因之在1795年2月被逮捕，度了半年多的囹圄生活。在这个期间，他的思想更加成熟了，他了解到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其根本症结在于：社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占有一切的少数人，另一部分人是什么也不占有或几乎什么也没有的大多数人。他认为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是私有财产制度造成的。医治这种症结的唯一办法，便是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共产主义。他提出一个建设共产主义的方案：全国成立一个大的公社，每个法国人都可以当公社社员，富人如果放弃自己的全部财产并且答应把自己的全部劳动都贡献给公社的话，也可以成为社员。公社经济应当由整个社会共同管理，除了老年人及病人外，其余的人一律要参加劳动。社会保证每个人都享有相等的房屋、衣服、取暖设备、食物及医药。大家也都受一样的教育。一言以蔽之，在公社里实行严格的消费上的平等。公社社员的劳动生产品都收藏在公共仓库中，然后进行平均分配。公社也取消货币，这就是说，它取消了商品经济。总之，这个方案的特点，便是它的平均主义。实际上，平均主义是反动的、有害的幻想，是任何时代都行不通的。

为了实现这个方案，他认为必须通过暴力革命，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他确信：“法国革命只是另一次更大更隆重的革命的先声”。巴贝夫不但认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也主张在革命胜利后赋予人民大众以“特殊的权力”，换言之，他主张实行贫民专政，以镇压反动势力的反抗。

他出狱后，便着手于革命的准备工作的。1795年3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平等会，并且在巴黎每一个区都派一个工作人员，在工人中间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巴贝夫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报纸、小册子及传单。不久，平等会的组织不但遍及巴黎，而且也扩展到外省去。1796年5月，巴贝夫正在积极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时候，被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奸细格里泽尔出卖了，根据他的告密，督政府在5月10日逮捕了巴贝夫等领袖。1797年2月开始审判，巴贝夫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勇敢，最高法院判处巴贝夫和一位战友达尔泰死刑，这两个人听到判决后，曾用短剑自杀未遂，5月28日英勇就义。

巴贝夫平等派运动虽然失败了，而且他的平均主义也不足取，但是巴贝

夫的思想在共产主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他不但提出了社会改造方案，而且还发现了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的手段——暴力革命，他把理论与革命行动结合起来了，所以他已经不是乌托邦共产主义者了。第二，巴贝夫已经有了阶级斗争的概念，他指出：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就是贵族同平民，富人同穷人之间的斗争。他也发现创造财富的是劳动人民。第三，他与许多乌托邦主义者不同，他已经知道近代大工业及机器的进步性，但是他认为问题在于大工业及机器为什么人服务。他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最高行政机关应该用机器以及能够减少人的劳动的各种办法来从事民族公社的建设工作”。第四，巴贝夫已经有了革命专政的观念，他主张一旦革命成功，为了粉碎反动势力，必须由劳动人民对他们实行专政。

（三）第二次反法联盟。雾月政变

1794年热月党人上台后，法国仍与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处在战争状态。这时战争已经转移到法国国境以外，但是热月党还是把战争继续下去，因而法国的战争就由防御性的转为侵略性的了。1795年4月，普鲁士被迫订立和约，退出反法联盟。1796年督政府派拿破仑攻打北意大利。1796年4月初拿破仑的大军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直趋撒丁尼亚。法军进展顺利，很快地击溃了撒丁尼亚军队，迫使撒丁尼亚退出反法同盟，并且把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接着法国又打败驻北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攻下米兰，夺取了曼都阿要塞，于是整个北意大利都落到法军占领下。在攻下曼都阿后不久，法军就攻入奥地利本土，1797年10月迫使奥地利求和，奥地利承认法国在北意大利的地位，于是，1793年成立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瓦解了。此后，只有英国继续与法国处在战争状态。1798年春，根据拿破仑的倡议，督政府又决定派他去远征埃及（当时是土耳其的属地），为的是威胁英国到印度去的航路。1798年7月，拿破仑大军在埃及登陆，很快地占领了埃及。不久，法军又向叙利亚推进，但是征服叙利亚的计划失败了，因而拿破仑在1799年6月又返回埃及。

法军在欧洲及北非的胜利进军，引起了欧洲诸国的惊恐，于是以沙皇俄国为首的欧洲诸国又在1798年底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参加者，除俄国外，还有英、奥、西班牙、那不勒斯以及土耳其等国。沙皇在联盟里起了主导作用，并且是攻打法军的急先锋。1799年春，沙皇派俄国军队远征北意大利，俄军迅速地把法军逐出北意大利。

在北线，1799年8月底英国的远征军在荷兰登陆，击败了法军；在东线，奥军也迫近法国国境。

法军在战场上连战连败，与督政府的腐朽统治有莫大的关系。督政府的政客们利欲薰心，在军需供应方面进行惊人的贪污，以致前线士兵的供应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二次反法同盟军的胜利及其逼近法国国境，意味着法国又面临封建复辟的危险。因为这次反法同盟的目的还是帮助恢复法国被推翻的王朝的封建统治。沙皇保罗一世给柯尔萨可夫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信里写道：同盟的目的，是消除法国在欧洲的一切侵略和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政体。

在反法同盟大军压境的同时，法国国内是人民运动与保王党叛乱迭起。早在 1795 年宪法颁布后不久，亦即 10 月 4 日，保王党人就起来暴动，暴动分子甚至携有大炮，准备占领国民大会。10 月 5 日，巴拉斯起用了当时正在赋闲的拿破仑，叫他负责镇压。第二天保王党叛乱就被平定下去。到 1797 年春，立法院议员选举的结果，保王党人取得多数。他们便在立法院策划复辟。于是督政府不得不从意大利战场上调回部分军队，占领了立法院，逮捕了保王党议员，其中有 160 人被处死刑，其余被流放了。但是在翌年 4 月立法院选举中，有 160 个雅各宾派分子当选为议员，这样一来又从左的方面威胁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督政府在保卫共和国和防止“雅各宾派阴谋”的借口下，驱逐了新选出的雅各宾派议员 106 名。到 1799 年 7 月，当前线法军接连败退下来的时候，民主运动又在巴黎复活了。在外省，保王党人也到处煽动。结果，万第省又爆发了叛乱。

这样，到 1799 年下半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危如累卵，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应付这个危险万分的局面。在他们看来，督政府的腐败及政治军事上的阉茸无能，显然无力领导法国渡过这个难关。当时最关切法国局势的是掌握法国经济命脉的 200 家财阀（这些财阀是在热月党人统治及督政府时期形成的），他们最害怕人民运动的发展，害怕来自下面的革命侵犯他们的财产及经济自由。他们同样害怕被推翻的封建势力卷土重来，夺回自己在大革命中获得的果实。而他们认为，督政府是无解解除他们的这种恐惧及忧虑的。同时，这些财阀们也希望法国能够在军事上连战连胜，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外国干涉者帮助封建势力在法国复辟，而且也可以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为法国资产阶级开辟国外市场及扩大海外殖民地。但是 1799 年法国在军事上迭次失利，也表明督政府的统治不能实现他们的这些希望。而且，保王党人或雅各宾党人时常被选进立法院的经验，也告诉他们：公开的、合法的议会制度已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了。

因此，财阀们决心甩掉督政府而另外拥戴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独裁者来收拾法国残局，给他们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个局面既可以保证法国国内安定，又可以扬法国军威于国外。在他们眼中，“在意大利的战胜者和大陆的绥靖者”（米涅语）拿破仑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他们之所以选中拿破仑，是因为他们在拿破仑身上找到了当代法国最有才干的军事领袖、镇压人民运动的铁腕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拿破仑有能力帮助他们粉碎复辟势力，击败反法同盟及为法国开辟国外市场，建立法国的世界霸权。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 年）出生在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祖先是

意大利贵族，该岛归属法国后，法国国王承认其父亲为法国贵族。1779年他随父赴巴黎，凭借贵族的身份，免费进入军事学校，后来又升入巴黎军官学校。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革命，并且在1793年12月参加了攻打陷于英国手中的土伦港的战役。督政府时期，他又得到巴拉斯的青睐，积极为法国大资产阶级效劳。拿破仑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家，但是他有极其强烈的权力欲，而且自私自利心颇重。自从意大利战场上获胜后，他就开始有了篡夺政权的野心。1799年他探知国内大财阀瞩目于他，于是便在这一年10月只身离开埃及回国。抵巴黎后，马上与财阀们勾结起来，在他们的财力帮助下（银行家科罗拿出50万法郎），在11月9日发动了政变（雾月十八日政变），推翻了督政府。

这次政变之所以顺利成功，也与当时人民的动向及军队态度有关。首先，广大劳动人民对热月党人及督政府的统治厌恶已极，巴不得有人推翻它，因而对雾月政变并不特别反对。第二，督政府在军需上的贪污舞弊，招致了军队的抱怨，因而军队是拥护这次政变的。

政变后，政权马上转到以拿破仑为首的三个执政手中，实际上是拿破仑个人独揽大权。1804年12月，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礼，正式即皇帝位，称拿破仑一世。这样一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寿终正寝，而开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又称拿破仑帝国）时代。

第二节 拿破仑的军事独裁

拿破仑一上台，就着手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他的军事独裁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形式之一。这样的政权在表面上似乎是超乎一切阶级之上的不偏不倚的政权，拿破仑本人也常常以一切阶级的代言人自居。但是实际上，他的政权代表了法国大金融家、大工业家、富裕农民及高级军官的利益。

（一）拿破仑政权的政绩

雾月政变后不久，法国资产阶级就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保存革命的基本成果（有利于本阶级的成果），建立一个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安定环境。拿破仑上台后，基本上就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这个愿望行事的。为了建立一个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安定局面，他不能不坚决镇压反革命叛乱。如前所述，在雾月政变前夕，万第省爆发了反革命叛乱。叛乱分子猖狂已极，他们公开喊出“打倒共和国”的口号，并且要求波旁王朝复位。拿破仑上台后，首先派大军前往镇压。他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叛乱分子，对放下武器投降的人实行大赦。结果，到1800年2月底，万第省的叛乱基本上平定。但是，反革命分子并不善罢甘休，他们采取了暗杀的手段。仅1800年下半年，被警察破获的谋杀拿破仑的案件就有三十起以上。1804年，保王党人策划了一个大规模的暗杀阴谋，有100个死硬的保王党人从英国潜入法国，计划在拿破仑赴玛尔梅宗宫的途中袭击他的卫队，然后打死他。但是这个阴谋也被粉碎了，有八个暗杀分子被判处死刑。

当时法国保王党人的暗杀活动的指挥中心是在法国边境波旁王族恩吉昂公爵家中，这个中心被政府发现了，于是当局便逮捕了恩吉昂，并且把他枪毙，这样便一下子制止了暗杀活动。这对于国内王党复辟活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为了确保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把资产阶级所有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拿破仑花费很大的精力制定了《拿破仑法典》。1804年拿破仑政府颁布了民法，1807年再一次颁布，并且正式命名为《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是法国大革命胜利成果和法国启蒙思想结合的产物。法典共有2281条，其主要内容：第一，全力保护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受侵犯，确立了绝对的个人所有制。这个规定对于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及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是有作用的。第二，否认封建等级制度及特权，否认人身依附关系，肯定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第三，确认了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对于封建贵族及教会土地的剥夺，不准封建势力反攻倒算。第四，把大革命中形成的小土地所有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就使得法国农民可以大胆地利用自己的小块土地。因而此后法国农民就成了拿破仑政权的主要支柱。第五，法典保证了自由买卖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法典也将劳动力划为商品，

允许自由买卖，这就等于肯定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了维护雇主对受雇者的剥削，法典规定后者对前者的服从关系。

《拿破仑法典》尽管经过几次修改，但在法国一直沿用到今天，并成为世界各国编纂新法典时所参考的蓝本。

拿破仑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举办博览会，政府订货，嘉奖有发明创造的人，为企业拨给厂房或贷款。拿破仑又设置发明奖金，结果收效甚大，出现许多新的发明创造：1807年有人发明了一台小型蒸汽机，1810年又有人发明一台麻纺机。他还设立工艺学校，增设实用学科。他通过官方宣传推广新的技术及新的工具。他看到修运河及公路可以扩大国内市场，所以下令修建几条大运河，也开辟了一些公路。当然，他之发展公路，更主要的是为了便利于军事运输。此外，他坚决执行保护关税政策，以抵制外国商品入口。1801年他成立“促进民族工业协会”，以加强对于工业的监督和领导。1800年建立法兰西银行，其任务是向工商业提供贷款及发行纸币。

这些措施，效果比较显著：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工业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与革命前相比，这个时期的法国毛织工业品增长三倍，生铁产量增长一倍。将近1813年时，棉纺厂有100万纱锭在运转，生产了1000万公斤的纱线。帝国末期，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制糖业有了蓬勃的发展。1811年，里昂和奥比的工厂第一次从甜菜提炼出糖块。1813年，334个工厂生产出116万公斤的糖。贸易额从1799年的5.53亿法郎增加到1810年的7.05亿法郎。

在拿破仑政府的保护和鼓励下，法国工业的机械化程度大大增长。1790年法国只有900架纺纱机，但是到1805年增加到12,500架。

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拿破仑帝国的军事力量，为抗击反法同盟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总之，拿破仑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以致在1815年拿破仑帝国瓦解之后，在王朝复辟时期，法国资本主义照样发展下去。这是拿破仑政权的重要政绩。

（二）拿破仑政权的两重性

拿破仑政权在本质上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但是它有与封建制度及封建势力妥协的一面。实际上，拿破仑个人独裁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就是革命的新秩序与革命前的旧秩序相融合的过程。

首先是帝制自为。他在1804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称帝后，便恢复了旧时代的宫廷体制——有侍从、宫内官、礼官、女官以及其他宫廷人员。他又创立了殿下、公爵及帝国元帅的称号。到1810年与奥地利皇帝的女儿（公主）结婚后，帝国宫廷完全恢复了旧封建时代的

建制。1811年恢复了朝觐、行礼等繁文缛节的，并且以波旁王朝的旧朝仪法规为蓝本制定了新的朝仪法规，达800页之多。拿破仑不但有皇室经费、皇室地产、私有产业，而且还任命专人去保管他在附庸国为自己保留的领地收入（当时估计价值达20亿法郎）。

拿破仑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恢复帝制，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对他有利：雅各宾专政的过火行为在法国广大居民的思想引起了反作用；反革命恐怖及新的战争威胁造成了不安的气氛；千百年来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皇权主义习惯势力等等。

其次，恢复等级制度及贵族称号。1802年，拿破仑创立了所谓“荣誉军团”。从表面上看，荣誉军团不是按门第出身，而是按军功授勋，其成员来自不同的阶级，但是实际上等于恢复了变相的等级制度。因为荣誉军团每个大队都拥有“国家封地”，每年地租收入按等级分发给军团成员，而且在1804年以后，荣誉军团发展为世袭的帝国贵族，被授以骑士称号。此外，拿破仑手下的元帅、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都接受封爵。最高封为公爵和亲王，各部大臣、元老院议员、大主教等封为伯爵，各大城市市长封为男爵。许多参加雾月政变有功的人，接受了荣誉勋章，并跻身于新贵族的行列。甚至1789年发表过著名的反封建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的西耶士，在1808年也受封为伯爵。其中某些贵族还建立了贵族长子世袭财产。如马赛市长安托万就从自己的财产中，划定位于马赛市圣约瑟夫区的一块地产、一所房产、两座磨房和一些草地为世袭财产。与此同时，逃亡国外的贵族也获准大批回国，并且在拿破仑的准许下收回部分或全部被没收的财产。早在1801年，拿破仑就下令撤销对被除名的流亡贵族僧侣的财产的查封。一个在押贵族的儿子莫莱从1802年起就开始收回他家在香普拉特的地产。在罗纳河口郡，发还的不动产达几百万法郎。当然，旧贵族的情况亦不一致，有些贵族的财产完整无缺，而另一些贵族则完全破产。地产的归还除通过官方途径外，还可以私下作些安排，后一个办法主要涉及已经出售的地产。总的说来，在帝国时期，旧贵族收回了通过没收、冻结、拍卖而丧失的财产的四分之一以上。

而且，旧贵族和前朝官僚，在拿破仑帝国宫廷内得到任用者，亦大有人在。拿破仑还录用某些旧贵族及前朝官僚为新帝国的官吏。在帝国时期任命的各省省长中，有171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有110人是旧贵族出身。而且，旧贵族出身的省长，其人数在全部省长中所占的比重，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而不断增长。拿破仑很信任这些旧时代的官吏，认为他们驯服易使唤，有一次他说过：“只有这些人才懂得伺候。”其中不少人缺乏才干或经验，但是只要合乎他的脾味，这些人就可以飞黄腾达。

最后，拿破仑又实行分封制。为了统治欧洲被征服国家，他成立了一系列附庸国，作为法兰西帝国的屏藩，并且分封自己的亲属为国王。1806年封乃兄约瑟夫为那不勒斯国王（1808年约瑟夫又被改封为西班牙国王），1808

年封妹夫繆拉元帅为那不勒斯国王，1805 年以他的弟弟路易为荷兰国王，1807 年以幼弟吉洛姆为威斯特发利亚国王。

这样，拿破仑既有巩固大革命成果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有复旧的一面：在他的资产阶级政权里面杂揉了大量封建的东西。这是这个政权的两面性。而复旧的一面，实际上等于铺设了通往正统君主制复辟的道路。

（三）拿破仑政权的反人民性

拿破仑政权不但具有上述两面性，而且还有其严重的反人民性：他扼杀了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成果，把劳动人民践踏在脚下，对全国人民实行军事警察的高压统治。这个政权的反人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拿破仑强化了镇压人民的官僚军事警察机器。

法国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早在君主专制时代就形成了，但是只有到拿破仑时代，法国才真正有了更完善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机器。

1800 年 2 月 17 日的法律确定了法国的新的行政制度，取消了大革命时期建立的自治。法国全国划分为 18 省，省长有掌管全省行政事务的大权。不但省长由中央直接任命，而且省参议官和省议会议员都由第一执政任命。省下有县，县下有公社，县有县长，公社有市长。县长及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公社的市长，也均由中央任命。人口在 5000 人以下的公社的市长由省长委任，但是都对中央政府负责。一句话，大革命时期民选的官吏，都为上级任命的官吏所代替。

为了加强控制，拿破仑建立了一套组织严密的警察系统。警察遍布全国，他们无孔不入，到处监视人民的言行。在巴黎设置一个特殊的警务总部，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活跃分子傅歇为其长官。

拿破仑把警察从地方行政机构里分出来，以便把警察置于中央机构的直接控制下面。与警察并存的还有宪兵队。警察与宪兵都拥有极大的权限。傅歇把侦探及告密人派到全国各地，他们随时随地把人民的言行秘密地上报给中央。还设置专门机构严格检查来往书信。为了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控制，拿破仑甚至想制订一套全帝国的“个人表现和德行的统计资料”。警察、宪兵肆意捕人，不但逮捕政治犯，而且还徇情枉法，为了某些有权势者的利益，而滥捕无辜者。除了在各地设置监狱外，还成立变相的监狱——疯人院，把政治犯送进疯人院中折磨。诗人德索盖斯在 1804 年发表一首讽刺拿破仑的短诗，结果作为疯子被监禁到疯人院里。一位医生富尔在 1804 年 12 月 5 日曾因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也被关押起来。警察头子傅歇利用自己的职权及地位，干了大量贪污舞弊的勾当。他从颁发护照及枪支执照的收费中，从没收反叛分子的财产中，贪污了大量赃款，因而发了财。一般的警察和宪兵也无恶不作，从欺诈、勒索到陷害杀人，无所不为。由于对傅歇

不信任，拿破仑还另外成立一支警察队伍，专门监视傅歇的活动。

到帝国晚期，警察、宪兵的肆虐更变本加厉了。由于他们任意捕人，监狱有人满之患。1810年建立了八个国家监狱（大革命前法国只有一个国家监狱——巴士底大狱），到1814年，有2500名政治犯被监禁在狱里。刑法也越来越残酷，恢复了大革命前的野蛮刑罚：烙面、枷刑及砍手等等。

有一次，拿破仑向他的近臣夏普塔尔说：“对内对外我都是用我所引起的恐惧来统治的。”这句话暴露出拿破仑军事独裁统治的真面目。

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军队由大革命时期的民主的军队转变为雇用的常备军，高级军官一律由拿破仑自己任命。他还建立了皇帝近卫军。

除了官僚、警察、军队（拿破仑独裁统治的三个主要杠杆）而外，天主教教会也成了拿破仑统治人民的工具。

1801年7月，拿破仑与罗马教皇庇护七世签订了教务条约（concordat），承认天主教是法国绝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神甫、主教及大主教都由法国政府任命而由教皇批准，所有的教士的薪俸都由法国政府负责发给。另一方面，教皇承认大革命中出卖教会土地财产为合法，他宣布不再打扰新的土地所有者，户口册籍的登记仍归地方官办理。拿破仑恢复天主教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社会的安宁（因为反革命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天主教僧侣煽动起来的，现在与天主教达成协议可以消弭叛乱的根源），而且也在于把天主教教会变为巩固他的个人独裁的精神工具。他说：“当我一掌握政权，我就……重建宗教。我使它成为我所从事的建筑物的根基。我把它看成是各项健全原则和善良德行的支柱。”他曾参与审订的《教义问答》成为教会用来“教育”信徒的必读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贯串了效忠及服从皇帝的思想。比如其中有这样的话：“尊敬和侍奉我皇陛下就是尊敬和侍奉上帝。”“谁要反对拿破仑皇帝，谁就是反对上帝自己建立的制度，谁就要终身受到谴责。”显然，拿破仑是想以此来神化皇帝个人。

拿破仑恢复天主教的另一个目的，便是想利用它来维护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他在1800年对人说：“没有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的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能忍受这种差别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在来生和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同。”

诚然，建立这个高度集中的、强大的官僚警察机器，对于对外战争及打败反法同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它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摆脱一切羁绊和拘束，而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机构恰恰起了束缚和限制作用。它不但限制了地方上的主动性，而且也束缚了人们的自由活动及自由思考，禁锢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而且，在这个制度下，皇帝一人握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听命于一个人的意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性与合理性，都取决于皇帝一

人的喜怒哀乐。从表面上看，这架官僚军事机器强大有力，效能很高，皇帝一人气使颐指，一呼百诺。但是这个制度窒息了人民的生气，压抑了人民的活力，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繁荣。可以说，拿破仑之加强国家机器及中央集权，是与他之保护及鼓励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相矛盾的。假如在这个时期法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及地方自治的话，法国资本主义是会有更大的发展的。

第二，拿破仑破坏了大革命期间所确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拿破仑是从内心中仇视大革命的原则的，他曾对大法官莫雷伯爵说过：“这些被称为 1789 年原则的学说，将永远成为各时代的不满分子、野心家和思想家所利用的威胁性武器。”首先他废弃了代议制度。他虽然在表面上保存了代议制的躯壳，但是在实际上他一个人总揽立法、行政及司法大权。按照共和八年（1800 年）的宪法，提出法律的权力属于第一执政：第一执政通过国务院提出一切法律。保民院有权讨论法律，而无权表决通过它，立法院有权表决通过它，而无权讨论。元老院有权判断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牾，如果认为它与宪法相抵牾，则有权废除它。这样，立法权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从而使得拿破仑个人任意操纵立法。1807 年保民院被解散了，立法院也几乎停止召集。元老院虽然继续存在，但是完全听命于拿破仑。到此，立法权名符其实地归拿破仑一人掌握。

其次，拿破仑也剥夺了人民在大革命中所争得的普选权。共和第八年宪法规定：凡年达 21 岁的法国人（仆役除外）皆有选举权，但是他们不能直接选举中央立法机关各院的成员，而只能选举候选人，即所谓“知名之士”。然后由元老院在这些“知名之士”的名单上酌量选拔国务院委员、保民院委员及立法院委员。元老院是拿破仑任命的终身职。这样，所谓人民的普选权，不过是拿破仑个人独裁的遮羞布罢了。

最后，拿破仑也取消了人民在大革命中赢得的自由民主权利。出版自由在督政府时期就几乎不存在了，现在最后被消除了。1800 年 1 月 17 日封闭 73 家报纸中的 60 家，残存下来的定期刊物、书籍、小册子，则由警务大臣和各省省长控制。言论自由完全被禁绝了。拿破仑对知识分子防范更严，凡作品及言论中稍微有一点点自由主义色彩者，都严加取缔。拿破仑特别讨厌“印刷品，因为它们诉诸舆论而不诉诸当局”。1807 年，夏托布里安的一篇文章由于触犯忌讳而使得登载这篇文章的《信使报》遭到取缔。1808 年 8 月，拿破仑下令：每省只许存在一种报纸，因而有一百多种报纸停刊了。

工人也受到残酷的迫害。工人参加工会和罢工的权利被剥夺了。刑法规定：凡参加工会及罢工者，处以一个月到三个月的监禁（发起人为两年到三年）。从 1803 年 12 月 1 日起实行工人身份证制度，在身份证上记载对工人的鉴定。凡未持有身份证者，就被视为流浪人。法律规定：流浪人或乞丐都要被关进监狱式的习艺所。

第三节 拿破仑对外战争

（一）拿破仑军队在欧洲的胜利进军

拿破仑的政权，是与对外战争相始终的。应该看到：拿破仑对外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对外战争的继续，这场战争首先是欧洲封建君主为了干涉法国大革命而挑起来的。拿破仑刚上台时，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军事干涉，使法国又一次面临封建复辟的危险。因此，拿破仑对外战争最初具有保卫法国革命果实、反对封建复辟的性质。但也应该指出：拿破仑的军事行动，也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对外侵略掠夺及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的要求。因而拿破仑战争一开始就有了极其错综复杂的性质。

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在他上台后不久——1800年春就开始了。拿破仑亲率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6月14日在马伦哥附近与奥地利军队血战一天，拿破仑军队以少胜多，大破奥军。结果，奥军仓皇退出北意大利。法军乘胜追击，一直打进奥地利境内。1801年2月9日，奥地利被迫与法军缔结“留尼维尔和约”，退出了反法同盟。由于失去奥地利这个重要帮手，英国最后也不得不与法国讲和，1802年3月25日，英法订立“亚眠和约”。

但是，英法间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到1805年4月，英国又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加入同盟的仍是俄国、奥地利及那不勒斯。西班牙在法国的压力下，成为法国的同盟者。这次拿破仑决心征服英国，因为他看到英国是法国的主要对手。他在法国北部的布伦港口集结16万大军，又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港口集结舰队及5万兵力，准备和西班牙的海军配合起来在英国登陆。但是，法、西联合舰队在1805年10月21日在特拉法加的海上被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的舰队击溃，因而登陆英国及征服英国的计划化为泡影。

不过，法军在欧洲大陆上的军事行动非常顺利。1805年法军长驱直入奥地利，11月13日攻下维也纳。接着在12月2日拿破仑又集中优势兵力在维也纳以北的奥斯特利兹击溃了沙皇和奥皇亲自指挥的俄、奥联军。在这个战役中，俄、奥军死伤及被俘35,000人，俄国近卫军全部被歼。奥国被迫求和，于12月26日缔结“普列斯堡和约”，奥国付出4000万法郎的赔款，并且割让大量土地给法国。1806年8月6日，奥国皇帝在拿破仑的压力下，正式取消他的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为了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统治，拿破仑在1806年建立了所谓“莱茵同盟”，参加者有16个德意志国家，后来又有五个德意志国家加入。拿破仑宣布自己为“莱茵同盟”的保护人。

1806年，法军在意大利南部又征服了那不勒斯。于是第三次反法同盟也土崩瓦解。

1806年9月，英、俄、普参加的第四次反法同盟组成。10月，战争又起。10月14日发生两个决定性战役——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普军遭到惨败，伤亡22,000人，被俘18,000人。10月27日，法军几乎兵不血刃地

进入柏林。法军继续东进，1807年2月8日在普鲁士的艾劳附近与俄军展开了剧烈的战斗，双方都蒙受惨重的损失：各丧失22,000人。同年6月14日在弗里德兰的战斗中，俄军终于惨败。7月7日，法、俄两国首脑在提尔西特安排了法、俄、普三国的和平谈判。根据“提尔西特和约”，俄国答应退出反法同盟，和英国断交，并且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排斥英货。拿破仑同意俄国在东欧和北欧自由行动。“提尔西特和约”的条件对于普鲁士极为苛刻：它必须割让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土地（拿破仑把这些土地和附近一些德意志小国合并在一起成立“威斯特发利亚王国”），它的军队必须减到4万人，并且付出1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普鲁士还被迫让出过去它瓜分波兰得来的土地，由拿破仑在上面建立“华沙大公国”，并且把“华沙大公国”置于法国的驯服的盟国萨克森王国的统治下（实际这个大公国是受制于法国的）。

但是，拿破仑一直没有放弃征服英国的野心。特拉法加海战大败后，法国海军一蹶不振，用武力征服英国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拿破仑着手从经济上征服英国的计划。在他看来，英国是工业大国，如果切断英国对外贸易特别是禁止英国商品进入欧洲，会制英国于死命。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在柏林发出一项命令，宣布封锁“不列颠诸岛”，严禁欧洲大陆诸国与英国通商，并且表示要没收一切英国商品及英国商船。为了报复，英国宣布从海上封锁大陆特别是封锁法国港口，并且派军舰在海上截击法国及一切中立国商船。拿破仑又在1807年11月23日和12月17日颁布米兰法令，法令规定：“一切商船，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装什么货，假如它来自英国港口，或者来自英国殖民地，或者来自英国军队所占领的国家，或者开往这些地区，一概没收。”

拿破仑严厉执行这些法令，他派两万名关税人员分布在欧洲大陆的边境，并且派军队与警察去协助他们，以便与英国货物的走私作斗争。但是，英国想尽一切办法把商品运进欧洲大陆。为了防止英国商品从伊比利亚半岛渗进大陆，1807年11月，法军占领了葡萄牙，翌年又侵入西班牙。

1809年，英国又组织了第五次反法同盟，参加这个同盟的只有英、奥两国。英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反法，是因为当时英、法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的地步：第一，当时法国已一跃而成为欧洲大陆上的霸主，从而破坏了欧洲大陆的均势，这是英国资产阶级所无法容忍的。因为英国的传统政策就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以便由英国控制欧洲。第二，拿破仑征服了欧洲许多国家，因而法国独占了欧洲市场，而拿破仑的封锁“不列颠诸岛”的政策，更加剧了英法两国在商业上的矛盾。第三，拿破仑的法国与当时的英国都想争夺中东：埃及和叙利亚（均为土耳其所辖）。而且法国也想恢复法国过去在印度所经营的贸易基地。

反法同盟组成后，法、奥重新开仗。最初双方互有胜负，但是最后在瓦格拉姆战役（1809年7月）中，拿破仑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09年10月14日奥国又一次被迫在维也纳订立和约。依据和约，奥地利拿

出赔款 8500 万法郎，丧失了有 350 万人口的领土。

综观 1800 年到 1809 年的战争，拿破仑军队在欧洲大陆上一直是所向无敌，几次反法同盟都在拿破仑军队的铁蹄践踏下一个接一个地解体了。法国军队接二连三地击溃了在数量上与法军相比占很大优势的俄、普、奥等国的军队，迫使这些国家的封建君主先后俯首求和。到 1809 年为止，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波兰及瑞典诸国都直接或间接落到法兰西帝国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欧洲的主宰者了。

拿破仑军队在欧洲大陆上之迭次胜利，其原因是很明显的。法国通过 18 世纪末的大革命，已经从封建专制国家发展为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这个国家，旧封建枷锁被打碎了，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因此工、农业及军事工业和科学技术都有了不小的发展，这就为军事上的胜利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拿破仑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具有高度的行政效率，这也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军队的成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拿破仑的军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拿破仑法典》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了在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农民小土地所有制，这就使得法国农民深深感到自己的命运与拿破仑政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穿军装的法国农民是为保卫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战的，因此他们在战场上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和勇敢。拿破仑严格禁止在军队中实行体罚，尊重和维护士兵的荣誉感及自尊心。他还对士兵论功行赏，把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和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的士兵提拔为军官，甚至破格提升为将军或元帅。这也大大地激发了士兵的积极性。拿破仑继承和发展了大革命期间创造出来的战略战术，不仅善于打运动战，行动敏捷而机动，急速而坚决，而且还善于集中优势兵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二）拿破仑战争对于欧洲的影响

在战争的初期，法国军队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欧洲反法同盟复辟波旁王朝的阴谋，而且也有有力地动摇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1796 ~ 1799 年法国军队占领北意大利期间，意大利的封建统治开始动摇了：贵族的封建特权被废除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实现了。1800 年法军再度占领意大利后，封建制度破坏得更加彻底：取消了 22 个内地关卡，封闭大量的寺院，并且拍卖了寺院的土地。还实行《拿破仑法典》。1809 年，法国把教皇国合并于法国，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政权。这些改革，为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在德意志，拿破仑战争的影响更为深刻。原来在德意志（即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有大小 296 个封建国家，但是根据 1801 年“留尼维尔和约”，莱茵河左岸的 97 个小国（面积有二万多平方公里）划归法国。在划归法国后，不但这 97 个小国被消灭了，而且这些土地上面的一切封建残余均归消灭：贵族的封建特权被取消了，教会和流亡者的财产被没收了、拍卖

了。这一切都为莱茵河左岸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1801 年和约所造成的变化不限于此，因为按照这个和约，拿破仑又把德意志的 112 个小国合并于与法国有联盟关系的几个德意志国家。同时，按照“留尼维尔和约”的规定，教会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这样，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不但德意志许多地区的中世纪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毁了，而且也大大减少了分裂。这些都有利于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且，拿破仑大军所到之处，欧洲的王冠纷纷落地。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在 1808 年被拿破仑抓去当了俘虏。葡萄牙的摄政王子在 1807 年法军入侵后逃往南美的巴西。1806 年，法军占领那不勒斯王国后，国王斐迪南在英国海军的保护下逃到西西里岛去了。1809 年罗马教皇国被合并到法国，于是教皇庇护七世被押解到法国。

总之，在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中欧、西欧及南欧的封建秩序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

因此，拿破仑战争对于欧洲起了进步的作用。

但是，拿破仑战争也有侵略的一面，而且它的侵略性质到战争后期越来越明显了。拿破仑在对外战争中所追求的目的是掠夺欧洲的财富，吞并欧洲土地，夺取新的市场和建立法国的军事、政治和工商业的霸权。它的侵略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军事行动中公开掠夺，在军事胜利后索取军事赔款或进行没收，从被征服国家搜刮大量金银财宝。1796 年在北意大利战场上拿破仑的军队就因打家劫舍而出了名。1804 年，这种“特别收入”在法国国家总收入 7.7 亿法郎中占 1.23 亿法郎。在占领普鲁士的两年中，从普鲁士及其盟国那里榨取约 10 亿法郎。拿破仑又从威斯特发利亚王国夺走 7100 万法郎。

第二，把被征服的国家化为法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及法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为了这个目的，法国强迫战败国豁免法国商品的进口税。在 1801 年到 1811 年的十年中，输入意大利的法国商品增加到六倍。同时，意大利的生丝、羊毛只能向法国出口。法国的这个政策，对意大利的工业发生了极其不利的影 响。意大利的许多工业部门衰落下去。威尼斯玻璃工场的数目从 36 家减少到 12 家，呢绒工场从 11 家减少到 8 家，丝织工场从 6 家减至 4 家。其他部门也有类似的情况。

第三，拿破仑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他每征服一个国家，除了大肆掠夺、搜刮及横征暴敛外，还无情地榨取血税：无限制地征发当地壮丁，强迫他们当兵，参加与他们本身毫不相干的战争。

拿破仑的侵略战争，使法国高级军官、国家债权人及军需供应商个个发

了大财。将军们和元帅们通过军事掠夺及受贿，而填满了私囊。苏尔特元帅尤以贪婪著称，当他在西班牙指挥作战时，他从西班牙博物馆抢走了大量珍贵名画。

（三）拿破仑帝国的崩溃

到 1811 年，拿破仑帝国已经包括 130 个省，人口有 7500 万，占当时全欧洲人口的一半，三倍于革命前的法国。帝国还被许许多多的附属国及同盟国环绕着，法国驻军遍布于安特卫普、但泽、罗马、都灵、北德意志和巴尔干。但是这个帝国实际上外强中干，危机四伏。

以国外来说，欧洲各国反法的民族运动及民族解放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法国的力量。拿破仑的侵略很自然地激起了反法斗争及反对拿破仑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早从 1807 年起，在欧洲一些地区就爆发了反法运动或反法起义。但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反法的民族解放战争发生在西班牙。西班牙的解放战争，早在法国军队入侵和占领西班牙之后不久（1808 年）就开始了。领导这个战争的是在法军占领后在西班牙各地出现的地方政权机构——洪达，战争的主力是工人和农民。西班牙人民的解放战争主要采取游击战的形式。游击队虽然装备很差，武器很坏，但是却屡次打败法国的精锐部队。这个战争一直持续到 1814 年初全部逐出法国侵略军时为止，其间牵制法国兵力达 25 万之众，对于最后推翻拿破仑在欧洲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再以法国国内来说，也是危机重重。拿破仑政权的阶级基础愈益缩小，最后几乎达到众叛亲离的地步。首先，原来拥护拿破仑的农民，现在也越来越不满。原因很明显：由于连年对外战争，农民的赋税负担加重了，生活每况愈下；不断地向农民抽丁去打仗，弄得家家出现孤儿寡妇。拿破仑的统治简直成了农民灾难的根源。其次，在帝国初期支持拿破仑的大资产阶级，现在也和他离心离德了，这是因为拿破仑进行的无休无止的战争加重了大资产阶级的困难。拿破仑封锁英国的政策，引起了英国的反封锁，英国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使法国在这场对英的经济斗争中处于劣势。法国商船无法在海上自由航行，以致法国与海外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联系中断。对外贸易的衰落，不仅造成法国港口的萧条，而且也造成法国原料不足。结果在 1810 年到 1811 年爆发了经济危机，工厂倒闭者甚多，使资本家蒙受严重的损失。而且战争频仍也增加了资产阶级的赋税负担，这也是他们无法忍受的。至于工人阶级，他们本来就不满拿破仑政权，到帝国末期，工人失业增多了，所以工人不满也愈甚了。一言以蔽之，被年复一年的对外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法国人民，普遍怀有反战情绪及对拿破仑的反感。这是帝国的致命弱点。

西班牙的反法民族解放战争是与资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的。1812 年颁布自由主义宪法，限制了王权，废除了一些中世纪的残余。

帝国的虚弱，也表现在如下事实上：第一，警察官僚机器到帝国晚期已远远不如早年那样有效率了。官僚营私舞弊者所在多有；办事拖沓者，比比皆是；工逢迎者，虽庸碌无能，也会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直道而行者，虽身怀奇才，亦终默默无闻。当然，这些现象都是个人独裁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拿破仑军队中的众多士兵是从被征服国家抽调来的外国人，他们显然不愿为拿破仑效命，时机一到便会调转枪口来反对拿破仑的。

正是在帝国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拿破仑发动了侵俄战争。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沙皇俄国与拿破仑的法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无法调和的矛盾。从法国方面来讲，拿破仑一心一意想建立以法国为中心的世界帝国，而在欧洲唯有英国与俄国未被征服，这是他心有所不甘的。因此他决定先征服俄国，然后再收拾英国。从俄国方面看，沙皇对于拿破仑之支配整个西欧及中欧，感到异常不安，并且认为拿破仑建立一个在法国影响下的“华沙大公国”（1809年扩大其领土）是对俄国的一个威胁，因而对法国存有戒心。而且，法国的封锁政策，割断了俄国对英国的贸易联系，使俄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因此，俄国亦准备与法国兵戎相见。

从1810年起，拿破仑就开始准备侵俄战争。到1812年2月他强迫普鲁士加入反俄军事联盟，3月又与奥国缔结同样的联盟。俄国也积极备战，由库图佐夫指挥的、训练有素的40万大军严阵以待。

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不宣战亲率大军渡过尼门河，于是法俄战争揭幕。参加侵俄战争的大军一共有61.1万人，其中法国人30万，从莱茵同盟征来的德意志人18万（其中包括3万奥地利人及2万普鲁士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9万，瑞士人9000，意大利人、伊利里亚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3.2万。可见半数以上是从被征服国家强拉来的。

法皇本来预计在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就在一次大的战役中一举击溃俄军主力，然后迫使俄国求和。但是，俄国选择了诱敌深入的战略，因而法军进入俄境后，俄军步步向内地后撤，法军全然无机会和敌军打一次大战役，于是只好沿着俄军撤退的道途向前追击。法军虽然攻下斯摩棱斯克，但是却未能粉碎对方的主力，因为俄军退得颇为神速。在这个情况下，拿破仑决定直趋莫斯科。9月7日，库图佐夫布置大军在博罗迪诺迎战，结果重创法军，使其丧失58,500名士兵和49名将军。俄方损失为38,500人。在结束这个战役后，库图佐夫下令俄军继续后撤，并且为了保存俄军主力，决定不战而放弃莫斯科，同时下令毁掉市内全部粮食及军事物资。拿破仑于9月13日率军进入莫斯科时，发现这已经是一座空城了，不但不见一兵一卒，连居民也逃光了。入城后的第二天莫斯科发生大火（至少一部分火是俄军将领下令放的），风力猛烈，大火延烧全城，一共烧了五个昼夜才熄灭。全城四分之三的建筑物化为一片瓦砾。

此时，库图佐夫积极蓄积力量，他在莫斯科外围集中的兵力很快地达到12万人。10月18日，俄军转入攻势。拿破仑不得不急忙率领11万人在10

月 19 日逃出莫斯科。在逃亡途中，饥寒交迫的法军又不断地遭到俄国人民的游击队伍的袭击。因此，在 12 月 13 日重渡尼门河时，拿破仑手下只剩 5 万人了。有 50 多万人在俄国战场上丧了命。

可见，侵俄战争的失败，使拿破仑受到沉重的打击。

拿破仑在俄国的惨败，推动了普鲁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普鲁士人民坚决要求重新对法开仗，以雪 1807 年的国耻。诗人凯尔涅尔、安得特和作曲家魏伯尔写出大量诗、歌，热情地号召德意志人民参加解放战争。秘密的爱国协会也到处展开宣传，鼓动人民参加反对拿破仑的战争。

普鲁士国王认识到：假如不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并且把它领导起来，普鲁士君主制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1813 年 2 月 28 日，普鲁士国王与沙皇签订了反拿破仑同盟，准备对法决一死战。当时这两国君主各有各的打算，沙皇希望在打败拿破仑之后，把“华沙大公国”合并于俄国，普王则希冀吞并德意志其他小邦的领土，尽管这两个人在口头上大谈为人民的自由而战等等冠冕堂皇的话。未几，英国和瑞典也加入了反法同盟。1813 年 8 月，奥地利也加入了，于是第六次反法同盟正式组成。

拿破仑从俄国逃回巴黎后，积极重整旗鼓，在短期内又从法国及附庸国搜刮到大批人丁、粮食、军事物资及金钱，并且重新建立了一支 30 万人的大军。但是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与他对立的是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人心向背上都占优势的第六次反法同盟——兵力达 100 万以上。

即将开始的战争，对于欧洲各国人民来说，是一场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尽管各国君主怀着反动的目的——瓜分欧洲及世界领土和恢复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诸国被推翻的封建王朝。

战争于 1813 年 10 月 16 日开始，19 日结束，这便是有名的莱比锡大战。这是军事史上少见的惊心动魄的一场鏖战。在战斗开始的那一天，拿破仑军队有 15.5 万人参加战斗，参战的普、奥军为 22 万人。但是到第二天，俄、瑞（典）军队 11 万人也投入了战斗。在第三天的战斗中，法军中的萨克森军团哗变，并且转到反法同盟方面。拿破仑得知后，慌忙指挥法军后退。反法联军乘势追击，法军全面溃败。12 月初，拿破仑的败兵残将渡过莱茵河，狼狈逃回法国。

经过这次沉重打击，拿破仑的军队已经陷于瓦解状态。1814 年初，反法联军以破竹之势打进法国境内。3 月 31 日，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率领的反法联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巴黎。以普洛旺斯伯爵为首的法国波旁王朝一家偕同一群流亡贵族，在沙皇骑兵刺刀的保护下回到巴黎。普洛旺斯伯爵即位，是为路易十八。拿破仑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

法国人民尽管对拿破仑深感不满，但是他们更加痛恨复辟的波旁王朝。这些情况为拿破仑所知，他便在 1815 年 2 月 26 日从厄尔巴岛逃出，带领一千多人于 3 月 1 日在法国登陆。登陆后，拿破仑把自己伪装成革命者，不但

使用了大革命时期的语言，而且还作出一些许诺，表示要实行自由主义改革。这欺骗了不少人，他们踊跃参加了拿破仑的队伍。还有一些旧部下率兵投到拿破仑麾下。3月20日拿破仑重返巴黎，路易十八慌忙逃走，拿破仑重登帝位。由是开始了“百日天下”。

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拿破仑在回巴黎后就颁布了一个《帝国宪法补充条例》，恢复了普选权及代议制。

拿破仑的卷土重来，震惊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他们赶忙成立第七次反法同盟，以便再一次协力对付拿破仑。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境内的滑铁卢发生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军队一败涂地。于是，拿破仑不得不第二次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了。路易十八再度复辟，开始了王朝复辟时期。

拿破仑这次退位后，被流放到大西洋上一个荒岛圣赫勒那岛。

第四节 欧洲的反动和 19 世纪 20 年代革命运动

（一）维也纳会议

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各战胜国从 1814 年 10 月 1 日到 1815 年 6 月 9 日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但是操纵会议的是四大战胜国——俄、英、普、奥。这几个大国的目的很为明确，那就是：瓜分赃物，以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打着“正统主义”招牌，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秩序，使旧封建王朝复辟；防止法国东山再起。在这几个大国中，以沙皇俄国的野心最大，它一心一意想扩张领土，以建立俄国在欧洲的霸权。奥地利力图建立自己在中欧的霸权特别是在德意志的优势。英国则希望一方面保持欧洲大陆诸国的均势，另一方面扩大英国海外殖民地以加强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普鲁士也要求扩充领土，以便同奥国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因此，在会议上斗争非常激烈。斗争的焦点是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俄国企图独占《华沙大公国》，提议把萨克森让给普鲁士，以补偿它在波兰方面损失的土地。这样，俄国就把普鲁士拉到自己一边。奥地利反对沙俄独占“华沙大公国”和普鲁士吞并萨克森，就和英国联合起来。法国害怕东邻普鲁士的强大，也站在英、奥一边。1815 年 1 月 3 日，英、奥、法三国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规定三国如遇他国进攻，则互相援助，法、奥各出兵 15 万，由英国供应军火。双方斗争愈演愈烈，几乎闹到决裂的地步。由于拿破仑重返法国，各战胜国才又组成新的反法联盟，暂时妥协，于 1815 年 6 月 9 日匆忙签署了《最后总决议》。

《最后总决议》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第一，恢复欧洲许多国家封建旧王朝的统治。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葡萄牙的布拉冈扎王朝，德意志和意大利各小邦的王朝都重新袍笏登场，罗马教皇的政权也予恢复，开始了欧洲规模的复辟。第二，任意瓜分欧洲领土及海外殖民地。波兰遭到第四次瓜分。拿破仑时期建立的“华沙大公国”的大部分领土被沙俄夺得。波兹南和格但斯克留给普鲁士，加里西亚仍属奥地利。这样，波兰只剩下克拉科夫及其毗邻地区组成一个共和国，由俄、奥、普共同“保护”。沙俄继续占有芬兰和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领土），但由于瑞典失去了芬兰，就把挪威划归瑞典作为“补偿”。普鲁士得到萨克森的五分之二领土和其他一些邦国的领土，邦界扩大到莱茵河左岸和波罗的海南岸。英国强迫会议同意它继续占领马耳他、法国殖民地多巴哥、圣卢西亚（二者都在西印度群岛）和毛里求斯，并从荷兰手中夺得南非开普殖民地和锡兰岛（斯里兰卡），从而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确立了它在世界殖民地的霸权。第三，决议建立德意志邦联，由德意志 34 个邦和四个自由市（汉堡、不来梅、卢卑克和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组成，奥地利代表主持邦联会议。“德意志邦联”完全是一个松弛的政治联盟，德意志继续保持分裂局面。第四，把法国限制

在 1790 年的疆界，东北边境的 17 个城堡和要塞由联军占领三年至五年，占领军的费用由法国负担。法国必须赔款 7 亿法郎，并交出军舰。为防止法国再起，北部的比利时被并入荷兰，成立尼德兰王国；卢森堡公国也归尼德兰国王兼治。瑞士确定为永久中立国。他们把瑞士看作是法、奥、德、意之间的缓冲国，所以把瑞士边境扩大，许多战略上的重要山隘都归其所有。第五，维持意大利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并且把它的大部分土地置于奥地利的主宰之下。奥地利取得了伦巴底和威尼斯。以托斯卡纳大公国为奥地利斐迪南大公的世袭领地，摩登纳公国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得埃斯特大公的世袭领地，以帕尔马公国为前法国皇后玛丽·路易斯的终身领地。撒丁尼亚收回萨伏依和尼斯二省，并且把热那亚合并于它。

这样，维也纳会议违反各国人民的愿望，恢复被推翻的封建君主的王位，使其重新压迫人民；把从拿破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民族，又置于战胜诸国的民族压迫之下。

（二）神圣同盟与 19 世纪 20 年代欧洲革命运动

为了巩固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反动秩序，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在沙皇亚历山大的倡议下，1815 年 9 月俄、普、奥三国首脑在巴黎共同宣布成立“神圣同盟”。在同盟中，俄国和奥国起主要作用，特别是俄国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为了更切实地执行神圣同盟的任务，同年 11 月又成立“四国同盟”，除上述三国外，英国也参加了。四国同盟条约明确规定四国以武力维护维也纳决议，也就是说以武力镇压任何革命运动。1818 年法国加入，于是就成为“五国同盟”了。

但是欧洲反动势力是阻止不了历史的前进的。到 20、30 年代，革命风暴席卷了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俄国、法国及比利时，沉重地打击了各国反动派，并且促使神圣同盟瓦解。

革命首先爆发于西班牙。根据维也纳决议波旁王朝在西班牙复辟后，立即恢复反动统治：废除 1812 年宪法，取消革命期间实行的一切改革措施。这些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 1820 年革命。西班牙革命使欧洲各国君主惊慌失措。1822 年神圣同盟召开会议，不顾英国反对，会议决定由法国出兵镇压。1823 年在法军镇压下，西班牙革命烈火被扑灭了。

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1820 年至 1821 年在意大利也发生了革命。革命首先爆发在南部意大利，很快地蔓延到全意大利半岛。神圣同盟在梅特涅的建议下，决定派奥军前往镇压。于是意大利革命也遭到失败。

1821 年 3 月，希腊人民掀起了反对土耳其统治和奴役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迅速扩大，人民武装经过一年的战斗解放了希腊大部分地区，因而在 1822 年 1 月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了宪法，宣布希腊独立。但是土耳其的封建统治者不甘心失败，他们派出大量军队进行残酷的镇压。土耳其军队所到之

处，疯狂地屠杀希腊人民。开俄斯岛有 10 万居民，经过屠城之后，幸免于难者不到两千人。到 1827 年，希腊起义力量已被摧毁殆尽。但是英勇不屈的希腊人民继续战斗下去，他们展开了游击战，沉重地打击了土耳其的军队。在爱琴海上，希腊的人民战士驾着小船，毫无畏惧地同装备着大炮的土耳其军舰进行搏斗。希腊爱国志士的这种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赢得了欧洲各国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人们争先恐后地捐款以支援希腊人民的斗争。英国的杰出诗人拜伦热情洋溢地奔赴希腊，参加了希腊人民的解放战争，并且为希腊的正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希腊人民的解放战争在欧洲各国统治阶级中间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梅特涅担心希腊革命会引起奥地利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因而他极力主张镇压希腊革命。但是沙俄却持异议。它的一贯政策是削弱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控制两个海峡，以扩大在巴尔干的势力。在沙俄眼中，希腊革命正好可以削弱土耳其的势力，并且是俄国势力渗入巴尔干的好机会。因此俄国当时以希腊东正教的当然保护者自居，谴责土耳其人对希腊人的屠杀。英法两国为了扩大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也反对奥国的主张。这样，在希腊问题上，神圣同盟内部的矛盾扩大了。1827 年 7 月，俄、英、法三国在伦敦签订“希腊绥靖”公约，要求停战，作为解决希腊问题的前提条件。但是土耳其拒绝停战，因此这一年 10 月，三国联合舰队出动了，并且在纳瓦利诺海上把土耳其—埃及舰队摧毁了。纳瓦利诺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土耳其，使其无力镇压希腊革命。但是，沙皇俄国出于侵略扩张的目的，把对土战争继续下去，并且于 1828 年正式对土宣战。在俄土战争中，土耳其连续败绩，到 1829 年不得不求和，被迫与俄国签订亚得里亚诺堡条约，承认希腊独立，希腊虽然获得独立，但是俄国势力渗入了独立后的希腊。

与希腊革命几乎同时，在俄国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次起义是一部分受法国革命思潮影响的俄国贵族军官发动的。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武装起义。起义终于被沙皇政府淹没在血泊里。

1830 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复辟王朝被推翻了。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在 1830 年 8 月在比利时又发生革命，比利时宣布脱离荷兰的统治而独立。

这样，通过一系列革命，维也纳会议所安排的反动体系已被冲破，神圣同盟也土崩瓦解。

第七章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和独立国家的形成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民族独立运动席卷了拉丁美洲。尽管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者竭力阻碍拉丁美洲社会的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展，由于美洲经济愈益卷入正在形成的全球经济，毕竟初步发展起来了。那些经济利益同世界市场有着密切联系的阶级，那些遭受压迫剥削的下层人民群众，越来越不能忍受殖民政府和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剥削。在北美 13 州获得民族独立之后，在法国大革命的狂飚兴起之际，海地人民揭竿而起(1790 年)，接着蔓延到西属拉丁美洲和葡属巴西(1810 ~ 1826 年)，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世界资本革命的组成部分。其范围之广、卷入人口之多和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都是空前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只达到了民族独立，而没有深入进行封建主义革命。大地产制的保存，天主教势力的存在，使独立的拉丁美洲各国长期动荡不宁，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现代化走上了一条依附性的道路。

第一节 独立战争前的拉丁美洲

（一）欧洲殖民主义者在拉美的殖民统治

欧洲殖民者入侵以前，拉丁美洲大部分地方还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只有在秘鲁、墨西哥等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进入了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社会形成的时期。勤劳、勇敢的印第安人世代开发了美洲大陆，创造了美洲的古代文化。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便纷纷踏上了这块土地，最早侵入拉丁美洲的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血腥的征服，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都相继沦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在整个中南美洲，除葡萄牙侵占了巴西外，其余的几乎全被西班牙所占。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接踵而至，除占领加勒比海一些岛屿外，还通过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剧烈争夺，抢到了圭亚那和伯利兹等地区，分别在那里建立了殖民统治。

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欧洲的封建专制国家，它们对拉丁美洲实行了极端残酷、落后的封建主义统治。

西班牙、葡萄牙在殖民地设立了庞大的殖民统治机构。西班牙设立了四个总督区：新西班牙区（包括今墨西哥、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秘鲁区（包括今秘鲁和智利）、新格拉纳达区（包括今哥伦比亚、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拉普拉塔区（包括今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葡萄牙最初在它的殖民地巴西设立了 13 个都督府，后来又把它们合并成一个总督区。总督和督军由宗主国政府直接任命，殖民地的法令由他们负责制定。西班牙、葡萄牙通过这一套统治机构，把对殖民地的统治大权紧紧地抓在手里。

殖民者侵入拉丁美洲以后疯狂地掠夺土地，在殖民地建立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西班牙殖民地曾广泛推行“监护制”，国王不但把土地，而且也把印第安人或部落，或以地域为单位强行赐予“征服者”，这样就使大批西班牙贵族、官吏和天主教会在拉丁美洲以“监护主”的名义霸占了大片印第安人的土地，建立了享有各种特权的大庄园。大庄园制是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实行殖民统治的经济基础。大庄园主在所谓“保护”印第安人的幌子下，对印第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被“保护”的印第安人为了使用小块份地，被迫在大地主的庄园上从事劳役和负担沉重的地租。他们实际上就是农奴。在 17 世纪末“监护制”废除后，许多印第安人又陷入“劳力偿债制”的泥潭。庄园主对待这些雇农特别苛刻，他们往往利用预付工资或强迫他们在其商店赊购物品的办法，使这些印第安人永远无法清偿债款，世代成为他们的债务奴隶。

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是大庄园制的另一种经营形式，盛行于葡属巴西、西

印度群岛和西属南美殖民地大西洋沿岸等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区。种植园主要种植甘蔗、棉花、烟草、可可等出口经济作物。种植园主不仅占有大片土地，而且占有土地上的全部劳动者。最初在种植园从事劳动的主要是印第安人，他们都是种植园主的奴隶。可以被任意处置，大批印第安人因劳累过度而死亡。后来，为了补充劳动力，殖民主义者又从非洲贩运来上千万的黑人充当奴隶。据估计，在 1850 年停止奴隶贸易前，输入巴西的黑人奴隶达 1200 万。西印度群岛和巴西一时成为世界最大的蓄奴区。黑人奴隶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他们往往一天要从事长达十几小时的劳动，生活条件又非常恶劣，因此一个壮年黑奴，常常工作六七年后就被折磨而死。

殖民地的贵重金属矿藏是欧洲殖民者大肆劫掠的对象。他们到处寻找金银产地，每发现一处金银矿藏便立即宣布为王室的私产并租给私人矿工开采。开发矿藏的劳动力主要是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在墨西哥、秘鲁等地采矿区，西班牙殖民当局实行“分派劳役制”的强迫劳动（在秘鲁称为“米达制”），根据这种徭役制度，每年都有大批印第安人轮流被强征到金银矿中从事奴隶劳动，为殖民者采掘大量金银财富。这种采矿劳动异常艰辛，再加上非人的待遇，被征者很少生返，所以每当被征派的人离开自己的村庄时，亲人都悲哀地预先为他们举行葬礼。据记载，那时在墨西哥一些矿井周围，好几里以内都堆满了印第安人的尸骨，景象十分悲惨。巴西的米内斯吉拉斯金矿也有类似的情景。据估计，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开始之后不到一个世纪，被屠杀和被折磨致死的印第安人达 1300 万至 1500 万之多。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换来了殖民者手中的灿灿金银。宗主国还采取各种措施阻挠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农业方面，西班牙不准美洲殖民地种植葡萄、橄榄树、亚麻等，以便保证宗主国的葡萄酒、橄榄油、亚麻布能在殖民地高价出售。他们在殖民地推行单一作物制，只准大批生产甘蔗、烟草、棉花和可可等经济作物，以保证在出口中赚取高额利润。工业方面，禁止殖民地开采和加工铁矿石，禁止生产宗主国能够输出的产品，如不准纺织棉花和毛呢。葡萄牙禁止巴西建立工厂，只许小规模地生产奴隶穿的衣服。他们用贱价收购殖民地的原料，同时又强迫殖民地人民从宗主国商人手中购买价格昂贵的欧洲商品。由于这样，殖民地的工农业十分落后。

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贸易实行严密控制，禁止殖民地与宗主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来往，各殖民地之间也不准互相贸易。殖民地全部贸易都垄断在宗主国大商人手中，实行极不公平的交换，他们把质量差、价格高而殖民地人民又不需要的商品强行推销给殖民地人民，重利盘剥，而殖民地每年却要向宗主国交纳大宗赋税，贡奉贵重的金银财物，宗主国专横的贸易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

天主教会是宗主国在拉丁美洲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是殖民者控制、奴役印第安人的精神武器。教堂遍布各地，各个教派的传教士强迫印第

安人改信天主教，麻痹他们的斗争意志。教会设立宗教裁判所，镇压异端。殖民地全部文化教育事业都处于天主教会的严密控制之下。由外地运入的书刊必须经过教会的严格审查，凡是不符合天主教的言行，都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残暴制裁。教会还是殖民地最大的封建剥削者，它拥有殖民地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并征收什一税。

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征服与劫掠，极其严重地摧残和阻碍了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二）殖民统治的危机

宗主国的殖民政策不能长久阻遏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到 18 世纪末，殖民地经济已经有了明显的增长。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许多手工作坊，生产着各式各样的铁器、纺织品、家具、皮革、火药和玻璃等等。到 19 世纪初墨西哥开雷他罗镇一地即有 18 家手工工场和 300 家以上的小型作坊，拥有纺织机 1280 台，工人 9000 人。殖民地生产的染料、蔗糖、棉花、兽皮和烟草开始在欧洲各地畅销。巴拿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的造船业也发展起来。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的巴西也建立了纺织、造船等一系列的手工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殖民地人民提出了自由贸易的口号，强烈要求在经济上彻底摆脱宗主国的束缚。宗主国曾被迫放宽了一些贸易上的限制，实行了某些改革，如西班牙在 1774 年下令准许各殖民地相互贸易；1778 年又允许殖民地与宗主国间自由贸易等等。殖民地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跃起来，各地出现了新的经济中心，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等。商人人数激增，布宜诺斯艾利斯从 1738 年的 75 人增至 1778 年的 635 人，许多商人的资本在二三十年增加 10 倍乃至 50 倍。商业资本的发展对殖民地封建经济起着瓦解的作用。

同时，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刺激了大陆沿海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经济的发展。18 世纪末出现“可可热”，仅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省就有 1444 个可可种植园，委内瑞拉每年出口可可 807 万公斤。这种大种植园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使用黑奴劳动，但种植园主“一开头就不是谋生，而是建立商业企业”。

拉丁美洲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宗主国极力维护的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推动着殖民地人民走上独立战争的道路。

在西属殖民地中，人口总共有 1600 万。社会最上层是约 30 万直接来自西班牙的大官吏、高级僧侣、大商人和大地主等，这些“半岛人”（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半岛上，故有“半岛人”之称）霸占着殖民地的行政、军队、法庭和教会的高级职位。他们是殖民地社会的统治者、压迫者。其次是约 300 万土生白人（又称克列奥人），这些人是西班牙移民的后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2 册，第 340、265 页。

掌握着殖民地大部分土地，构成殖民地社会地主集团和中级官吏的核心。他们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同时与宗主国又有矛盾。他们名义上与“半岛人”平等，同样是宗主国的公民，实际上却被排除于行政机构、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务之外。在西班牙统治美洲期间的170个总督中，只有四个是土生白人，由于这种排挤和歧视，他们与宗主国殖民当局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到18世纪末，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土生白人中间产生了殖民地早期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地主中也分裂出一个与世界市场有联系的种植园主集团，他们对宗主国殖民当局把持政权压制殖民地工商业的发展深为不满，要求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希望同宗主国分离。他们作为“美洲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在他们中间出现了独立派，成为后来独立战争中的领导力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叫墨斯提左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后代叫穆拉托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叫桑保人，这些混血人种有五百万左右，构成殖民地社会广大劳动群众，如手工业者、小贩、自由牧民等，还有少数人做下层神父。混血种名义上虽被视作自由人，但并不享有法律上的公民权利，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随时有破产的可能，而且还要遭受种族歧视，他们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占殖民地人口半数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是殖民地社会的最低层，印第安人绝大多数为佃农和债奴，黑人一般是种植场的奴隶，他们遭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最重、最深，因此，革命性最强，斗争最坚决。广大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由于不堪忍受残暴的殖民统治而不断掀起激烈的反抗斗争。印第安人的起义，往往是在复兴印第安国家的口号下进行的。1742年在秘鲁爆发了几万印第安人的起义，起义者赶走和杀死殖民官吏、地主和传教士，起义的领导者胡安·桑托斯，就自称是“印加帝国”统治者的后代，把复兴印加国家作为起义的主要目的。1780年秘鲁的印第安人又在康都尔堪基领导下举行起义，号召印第安人复兴独立的“印加帝国”，参加者达数万人，起义队伍席卷秘鲁南部广大地区，历时两年之久。这些起义和反抗虽然最后都遭失败，但却表现了拉丁美洲人民不甘屈辱，争取自由和独立的革命精神。

在巴西，社会结构和西班牙殖民地相似，不同的是巴西300万人口中黑人奴隶要占一半，黑人奴隶不断地掀起反对奴隶种植园主的斗争。1630年有两万多黑人聚集在棕榈丛林中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巴马瑞斯国，抗击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围剿，前后坚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巴西众多的黑人奴隶是反对殖民统治的主要力量。

殖民地社会存在着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但是，民族矛盾是当时殖民地社会的主要矛盾。印第安人、黑人、混血种人虽和土生白人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存在着阶级的、种族的矛盾，但他们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共同遭受民族压迫，有着迅速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愿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殖民地人民能够联合起来，把矛头指向主要的敌人，即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者，

掀起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

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美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拉丁美洲人民有很大影响。18世纪下半期，殖民地出现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大都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受过教育，熟悉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和著作，熟悉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历史，以这些人为核心，开始在殖民地传布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进行争取独立的舆论准备和秘密活动。哥伦比亚人纳利诺（1769~1822年）于1794年用西班牙文印发了法国的《人权宣言》。智利共和主义者罗哈斯（1743~1816年）曾从欧洲带回大批书籍，在智利建立秘密组织，阅读和讨论《人权宣言》和《百科全书》。委内瑞拉的米兰达（1750~1816年）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深受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后来成为独立战争的领导人之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为独立运动进行了思想准备。

18世纪末，欧洲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796年英法战争之际，西班牙被迫与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加入对英国的战争。由于英海军封锁，西班牙商业愈益萧条。1807年，葡萄牙、西班牙被迫参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后，英国更增强对西海岸的控制。这就削弱了西班牙对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控制，从而有利于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

第二节 海地革命（1790～1803年）

海地原为西班牙的属地。到17世纪中叶，法国殖民势力伸进该岛，西班牙根据1697年里斯维克条约把海地割让给法国。

法国殖民者占领海地以后，设立了以总督和天主教大主教为首的殖民统治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奴役性法令，广泛实行了最残酷最野蛮的奴隶制度。他们在海地建立了甘蔗、咖啡、蓝靛等热带作物的大种植园。由于岛上原有的居民印第安人早被殖民者虐杀殆尽，法国殖民当局远从非洲运来大批黑人奴隶，担负种植园的繁重劳动。黑人的血汗为殖民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海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热带殖民地之一，出产了当时西方市场上大部分的糖和咖啡，其出口贸易额占法国殖民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据记载，当时岛上的法国大种植园主拥有豪华的宫殿、镀金的大马车和成群的仆役，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法国殖民者包括殖民地的高级官吏、大种植园主、大商人、军官和高级教士等有四万人左右。他们人数不多，却控制着整个海地的经济命脉，霸占着海地政治、经济、军队和教会中的重要职位，是海地社会的统治阶级。占海地人口十分之九的黑人奴隶有48万人，他们全无人身自由，境遇悲惨，长期以来，不断掀起暴动和进行逃亡斗争。还有约三万人的自由有色人种，包括混血人种和自由黑人，他们占有少量土地，多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政治、经济上都受到殖民者的严格限制和歧视，法律规定他们不准在军队和公共机关任职，不准带宝石、乘马车，甚至不准去巴黎旅行。黑人奴隶、自由有色人种与法国殖民者之间存在尖锐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成为海地爆发革命的基本原因。

海地革命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直接影响下爆发的。海地的自由有色人种，根据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宣布的自由平等原则，首先向法国提出了与白人享有同等公民权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1790年在文森特·奥赫的领导下爆发了第一次自由有色人种的武装起义。由于起义只是孤立的行动，很快被镇压下去，文森特·奥赫被判处死刑。

1791年，海地自由有色人种在布克曼领导下再次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有大批黑人奴隶参加，因而迅速扩展成为消灭殖民统治和奴隶制度的斗争。黑人奴隶怀着满腔仇恨焚烧种植场，处死大种植场主。据当时一个目击者记载，仅起义的两个半月内，就大约有2000个白人殖民者被杀死，180个甘蔗种植园和900个咖啡与蓝靛种植场被破坏。大种植场主纷纷逃往圣多明各岛东部的西班牙殖民地或西印度其他岛屿。杰出的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1743～1803年）成为这次革命的领导人。杜桑原是种植场的一个奴隶和马车夫，年轻时读过启蒙学者的著作，深受法国革命的影响，他向往自由，痛恨黑暗的殖民统治和罪恶的奴隶制度。他在参加奴隶起义的过程中逐渐锻炼成为一个坚决为解放黑人奴隶而战和有军事才能的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

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不久就控制了海地的绝大部分领土。

岛上大种植园主依靠一万名左右的法国远征军对起义进行军事镇压，黑人起义军队虽然武器不足，装备很差，但是他们为争取独立自由解放而战，士气高昂，并得到广大奴隶们的支持，终于打败了法国殖民军。

这时，占领圣多明各岛东部的西班牙人，乘法国和欧洲反法联盟作战的机会，妄图重新占领海地，便以解放奴隶为名，于 1793 年派兵侵入海地。杜桑识破了西班牙殖民者的阴谋，于 1794 年赶走了侵略军，并乘胜追击，几乎全部解放了海岛的东部。处于困境的大种植园主又设法勾结英国前来镇压起义。正在同法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英国则认为这是它霸占海地的极好时机，遂派兵 15,000 名在海地登陆。黑人起义军又一次奋起保卫国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战。1798 年 10 月，英军失败，与杜桑签订条约，承认海地独立，黑人起义军实际控制了全岛。

1801 年，杜桑·卢维杜尔声明海地独立，颁布了宪法。宪法规定：正式废除奴隶制度，居民不分肤色一律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贸易自由，海地独立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等等。杜桑·卢维杜尔被推选为终身总督。

在 1799~1801 年间，以杜桑为首的海地新政府，采取了几项恢复、改造和发展海地经济的重大措施。一、没收已逃亡的种植园的土地，将其分配给起义官兵和无地黑人耕种。但是土地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因此除小农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外，也出现了一批黑人新种植园主。杜桑的部将德萨林和克里斯多夫从一名奴隶成为拥资几十万美元、几十个种植园的大地主。二、废除奴隶制度。解放了的奴隶可以自由选择业主。雇工工资应占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三、发展商业。提倡自由贸易，降低税率，修建道路，扩广马车运输。这些措施促使海地经济的一度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海地宣布独立，正值拿破仑战胜了欧洲列强声势煊赫之时。法国大资产阶级妄图再度控制海地，在岛上重新恢复种植园奴隶制度。同时拿破仑为了与英国争霸，还妄想以海地为基地，实现在美洲建立法兰西殖民大帝国的野心，拿破仑派遣自己的妹夫勒克莱尔将军于 1801 年率领 54 艘战舰和近 3 万名士兵在海地登陆。勒克莱尔率军多次“征讨”失败以后，就施展反革命政治阴谋，1802 年，他以“和平谈判”为名，邀请杜桑会谈，结果竟不顾信义将杜桑逮捕，加上镣铐，送往法国。这位为黑人奴隶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于 1803 年死在法国监狱中。临死前他仍对海地的解放事业充满信心，他说：“打倒我，只是推倒了圣多明各的一棵自由之树。但是这棵树会重新成长起来，因为它已根深蒂固。”

杜桑被捕对于海地革命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是敌人的卑劣阴谋未能征服海地人民，海地人民展开了更英勇的斗争，黑人的誓死抵抗和热带黄热病的侵袭，使法国侵略军损失惨重。海地成了埋葬拿破仑侵略军的坟场。1803 年 10 月，法军终于被迫投降。拿破仑为重征海地先后派去的 43,000 侵略军死亡了 35,000 多人，勒克莱尔本人也死于传染病。法国舰队最后载着 8000

老弱残兵驶离该岛，途中又全部被英国海军俘去，法国殖民军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

赶走法国军队之后，1803年11月29日，海地人民通过了《独立宣言》，它宣布：“圣多明各宣布独立了，我们恢复了我们原有的尊严，维护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宣誓，永远不把我们的权利委弃给任何强国”。1804年1月1日，拉丁美洲第一个摆脱了殖民统治和废除了奴隶制度的国家在圣多明各岛上正式宣布独立，并采用了印第安人的传统名称“海地”作为国名。

海地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大大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信心和斗志。为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斗争树立了榜样，推动了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三节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1810~1826年）

继海地革命成功之后，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而把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推向了高潮。

1808年，法国拿破仑军队侵入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全家被囚禁，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登上西班牙王位。

1810年，法国军队进一步占领了西班牙全境，西班牙中央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这一消息成了西属美洲殖民地各地区发动起义的信号。各地人民相继起义，很快地一场西属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就开始了。

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主要有三个战场：第一是以委内瑞拉为中心的南美北部战场；第二是以拉普拉塔为中心的南美南部战场；第三是以墨西哥为中心的北美和中美战场。

（一）以委内瑞拉为中心的南美北部地区的独立战争

以委内瑞拉为中心的南美北部是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爆发最早，斗争最激烈的一个区域。

独立战争爆发以前，委内瑞拉人米兰达（1750~1816年）长期从事反西班牙统治的密谋活动。他竭力争取欧美诸国的援助，期望在外国的援助下实现委内瑞拉的独立。1806年，他在美国组织了一个远征队，在委内瑞拉海岸突袭登陆，这次起事由于脱离国内人民群众，未能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很快就失败了。

1810年法国军队占领西班牙的消息传到委内瑞拉，首府加拉加斯4月19日爆发了起义。起义者驱逐了西班牙殖民官吏，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新政府主要由土生白人组成，他们改组了司法机关、军队，在贸易、税收方面实行了改革，还宣布禁止买卖奴隶等。继加拉加斯起义之后，新格拉纳达全境都群起响应，革命政府纷纷建立。1810年12月，米兰达回到委内瑞拉，他领导“爱国协会”进行独立和成立共和国的宣传鼓动，力图促使革命走上争取独立的道路。1811年3月，召开了新选出的国民议会，7月通过了《独立宣言》，委内瑞拉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了以米兰达为首的共和国政府，并制定了宪法。但是共和国政府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改善人民群众的处境，也没有坚决肃清残存的西班牙反动势力。1812年春天加拉加斯等地又不幸发生了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很大损失，反动势力乘机骚乱。这时，盘踞在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的西班牙殖民军队和内部反动势力相勾结，向共和国发动了进攻。共和国政府本来就缺乏群众基础，再加上领导内部又产生严重分歧，共和国军队连连失败，7月25日米兰达与西班牙军签约，同意放下武器，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终于被绞杀了。米兰达本人也被捕，后来死于西班牙狱中。

共和国虽然夭折，但是委内瑞拉革命者没有气馁。他们在第一共和国领

领导人之一西蒙·波利瓦尔（1783~1830年）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波利瓦尔出身于加拉加斯土生白人地主家庭，青年时代曾往欧洲留学，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第一共和国失败后，波利瓦尔历经艰险，流亡到已经解除了西班牙束缚的新格拉纳达的卡塔黑纳城，很快组成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于1813年重新远征委内瑞拉，并很快解放了委内瑞拉西部，顺利地占领了加拉加斯。1814年1月，第二委内瑞拉共和国宣布成立。但是，波利瓦尔仍然没有采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的措施，也没有把委内瑞拉的全体爱国力量团结起来。1814年夏，西班牙殖民军队和国内的受西班牙煽动而与新政权对立的混血种雅诺斯移民结合，对共和军发动进攻，共和军屡遭失败，共和国又被摧毁，波利瓦尔被迫流亡国外。

拿破仑帝国瓦解以后，西班牙皇帝斐迪南七世又恢复了王位，他于1815年派出一支万人的“讨伐队”，由刽子手莫利略率领开往美洲。莫利略于4月到达委内瑞拉，对革命者实行了极端残酷的镇压。

但是，革命者并没有放弃战斗。流亡海地的波利瓦尔，在海地共和国的大力支持下，重新组织革命队伍，1816年3月和11月先后两次从海地率领军队返回委内瑞拉。后一次他接受一个爱国人士的建议，先不攻打驻有重兵的加拉加斯，而是首先占领了易于防守的委内瑞拉东部奥里诺科河沿岸的地区，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一次波利瓦尔总结了以往多次失败的教训，采取了许多社会改革措施。如1816年5月，他签署和颁布了废除奴隶制度的法令，1817年他宣布没收西班牙王室和一切反动分子的土地，并应允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参加革命的士兵等等。这些措施对独立战争的进程发生了影响，大批奴隶、农民、草原牧民踊跃参加起义部队，参加争取独立的斗争。各地起义队伍也纷纷投奔波利瓦尔，一时起义力量得到很大发展。1818年10月，波利瓦尔在他占领的地区宣布建立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

1819年5月，波利瓦尔制定了一项大胆的进攻计划，他率领一支军队长途跋涉，翻越安第斯山突袭哥伦比亚。在高山上行军非常困难，连马匹都大量死亡，但起义军队仍然奋勇前进。经过艰苦的行军战斗，起义军队终于解放了哥伦比亚地区。

1819年12月，包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在内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宣布成立。此后，波利瓦尔继续率军战斗。1821年7月，他的部队开进了加拉加斯城，肃清了在委内瑞拉的殖民军和反动势力。1822年占领了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厄瓜多尔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联合一起成立了统一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波利瓦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至此，南美北部的独立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二）以拉普拉塔为中心的南美南部地区的独立战争

拉普拉塔地区是经济比较落后的一个区域，西班牙殖民统治力量也比较

薄弱。1810年初，拉普拉塔地区出现了土生白人的秘密结社，从事争取独立的活动。同年5月，西班牙全境被法国占领的消息传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土生白人立即举行示威游行，推翻了西班牙任命的总督，成立了土生白人领导下的临时政府。附近各省随即纷纷响应。1811年6月，巴拉圭在土生白人领导下爆发了起义，逮捕了西班牙省长，建立了临时政府并于8月宣布独立。翌年乌拉圭也爆发了武装起义。拉普拉塔各省的政权先后都从西班牙殖民当局手中转到土生白人的富商、大地主、大牧场主手中。

盘踞在秘鲁的西班牙殖民军曾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动进攻，但被临时政府击退。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着手联合各省区以建立统一的国家，实现全地区的统一。1816年7月，各省代表聚会，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拉普拉塔联合省”。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其主要内容有：鼓励自由贸易，铸造新币，禁止发行强迫公债，取消印第安人的“人头税”和“分派劳役制”，禁止输入黑人奴隶等。由于各省区之间存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的矛盾，联合省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拉普拉塔地区独立战争杰出领导人是圣·马丁（1778~1850年）。他出身于阿根廷土生白人船主的家庭，曾在西班牙任西班牙军队职业军官，与留学西班牙的拉丁美洲革命人士有过密切交往，参加了秘密革命团体，立志献身于拉丁美洲独立解放事业。1812年他回到南美拉普拉塔地区领导民族独立斗争。18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任命他担任北方军总指挥，负责解放上秘鲁的任务。圣·马丁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指挥才能，他考虑到：要保障拉普拉塔联合省的独立，首要步骤应该是集中全力解放秘鲁，因为秘鲁驻扎着几万殖民军，是西班牙控制南美的一个中心堡垒。因此他制定了一个军事计划：率军越过安第斯山脉，首先解放智利，然后再从海上进攻秘鲁。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辞去了北方军总指挥的职务，于1814年来到安第斯山麓库约省门多萨城，用了三年时间，从事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训练军队并宣布解放奴隶，得到广大黑人奴隶和混血种人的积极支持。许多智利的爱国志士也踊跃参加他的队伍。1817年春，圣·马丁和智利的革命领导人沃伊金斯率领一支5000人的队伍翻越高达四千多公尺的安第斯山隘，出其不意地向智利的西班牙军队展开进攻，西班牙军队全面崩溃。1818年2月智利正式宣布独立，组织了以沃伊金斯为首的土生白人地主资产阶级政府。

智利独立以后，圣·马丁又着手进行解放秘鲁的组织工作。在智利政府的支持下，他组建了一支舰队。1820年8月，他亲率舰队从海上向西班牙在美洲最顽固的殖民堡垒秘鲁进军。圣·马丁的军队在秘鲁登陆后，受到沿海一带秘鲁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印第安人自动加入革命军队，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很快于1821年7月攻下了秘鲁首府利马。秘鲁宣布独立，授予圣·马丁以共和国“保护者”的称号。西班牙驻利马总督逃至东部山区，纠集了两

1856年“拉普拉塔联合省”改组为阿根廷联邦共和国。

万多殖民军负隅顽抗，直接威胁利马的安全。为了彻底消灭这支殖民军队，圣·马丁和波利瓦尔取得联系，以便联合全体爱国武装力量解放整个南美。1822年7月，南美大陆南北两支大军的领导人波利瓦尔和圣·马丁在瓜亚基尔(厄瓜多尔)举行了秘密会议，商讨了重大军事问题。这次会见以后，圣·马丁回到利马，不久辞去了秘鲁政府首脑的职位离开了秘鲁。最后解放秘鲁的任务是由波利瓦尔完成的。波利瓦尔联合了大陆上一切力量，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久就和西班牙殖民军在秘鲁境内展开了两次决定南美命运的大战。一次是1824年8月6日在胡宁平原上的决战，战斗中双方短兵相接，进行了白刃战，经过激烈的交锋，革命军终于把殖民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获得胜利。同年12月9日，在阿雅库乔高地进行了另一场决战，由波利瓦尔的战友苏克雷将军率领的革命军队又大败西班牙军，俘虏了秘鲁总督，四个敌军元帅，十个将军和几千名士兵。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这次战役，指出这是“一次最终保证了西属南美洲独立的会战”。

此后，苏克雷又率领军队解放了上秘鲁。1825年1月上秘鲁宣布独立，为纪念波利瓦尔的功勋，新共和国命名为玻利维亚。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驻在卡亚俄港口堡垒中的最后残军向波利瓦尔投降，至此秘鲁全境获得解放。西班牙在南美大陆的势力被彻底摧毁，300年的殖民统治宣告寿终正寝。

(三) 以墨西哥为中心的北美和中美地区的独立战争

墨西哥地区距离宗主国较近，是重要的银矿产地，殖民统治势力比较强，土地贵族和教会势力也最大。当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全境的消息传来以后，墨西哥的土生白人中间也产生了争取自治和独立的运动。但是由于西班牙统治者的严密控制，首都的土生白人始终未能形成足以动员广大群众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的领导权一开始就掌握在外省的下层牧师、低级官吏和小地主手中。

1810年9月16日，在伊达尔哥的带领下，多洛雷斯爆发了人民起义。伊达尔哥(1753~1811年)是多洛雷斯镇的牧师，熟悉法国革命的历史和启蒙学者的著作，平时接近群众，积极宣传法国革命的“自由”和“人权”思想。他对印第安人很同情，关心本教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很受当地居民信任。他参加了圭列大罗城的一个秘密组织，准备在1810年12月举行反西班牙的起义，宣布墨西哥独立。但因这个秘密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参加者被捕，伊达尔哥为了应付这种紧急情况决定提前起义。9月16日凌晨，他敲响教堂的钟，召集了当地的群众，号召大家为自由和土地而斗争。他向大家呼吁：“你们愿意自由吗？300年前可恨的西班牙人夺去我们祖先的土地，你们愿

马克思、恩格斯：《艾阿库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72页。

意全力以赴地夺回吗？”群众高喊“独立万岁！”“打倒坏政府！”“消灭西班牙强盗！”这就是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后来，墨西哥人民把这一天定为墨西哥独立节。

伊达尔哥率领起义军向驻守在附近城市的西班牙军队展开进攻。伊达尔哥为了动员群众下令废除奴隶制度，废除印第安人的贡税，将一切非法夺取的土地归还印第安人。大批下层劳动群众纷纷投奔起义队伍，他们拿起斧头、砍刀、棍棒到处攻打大地主庄园，烧毁房子，没收财物并处死不少作恶多端的大庄园主。墨西哥革命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的性质。起义部队取得了很大成功，起义席卷整个墨西哥北部并逼进首府墨西哥城，队伍迅速扩大到8万人。但是伊达尔哥缺乏军事斗争的经验，在军事进攻问题上犹豫不决，本来可以乘胜一举攻下墨西哥城，而伊达尔哥却错误地下令撤军，丧失了战机。此后起义部队虽然还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缺乏坚强统一的军事指挥，内部又发生分裂，战斗力逐渐削弱。1811年初起义部队在转移中遭到敌人伏击，伊达尔哥和几名主要领导人都被俘牺牲。

伊达尔哥牺牲后，他的学生和战友莫瑞洛斯（1765~1815年）继承了他的事业。莫瑞洛斯是一个贫苦的乡村牧师，混血种人。他继任军事领导人后，吸取伊达尔哥失败的教训，不和装备优良的敌人进行大规模正面交锋，而采取分散的游击战争，经过两年的战斗，起义军控制了墨西哥南部的大部分地区。1813年9月，莫瑞洛斯在他控制的区域召开了有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级僧侣参加的国民议会，莫瑞洛斯提出了种族平等，废除教会和军队特权，征收教会土地，没收富人财产，消灭大地主鼓励小土地所有制及普遍选举制等社会经济主张，这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提出的最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11月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

1814年斐迪南七世在西班牙复位后，西班牙殖民军得到大量增援，开始对革命进行疯狂反扑，起义军内部一些土生白人地主由于惧怕激进的革命要求转而投降敌人。在敌人进攻下起义军遭到失败，1815年莫瑞洛斯被捕后壮烈牺牲，剩下的起义队伍转入山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1820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在墨西哥的殖民者和殖民地上层分子，害怕西班牙革命会再次引起墨西哥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便提出脱离西班牙的主张，以便夺取独立运动的领导权。这时西班牙殖民军中一个曾经镇压过独立运动的军官伊都维德上校怀着个人野心出来大肆活动，他打出要求脱离西班牙实行独立的旗号，同时又主张在墨西哥保持反动的大庄园制和维护教会的利益，他的活动赢得大地主、教会上层的支持，他的独立口号也欺骗了一部分下层群众。1821年伊都维德篡夺了政权，宣布墨西哥独立。

野心家伊都维德夺取国家权力后于1822年5月又恢复帝制，自立为奥古斯丁一世，建立了墨西哥帝国。伊都维德的帝国遭到墨西哥人民的反对，即位不到十个月就被推翻了。1824年墨西哥新宪法确定墨西哥为联邦共和国。

在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中美地区也于 1821 年脱离西班牙宣布独立并一度加入墨西哥。1823 年又脱离墨西哥建立了联邦共和国——中美联合省。1838 年中美联合省分成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五个国家。

第四节 巴西的独立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在葡属巴西也掀起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争取独立的运动。

18 世纪末，巴西的商品货币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也出现了手工工场。经济力量日益增强的殖民地土生白人种植园主、商人和手工工场主，迫切要求摆脱殖民统治的束缚。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海地革命的胜利都鼓舞了巴西人民争取独立的信心。1789 年在米内斯吉拉斯省成立了一个由牙医希尔瓦·哈维厄（“拔牙者”）领导的，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密谋组织，提出推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建立共和国，实行自由贸易和改善奴隶处境等要求，后因叛徒告密，组织遭到破坏，哈维厄被捕，17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就义。19 世纪初，巴西黑人奴隶约占全国 350 万人口的一半以上，白种人只有 80 万人，其余是自由黑人、印第安人和各种混血种人。巴西的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为反抗殖民剥削和种族压迫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06 年圣保罗的黑人奴隶就曾举行过大规模的起义，在巴依亚等地区黑人起义也多次发生。

1807 年底，拿破仑军队大举入侵葡萄牙。葡萄牙王室在英国海军的帮助下，仓皇逃到了巴西。王室迁到殖民地以后，加强了对巴西的直接统治，巴西暂时变成了葡萄牙王国的政治中心。为了巩固这个统治基地，葡萄牙王室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主要是改组管理体制，加强了王室对各省的直接控制。在经济上，取消了对巴西的贸易垄断，开放了巴西的港口，允许巴西和其他国家通商。国王还颁布了关于一切工业部门都有企业活动自由的敕令，撤销了限制采矿活动和阻碍巴西本地工业发展的法律和条例，颁布了一些鼓励外侨入境的法令，在交通运输和邮政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

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其目的首先在于促进巴西工商业的发展，以保证王室和随同迁来的大臣、文武官员对于工业品和其他商品的需要。同时葡萄牙统治者也想用此来笼络当地的统治集团——大庄园主，缓和他们对于宗主国在贸易上加给殖民地种种束缚的不满情绪。在国际上则是以开放巴西市场来换取英国的支持和庇护。总之，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加强和巩固葡萄牙对巴西的统治，而未能改善殖民地人民的处境。相反，王室迁来巴西以后，由于王室及其所属行政机构和军队的巨额开支，殖民地捐税不断加重，殖民地人民深受各种捐税的重压。巴西港口开放以后，英国势力逐渐垄断了巴西市场，本地工商业由于无力竞争而遭受极大摧残。王室官吏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和作威作福也日益使人不能忍受。1816 年王室又出兵侵占乌拉圭，更加重了殖民地人民的负担。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殖民地各阶级的不满。处于巴西社会最低层黑人奴隶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宗主国和本地剥削阶级的压榨下，处境日益恶化，反抗情绪高涨。

1813年巴伊亚发生了大规模的黑奴起义，在起义过程中，有600名武装的黑人向市中心奴隶主住宅发动了进攻，殖民当局动用了军队，黑人奋力进行抵抗，直到几乎全部牺牲以后起义才被镇压下去。1814年至1815年间，米内斯吉拉斯金矿也爆发了黑奴起义。许多城市出现了共济会等秘密组织和团体，从事争取独立的活动。

1817年3月，伯南布哥省的土生白人发动了起义，这是巴西独立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起义是由该省的一些巴西籍军官、商人和庄园主领导的。起义者赶走督军，夺取了地方政权，在该省首府累西腓建立了有各阶级代表参加的临时洪达，洪达权力很快扩展到全省。洪达宣布成立共和国，取消等级制和等级特权并废除了苛捐杂税、贸易垄断和其他贸易特权。洪达还派人往邻省宣传，号召参加起义。但是由于起义领导者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不愿也不敢触动巴西的社会基础——奴隶制度，致使黑人奴隶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未能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斗争，同时起义只局限在该省，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广泛发动，结果在葡萄牙军和外国雇佣兵的镇压下，起义终告失败。

巴西各地的起义和反抗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殖民者，但最终未能推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这是因为巴西独立运动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斗争是分散的；黑人奴隶、印第安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提不出明确的斗争纲领；巴西的商人、手工场主由于本身软弱也没有力量来领导这场斗争。

1820年葡萄牙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新选举出来的议会要求下，若奥六世于1821年回国，他把儿子彼得罗留下统治巴西。鉴于当时巴西争取独立的革命形势，他临行时嘱咐儿子，如果情势变化可立即宣布独立，自立为帝。彼得罗就任巴西摄政王。不久，葡萄牙议会也要求彼得罗回国，彼得罗拒绝了。当时，巴西国内局势动荡，要求独立的呼声遍及全国，许多地区都在酝酿独立，资产阶级共和派提出了独立共和国的要求。面临爆发新的革命的威胁，巴西的大种植园主、大商人和上层保守分子为了预防革命的爆发，乃在1822年拥戴彼得罗为帝，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1823年7月，最后一批葡萄牙殖民军被迫从巴西撤走。

巴西的独立是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多次武装起义、流血牺牲和坚持了长期的斗争才取得的。可是斗争的果实却被大种植园主、大奴隶主所窃取。后来，巴西人民又经过半个世纪的英勇斗争，才于1888年废除了奴隶制，并在1889年建立了共和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殖民主义，同时也反对封建剥削制度和种植园奴隶制度。这次革命运动波及地区之广，卷入斗争的人口之多，斗争时间之长在殖民地革命斗争史上都是空前的。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最主要的成果是摧毁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美洲的

殖民统治，除古巴、波多黎各以及英国的岛屿殖民地和英属洪都拉斯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摆脱了西、葡、法的殖民枷锁，先后建立了海地、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乌拉圭、巴西等17个独立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在宣布独立以后都颁布了宪法，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有巴西保存了帝制。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使各国教会的政治经济权力受到很大限制，极端反动的宗教裁判所被废除，贵族称号也被取消，巴西除外，各独立国家都先后明文规定禁止奴隶制。农民摆脱了向地主、国家和教会进行无偿劳动的义务，殖民时期阻止生产发展的各种商业限制都被取消，实行了自由贸易。所有这些措施和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制度和种植园奴隶制度，推动了拉丁美洲社会的发展。

但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没有能够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主要表现就是没有触动原有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大地产制，没有废除保守的天主教会。在独立战争中印第安人、黑人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领导权却始终掌握在土生白人地主、种植园主、官吏和上层教会人士手中。这些领导人一方面反对殖民制度，另一方面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大庄园制和封建剥削。独立以后，政权仍然操纵在这些人手中，因而原有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大地产制得以保存下来。正是由于大地产制和封建剥削的继续存在，独立以后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普遍十分缓慢，在经济上也没有真正摆脱对殖民主义国家的依赖地位。后来英、美、德等侵略者又陆续把它们的侵略魔爪伸进了拉丁美洲。

第八章 19 世纪 30、40 年代的西欧主要国家

第一节 1815 ~ 1847 年的法国。法国 1830 年革命

(一) 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1814 年，路易十八在反法联军的护送下返回法国登上国王宝座的时候，在沙皇亚力山大一世的授意下，颁布了一部宪法，称之为“宪章”。“宪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及其大臣的权力受议会的限制，议会由贵族院及众议院组成，贵族院议员是国王直接指定的，众议院议员通过选举产生，但是为选民规定了很高的财产资格，只有上层资产阶级方有资格参加选举，劳动人民甚至中、小资产阶级也被剥夺了选举权。第二，承认《拿破仑法典》继续有效，从而确认了大革命中发生的财产关系的变化，确认了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获得的果实。第三，保留拿破仑时代的行政和司法制度，换言之，把拿破仑帝国的官僚警察机器全盘接受过来。第四，承认大革命所实现的公民平等，承认废除僧侣和贵族的等级特权。第五，宣布出版自由等等。可见，颁布这个“宪章”意味着波旁王朝对于大资产阶级的妥协。这是因为路易十八及沙皇从过去二十多年的法国革命风暴中认识到：假如在复辟伊始不顾一切地恢复革命前的专制封建秩序的话，不旋踵就会引起法国人民的反抗，路易十八的王位是想坐也坐不稳的。为了缓和法国人民的革命情绪，暂时欺骗一下，装成和革命和解的样子，是大有必要的。沙皇亚力山大说：假如不在法国颁布一个有“避雷针”作用的“宪章”的话，波旁王朝就有被新的革命推翻的可能。路易十八本人说：王座是“最舒服的椅子”，所以他不愿再度去“旅行”了。

“宪章”之颁布，受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欢迎，因为他们由于害怕人民，实在不愿意法国再发生革命动荡，他们宁愿与复辟王朝妥协，以便安稳地剥削人民。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却反对“宪章”，因为它剥夺了劳动人民的选举权，使人民继续处在被压迫地位。群众不相信路易十八及他所代表的僧侣贵族对人民有什么好心肠的。

不久，人民群众的这个想法被证实了。和路易十八一道回国的流亡贵族及僧侣开始以白色恐怖对待人民及革命分子。他们罗致居民中的败类充当打手，到处迫害和杀害大革命时期及帝国时期的积极分子，仅仅在亚威农一地，就杀害五百余人。路易十八的政府还组织军事法庭及特别法庭审问革命分子及拿破仑分子，它们所判决的案件达 1 万件。

在第二次复辟后，有 15 万反法联盟军驻扎在法国（到 1818 年才撤走），占领军时常任意掠夺和屠杀居民。因此，法国人民落到本国反动派及外国占领军的双重压迫下。但是，法国人民是爱好自由的，他们不断地挺身而出，与压迫者进行英勇的斗争。

1821年法国出现了一个秘密团体，名曰“烧炭党”，它企图用军事密谋的方法推翻波旁王朝的统治。这一团体的主要成员为退伍军官、律师、大学生、商业从业员及自由主义工业家。拉法叶特将军是其中著名的活动家之一。烧炭党在各地的军队及军官中展开活动，并且准备在1822年元旦以伯尔福城为中心发动起义。但密谋为警方侦悉，多人遭到逮捕，因而起义被扼杀在摇篮中。法国其他地方的烧炭党人起义也相继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烧炭党采取狭隘的密谋方式，远远脱离了群众，加以党内成分复杂，意见纷纭，领导者又举棋不定，动摇妥协。

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家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反对复辟王朝的斗争。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最著名的有奥古斯特·提厄里和基佐等人，他们出版许多历史著作，如提厄里的《第三等级形成和发展史概论》；基佐的《法国文明史》《英国革命史》等书。他们能够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阐述历史，并且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和僧侣斗争的历史；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斗争的历史。他们猛烈抨击封建贵族特权和封建专制制度，热烈赞扬资产阶级的兴起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并强调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论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必将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们这些反对封建贵族和封建制度的主张，为推翻复辟王朝的革命制造舆论，但是他们所强调的阶级斗争仅仅是极力美化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而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则极端仇视，诬蔑这种阶级斗争是“不合法的”。

复辟王朝时期法国资本主义继续有所发展。因为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而拿破仑统治又使这种发展得到了巩固。这个时期，轻工业发展较快，1815~1830年丝纺织品的产值增加了两倍。煤、铁和交通运输也都有所发展。1825年英国取消禁止机器出口的法令后，英国机器也大批输往法国，法国各种工业特别是棉、丝纺织业采用机器更形增多，如上莱茵省绵纺织工业机器增加了近十倍。工业中使用蒸气机有很大增长，由1820年的65架增加到1830年的625架，18世纪末开始的法国工业革命继续前进了一步。冶金工业的发展虽较轻工业为慢，但也有所增长，冶铁工业的产量到1825年增加到1.6公斤。农业技术也有改进，生产有所增长，但农业中仍然以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总的看来，当时法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步伐较英国缓慢。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农民生活愈益恶化，工人每日工作长达16小时至18小时，工资很低，食不饱腹。当时工人还未能认识到贫困的根源是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因而，这一时期的法国工人运动多系自发性的捣毁机器运动。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劳动群众的苦难，资产阶级知识界的一些先进人物，对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理性社会”的憧憬破灭了，他们开始寻求新的“理想社会”。但是，这一时期法国资本主义关系尚未十分成熟，工人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而且在这一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也还在继续进行。所有这些经济方面和社会阶级方面的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性质。19世纪初期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和傅利叶，他们和英国的欧文并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

昂里·圣西门（1760～1825年），出身贵族，承袭伯爵，青年时代问学于百科全书派的达兰贝尔，19岁时，因同情美国独立战争，束装赴美参战，建立战功。23岁回国，担任麦次要塞司令，但在不久即辞职出国。法国革命时，他放弃爵位，与贵族断绝关系，专心致志于改造社会的计划。他的主要著作有：《日内瓦书简》（1802年）、《工业问答》和《新基督教》（1823～1825年）。

他在《日内瓦书简》中指出：法国革命是一次阶级斗争，“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他又提出“一切人都必须劳动”的命题。他对资产阶级的“个性自由”的口号持反对态度，指出：真正的自由不能允许谁只要愿意，谁就可以在团体内游手好闲，为所欲为，相反，这种倾向应当坚决制止。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情揭露和辛辣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并对人类的未来怀着善良的愿望，相信人类将会出现一个平等、幸福的社会，“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他在晚年的著作《新基督教》中，又进一步指出：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在于“改善占人类最多数的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状况”。总之，他的学说中包含着社会主义成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但是，他又唯心主义地观察社会和阶级，错误地认为工人和企业主同属于一个他所谓的“工业者”阶级，未来社会应由这个“工业者”阶级掌权，这样就可以为劳动者谋取最大幸福。而为了取得政权，他认为“讨论、证明、说服，是工业者所用的唯一方法，他们应该用这种方法去取消贵族、军人、法官、富人等对于社会产业的管理”。他这种论点，实际上就是“阶级调和论”、“阶级合作论”，离开阶级斗争来侈谈社会主义，只能使社会主义成为空想。因而，他虽然孜孜一生，不变初衷，但其理想终成为空中楼阁。以后他的学生安方顿和巴扎尔著有《圣西门学说》一书，宣扬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他的这些门徒在以后工人运动发展的年代成了工人运动的绊脚石。

查理·傅利叶（1772～1837年），商人之子，早年为店员，后经商破产，从事推销员、交易所经纪人等工作，由于涉足商场日久，目击资产阶级欺骗诡诈的卑鄙手段，深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他的主要著作有：《四种运动原理》（1808年）、《新工业世界》（1829年）、《论公社制度》等。他比圣西门更尖锐、更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

的混乱和罪恶，指出，“犯罪——乃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制度（指资本主义制度。——引者）的灵魂”。他又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限制的竞争和经济危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关系的基础是金钱，并认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测量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的尺度。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尖锐地指出它的虚伪性，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并不享有民主和自由，那只是富人所享有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关于抨击资本主义社会部分，是傅利叶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傅利叶的理想社会由他称之为“法郎吉”的基层组织所组成，这是一种农业和工业联合在一起的生产、消费协作组织，劳动者以劳力、资本家以股份参加。每一“法郎吉”成员不宜太多，约在一千六百人至两千人之间，成员都应当劳动，生产总收益除生产费外，按特定比例分配给出资本的股东及出劳力的技术工作者和劳动者。此外，傅利叶还主张设立农业银行来帮助“法郎吉”的生产。

正由于傅利叶错误地主张阶级调和与合作，他多次请当时统治者和资本家赞助他的计划，但到他老死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因之，他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的憧憬终于破灭了。

无论是法国的圣西门、傅利叶，或者是英国的欧文，都一致猛烈抨击资本主义，肯定未来将要出现无剥削的美好社会，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苦难寄予极大的同情，这在当时历史阶段对启发工人阶级意识起着积极作用，“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是，他们还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还不能了解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是全人类的解放者，幻想阶级调和和阶级合作，因而他们的理想成为永远不能实现的空想。而且在以后工人运动发展年代里，他们的学说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他们的信徒成为反动的流派。

（二） 1830 年七月革命。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路易十八在 1824 年死去，乃第亚多瓦伯爵继承王位，称为查理十世。这个流亡贵族的头目对法国大革命怀有刻骨的仇恨，他做梦也在想恢复大革命前的封建专制统治及贵族特权，因此他即位后就加紧向革命人民实行反攻倒算。1825 年在他的授意下，议会颁布法令：凡在大革命期间流亡国外而其土地被没收和出卖的贵族僧侣，概由国家予以金钱的补偿，其总数大约为十亿法郎。这个法令立刻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因为得到补偿的正是过去勾结欧洲封建君主与法国人民作战的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为了筹措这笔赔偿的经费，法国复辟政府还把公债的利息从 5% 减到 3%。法国公债持有

人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减低利息的做法，大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大资产阶级也非常不满。

接着，查理十世又授议会颁布一系列反动法律，它们规定：凡污辱教会“圣物”、“圣像”及教会祭器者，均处以严厉的惩罚——先斩断右手，然后再处以死刑；大学教育由教会僧侣管理。很明显，颁布这些法律的目的在于恢复革命前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这进一步加深了全国人民的不满。

到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以国王名义颁布了六条非常法令，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出版自由；修改选举法，甚至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投票权。这意味着公然破坏“宪章”的原则。这使得法国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在非常法令颁布的当天，巴黎的工人、小手工业者、青年学生和一些退伍军人与士兵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国王的倒行逆施。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国民报》也展开宣传鼓动工作。但是资产阶级看到人民群众革命情绪激昂，又畏首畏尾，徘徊犹豫了。在这关键时刻，巴黎人民进一步行动起来，7月27日运动发展为起义，群众纷纷拿起武器向国王军队冲击。翌日，起义规模扩大，起义参加者锐增到8万人。武装群众攻占了市政厅，升起了三色革命旗帜。当天，一部分国王军队也举行起义，转到人民方面来。29日，武装人民又占领了杜伊勒里宫。当时查理十世正在狩猎行乐，闻讯后仓皇逃往英国。革命胜利了。

七月革命虽然是人民群众出生入死取得的，但是当时巴黎工人阶级还缺乏坚强的组织，因而革命果实为大资产阶级所篡夺，大金融家们组成临时政府，拥戴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国王，建立了“七月王朝”。于是法国政权落到金融贵族手中。

七月革命的结果虽然建立了大资产阶级君主国，但是它粉碎了旧贵族、僧侣在法国重建封建专制制度的企图，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运动和改革，沉重地打击了神圣同盟的反动体系，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在七月王朝统治下，法国政权为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矿、铁矿、森林所有者等“金融贵族”所把持。路易·菲力浦便是他们的首领，因而被称为“钱袋子国王”。

七月王朝的对内、对外政策完全是为“金融贵族”谋利的。在内政方面，“金融贵族”利用政治权力，进行经济投机，攫劫人民财富。其对外政策是软弱妥协，不敢和俄、英、普、奥争衡，怕引起战争，使公债跌价，影响“金融贵族”公债投机的暴利。当时它的对外政策口号是：“不为荣誉花一文钱”。但他们并不忘情于对殖民地的掠夺，1847年，曾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

在七月王朝统治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棉纺织工业中的棉花用量由1831年的2800万公斤增加到1845年的6400万公斤。全国工商资本总额从1830年的300亿法郎锐增到1848年的4500亿法郎，工业用

的蒸气机从 1830 年的 625 架增加到 1848 年的 4853 架，铁路到 1847 年也建成了 1835 公里。开凿运河的长度由 1830 年的 1324 英里增加到 1845 年的 2806 英里。银行业也获得迅速发展，由 1830 年的 12 家增加到 1840 年的 278 家和 1847 年的 354 家。工人人数也激增起来，仅煤矿工人就由 1830 年的 15,000 人增加到 1847 年的 35,000 人。在此时期，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发展较为迅速，但手工工场和手工业的生产仍然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如 1847 年，在巴黎 64,000 多家企业中，雇佣工人十人以上者只有 7100 多家，而雇用十人以下者却有 25,000 多家，其余 30,000 多家都是家庭手工业者，或是雇用工人一人的小作坊。

在此时期，自然科学和技术也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发明。在自然科学方面如勒维利埃从数学理论上预测在天王星外还存在新的行星，因而导致了 1846 年在其预测的位置上发现了海王星。又如加斯帕尔·蒙日发现了微分几何，并奠定了投影几何学，后者大大推动了工业机械和建筑的制图的发展。在技术方面，如 1834 年佩罗发明了多色印花机，同时可印染三四种颜色，大大提高印染生产的功效。又如 30 年代达格尔和尼埃普斯发明了“银版照相术”等。这些科技的新发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阶级矛盾也更加尖锐化。反映在文学上，便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便是欧诺尔·德·巴尔扎克（1799~1850 年）。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把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的世相及资产阶级的肮脏灵魂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起了揭露和鞭挞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作用。

1829 年巴尔扎克发表《朱安党人》，使他名噪一时，他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人间喜剧》。这是一部包括九十多部小说的总集，其中著名的小说有：《高老头》《纽心根银行》《欧也妮·葛朗台》《夏倍上校》《于絮尔·弥罗埃》《邦斯舅舅》《贝姨》《农民》等。在这部巨著中，每一部小说反映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侧面，既独立成书，又连缀相贯，他塑造了两千个典型形象，贯穿全书，有些人物在书中一再重现。在布满这些栩栩如生“典型形象群”的光怪陆离的广阔画廊上，展现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构成了一部 19 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和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他以在资产阶级逼攻下贵族的衰亡作为这部巨著的“中心图画”，“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他用尖刀似的笔锋，冷嘲热讽、惟妙惟肖地使百丑群集、群魔乱舞、散发铜钱臭味的资本主义社会全貌，跃然于纸上，写尽了“没有一个讽刺家能写尽珠光宝气下的丑恶”（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仿照但丁名著《神的喜剧》（简译为《神曲》），把他的这部巨著取名为《人间喜剧》。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 年 4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84、683 页。

《高老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恩格斯指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是一个中小资产阶级作家，但又具有浓烈的贵族感情和意识，他一生潦倒穷困，但又力图挤进贵族圈子，他曾在自己姓氏上加上“德”这样一个表示贵族称号的字。这种世界观的矛盾性是他生活的那个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时代的反映，也是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所经历的生活道路的反映。正因为这样，在他的创作中，一方面对“杨花落尽凤楼空”的没落贵族满怀眷恋之情，对“朱门酒肉臭”的新兴大资产阶级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对资产阶级取代贵族而兴起，予以肯定，并且不仅对大资产阶级，而且也同样对贵族给予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批判。至于他对劳动人民虽然给予一定的同情，但对无产阶级掀起的革命风暴，则感到战栗恐惧，因而在他的创作中也就不能从正面反映出开拓历史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斗争，不能反映出革命的时代雷声，也不可能指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途径。他只是基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幻想在抽象的道德范围内寻找出路，而不敢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这些构成了巴尔扎克创作的最大阶级局限。

（三）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劳动人民的斗争

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劳动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金融贵族”的发财致富，骄奢淫逸，另一方面是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困顿呻吟。因此，这个时期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剧烈、更加深化。最有代表性的是 1831 年和 1834 年两次里昂工人起义。

里昂是法国丝织业中心，30 年代初这里的丝织工人已有 9 万人之多。工人受到资本家敲骨吸髓的榨取，劳动繁重，工资微薄，每天劳动时间长达 18 小时，得来的工资还不能换取一磅面包。1831 年，工人掀起了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资方达成了一个“工资协定”。但是资本家背信弃义地破坏了协议。工人忍无可忍，乃在这一年 11 月 21 日宣布罢工。罢工很快地发展为起义。到 23 日黎明，起义工人胜利地占领了市中心的市政厅，因而控制了全城。在战斗中，工人提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这个口号既表明了起义工人的决心，也激励了群众的斗志，因而取得了初步战果。七月王朝为革命风暴吓破了胆，慌忙调来 6 万大军进行镇压。但是工人浴血奋战，临危不惧，坚持战斗到 12 月 3 日，才最后归于失败。

到 1834 年，里昂工人又举行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是政府的高压政策激起来的：政府不但禁止工人集会，而且还逮捕工人互助会领袖。这一年 4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 年 4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84、683 页。

月9日里昂工人举行总罢工，接着就转为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具有更鲜明的政治性质，不仅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而且还发布宣言，庄严宣告：“我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工人们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和政府军队作殊死的决战，终因众寡悬殊，在12日军队转入反攻占领怀兹镇之后，工人撤到市中心，宁死不屈，坚持战斗到13日，工人最后一个阵地才被攻占。当时工人全部英勇战死。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里昂起义烈士们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法国劳动人民心中。由于当时里昂工人还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指导，加以起义的当时又没有与其他城市工人取得联系，因此，两次里昂工人起义最后都失败了。

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两次起义中，工人们独立地提出本阶级的要求，并为之进行英勇的战斗，这标志着工人运动开始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

自里昂工人起义失败到19世纪中期，法国人民群众运动以罢工、抗粮、抗税的形式在各地广泛展开。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流派也展开了活动，出现了一些秘密革命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布朗基组织的“四季社”。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议员之子，大学时代曾积极参加过七月革命和30年代的共和运动。1837年组织“四季社”。1839年5月，“四季社”发动起义失败，布朗基被捕。布朗基是巴贝夫事业的继承者，思想上拥护共产主义，行动上勇于献身革命，半生岁月是在牢狱中度过的。但他轻视革命理论，犯了一系列严重的理论错误。他不知道密切联系群众，不考虑具体情况，主张只依靠狭小的秘密团体，用脱离群众的密谋暴动方法去夺取政权，因而他多次起义都归于失败。此外，他又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建立“巴黎专政”，但他所主张的“巴黎专政”，也只是一小群职业革命家的专政，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专政，与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处。布朗基这种脱离群众依靠少数人密谋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被称为“布朗基主义”。

这一时期，另一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著名人物是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蒲鲁东。皮叶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青年时代做过印刷工人，以后开设一小印刷店。1840年出版《什么是财产？》一书，1846年又出版《贫困的哲学》。

他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虽然提出“财产就是窃盗”，但他又不主张废除私有制，仅仅是反对大私有，保护小私有；反对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交易所和不正当的贸易，而不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用“交换银行”、“无息贷款”等手段，使小生产者不经过中间人剥削，相互交换产品，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他在《贫困的哲学》中，更系统地阐

“四季社”以七人为一小组，称为“星期”，四个星期即28人为“一月”，三个“月”即84人为一“季”，故称“四季社”。

发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谬论，并公开表示反对共产主义。他认为小私有制是社会幸福的基础，是自由的保障，而一切形式的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内，都是对个人的强制，都是有害的，都是“万恶之源”，因而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斗争，甚至反对一切工会组织和罢工运动。他的这种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想，对工人运动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他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大批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马克思在 1847 年出版了伟大著作《哲学的贫困》，给予蒲鲁东无情的“批判和鞭挞”。

第二节 19 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宪章运动

（一）战后急进运动

长达二十余年的反法战争终于在 1815 年结束了，但是和平带来了许多困难。由于政府停止军事订货，许多重工业及军事企业倒闭了，英国商品在欧洲销售的困难也促使英国多数工厂企业倒闭，因之失业工人人数遽增。陆海军士兵的复员（有 30 万人）也增大了失业者的队伍。与此同时，在业工人的工资大大下降。

反法战争结束时国债达 86,400 余万镑，利息也有 3000 万镑，购买国债券的大资产阶级发了大财。为了把战争负担转嫁在劳动人民身上，政府取消了所得税，肆意增加间接税，间接税占去了平均工资的一半，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生活。而且，为了大地主的利益，国会在 1815 年颁布了“谷物法”，规定在国内市场小麦价格每夸脱 82 先令以下时，禁止外国小麦进口，这就人为地制造粮价上涨，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负担。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战后英国劳动人民状况极度恶化，不仅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陷于绝望，而且小资产阶级的日子也不好过。群众时常集会，讨论政治问题，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为了摆脱贫困，为了改善生活，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参加国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争取选举权和改革国会。因此，从 1816 年起，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有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的急进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运动的目标，便是实现 18 世纪下期急进运动领袖卡特莱特所提出来的纲领要求。

这个时期工业资产阶级没有参加急进运动，因为他们害怕下层群众运动。他们继续留在 18 世纪 90 年代结成的反动联盟之内，与人民运动为敌。

急进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威廉·科伯特（1763～1835 年）从 1816 年起就出版一种售价低廉的报纸《政治纪事报》（每份只售两便士），发行数量达 6 万份。他在这个报纸上猛烈地攻击英国政治的腐败，他写道：“国会和政府操在少数人手里，他们不是用政权来谋公共福利，而是滥用自己的权势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因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和自己的亲戚朋友。”他还谈到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并且历举了劳动大众的种种苦难。他指出：“补救办法完全在于改革国会的下院或人民院，使每一个直接税的交纳者都享有选举权，并且一年选举一次。”

除了科伯特而外，还有许多群众领袖从事宣传鼓动活动，其中有塞尔文、瓦特逊等人。塞尔文在报纸上有力地揭露了英国国家的反动实质，他说：“把人民群众变为有产者的奴隶，是一切暴政的主要目的……英国政府就是

战争结束后，欧洲诸国仍旧混乱和贫困，所以无力购买大量的英国商品。

1 夸脱等于 12.7 公斤。

始终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的。”瓦特逊主张把“贵族和富人”从国家的统治中驱逐出去，而建立人民的政治统治。他说：与劳动者有关的一切法律都应该由劳动者自己制定，“他们是社会的唯一支柱，他们应该也是社会事务的唯一统治者”。一部分急进派报纸不但号召反对政府，而且也号召反对“为了自己的、自私的、生意人的利益”而与这个政府联盟的一切资产阶级。还有极少数人要求消灭君主制，建立共和国。

除了报刊宣传外，运动还采取了召开群众大会、群众示威及请愿的形式。1816年，在格拉斯哥发生了工人和军队的流血冲突。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几乎有发展为武装起义之势。面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国会在1817年1月通过一项法令，授权当局禁止公众集会，并且宣布“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一年。

但是这些高压手段是压抑不住群众的政治热情的。在伦敦、伯明翰等地人们照旧举行群众大会。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召开了有八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天人们手持旗帜，排成队伍进入会场。担任主席的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亨利·罕特，他刚开始讲话，政府派来的骑兵队伍便闯进会场横冲直撞，并且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1个人，有400人受伤。罕特等人也被捕，并被控以叛国罪。这次流血惨案，当代人称为“彼得卢大屠杀”。反动政府为了替这次屠杀作辩解，还捏造事实，硬说这次大会阴谋暴动。甚至《泰晤士报》也承认这是谎言。

接着国会又在这一年11月通过六项特别法令，宣布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禁止举行训练或手持旗帜游行，警察有权搜查任何家庭，并逮捕一切手持武器的人。法令还规定：对一切售价在6便士以下的报刊或小册子均课以4便士的税（每份）。其目的是阻止像《政治纪事报》这一类民主刊物在群众中畅销。

8月16日大屠杀及11月六项特别法令的颁布，并没有吓倒英勇的人民。人们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活动。急进运动中的少数左翼分子在锡斯尔伍德的领导下计划暗杀政府人员，参加这个计划的有几十名伦敦工人及手工业者。他们把武器秘密运到伦敦的卡托街，准备趁1820年2月23日内阁举行宴会的机会，暗杀内阁大臣。但是，这个计划被混进来的政府密探爱德华兹告发，参与计划的人被逮捕，以锡斯尔伍德为首的五个人被处死刑。锡斯尔伍德是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他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他之暗杀内阁大臣的计划，就是他的总的革命计划的一部分。他在断头台上表现得极为勇敢，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作为一切暴君的敌人而死的。”

在这个事件后不久，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及其附近地区爆发了工人的政治性总罢工，参加者达6万人，其中有许多人是煤矿工人。当时各地人民都

人们称之为“彼得卢大屠杀”，是因为反动政府的骑兵在圣彼得广场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冲杀，有如他们在四年前和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决战。

盼望这次总罢工将成为武装起义的序幕，但是始终没有发展为起义。只是有一小群罢工工人在政府密探的挑拨下，没有等待时机成熟就采取了武装行动，在邦尼姆尔与政府军打了一仗，结果还是失败。

然而，在采取高压措施之后，反动政府也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国会在1823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修改了“谷物法”，规定：在国内小麦价格达到每夸脱66先令时，即允许外国小麦进口。1824年，又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国会取消了1799年颁布的关于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从而使得工会的存在合法化。不过，在企业家的要求下，国会到1825年又通过新的法案，禁止工人举行罢工。尽管有这个禁令，英国工人毕竟为自己争取到成立工会的权利。而且，到20年代初，英国也克服了战后的经济困难而进入了经济高涨时期。因此，一个时候阶级斗争缓和下来，战后的急进运动也就销声敛迹了。

（二）1832年国会改革

到20年代下半期，要求改革的呼声又响彻全国，争取国会改革的运动又开展起来。

与前一时期的急进运动不同，这次改革运动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积极参加。到这时为止，工业资产阶级的地位和要求有显著的变化。在1800年左右，他们大多数是小规模的工厂主，那时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多赚利润。而现在他们已经积累起雄厚的资本，大大扩充了企业的规模，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因此他们的野心也大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参加国家统治。在他们看来，只有争取选举权，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且，自从1815年实行“谷物法”以来，一方面国内粮价抬高了，劳动力昂贵了；另一方面，欧洲许多农业国采取限制英国工业品进口的措施，以抵制“谷物法”，因而英国工业品出口额锐减。这些事实使得工业资产阶级认识到：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争取废除“谷物法”，而为了废除“谷物法”，必须改变选举法及改革国会制度，使自己参加政权。这便是他们投身于国会改革运动的主要原因。工业资产阶级参加这个运动，意味着上世纪90年代结成的反雅各宾主义的反动阶级联盟开始瓦解。

为了推动改革运动，工业资产阶级早在1830年就成立“伯明翰政治联盟”（创始人为银行家阿特伍德），并且积极展开活动，以争取工人的支持。不久，全国各地也争相仿效，纷纷成立“政治联盟”。

工人阶级是运动的主力。1825年爆发的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危机有力地推动工人阶级参加运动，因为这次危机波及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恶化了广大工人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大加强。由于工业革命的胜利进军，工厂工人人数急遽增加，工厂工人在运动中的作用加强了。同时，经过一个世代的残酷的斗争之后，一些先进工人开始看到，资本家整个说来都

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因此他们在运动中拒绝资产阶级领导，他们成立工人自己的“政治联盟”，这样的工人组织在北方工业地区特别普遍。而且，个别的工人报纸如 1830 年出世的《穷人卫报》（办报人为欧布莱恩）还以平易的笔调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想，这表明有些先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一些工人认识到争取普选权及政治民主，是为了实现工人的社会解放。当然，具有这样觉悟的只是一部分工人，因为大部分工人照旧接受工业资产阶级的领导，如 1830 年初创立的工业资产阶级领导的“伯明翰政治联盟”就有许多工人群众积极参加。而且，大部分工人对于社会主义是陌生的。

除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外，参加运动的还有同路人——辉格党的左派，其中有对腐败的国会制度也有所不满的葛雷和罗素。

在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国会改革运动进入了高潮。全国各地的工人集会更加频繁，改革的呼声更高。但是托利党政府仍然顽固地反对改革。1830 年秋国会开会讨论改革问题时，首相威灵顿竟宣称现行的选举制度完美无缺，改革是不必要的，并且表示要调动政府的全部力量去压制群众运动。因此，托利党在这一年大选中遭到惨败，托利党内阁倒台。同情改革的国会多数党——辉格党领袖葛雷组阁。葛雷在组阁后不久就向下院提出一项改革法案（1831 年 3 月），这个法案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取消所有“衰败城镇”在下院的席位，人口不足四千的城镇的席位由二席减为一席，把空下来的席位分配给席位过少的郡及没有席位的新兴工业都市。第二，扩大选举权，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让城市工业资产阶级和农村的农场主享有选举权。而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选举权。一句话，这个法案距离人民的要求甚远，距离卡特莱特所提出的纲领要求也很远。因此它引起许多工人的不满。工人报纸《穷人卫报》尖锐地批评了这个法案，说它是“一种邪恶、专横、欺骗和奸诈的措施”，并且警告广大读者说：“如果这个法案得到通过，你们将成千上万地饿死，像死狗一样赤条条地被抛弃在垃圾堆上。”1831 年在木匠洛维特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人阶级全国联盟”，这个联盟提出了与葛雷的改革法案针锋相对的纲领：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及一年选举一次国会等等。

为了抵消“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的影响，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普累斯也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全国政治联盟”，这个组织吸收工人参加，以便控制工人的行动；同时它也与全国各地的“政治联盟”合作，以便影响这些组织的活动。但是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号召和动员人们去支持葛雷提出的改革法案。

但是该改革法案在下院被击败，于是辉格党内阁把国会解散，下令举行新的选举。选举结果，辉格党获得多数（136 个席位），因而法案获得通过。但是 1831 年 10 月被上院否决了，投反对票的大半是主教及发战争财的贵族。

法案被上院否决，却造成了一个对改革法案有利的形势：原来反对这个

法案的成千上万工人现在看到：这是一个人民与维护“旧的、腐朽制度”的贵族之间的斗争，因而转变了原来的立场，而支持这个法案了。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人示威运动，在有些地方示威发展为暴动。在伦敦街上，群众袭击托利党主教和贵族的住宅。

1831年12月，改革法案第三次被提到下院，并且第三次被通过，当时上院仍准备否决它。于是全国又呈现紧张局面，许多地方发生暴动事件。“政治联盟”表示要组织几千人的进军，去声援辉格党内阁。有些集会提出更激烈的要求：废除上院及世袭贵族。1832年3月，伦敦示威群众不下10万人。

这时“全国政治联盟”的普累斯玩弄了巧妙的政治权术，他一方面劝阻工人群众，不让他们起来暴动，另一方面用革命的前景去威吓托利党人，表示只有通过改革法案才能避免一场革命。他还劝中等阶级存款户从银行里提取黄金，以使用金融恐慌去威胁托利党人。

当时辉格党内阁劝国王任命同情法案的人们为上院议员，以造成支持法案的多数，但是国王拒绝了。于是内阁辞职，国王指定托利党威灵顿组阁。这就立刻引起了抗议的浪潮：报纸刊出黑边，表示国丧，到处鸣丧钟似乎发生了国难。人们纷纷向下院请愿，主张在法案被通过之前下院不再拨款。北部工业地区的许多“政治联盟”准备向伦敦进军。在这个形势下，威灵顿也退缩了，他拒绝组阁，并且劝国王接受辉格党内阁的劝告。国王乃又召回辉格党内阁，并且答应任命50名新的上院议员，以促成法案的通过。同时，国王也写信给反对法案的上院议员们劝他们让步。威灵顿也说服这些议员不要继续抵制这个法案。因此，到1832年6月7日，上院终于通过了改革法案。

在国会多次辩论的过程中，法案内容有些修改，但是最后通过的法案与原来提出的法案大体上相似。最后通过的法案的内容如下：

(1) 议席的重新分配。人口在2000人以下的56个城镇完全被剥夺了下院中的席位，人口在2000与4000之间的31个城镇保留一个席位（原来为两席）。这样就空出143个席位，把其中65个送给较大的郡，8个送给苏格兰，5个送给爱尔兰，65个送给新兴大工业城市，其中有曼彻斯特、伯明翰、设菲尔德及里子等。

(2) 选举权的改革。在各郡，每年收入在10镑以上的土地持有者和每年收入在50镑以上的租地经营者，均为选民。在城市，房租收入每年达10镑以上的房主及每年纳10镑以上的房租的房客，都可以享有选举权。

按照这项规定，英国诸郡的选民从24.7万人增至37万人；城市选民从18.8万人增至28.6万人。选民与总人口的比例从过去的1/32变为现在的1/22。城市工人及农村劳动者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3) 投票方式的改革。过去投票用15天，为舞弊、贿赂及酗酒制造机会。此后投票只限两天。

1832年的国会改革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

有其进步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使得工业资产阶级跻身于统治地位，从而使得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但是，它剥夺了劳动人民的投票权，使工人阶级大失所望，他们认识到：几年来在政治斗争中追随资产阶级的结果，竟被出卖了。因此，在 1832 年以后，英国工人阶级对政治斗争心灰意冷，便离开了政治斗争，而集中全力参加经济斗争。他们积极组织工会，并且在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影响下，参加工人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的运动。

（三）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

19 世纪初，英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工业革命尚未最后完成，资本主义生产尚未达到成熟。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英国出现了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罗伯特·欧文（1771~1858 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制作马鞍的手工业者之家，10 岁时在一小布店当学徒，20 岁担任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经理，22 岁任苏格兰新拉拿尔克纺织工厂经理兼股东。他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并采取一些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措施，如减少劳动日为 10 小时半；不用 10 岁以下童工；改善工人住宅和保健条件；建立合作社；设立少年学校和公共食堂及发给工人养老补助金等。

1813~1815 年，他发表《性格形成论》，1815 年发表《关于工业制度效果的各种观察》，两年后又提出一个和失业及贫困斗争的报告，1820 年发表《致新拉拿尔克郡报告书》，大力宣传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823 年又提出一个建立他的共产主义公社计划，并于次年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前往北美印地安那州，用 30 万镑购买一片土地，移去 900 人从事他理想公社的试验。他创建的公社取名叫“新和谐”。但他的空想计划使这个公社很快解体，公社中一部分人变成为剥削别人的富农。1832 年，他又在伦敦开办一所合作社和一所“劳动交换银行”，号召手工业者用产品到银行来等价交换其他劳动产品，避免中间人的剥削，银行发行“劳动券”用以代替货币，“劳动券”以每小时的劳动作为单位，每一“劳动时”的价值规定为 6 便士。但是他的“劳动交换银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存在不下去的。到 1832 年就倒闭了。30 年代，在欧文倡导下，英国工人曾广泛组织了一些生产合作社和工会，并在 1834 年，各工会团体联合组成“全国工会大同盟”，欧文被推为主席。

欧文在他的著作中，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私有制。他尖锐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充满了财富，但到处却是贫困”。又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源泉，私有制存在，人类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压迫一切民族的有三种罪恶，那就是“私有财产，荒谬不合理的宗教制度，以及基于这种私有财产和宗教上的婚姻关系”。他企图建立的理想社会是废除了私有财产的规模不大的“劳动公社”，公社分为生产、分配、教育和管理四个部门，在分社内土地公有，财产公有，并共同进行劳动，等到全世界建立“公社总同盟”时，国家即行消亡。

（四）宪章运动的兴起

英国宪章运动之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及政治背景的。

英国工业革命到 19 世纪 30 年代基本上完成，无产阶级在英国作为一个伟大的阶级力量出现了。但是，工业革命带给无产阶级的是贫困和苦难、饥饿和疾病。工人居住在湫隘肮脏的贫民窟，他们吸的是污染的空气，饮的是不清洁的水，很少享受到阳光。机器的采用，使劳动过度紧张，劳动时间极长，劳动条件也差。工资很低，而粮价不断上涨，因此大多数工人挣扎在饥饿线上。1832 年国会改革的结果，工人阶级一无所得。失望之余，他们便暂时离开政治舞台，而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工会活动方面，指望依靠工会组织去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首先致力于把工会由个别行业的组织发展为多行业的全国性工会组织，1834 年成立的“全国工会大同盟”便是这样的工会组织。在惊人的短时期内就有 50 万名工人参加了这个“大同盟”，每一个工业部门的工人都参加了，甚至农业工人也集体参加。

“大同盟”刚一成立，就领导了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日及工会权利的罢工斗争。这个斗争席卷全国，而且有些地方，罢工发展为武装冲突。这在统治阶级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恐惧。政府决定打击“大同盟”的薄弱的一环，也就是它在农业工人中间的组织。当时在多塞特的托尔派德尔村有乔治·洛夫列特和詹姆斯·洛夫列特兄弟二人领导成立了“农业工人朋友协会”，在成立时举行习惯上的仪式及宣誓。于是政府当局立刻逮捕了两兄弟及另外四个人，罪名是：他们举行非法的宣誓，并且判处七年流放。这个冤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抗议运动，“大同盟”领导了这个运动，有二十五万多人在请愿书中签名，要求当局释放被判处流放的农业工人。工人群众还在伦敦举行大示威，参加示威行列的人达 20 万人。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当局不得不让步，把被流放的人释放回家。

但是，统治阶级并不善罢甘休，他们采取其他方式去打击工会组织。在约克郡、兰开夏郡、中部地区及苏格兰，工厂主强迫每一个工人都在文件上签名具结，表示离开工会，凡拒绝签名具结者，一概开除出厂。这样，“大同盟”就在资本家的进攻下解体了。“大同盟”存在期间还不足一年。

政府之残酷地镇压工会运动，深深地教育了工人阶级，使他们认识到政治斗争的重要，因而他们又转向政治斗争，而 1834 年“新贫民法”的实施，更有力地推动工人阶级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英国早在 1601 年就开始实行“贫民法”，根据这个法律，救济贫民事宜由各教区负责，凡贫苦无告者，均由教区救济院予以收容和扶养，由富人纳税充作救济费用。到 18 世纪下期，又对工资低下的工人发补助金，以济其不足。不消说，这个措施的用意在于安抚穷人，防止他们起来“犯上作乱”。到 18 世纪上期，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取消这种救济办法，因为这个办法妨碍

劳动力的供应，而且他们也不愿负担救济费用。1832年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选举权并且参加了政权。工业资产阶级一上台，便迫不及待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1834年，国会废除了“贫民法”而颁布了“新贫民法”，新的法律取消了生活补助金，它规定在全国各地成立“劳动院”，凡要求得到救济者，都必须进“劳动院”。但是新成立的“劳动院”，对于贫民来说，不啻是集中营式监狱。凡进入“劳动院”者，终日劳动，而食不果腹，而且备受监工的欺凌虐待。更甚者，一旦进入“劳动院”，就失去一切自由，甚至家人夫妇都被强制拆散，不得监工的许可，连来访也不能接见。因此，“劳动院”有工人的“巴士底大狱”之称。资产阶级设置“劳动院”的目的便是使贫民对“劳动院”望而生畏，被迫走进工厂去接受资本家的剥削。结果，他们如愿以偿了，各地的贫民由于不愿进入“劳动院”而纷纷流入城市当工人，而不管工资多寡。但是，也有许多劳动群众进行反抗，在肯特、萨佛克及贝德福德等地发生了反对“新贫民法”的人民暴动。在斗争中甚至有人号召大家用“火和剑”去消灭宫廷和推翻富人的统治。

在反“新贫民法”的斗争中，英国工人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他们觉悟到：为了保卫工人的利益，关键仍然在于选举权，而为了争到选举权，就必须再接再厉进行斗争。1836年至1837年的工业危机加速了这个斗争的到来。

1836年，以木匠洛维特为首的一些富裕的技术工匠成立“伦敦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最初只有33个会员，协会成立后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1836年底出版了一本标题为《腐败的下院》的小册子。作者在小册子中指出有两个因素决定国会的政策，一个是地主的利益，一个是资本家的利益，而且地主和资本家二者同样敌视工人，工人不应该对他们存任何幻想。协会不久又创办《北极星报》等报纸，通过报刊揭露英国政治的真相。

在1837年五六月间，“伦敦工人协会”的领袖们和少数急进派国会议员共同草拟了一个纲领，其中包括六点政治要求：第一，凡年满21岁、身体健康而未被处过徒刑的男子均有选举权。第二，全国应划分为居民人数相等的300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人数相等的议员。第三，取消候选人的财产资格及其他任何限制。第四，国会一年改选一次。第五，实行秘密投票。第六，每个议员都领取薪金，数目为500镑。在这些要求中，关键是普选权。关于普选权的意义，马克思写道：“……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1832年未举行国会选举的结果，辉格党取得巨大胜利，托利党遭到惨败。从这时起，辉格党逐渐更名为自由党，托利党更名为保守党。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由此可见，争取实现六点政治要求，就意味着争取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

1838年5月8日，这个纲领文件以法案的形式公布，命名曰《人民宪章》，宪章运动的名称实源于此。

《人民宪章》的公布，标志着宪章运动的发轫，因为它马上得到广大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热烈支持，很快地就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投入争取实现宪章的六点要求的斗争中来。全国各地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集合的群众动辄四五万人，有时达到10万人。在格拉斯哥集会的人数甚至达15万人，其中许多人是从小镇和乡村赶来的。宪章运动很快地就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运动。

为什么《人民宪章》得到人民如此热烈的拥护？这是因为：第一，群众认识到《人民宪章》的实现，可以给人民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善。在这里，哈尼的话如实地反映了群众的想法，他说：“我们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权利，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的国家带来自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

第二，希望享受教育权利的技术工匠、争取提高工资及十小时工作制的产业工人、要求废除“新贫民法”的贫民及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破产了的手工业者，都把普选权看成是实现自己的要求的手段。而且，一些接受欧文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也在六点要求的背后朦胧地看到实现社会改革的希望。

第三，少数先进的工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性，而在他们看来，实现宪章中的六点要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工人在《穷人卫报》上写道：“工人的政策应该是夺取国会中的权力，以便提高工资、降低利润，并且完全取消地租、教会什一税及商业利润。”

一句话，劳动人民各个集团都带着本身的要求参加宪章运动。

（五）宪章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在宪章运动的初期，参加运动的有以下几个集团：

第一是工厂工人。这是最先进的集团，他们是宪章运动中最稳固、最可靠的部分。但是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他们中间没有产生运动的领袖来领导全国运动。

第二是矿工，他们热烈支持宪章运动，武装起义的思想在矿工中间是很牢固的。

第三是绝望的手工业者，他们在数量上是工人阶级中的重要部分。这部分工人参加运动是通过反抗“新贫民法”的斗争。这个集团为宪章运动提供

了最积极的力量，它富于拚命精神，同时总是向往过去，不满现在（1800 年左右每周挣 20 先令，而现在只有六七先令）。爱尔兰移民在这个集团中占很大的比重，他们从爱尔兰带来了斗争的传统及对于权威的仇恨。从爱尔兰移民中涌现出好几个杰出的领袖：如欧布莱恩和弗格斯·欧康诺等。

第四个集团是技术工匠，他们是“伦敦工人协会”的基本队伍。但是他们在生活上的优裕地位及脱离大生产，使得他们无法摆脱和平斗争的观点。因此，尽管运动之发生得力于他们的首先倡导，但是等运动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就逐渐变为运动的阻碍力量。

除了上述四个劳动集团以外，伯明翰的中等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的急进分子也作为“同路人”参加了宪章运动。他们在 1837 年春天又把“伯明翰政治联盟”恢复起来。伯明翰及伯明翰附近地区的阶级情况很为特殊，在这里，中等阶级特别急进，他们和工人没有显著的区别，因为他们所经营的生产是小规模的、家庭式的和近乎包工性质的生产。伯明翰的急进分子在搞政治运动方面有高度的技巧，如在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召开群众大会，偶然搞一次适可而止的暴动以及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引向一个仔细准备好的高潮等方面，他们都是老手。因此，他们能够把伯明翰的工人领导起来。但是，后来斗争的发展使他们失去对伯明翰的工人的领导地位，于是他们便脱离了运动。

参加宪章运动的成分如此复杂，在观点及策略问题上也不一致，因而分成右中左三派。右派包括以洛维特为代表的伦敦的富裕技术工匠，还有以阿特伍德为首的代表伯明翰小业主利益的急进分子。这一派由于生活上比较优裕，在政治上抱温和的态度，他们强调在争取宪章的斗争中采取和平的、合法的手段——进行文字宣传、举行群众集会及组织群众签名向国会请愿。他们坚决反对诉诸革命手段和暴力行动，洛维特说：“凡提出革命斗争，号召诉诸武力的人，都是我们首先要反对的人”。中间派的代表人物是弗格斯·欧康诺。欧康诺一开始就得到北方的大多数产业工人、矿工以及破产的手工业工人的拥护。不过他的社会经济主张是错误的，他把恢复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作为工人斗争的终极目标。而且，虽然他口头上侈谈暴力或武装起义，但是他一到紧要关头就退缩了。左派领袖有欧布莱恩和哈尼。欧布莱恩在思想上深受欧文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但是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解却远远超过欧文，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哈尼早在 1838 年就和洛维特分道扬镳，单独创立了自己的组织“民主协会”。他写道：“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获得宪章，这个方法便是起义。”但是，他没有提出明确的行动纲领。

这三派的意见分歧，在 1839 年宪章派全体代表大会前夕就表现得很明显。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是向国会提出请愿，要求国会采纳《人民宪章》的六点要求。在会期迫近时，哈尼向大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倘若国会拒绝我们的请愿——这是很可能的——那末应当怎么办？”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洛维特派及伯明翰的急进派的回答是：应该采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左派

主张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欧康诺和绝大多数的领袖们反对左派的主张，但是他们自己又没有明确的办法。结果，到2月4日全体代表大会开会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决定。3月28日，有三个急进派代表为了抗议左派的革命煽动，退出了大会。大会拖延到5月才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宣布鉴于政府正在武装富人来镇压穷人，根据宪法人民有权利武装自己，但同时又强调轻率地或在时机未成熟时使用武力的危险。决议案这种模棱两可的话，等于取消武装起义。实际上当时政府在曼彻斯特、约克郡、诺丁昂、南威尔斯及其他运动中心地区都派有军队严加戒备，准备随时进行镇压。同时，政府又征募富人及上层分子当特别警察。

代表大会感到本身受到威胁，在5月7日把有125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送给国会后，就迁移到伯明翰去。

7月初，政府开始了镇压的行动：禁止群众集会，逮捕了許多人。7月4日，从伦敦调一队特别警察到伯明翰，突然袭击了正在开会的宪章派群众大会，当场逮捕了宪章派领袖麦克杜尔和泰勒。随后，洛维特和科林斯也被逮捕。7月12日，国会下院以335票对46票拒绝了请愿书。

国会的这些无理的行动，在人民群众中间引起了无比的愤慨，到处是群众的示威和集会，伯明翰的工人群众在一怒之下烧毁了店铺和货栈。同时，各地群众加紧进行武装和操练。在一所教堂门口张贴的一张传单，号召大家起来斗争：“要末‘大家都有面包吃’，要末‘大家流血’。准备好你们的匕首、手枪和枪枝，你们的长矛和火柴。大家整队前进，没有面包就流血，不能活着就死去。”

面对着群众的冲天义愤，宪章派代表大会在7月16日不得不通过一项关于从8月12日开始举行总罢工的决议，但是为了实现这个决议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大会并没有和工会取得联系，而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总罢工的决议只能是一纸空文。后来代表大会又撤销了总罢工的决议。

这个退却，使得政府认为宪章派软弱可欺，乃在8月里又开始大逮捕，把几十个宪章派关进了监狱。在这个沉重的打击下，代表大会只好在9月12日宣布解散。

但是，群众的积极性仍然很高，他们转入地下活动，并且开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至于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因为文献不足，而且现存史料又互相抵牾。但是，至少关于南威尔斯的起义一事，是信而有征的。起义经过是这样：1839年11月3日夜间，在约翰·弗洛斯特率领下武装起来的数千名矿工，冒着倾盆大雨，从蒙摩斯河谷出发向纽波特前进，准备通过夜袭占领该城。当这一支队伍在晨光微曦中到达纽波特时，已经疲惫不堪了，这时，他们突然遭到埋伏在西门饭店中的军队的袭击，但是起义者并没有退缩，而是猛攻该饭店达20分钟之久。结果失败，有14人被打死，50多人受伤。在以后几天内有125人被捕，其中有弗洛斯特。最初这些人被判处死刑，但后来在群众压力下，又改判为流放。

这次起义为政府提供了借口，它在几个月之内，又逮捕了大约 450 人，其中包括欧康诺、欧布莱恩等著名领袖。由于失去领袖，更由于 1840 年经济景况开始好转，运动暂时走向低落。

（六）宪章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1841 年至 1842 年爆发的新的工业危机，又引起了宪章运动的高涨。这时，伯明翰的中等阶级急进派已经退出了运动。同时，洛维特等人在出狱后，也脱离了运动而从事工人教育事业去了。因此，这一阶段的宪章运动已经具有更纯粹的无产阶级性质。

在总结第一个阶段的运动的经验时，宪章派领袖们痛切地感到成立一个有集中领导的、和工会运动有更密切的联系的、更为坚强的机构的重要性，因此早在 1840 年 7 月，宪章派就在曼彻斯特召开一个新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个机构有严密的组织，会员以每十人为一组，每组有一个组长，由执行委员会指派。执行委员会由七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每年选举一次。凡入会的人，只要表示赞成协会的原则，就可以加入协会成为会员。入会者有一张会员证，每季更换一次，每张会员证收费两便士。这个协会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协会成立后发展得很快，到 1841 年底它已拥有 282 个分会，第二年它的会员人数已达到 5 万人。而且在 1841 年，被捕的领袖一个一个地获得释放，这更给“全国宪章派协会”增添力量。协会出版新的报刊展开宣传，派出更多的讲演员到各处去讲演。

宪章派讲演员不但向广大听众宣讲争取选举权的重大意义，并且号召大家在请愿书上签名，而且还和资产阶级的“反谷物法同盟”展开了斗争。这个同盟是一群工业资产阶级代表在 1838 年 10 月创立的，目的在于争取废除“谷物法”，因为“谷物法”促进粮价上涨，从而增加工业生产的成本，对于工业资本家颇为不利。同盟的领导人科布登与布莱特善于用巧妙词令骗取工人的支持，说什么取消“谷物法”可以降低粮价，从而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宪章派讲演员揭露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欺骗，他们对工人说：“不要再受资产者欺骗了，你们曾经帮助他们争得选举权，可是他们当时给你们的美丽诺言现在哪里去了呢？他们当时施行的一切改革，只是于他们有利。现在他们又要争取废除谷物法，也并不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嘴里喊着：给我们便宜的粮食，实际上是想：让我们发低廉的工资吧！不要倾听他们伪善的讲演词，你们要坚持宪章，没有选举权，你们便是奴隶。”

1841 年 8 月 30 日欧康诺出狱后，就积极领导第二次请愿运动。1842 年 2 月，宪章派在欧康诺的领导下，写出了第二次请愿书，这个请愿书直接表

欧康诺和欧布莱恩以阴谋叛国罪被判处 18 个月徒刑。

达了工人心中的悲愤，比起第一次请愿书来说，内容更为激进，措词更为激烈。它在缕述劳苦大众的贫困状况时写道：“你们的请愿者控诉：劳动时间，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到超出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以外，在高温和简陋的厂房内进行非人的劳动，所得工资又不足以维持体力和取得因体力过分消耗而迫切需要的那些物品。你们的请愿者要求国会注意农业劳动者不能靠工资获得温饱，并且看到那些用辛勤劳动为人民生产主要粮食的人们取得非常菲薄的工资不能不感到恐怖和愤慨。”接着，请愿书要求减税，废除教会什一税和“贫民法”，甚至要求消灭资产阶级和地主对机器、土地、新闻出版及交通工具的独占。1842年4月12日，第二次宪章派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5月2日将请愿书送交给国会，在这个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达3,315,752人。但是国会以287票对49票拒绝了它。资产阶级议员麦考莱在辩论中发言道：“我是反对普选权的……我认为文明是建筑在财产安全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决不应该把国家的最高权力委托给一个显然要严重地、系统地侵犯财产安全的阶级，这样做是太危险了。”罗素在发言中也以同样的口吻说：“即使讨论这些要求也会使国家古老而悠久的制度成为问题……它将使人们对于财产权利发生怀疑，从而会把资本赶出国家。”

请愿书被否决的消息传开之后，立刻在许多地区爆发了大罢工。这一年6月、7月，斯塔福德郡和瓦维克郡的矿工和铁工首先罢工。不久，罢工运动席卷了整个北方工业地区，并且蔓延到苏格兰和威尔士。8月初，兰开夏的各棉纺厂也开始罢工。后来罢工风潮又传到约克郡的陶器工业区及其他地区。各地罢工工人纷纷举行大会，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在《人民宪章》未能成为法律之前，决不复工。8月间，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我们严肃而诚挚地相信，增加社会的痛苦，使生产阶级的大多数人筋疲力尽的各种祸害，全是由于阶级的立法而产生的；而补救当前触目惊心的苦难和普遍贫困的唯一的办法，乃是立即并不加修改地通过这个称作人民的宪章的文件，使之成为法律。”

这个会议劝告所有各行各业的人民从现在起立即停止工作，直到上述文件成为本国的法律的时候。”

在罢工浪潮席卷各地的情势下，在曼彻斯特开会的“全国宪章派协会”也不得不讨论当前的罢工问题。大多数代表对罢工行动都表示赞同，但是以麦克杜尔为首的少数代表认识到只有把罢工进一步引向革命，才有真正的成效。在麦克杜尔的建议下，会议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工人群众“要刚毅，要勇敢，要做个好男儿！”但是会议只限于发表宣言，而没有商定任何具体措施及步骤，就散会了。因此，罢工在没有集中领导的情况下继续下去。更坏的是，欧康诺在《北极星报》上猛烈抨击麦克杜尔，硬说罢工是“反谷物法同盟”转移人民对《人民宪章》的注意力的阴谋诡计。

由于缺乏领导和组织，也由于缺乏经费，罢工运动是注定失败的，但是它仍然顽固地坚持到8月下旬，有些地方甚至坚持到9月。而且在一些地区

发生了巷战。

当罢工运动快要停止的时候，政府开始大逮捕，一共逮捕 1500 人，其中有 700 人受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贸易主义者对宪章运动进行破坏。他们在 1841 年底组织了“争取完全选举权同盟”，采纳了《人民宪章》中的六点要求作为自己的纲领，企图和宪章派争夺对于工人的领导权。结果，有些技术工匠及熟练工人被他们拉了过去。

从 1843 年起，宪章运动进入低潮，工人阶级的庞大阶层开始退出政治斗争，“全国宪章派协会”会员人数锐减，只剩下 4000 人了。这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从 1842 年年底，与铁路大规模兴建相联系的英国经济情况之好转及某些重要生活用品价格的下降，严重地影响了工人参加政治斗争的积极性。同时，合作社运动展开后，一部分工人对于建立消费合作社颇感兴趣，因而对于政治斗争大为厌倦。此外，1846 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国会通过了保守党的皮尔内阁所提出的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在许多工人眼中，取消“谷物法”，意味着工人生活费用大大降低。1847 年，国会又通过关于女工及童工十小时工作制的法案。这两项改革也促使许多工人退出宪章运动。

在宪章运动进入低潮后，欧康诺把宪章事业完全丢在脑后，从 1843 年起他就埋头于实行他的“土地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由工人拿出一定数量的钱入股，用这笔股金购买地产和修盖房屋，然后在股东中间抽签，得签的人就可以领到一所房及一小块土地。用第一批地产所得的利润再买地产，这样便可以继续不断地把计划无限扩大下去。按照欧康诺的打算，在《人民宪章》成为法律，普选权实现后，就可以用国家力量向全国推广这个计划。其实，从经济观点来看，这个计划可谓荒谬绝伦，注定失败。但是当时它着实迷惑了一些工人，他们凑集了 8 万镑经费，开办了好几个试验区，但是最后都归于失败。

只有少数左派在哈尼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当时伦敦是各国革命流亡者汇聚的地方，但是宪章派最初很少与他们发生接触。恩格斯早在 1843 年就批评这个现象，并且多方推动英国宪章派建立国际联系。正是在恩格斯的积极影响下，哈尼才开始与各国政治流亡者建立联系。1845 年 8 月，许多国家的民主派在伦敦举行会议，哈尼就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在 9 月 20 日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成立一个国际性的“民主兄弟协会”，英国宪章派加入了这个组织。这样，英国宪章运动终于向国际主义道路迈上了第一步。

“民主兄弟协会”之创建，哈尼的贡献很大，因为他在消除各国代表之间的误解及分歧方面，“与有力焉”。而且，他在会议上所作的充满国际主

1844 年在洛乞得尔诞生了第一个消费合作社。

义精神的发言，深深地感动了与会者。他说：“我向每个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发出号召：‘团结起来为争取共同事业而斗争！’。‘分而治之’是迄今为止的压迫者的口号。‘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吧！’应该是回答的口号”。不管在各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民族区别，“这些区别并不能阻止俄国、奥地利及普鲁士的暴君们团结起来去保卫及保持自己的暴政。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应该团结起来以争取自由呢？人民事业在一切国家都是一样的——这是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者的事业。”

（七）宪章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1847年爆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同一年又发生了粮食及马铃薯的歉收，因而失业人数增加了，生活费用也上涨了。于是，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也高昂起来：整个英格兰到处是讲演、公众集会及地方代表的集会。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成了宪章运动第三次高涨的直接推动力。

但是这一阶段的宪章运动已失去其群众的性质：熟练的有组织的工人转向狭隘的工会活动，十小时工作制的法令及“谷物法”之废除，使大批工人离开宪章运动。因此，此时的宪章运动已经不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了，它变成了非熟练工人、失业工人和富于战斗性的少数人的事业。但是，这时运动却增添了一位杰出的领袖欧内斯特·琼斯。琼斯是在1845年参加运动的，他有旺盛的精力及非凡的气魄，他认识到组织的重要性，也懂得宪章运动是一个阶级力量，这种认识在宪章运动领袖中是不可多见的。

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后，英国宪章派报以热烈的欢呼。《北极星报》积极鼓动群众起来斗争，它在2月26日号召：“如果英国人不是最可厌的奴隶的话，他们就会立刻开始——和平地、合法地——争取宪章的工作。”

3月6日，在伦敦有8000人到1万人参加了宪章派大会，主持人为G.W.M. 雷诺兹。在散会后，与会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个冲突最后发展为大规模暴动。也是在3月6日这一天，在格拉斯哥爆发了失业工人的暴动，武器店及食品店被捣毁。在混乱中也发生坏人抢劫财物的事件。驻格拉斯哥的《泰晤士报》通讯记者在3月6日写道：“惶恐像野火一般很快地传遍全市，并且和最近在巴黎发生的事件合在一起，造成了一般人对于某种政治骚动的恐惧心理。”

利用这次格拉斯哥事件，英国统治阶级赶紧开动宣传机器，把宪章运动与暴乱乃至抢劫行为混为一谈，借以制造人们对于宪章运动的恐惧，并且贬低宪章运动的声誉。同时，英国当局又通过报章杂志大肆渲染巴黎群众的革命行动，把它描写得阴森可怕，进而强调革命是法国的产物，不合乎英国国情。这些宣传，在英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但在有产阶级中间造成恐怖气氛，而且也影响了宪章运动的领导层，迷惑了一部分工人。人们把宪章运动与暴乱等量齐观，使得宪章运动的左派处在防御地位，并且使中间派欧康

诺向右转，采取和平、合法的斗争策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政府及统治阶级的报刊的宣传麻痹了宪章派大多数领袖争取胜利的意志。一部分工人，特别是伦敦的技术工匠及独立技工在政府宣传的影响下，把宪章派和暴徒看成是一个东西，迫不及待地报名当特别警察，希望“在发生抢劫及各种流氓的暴动时得到足够的保障”。当然，归根结底，技术工人的这种政治态度也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经济上的原因：他们生活比一般工人富裕，对于革命是格格不入的。总之，英国政府不仅得到一切有产阶级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而且也能够得到中、下层甚至一部分工人的支持。

与此同时，政府一方面积极地加强和部署镇压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到本身力量的强大，反而更加以谨慎的态度行事。内阁首相罗素尽可能避免发生猛烈的冲突，因为这样会触怒工人阶级。内政部大臣向地方政府下达训令，禁止地方当局进行逮捕，除非在发生挑拨或暴动的极端场合。内阁也警告地方当局不要干涉集会，除非有确凿根据预料会导致破坏和平的事件。政府在4月及5月一直坚持这种克制的政策。

第三次请愿运动就是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进行的。早在1848年3月10日，欧康诺就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便向国会提交请愿书。4月4日，代表大会召开了，大会决定在4月10日先在坎宁顿草场召开一个盛大的集会，然后整队向威斯敏斯特出发，将请愿书递交给国会。代表大会同时又发布一份由全体代表签名的文件，在文件中表示：“我们的游行将是一次非武装的道义上的示威”。但是中、上等阶级大多数人根本不相信这些话，他们担心一场革命风暴就要来临。《泰晤士报》对于当时英国人的心情作了如下的描述：“不能否认：公众被大陆上的事件弄得目瞪口呆，仓皇失措，忐忑不安……”。

在请愿日期即将到来之际，政府在有人搞阴谋叛乱的借口下，调集了大批军队和上千的特别警察，他们各就岗位，如临大敌。依仗着这种武力，政府宣布坎宁顿集会可以召开，但是不准结队游行到威斯敏斯特去。不过，政府对于使用武力仍抱审慎的态度。4月9日，罗素向女王的丈夫表示：只有在最后不得已时才使用武力。“我相信它们（指武力。——引者）会轻而易举地战胜伦敦的暴民。但是伤害任何一条人命，都会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愤怒。我有一切理由相信一切都会安静地、顺利地成为过去。”

面对着政府的威胁，宪章派领袖决定取消游行。以琼斯为首的左派也同意这个决定，而且琼斯还发言支持欧康诺关于和平请愿的主张。

这样，在4月10日黎明时，政府已掌握了全部主动权，可以从心所欲地指挥全局。在这一天参加坎宁顿草场集会的只有3万人，然后派一个人数很少的代表团把请愿书送交国会。欧康诺自称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达500万人，但后来查明实际签名的仅及197.5万人，而且其中有许多人名是假造的。不消说，这次请愿又被国会拒绝了。

1848年4月10日的发动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并不像一般历史家所记载

的那样在 1848 年以后宪章运动就无声无息地自消自灭下去。实际上，经过这次失败，富有战斗精神的领袖们——琼斯、哈尼、基德和麦克杜尔等人——并没有心灰意冷。他们决心继续战斗下去。在 4 月 10 日以后的几个月里，运动仍保持一定程度的势头。在北方工业地区及首都，整个 4 月、5 月两个月内几乎每天晚上都有集会和示威。当代人记载：“政府现在对于宪章派在国内各地特别是在伦敦的表现以及一再举行的盛大集会和游行感到不安……最近从消息灵通的人们……那里得到的报告谓：他们发现……不平不满愈益加甚，而且许多在 4 月 10 日担任特别警察的人宣称他们不愿再干这种职业了”。苏格兰工人开始组织了一个“国民自卫军”。宪章运动与“爱尔兰人大同盟”的联系也加强了。针对这些情势，布鲁厄姆在 6 月 2 日和 5 日两次在上院提议政府进行镇压。6 月 6 日清晨政府就下令逮捕琼斯及另外五名领袖。在 6 月、7 月、8 月三个月内举行了好几次大逮捕。在曼彻斯特，为了逮捕 15 名宪章派及“爱尔兰人大同盟”分子，竟动用了 300 名警察，两个连的龙骑兵及两个连的步兵。

政府广泛地把密探打进宪章派组织内部，这些密探不但搜集情报，刺探内情，而且还挑拨宪章派举行未成熟的暴动，以便使政府当局有借口去镇压。在审讯中所依据的证据，很多是这些密探提供的材料。在审讯 8 月中被逮捕的伦敦宪章派的时候，大量证据来自两个密探鲍威尔和戴维斯。

建立无孔不入的密探系统和进行大逮捕，在宪章派组织内造成恐怖、互相猜忌及沮丧的情绪。基德在 8 月 5 日的《北极星报》上写道：“同胞们——恐怖统治有加无已，而且愈来愈逼人和可怕了。……我们的政治空气这样沉闷，我们差不多都要窒息了。”

到 9 月末为止，由于领袖们被捕入狱，运动几乎陷于瓦解。

但是，左派坚持斗争到 1852 年。这几年中，宪章运动虽然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性质，但是在思想上有了飞跃的发展。第一，经过多次挫折失败之后，左派领袖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建立一个更为坚强的组织，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而仅靠骚动是不会有成就的。第二，在马克思的帮助下，琼斯和哈尼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并且成为社会主义者。这个时期左派的基本思想表达在下述口号之中：“宪章和某些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除了争取六点政治要求外，还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1851 年 3 月宪章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精神，这个纲领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文件。

但是从 1853 年以后，“全国宪章派协会”决定不再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到 1858 年这个协会也终于解散。

宪章运动是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从主观上来说，参加运动的工人阶级成分复杂，意见分歧，步调不统一，没有坚强的统一的领导和强有力的组织，特别是缺乏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和斗争经验等等，都是重要的原因。

欧康诺则怯懦地退出了运动。

客观原因有四：第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晚期是工业生产及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时期，工人的困难有所缓和，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因而工人对于政治斗争的兴趣大减。第二，如前所述，英国统治阶级实行一些劳工立法，对工人阶级进行让步，这也促使许多工人离开运动。第三，统治阶级施展了狡猾的策略，这在 1848 年表现得最为突出。第四，法国无产阶级在 1848 年 6 月起义中的失败和 50 年代初全欧反动势力的胜利，也促使英国工人阶级意志消沉，动摇了他们对本身事业的信心。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英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斗争，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所提出的六点政治要求虽然没有得到实现，但是“十小时工作法令”、“1842 年矿井法令”以及“1844 年的工厂法令”都是国会在宪章运动的强大压力下颁布的。宪章运动的内容丰富复杂，在运动中出现了一系列理论问题及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为工人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及教训。而且，宪章运动的经验为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材料。最后，宪章运动也对英国以后的政治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英国资产阶级在宪章运动的年代里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因而从那时起他们被迫实现了宪章中的大部分要求。

（八）拜伦与狄更斯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风雷激荡，封建反动势力死灰复燃，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日益发展，这一切交织而成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复杂、尖锐的局面。当时普遍流行于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文学思潮——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愿望，反映资产阶级民主倾向，它对封建主义的专横和资本主义的新暴政同样愤懑，它用“感情主义”反对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通过缥缈的想象、离奇的情节、奔放的语言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与当代罪恶现实相对立的形象，以抒发其反抗的激情。英国杰出诗人拜伦就是这个思潮的卓越的代表之一。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 年）出身贵族，剑桥大学毕业后任上院议员，曾在议会发表演说并创作诗歌，抨击政府对“鲁德运动”的镇压。他在反动政府迫害下，浪迹国外，先后在瑞士和意大利侨居，并参加意大利烧炭党的反奥斗争。1823 年前往希腊，热情参加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

拜伦创作的主要诗篇大多写于神圣同盟张牙舞爪时期，计有：《哈尔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292 页。

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鲁德工人之歌》《东方纪事组诗》《该隐》《别波》《青铜世纪》《逝去的韶光》和诗剧《曼弗雷德》等。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1812~1818年),是拜伦最主要的代表作。这是一部由四千七百多行诗句组成的叙事、抒情长诗。《游记》共分四章,用多样的调子,包括议论、赞颂、讽刺、戏谑、哀沉的挽歌、战斗的号角,吟咏出大自然的万千气象,以及人在和大自然融成一片的祥光瑞彩中载歌载舞的情景。特别是《游记》借主人翁漫游欧洲各国,抒发作者对神圣同盟的极度愤恨;反映人民群众反侵略、求解放的呼声;并热情歌颂、启发和号召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人民,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斗争。如他在《游记》第四章《哀罗马》中写道:

自由大纛破且黄,
天风高卷仍飘扬!
角声虽断余音在,
暴风雨后最铿锵!

拜伦的诗篇以火一般的热情,奔放流畅的诗笔,音乐般的语言和节奏,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残暴,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歌颂“自由”与民族解放。诗篇的这种反抗精神在当时历史阶段起过进步作用,有过很大影响。但拜伦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和对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的宣扬,很大地损害了他创作的思想价值,反映了他的作品的阶级局限性。

到19世纪20年代,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学领域,批判现实主义已逐渐代替浪漫主义。狄更斯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和杰出的代表。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年),生于波特西的一个贫苦家庭,最初在一鞋油厂当童工,后学会速记,充当国会记者。狄更斯勤奋自学,经常在大英博物馆图书室中孜孜不倦地攻读,学业精进。1836年发表处女作《特写集》小说两本,1837年,发表《匹克威克先生外传》震动了当时文坛。1844年后,他经常居住瑞士、法国和意大利,创作小说多种,1846年创办了一份激进派报纸《每日邮报》。狄更斯的主要作品有:《奥利弗尔·退斯特》(1838年)、《大卫·科波菲尔》(1850年,自传性小说)、《艰难时世》(1858年)、《双城记》(1859年)等。

狄更斯的小说大多创作在宪章运动前后,是宪章运动时代整个英国的社会风情画。他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在他的创作中,用犀利的笔锋、辛辣的嘲讽、敏锐的观察,拨开充满腥风臭气的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巨大垃圾堆,掀去那个社会最黑暗、最阴森角落的帷幕,展现出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多面的、纵深的、广阔的丑恶画面;细腻地勾划出一幅伤天害理、无恶不作的各色资产阶级人物的百丑图。他把抨击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结构的各个方面,包括国会、政府、法院、监狱、学校、

孤儿院、家庭等等。但他并不能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也找不出解救之方。他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错误地认为“善”、“仁爱”、“宽恕”是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万应灵丹，幻想“上层分子”对“下层人民”一掬其“同情之泪”。他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但又惧怕革命。这些，反映了他的创作的两重性和阶级局限性。

虽然如此，但他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简单地描摹“现实”，而是“典型地再现”现实，并且对资本主义的抨击，不是笼统的、刻板的、模式般的说教，而是用深刻的、隽永的嘲讽和幽默，使人们在回味无穷的笑声中迸发出对资本主义丑恶与罪恶的憎恨，他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强烈批判性，在当时历史阶段，使他成为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和法国的巴尔扎克并驾齐驱，蜚声于世界文坛。

第三节 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一）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关税同盟

根据维也纳会议的“最后总决议”建立起来的“德意志邦联”，是由 34 个君主国和汉堡、不来梅、卢卑克、法兰克福四个自由市组成的。邦联设邦联国会于法兰克福，但邦联国会软弱无力，无权制定统一的法律和关税税则，无论在经济、内政或外交各方面，各邦仍各自为政，与独立国家无异，邦联只不过徒具统一的形式而已。邦联国会的主席由奥地利代表担任，因此邦联实际上操纵在坐镇维也纳指挥着全欧间谍网的“欧洲的蜘蛛”——奥国首相梅特涅之手。19 世纪初，德意志全境封建势力死灰复燃，日益猖獗，人民群众展开了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反对封建、争取统一的斗争。1817 年 10 月 17 日是宗教改革 300 年纪念日，魏玛公国耶拿大学学生在耶拿城举行盛大庆祝会，要求成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并把象征封建制度的衣物和反动著作付之一炬。针对学生运动，梅特涅在 1819 年召集全德会议于卡尔斯巴达，以会议的名义颁布“卡尔斯巴达法令”，严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限制出版自由。

德意志的分裂及反动统治的加强显然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普鲁士的土地改革和“关税同盟”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意志工、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普鲁士土地改革开始于拿破仑战争时期。1807 年 10 月在斯泰因首相的倡议下，普鲁士政府颁布改革法令，宣布废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可以自由迁徙。但是该法令把农民的一切封建义务以及地主对于农民的司法权及警察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继斯泰因为首相的哈登堡在 1811 年 9 月颁布了一项土地改革法令，即所谓“协调”法，责成地主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但同时要求农民付出很高的代价来赎买：或者把自己的份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割让给地主，或者向地主缴出一笔等于常年支付的货币地租的 25 倍的钱。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又颁布新的法令，对于农民赎买封建义务作了很大的限制。1816 年的土地改革法令规定：只有具备整套农畜并且名列税册的富裕农民方有赎买的权利，没有马，或者只有一匹马的农民被剥夺了赎买的权利。因此，到 1848 年为止，只有七分之六的富农和五分之一的中农、贫农得到赎买的机会。通过赎买，农民被迫在 1816 年到 1848 年间一共交出 153 万余德亩的土地及 1800 万塔列尔以上的现金。因之许多农民破产了，手中仅有的土地也被迫卖给地主。而且，在赎买后，地主仍保留对于农民的司法权和警察权。因此，普鲁士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是贫困、破产的痛苦。相反地，地主在改革中从农民那里搜刮到巨额土地和现金，从而有可能雇用农业劳动者和采用机器从事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所走的这种道路，列宁称之为“普鲁士道路”。但是，不管怎

样，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30年代，以普鲁士为首的18个德意志国家成立了“关税同盟”，在同盟内部取消了关税壁垒，制订统一税则，缴一次税货物就可以在同盟内的各邦之间畅通无阻。这就加速了商品流通，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因此同盟组成后，工业生产特别是纺织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1834~1838年在萨克森就兴建了45座大型纺织厂。到1845年，德意志的棉、麻、羊毛纺织业的纺锭分别增加到15万锭、2.8万锭和45万锭。40年代，仅普鲁士就有蒸汽机一千多架，柏林到40年代已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1846年在柏林40万人口中雇佣工人就有7万人。在德意志境内，莱茵河中游的莱茵—威斯特发利亚省一带，摆脱封建主义较早，煤铁蕴藏量丰富，资本主义工业在全德最发达。铁路自1835年开始修筑，到1850年已有了747英里，公路也由1816年的523英里增加到1848年的1573英里。总之，在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已进入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

（二）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19世纪40年代的德意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人数由30年代初的40万人增加到40年代的200万人。德意志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日益广泛展开，1844年爆发了震撼全欧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西里西亚地区是当时德意志的纺织业中心，亚麻布的主要产地。纺织工人一面受到厂主们日益加深的剥削，一面又须向封建地主缴纳一种名为“纺织税”的特别税，工人在沉重苛繁的资本主义的和封建的双重压迫下，处于极端痛苦之中，就连当时的官方记载，也承认在起义前的36,000多名织工中就有6000人直接死于饥饿。40年代初，企业主们为了和英国纺织品竞争，不断压低工资，以降低成本，这就更引起工人的强烈愤懑。织工们编唱一支歌曲，名为“血腥的屠杀”，表示对企业主特别是对其中最残暴的企业主茨凡奇格尔的痛恨。

1844年6月4日，西里西亚纺织业中心——彼得尔斯瓦尼达渥镇的织工们高唱这支激越的革命歌曲，走过企业主茨凡奇格尔住宅窗下，遭到反动军警的毒打和逮捕，这就成为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导火线，当天，织工们捣毁了茨凡奇格尔的住宅。次日，彼得尔斯瓦尼达渥和朗根比劳两地的织工三千多人，捣毁工厂，焚毁债券。6月6日，工人们和反动政府派来的大批援军浴血奋战，在反动军队用大炮残酷轰击下，工人们横眉冷对，怒气冲天，手持斧头、石头，英勇战斗，裹创扶伤，坚持不退，终因众寡悬殊，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织工在战斗中死难11人，受伤24人。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虽然失败，但其历史意义是很重大的，它“毫不含糊

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它标志着德意志工人阶级已开始成为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推动了德意志工人阶级的斗争，起义失败后，萨克森印染工人和铁路工人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诺伦斯堡和柏林等地的罢工浪潮也不断地冲击资产阶级制度。

（三）德意志的古典哲学

在 19 世纪初的德意志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占有重要地位。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黑格尔（1770～1831 年）的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1806 年）、《逻辑学》（1812～1816 年）、《法权哲学》（1812 年）、《哲学全书》（1817 年），以及死后出版的《历史哲学》（1837 年）、《美学讲演集》（1836～1838 年）等。

黑格尔创建了一整套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它反映了在法国革命影响下主张变革德意志封建秩序而同时又被西欧工人运动吓得胆战心惊因而倾向于对封建势力妥协的德意志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他虽然批判了康德（1724～1804 年）的“不可知论”，认为世界是可认识的，但黑格尔的认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他看来，现实世界是受“绝对精神”、“绝对观念”支配的，而“绝对精神”、“绝对观念”先于“天、地、人”三界而存在；也离开人的主观而独立存在，成为万有世界存在的基础。因此，他的哲学体系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黑格尔创立了辩证法，他的辩证法虽然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但是在其辩证法中，也还包含着一个“合理内核”。这个“合理内核”就是他关于发展的观念。他指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都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由低级到高级。而“内在矛盾”则是运动的源泉。这些就是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但他又认为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绝对精神”、“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的结果。客观世界一切千变万化，都受着“绝对精神”、“绝对观念”的不断运动、变化的支配。在他看来，“绝对精神”、“绝对观念”成为超于一切、先于一切的主体和实体，客观世界反而成为由它派生出来的客体和外部现象。这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存在于何处的“绝对精神”、“绝对观念”，却成了现实世界的创造主，倒果为因，反宾为主，把事物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其唯心主义辩证法成了“两脚朝天”的辩证法。

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是替当时德意志反动统治辩护的，他在《法权哲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83 页。

学》中，提出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命题，以此来替当时普鲁士的“现存的一切作辩护”，把当时普鲁士国家制度说成是一切发展的顶点，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无怪乎当时普鲁士统治者把黑格尔哲学推崇为普鲁士王国国家哲学。

黑格尔派以后分裂出它的左翼，称为青年黑格尔派，其著名人物有鲍威尔·布鲁诺兄弟和斯特劳斯等人。他们基于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立场，抨击封建制度，特别是强烈抨击基督教，要求资产阶级改革。但他们的观点仍未脱离黑格尔唯心主义樊篱，他们蔑视人民群众，过分强调“有批判思想的”个人的历史作用。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另树一帜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原属青年黑格尔派。30年代后，他摒弃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主张，和黑格尔唯心论决裂，形成了他的唯物论。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是法学名教授之子，早年求学于柏林大学，1828年在爱尔朗根大学教哲学，1830年出版《论死与不死》，大力宣扬无神论，因而被解聘。自此以后，退隐林泉，潜心著述，1839年出版《黑格尔哲学批判》，1841年出版《基督教的本质》，1844年出版《宗教的本质》，187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晚年开始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思维和意识是由物质构成的器官——人脑的产物。思维和意识不过是物质的反映而已。费尔巴哈这种认为物质是第一性，思维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他哲学中的基本内核。

但是，费尔巴哈的哲学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唯物论，在解释自然现象方面是唯物主义的，但在对待社会现象方面却又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如他虽尖锐批判了基督教，指出：“自然和人以外，一无所有”，上帝只是一种幻象，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基督教是人类一切灾难的根源，但他不能理解宗教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他只是希望改进宗教，唯心主义地认为用基于爱的新宗教来代替信仰上帝的旧宗教，就能够改善当代的社会秩序。又如他对伦理的看法，也是忽视阶级关系、脱离生产关系的，认为人人平等互爱、互相忍让就可以达到至善之境。

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也是一种消极的和直观的唯物论。由于他把人只看成是自然物，而看不到人的社会性，因而他只看到人的意识反映客观世界，而看不到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和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重大作用，因而他的哲学成为消极的唯物主义哲学。同时，他虽然否定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又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一同抛弃，这就好像把小孩（发展观点）连同污水（唯心主义），不分青红皂白，从澡盆中一齐泼了出去。可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不过是直观的唯物论，而根本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

(四) 歌德、海涅和贝多芬

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叶，在欧洲文坛上，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相呼应，出现了启蒙文学。它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理性原则”，讴歌“自由”、“平等”、“博爱”，为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德意志的歌德是当时启蒙文学的重要代表。

约翰·乌尔甫根·冯·歌德(1749~1832年)生于法兰克福，世代以缝纫和旅店为业，父亲是法兰克福市参议员。歌德青年时代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学，后转到斯特拉斯堡大学毕业，曾做过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官。

歌德早期的作品有：《恋人的心情》(1767年)和《同罪者》(1769年)。1773年发表历史剧《铁手骑士葛慈·冯·伯利欣根》和《普罗米修斯》。在这两部作品中，他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热情要求民族统一。1775年发表著名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此书一出，风靡全欧，影响很大。他用书信体裁，借描写恋爱悲剧，强烈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但歌德并没有号召斗争，而且还宣扬了“恋爱至上”的资产阶级恋爱观。歌德在18世纪70年代的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欧洲文学“狂飙突起运动”中的反封建精神，但在他的另一些作品中，如《人类的极限》(1779年)、《旅者的夜歌》(1780年)等又表露了“超然的”和妥协的情绪。

歌德最驰名的代表作是诗剧《浮士德》。这是他经过近六十年构思写成的一部巨著。全书分为两部，用12,111行诗句写成。第一部发表在1806年，第二部发表在1831年。他用16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浮士德作为全书的主人翁，通过浮士德奋斗的一生，反映当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先进知识分子追求人生真谛和探索理想社会的过程，并对封建王朝、贵族、僧侣的腐朽残暴，以及资本主义剥削、掠夺的种种现象，给予大胆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歌德对于封建制度又抱着改良的幻想。

总之，歌德所度过的八十多年漫长岁月，正是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动荡时代。在德意志，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封建势力的顽固残暴，资产阶级的卑怯妥协和工人阶级的崭露头角，这些社会现实，再加上歌德所经历的生活道路，使得歌德的作品具有两重性格，它一面反映了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激情和对民族统一的热情要求；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对当时现实的妥协和对革命斗争的冷淡，幻想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从事改革，从而逃避革命的震撼。

这一时期德意志最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是亨利希·海涅(1797~1856年)。他生于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一个贫苦犹太家庭。早年在波恩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1817年开始诗歌创作。早期作品著名的有《歌集》和散文《哈茨山游记》等。在这些作品中，他嘲骂、抨击封建贵族和教会，热情号召祖国从百年迷梦中觉醒过来。后来他被迫流亡国外，从1836年起，长期侨居于巴黎。

1843~1845年，海涅结识了马克思，两人交往很密，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海涅的思想发展有了正确的方向，从而使他的诗歌成为革命战斗的鼓角和革命激荡时代的回声。《时代的诗》，是他1839~1846年所写诗歌的一部汇编，其中大部分都是和马克思结识后写成的，这些富于战斗性的诗篇把抨击矛头直逼封建统治者的残暴、教会僧侣的奸诈和资产阶级的卑怯与贪婪。其中最杰出的诗篇之一是《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在这一光辉不朽的诗篇中，他热情洋溢地歌颂德意志工人的斗争，满腔激愤地控诉“老德意志”的封建制度，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最后胜利的信心。恩格斯曾对这一诗篇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此诗发表后，恩格斯就指出：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1844年，他又发表一部共分27章的长诗——《德意志——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一部可以和《时代的诗》互相媲美的姊妹篇，在这部长诗中，他号召人民为争取民主的新德国而战斗。

1848年革命后，海涅对资产阶级民主完全失望，但他还没有能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虽然他肯定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正义的，最后胜利也是必然的，但是他又对革命怀着恐惧情绪，如他最后发表的一部诗集《罗曼采罗》（1851年），一面对“老德意志”充满嘲讽和鞭挞；一面又徬徨不安，情调忧郁，色彩灰暗。虽然如此，但总的说来，他用却扫千军之笔，怀着烈火般的情操，写出许多气贯长虹的战斗诗篇，与革命时代起着共鸣。他的诗歌仍然是19世纪欧洲民主诗坛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意志的封建统治和资本主义正在进行剧烈的搏斗，这种阶级斗争现实反映到当时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在音乐世界中，杰出的作曲家贝多芬用激越的乐章谱写出那个时代反抗封建的呼声。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1770~1827年），生于波恩的一个寒微之家，父亲是一个潦倒的琴师，母亲是厨师之女。贝多芬自幼练琴，未受过正式教育，曾自学钻研过荷马、莎士比亚等人的古典文学作品，以后专心致志于音乐。他长期侨居维也纳，终身未婚，中年双耳失聪。最初以钢琴名家，以后致力于作曲，谱写出许多动人心弦的不朽乐章。

他的创作，除了代表作九部管弦交响曲外，著名的有：《热情奏鸣曲》《悲怆奏鸣曲》《月光奏鸣曲》《克罗采奏鸣曲》《春之曲》《雨滴序曲》，以及歌剧《菲德里奥》等。

在他的九部管弦交响曲中，第三、第六尤其是第九交响曲最为有名。在第三交响曲（《英雄》）中，他用“力”与“火焰”交融的音响，描写出英雄的生活、斗争、死亡，和人民对他的忆念，以及争取新胜利的人民喜悦。在第六交响曲（《田园》）中，他用清新美妙、轻柔隽永的旋律，谱出大自然的沛然元气，和人在大自然中的活力、斗争和欢乐。他的宏伟的第九交响曲（《合唱》），写成于神圣同盟厉行反动时期。在这个乐章里，他运用了多面的、精妙的、高度的音乐艺术的技巧，有时流莺细雨，游丝欲断；有时

惊涛拍岸，轰雷震耳；快板、慢板相间而出；急管繁弦一时并作，用这样一些复杂、美妙的“音乐语言”，构成无数条令人眼花缭乱的“音乐曲线”，抒发出人民的理想、抗暴斗争和冲破黑暗迎来自由、解放的欢乐。他并且在末章中加上席勒《欢乐颂》诗篇的合唱，打破交响曲的传统陈规，管弦之外，添进人声，把交响曲扩大为交声曲，更丰富了管弦乐的绚丽色彩。

贝多芬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曲家。法国革命的启蒙思想和18世纪70年代欧洲文坛上狂飙运动的新思潮，都给予他很大的影响，因而他在创作中，用美妙的音符，把憎恨封建暴政、追求正义自由、争取民族解放的呼声，谱入管弦，写成热情洋溢、光辉壮丽的乐章，并且在乐章中，涵溶着德意志民间哥谣中遒劲纯朴的风格。当然，他的创作未能摆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窠臼，存在着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革命精神，他的乐曲和革命时代起着共鸣。列宁在古典音乐中就特别对贝多芬的乐曲加以肯定，经常要求音乐家为他演奏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等作品，并一再称赞《热情奏鸣曲》是“美妙的音乐”。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阶级根源。

到了 19 世纪 30~40 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先进国家已占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工人为机器排挤而失业，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化，从而不断破坏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使资本家加剧了相互间的竞争，从而加强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扩张，于是便出现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早在 1825 年，英国第一次爆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后大约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生产力和产品遭到空前的破坏，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连续爆发了震撼欧洲的 1831 年和 1834 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6 年至 1848 年英国宪章运动，以及 1844 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不仅提出了独立政治要求，而且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从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一些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

但是，当时高涨的工人运动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还认识不清，找不到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和方法。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严重地阻碍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十分需要指导自己革命实践的科学理论，因此，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时代斗争的需要，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亲身参加革命实践和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同时，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即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对它们提出的种种问题，作了严格的审查，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吸收其中合理部分，并加以根本的、革命的改造，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即关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念；并且进一步加以改造，创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

哈唯物主义的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完成了哲学上的一次真正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吸取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并进一步详尽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揭示出商品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地论证了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指出了工人阶级被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这一伟大学说是动员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法国圣西门、傅利叶和英国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了他们否认阶级斗争，无视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错误观点；吸取了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的推想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是创造新社会的真正力量。这样一来，就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吸取了 19 世纪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成就，特别是 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即“有机体细胞结构”学说、“能量守恒及转化”学说和达尔文的关于“物种起源和发展”学说。这些学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科学地证明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和它的变化、发展，从而推翻了一切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旧宇宙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利用并高度总结了自然科学各部门最新资料和最新成就，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革命活动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于德国。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所发展，并已开始了工业革命，但在政治方面，封建贵族掌握大权，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当时的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并且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既存在着资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也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德国的资产阶级面对30年代至40年代英法等国高涨的工人运动和本国的无产阶级的发动，吓得心惊胆战，感到无产阶级已成为他们的最危险的威胁力量。他们当时处于封建主和无产阶级、新的力量和旧的力量夹攻之中，他们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是比封建贵族更为危险的敌人。德国资产阶级为了对付无产阶级，宁愿与专制制度和贵族作任何妥协。这样，推动德国社会进步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肩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把德国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一旦革命爆发，无产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就会使资产阶级革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并推动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欧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因此，德国遂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故乡。但是，科学共产主义同时也是国际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社会全部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欧洲先进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批判地继承并革命地改造和发展了整个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才创建了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就曾经饶有风趣地表示：“我是世界的公民”。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莱茵省当时是普鲁士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马克思的父亲亨利·马克思，是一位学识渊博、具有先进思想的律师。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抱有远大理想，立志走革命道路。当他在当地中学求学时，曾写过一篇题为《青年人如何选择职业》的文章，在文章中表示要把自己一生献给“最能为人类服务，最能实现人类幸福”的伟大事业。

1835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律，但是他酷爱历史和哲学。在大学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1841年大学毕业前，写成了题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区别》的博士论文，毕业后不久，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马克思的这篇博士论文是一篇具有无神论精神的著作。黑格尔反对伊壁鸠鲁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而马克思却在他的论文中热情称赞了伊壁鸠鲁反抗宗教迷信的勇敢精神。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本打算到波恩大学任教，但由于当时普鲁士反动政府迫害进步学者，他便转入新闻界工作。最初为《莱茵报》撰稿，不久被聘为该报主编。《莱茵报》是当时莱茵省科伦城比较激进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所

办的报纸。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该报日益带有革命民主主义的色彩，成为抨击德国封建君主制度的战斗阵地。在办报工作中，马克思十分重视深入社会，直接接触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撰文激烈反对普鲁士的反动统治，痛斥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吞并，热情地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辩护。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他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论证了劳动人民无罪，指出劳动人民只是由于普鲁士反动政府的苛政，迫于生活走投无路才砍伐树木，强烈谴责政府规定的残酷惩治法，并深刻揭示出普鲁士国家的法律是暴力的化身，是为封建主掠夺贫民服务的。马克思写道：普鲁士国家机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不能设想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政府无关，贫困的原因应该从国家制度本身去找。这就揭露了普鲁士封建专制国家的反动本质，从而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理性和自由的体现这一美化普鲁士国家的谬论。

1843年，普鲁士反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迫害，马克思被迫离职，迁居巴黎。他特意选定在工人区居住，和工人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深入工人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的情况，还同“正义者同盟”以及法国的工人组织保持经常的接触，积极参加它们的活动，共同战斗。同时，他还深入地研究英国的经济学和各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

1844年，马克思创办《德法年鉴》杂志，并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等光辉著作。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布鲁诺·鲍威尔在民族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了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即社会主义革命）两种革命的思想，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论证了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才能使人类获得解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初步系统地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并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以及先进的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重大作用。马克思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从《莱茵报》上马克思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从《德法年鉴》上马克思所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0页。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0～431页。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9页。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9页。

表述的思想观点，更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最终地完成了这一转变。

费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一个纺织厂主，保守的教徒。恩格斯从小就和家庭发生思想冲突。1837年，恩格斯17岁时，就中断了中学学习生活，被他父亲送到巴门的商业营业所当办事员，一年后又到不来梅的一家贸易公司任职。恩格斯十分厌恶投机取巧的“生意经”和尔虞我诈的商业生活，他利用业余时间勤奋攻读，博览群书。年青的恩格斯特别注意考察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工人生活的凄惨景象激起了他对劳动人民境遇的深厚同情。在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乌培河谷来信》中，他揭露剥削阶级的伪善，抨击现存制度，逼真地描述了工人们的悲惨境遇。恩格斯愤怒地写道：工人中“疾病蔓延”，“五个人就会有三个人因肺结核死去”，“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

1841年秋，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他除了学习和研究军事外，还经常抽空去柏林大学旁听哲学，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当他听了御用学者谢林开设的极端反动和保守的哲学课后，即撰文批判谢林违背科学、用神秘主义代替理智、庇护宗教、替君主专制作宣传的反动实质，表现出革命的战斗精神。这时他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开始转向唯物主义。

1842年，恩格斯在他父亲的安排下到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纺纱厂工作。当时英国的宪章运动正进入高潮，而纺织业中心的曼彻斯特又是运动的中心地区，恩格斯进一步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深入考察了工人的悲惨境况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尖锐斗争。他经常深入到工人栖身的贫民区，观察、了解工人们的苦难和斗争。

恩格斯还同英国工人组织、宪章派领导人进行密切联系，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出席他们的集会，为他们的刊物写稿。他在总结英国工人1842年8月罢工失败的教训时，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条基本原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

同时，恩格斯也积极从事理论研究，批判地考察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大量著作，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战斗论文。1844年，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指出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商业危机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揭露了私有制是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政治经济矛盾的根源，进而指明只有“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恩

恩格斯：《乌培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8～499页。

恩格斯：《国内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0～551页。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1页。

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学。恩格斯的这些光辉思想表明他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居住在不同的国度里，但是，他们都非常同情和信任无产阶级，主动接触和了解无产阶级，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分别进行了理论相结合的、深入而广泛的科学研究，在对旧世界展开的无情批判和战斗中，几乎同时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特意绕道巴黎去和马克思会晤，他们在一起畅谈了十天，从此，两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结成了毕生的友谊。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1845年），以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批判了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青年黑格尔派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其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等人虽然反对黑格尔正统派，但他们仍然大肆宣扬唯心史观，鄙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革命斗争，认为只有像他们那样的“哲学领袖”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通过他们的“纯批评”的方法就可以改造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空谈哲理、藐视群众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深刻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他们指出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活动，社会就失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历史既不是“绝对精神”的体现，也不是“天才”人物的创造，只有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千百万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进一步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因此，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1845年，恩格斯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是一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义辞严的控诉书。恩格斯根据亲身搜集到的大量材料，论证了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论述了英国工人难以忍受的悲惨处境，同时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难的阶级，而且是一个能够解放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同时，社会主义只有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能成为一种力量。恩格斯提出了工人运动必须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原理。

1845年1月，马克思受法国政府迫害，迁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春，写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他强调了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他第一次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实践的观点。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黑格尔及其门徒的唯心主义哲学作了彻底的清算，也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并揭露了当时在德国十分流行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比较详尽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一个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个社会制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根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45页。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45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5页。

据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马克思、恩格斯并进而指出：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这里已包含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萌芽。

1847年，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以革命的辩证法彻底批判了蒲鲁东“永恒不变的正义”的呓语和用“对立调和”代替“对立斗争”的谬论，深刻揭露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同时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原理、观念和范畴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且也不是永恒的，只是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暂时产物。

马克思还揭露了蒲鲁东企图在大工业生产时期保存小生产的反动立场，粉碎了蒲鲁东妄图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去“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幻想，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并揭示出作为新社会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全世界历史使命。马克思后来在追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形成时写道：“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的、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恩格斯为适应这一客观要求，在创立共产主义理论的同时，还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艰苦而又卓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使自己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引向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道路。

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接着在巴黎、伦敦、汉堡、莱比锡、西里西亚各地设立了支部。创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通过与各国工人团体、社会主义者的经常联系，团结先进工人，克服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理论和涣散状态，促使各国社会主义者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步骤，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了干部。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各国工人组织的联系中，特别注意对正义者同盟的团结和改造。正义者同盟是1836年从侨居巴黎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组织的流亡者同盟分化出来的左翼组织，成员主要是工人和手工业者以及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参加的不仅有德国人，而且有瑞士人、荷兰人、匈牙利人、俄国人、捷克人，逐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这个组织深受魏特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2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页。

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影响，其后又受到“真正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性的秘密组织。它的指导思想是平均的共产主义，它的宗旨是要“世界上一切人享有自由，使任何人都不比别人生活得好些或坏些”，它的口号是超阶级观点的“人人皆兄弟”。因此，同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作斗争，是改造同盟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步骤。

乔治·魏特林（1808~1871年）生于普鲁士的马格德堡，做过裁缝和雇佣工人，1834年流亡到巴黎，1837年参加正义者同盟。他的主要著作有：《人类现在怎样？和将来怎样？》（1838年）、《和谐和自由保证》（1842年）、《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年）。魏特林在他的著作中，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主张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但是，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他拟定了一个“平均共产主义”方案，主张“共有共享”，人人从事劳动，人人待遇平等，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同时他又把共产主义看成是聪明人的发明，一旦设想出来就能立即实现，甚至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口袋里装有一付实现人间天堂妙方的“救世主”。他虽然也主张暴力革命，但不过是少数人的密谋活动。他并认为革命应由社会上最不幸的人——乞丐、罪犯和强盗去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密谋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并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吸收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1846年的一次会议上，帮助他改正错误，热情希望他转向共产主义。但是他坚持错误观点和宗派立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同他决裂，将他从通讯委员会开除出去。这得到了伦敦、巴黎和德国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坚决支持。这是科学共产主义在正义者同盟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社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真正社会主义”者是一些破坏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蒲鲁东的空想计划杂拌起来，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超阶级的“博爱”、“友谊”等空洞的词句，鼓吹阶级和平，反对革命，使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海尔曼·克利盖宣传说，如果在北美划出14亿英亩土地，无偿分给贫困者，那么在这里就将建立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痛斥了这种荒谬的说教，指出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掩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清除“真正社会主义”在工人中的恶劣影响，通讯委员会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在《通告》中指出“真正社会主义”所争取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克利盖妄图把无产阶级用革命方式改造社会的学说改变为关于“爱”的胡言乱语，这种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随后，1846年8月，恩格斯受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同“真正社会主义”在巴黎的主要代表卡尔·格律恩及其信徒作斗争。格律恩和蒲鲁东气味相投，反对暴力革命，宣扬改良主义。他甚至把蒲鲁东捧为“当代最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因此，在巴黎反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恩格斯在巴黎参加了正义者同盟的活动，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向工人讲解德国的历史和现状，以提高工人觉悟，并在工人集会上批判格律恩及其追随者。为了揭露蒲鲁东和格律恩“和平药方”的反无产阶级性质，戳穿“真正社会主义”的虚伪口号，恩格斯特别强调和论证了暴力革命的必要，经常连续几个夜晚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进行论战。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宗旨：“一、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二、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三、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提出的三项原则得到了巴黎正义者同盟的确认和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真正社会主义”终于被击溃了。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正义者同盟主要领导人和大部分成员逐渐摆脱了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确信改组同盟的必要。1847年春，同盟委派全权代表莫尔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正式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并接受他们的意见改组同盟。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正义者同盟过去“人人皆兄弟”的错误口号。大会委托恩格斯草拟《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章程第一条明确指出：“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第一个党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胜利，它是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最初组织形式，是第一国际的先驱。共产主义者同盟一直存在到1852年才解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1页。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

第四节 《共产党宣言》

1847年11月2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德、英、法、比、波兰、瑞士等国共产主义者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批准了同盟的章程,并着手制订同盟的纲领,经过十天的争论,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原则,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在伦敦发表。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晶。《宣言》由引言和四章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

(1) 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在这条规律的支配下曾经战胜了封建制度,它也必然在这条规律的支配下走向灭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明显地暴露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打碎这一桎梏而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必不可免地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2)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同产生,由于两者利益是对抗的、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随着斗争的发展和激化,到一定阶段,就要转变为公开的革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所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肩负着消灭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一切阶级,无产阶级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它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最有前途的一个阶级,机器大生产把无产阶级组成一支产业大军,锻炼成为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又是一无所有和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社会最下层,它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同时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所以它又是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战斗性、坚定性和彻底性,并且是唯一能团结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阶级。

(3)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

国家机器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资产阶级总是经常运用它手中的强大国家机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维护其阶级统治。所以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唯一的必由

之路就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并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最后，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一切阶级的统治，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初次明确表述。

（4）共产主义政党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领导力量。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使无产阶级觉悟到要组织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一个革命的独立政党，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战胜旧世界，创立新社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党要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并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所武装。这个党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的策略原则是，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作。“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以实现最近要求，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巧妙结合起来，制定了建立统一战线原则。

此外，《宣言》并用一整章的篇幅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揭露它们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实质、指出它们的反动性和欺骗性，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它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宣言》的发表，使世界无产阶级获得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使各国共产主义者有了共同的战斗纲领。《宣言》问世以来的历史，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争取实现《宣言》所揭示的真理而斗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公开的敌人或者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历史。《宣言》的基本原理是常新的，“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页。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93页。

第十章 1848 年欧洲革命

1848 年，革命浪潮淹没了欧洲大地，从巴勒摩到巴黎，从柏林到维也纳，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都爆发了革命。1848 年欧洲革命是工业革命在欧洲胜利进军的情况下发生的，无产阶级已经形成并且走上政治舞台。因此，革命呈现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封建势力搏斗，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不得和无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他们已经失去 17、18 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了。

第一节 1848 年法国革命

（一）巴黎二月革命

七月王朝并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只是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权，实际上掌握政权的是一小撮金融贵族，其中包括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大矿山主、大森林主以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而国王路易·菲力浦不过是这个集团的代理人而已。在七月王朝时期，享有选举权的也只是这个阶层，因为宪法规定只有年纳 200 法郎直接税的人才享有选举权。按照这个标准，不仅广大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被剥夺了选举权，就是中等资产阶级，其中包括许多新兴工业家，也享受不到这个权利。上层资产阶级垄断选举权及政权，许久以来就是中等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满的原因之一。这些金融贵族不但垄断法国政权，而且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国民经济，榨取和盗窃国家财富，并且以非法手段扰乱市场，从而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这是中、小资产阶级不满七月王朝统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七月王朝的统治下，法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农民在政府的沉重的税捐及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下，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工人在资本家的贪得无厌的榨取下，愈益贫困化。因此，劳动人民对现状不满，是很自然的。

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满七月王朝的统治，是 1848 年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革命的直接的、客观的任务，便是推翻七月王朝的金融贵族的反动统治，建立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使法国政治上层建筑适应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到七月王朝末期，在工人中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的影响很大。路易·布朗在 1840 年发表了一部著作《劳动的组织》。他在这本书里指出：工人的贫困、堕落、犯罪及愚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他认为把劳动组织起来就可以消灭这种现象。因此，他建议由资产阶级国家拿出资本，成立“社会工厂”，由国家负责指导和组织生产。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工厂”普遍成立就可以排挤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这样，他把工人解放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国家上面，他提倡阶级合作，把资产阶级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东西。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蒙蔽了许多工人，他们天真地相信在推翻七月王朝之后就可以靠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实现工人的解放。

在反对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也产生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及主张，并且形成了以下三大派别：第一，王朝反对派，其领袖是巴洛。这是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派别，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部分大资产阶级利益。它并不反对君主制，只要求实行若干改革：扩大选举权，清洗行政机构，根除贪污腐化现象，建立廉洁政府。第二，资产阶级共和派，其核心是以拉

马丁为首的《国民报》派。这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它反对七月王朝的君主制，极力鼓吹共和思想，要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因此，它得到工业资产阶级的拥护。第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以《改革报》派为核心，代表小作坊主、小店员、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小知识分子阶层的利益。他们不仅要求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而且主张实行社会经济改革，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实行普选制。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中比王朝反对派更为坚决，但是它具有两面性：当它遭到金融贵族打击时，便拥护革命，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但是当革命深入发展时，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提出自己的要求时，就害怕革命，阻止革命发展，甚至公开反对革命。

1840年，基佐上台执政。最初他在名义上任外交大臣，但实际上却掌握内阁实权。1847年9月，正式担任首相。他是金融贵族的忠实代表，既仇视工人和劳动人民，也顽固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当人们要求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和扩大选民范围时，他竟厚颜无耻地回答说：“诸位先生，你们发财吧！发了财，你们就会成为选民了。”

1845年和1846年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造成了严重饥荒，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法国，为此工厂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有的地区失业工人占该地区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在业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50%~60%。由于地主和资本家进行粮食投机，粮价迅速上涨。不少群众自发地起来捣毁地主的庄园，强占粮仓。饥民骚动事件几乎遍及全国。工人群众也不断地掀起罢工浪潮，反对厂主降低工资和七月王朝的暴政。

在工农大众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王朝反对派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发起了“宴会运动”，以宴会为名，组织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宣传改革选举制度。1847年7月在巴黎举行了拥护选举改革的第一次宴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在这次宴会以后，法国各地也纷纷举行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这个运动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响应，起了发动群众的作用。

国王路易·菲力浦认为选举改革宴会运动对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下令禁止王朝反对派预定在1848年1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宴会活动。王朝反对派决定将这次例行宴会改在2月22日举行，同时准备在这一天组织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破坏集会自由。但政府下令禁止一切政治集会和游行，并且准备必要时使用武力。王朝反对派开始退却了。

但是，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不甘心退却的，他们于2月22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中午时刻，示威群众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的口号，冲向基佐住宅，把窗子玻璃打得粉碎。

傍晚时分，示威游行分散到邻近各条街道，开始拆毁马路，推倒公共马车，并动手构筑街垒，巴士底广场上的一个警察密探被群众杀死。武器铺也被群众捣毁了。2月23日清晨，革命群众与政府军展开巷战，武装起义爆发了。大批国民自卫军士兵不仅不执行镇压群众的命令，而且公开支持革

命。面对这个形势，路易·菲力浦不得不把基佐免职，命有自由主义声望的莫尔伯爵组织新政府，企图借此阻止革命的发展。基佐下台消息传出后，资产阶级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准备和七月王朝妥协，共同执政。但是，巴黎的无产阶级决心彻底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制度。他们坚守堡垒，继续战斗。23日夜，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革命群众高举火炬，喊着“建立共和！”的口号，举行了通宵的全城示威游行。武装的工人在23日至24日一夜间筑起了一千五百多座街垒。

起义迅速地扩大了，到24日晨，巴黎的无产阶级和群众占领了巴黎所有的兵营和武器库。人民高呼“打倒路易·菲力浦！”“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向王宫进攻。浩大的革命声势迫使莫尔谢绝组阁。路易·菲力浦看大势已去，不及整装就逃往英国去了。资产阶级企图保留君主立宪制，他们在人民进攻王宫的同时，召开了立法会议，企图拥立路易·菲力浦的长孙巴黎伯爵为国王。起义的工人驱散了立法会议，粉碎了资产阶级保留君主制的阴谋。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正当巴黎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大街上战斗的时候，资产阶级趁机窃夺了革命果实。2月24日晚在市政厅大厦宣布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由11人组成，其中二人为王朝反对派，五人为资产阶级共和派，二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工人代表二人，即路易·布朗和阿尔伯特。从表面上看，临时政府是由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联合组成的，但实际上，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重要的职位都被资产阶级所窃据。主席由杜邦·德·累尔担任，外交部长是拉马丁，司法部长是克列米埃，海军部长是阿拉格，财政部长是加尼埃·巴热斯。参加临时政府的工人代表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尾巴。巴黎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了资产阶级的手中。

资产阶级之所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掌握政权，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革命前，资产阶级政客积极反对七月王朝，并且从事各种宣传活动，因而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第二，革命前，改良主义者路易·布朗的思想在工人中间起了麻痹作用，使工人相信资产阶级上台可以帮助改善工人的经济地位。

工人阶级虽然没有掌握政权，但是他们当时的力量可以左右整个局势，因为他们尚未放下武器。在这个情况下，临时政府也不不得不在一系列问题上向工人阶级让步，接受工人的要求。

第一，在巴黎工人的强大压力下，临时政府在2月25日不得不宣布普选制和共和国。这便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当时在工人阶级眼中，这个共和国应该是一个“社会共和国”，他们幻想在“社会共和国”里，人民群众不但可以享受政治权利和自由，而且还可以解除资本的压迫。但是资产阶级却力图使共和国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第二，2月28日，巴黎工人在游行示威中要求成立“劳动部”，以解决工人失业问题。临时政府虽然没有同意成立“劳动部”，但是却不得不采取

一个妥协性的措施——成立“工人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是设在巴黎临时政府里面，而是设置在城郊的卢森堡宫，因而又称为卢森堡委员会，由路易·布朗和阿尔伯特主持。实际上这个委员会是有名无实的机构，既无经费，又无实权，也无具体职责。临时政府之指定路易·布朗及阿尔伯特去主持它，是想借此把这两名工人代表从临时政府中排斥出去。而路易·布朗在主持这个委员会时，起了有害的作用。他当时提出许多改革方案，如成立生产合作社、公共食堂等。他向工人宣传说：所有这些方案都可以在阶级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他还劝工人耐心等待政府去实施这些方案。路易·布朗的这些行为大大地麻痹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因而他实际上扮演了工人阶级的叛徒的角色。

第三，针对工人成立“社会工厂”的要求，临时政府在2月28日下令成立国立工厂。工人天真地相信这样做可以达到劳动解放的目的，但是临时政府却别有打算，想借此去解除工人的思想武装。当时在法国工人中间，路易·布朗的劳动组织的思想颇受欢迎。这种思想固然是有害的，但是在资产阶级看来，不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都是危险的。政府成立国立工厂就是为了败坏社会主义在工人中间的声誉：一方面说国立工厂就是路易·布朗提倡的“社会工厂”，另一方面又故意恶化国立工厂中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过资产阶级的这个目的并未达到，因为工人照旧向往社会主义。

第四，在工人的压力下，临时政府又下令将巴黎工人的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同时也不得不默认集会、结社及出版的自由。实际上当时巴黎出现了各种政治俱乐部，它们团结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3月9日又取消了债务囚禁法（按照此法，到期无力偿债的债务人必须进监狱）。

临时政府的这些让步虽则包含很大的欺骗成分，却起了麻痹工人的作用。而当工人麻痹大意之际，资产阶级在处心积虑地孤立工人和增强自己的力量。首先，早在2月25日就建立所谓“别动队”，招募流氓地痞，把他们武装起来，以便利用它去对付工人阶级。其次，在3月16日下令对原有的土地税增收45%的附加税，同时造谣说：让农民纳附加税就是为了养活国立工厂的工人懒汉的。这就使得落后的农民迁怒于工人。此外，又吓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说：工人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要求没收私有财产。这就使得相当部分的农民和小资产者对工人阶级怀有戒惧心理。最后，临时政府还以镇压工人暴动为借口，乘机调来10万国民自卫军进驻巴黎。

这样，二月革命以来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工人陷于孤立及无戒备的状态，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到5月制宪会议开会后，资产阶级感到形势完全有利于自己，于是便开始大举向工人阶级进攻，因而引起了六月起义的爆发。

（二）六月起义

1848年4月23日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选举是按照普选制原则进行的。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挑拨下都仇视工人阶级，因此在选举中都投了资产阶级政客的票。结果，资产阶级共和派在选举中获得压倒的胜利。在880个代表中，有550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212人是君主派，100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工人代表只占18个议席。布朗基等工人领袖落选了。5月4日，制宪会议开幕，到5月10日由制宪会议选出执行委员会，以代替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由阿拉格、巴热斯、马利、拉马丁及赖德律·洛兰等五个人组成，其中大多数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只有洛兰一个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工人代表则完全被排除在外。

制宪会议开幕及执行委员会成立后，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巩固，而工人阶级处于劣势，于是便开始向工人阶级大举进攻：下令禁止集会、结社；解散卢森堡委员会；6月22日又下令解散国立工厂。资产阶级政府之所以解散国立工厂，首先是因为国立工厂工人与工人革命组织有联系，这颇使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其次，这也与企业主的要求有关。1848年6月，经济危机已经有所缓和，企业主想扩大生产，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他们要求解散国立工厂。最后，资产阶级政府决定解散国立工厂，也是因为它想借此挑起巴黎工人的暴动，以便在工人无准备的情况下粉碎工人的力量。可见，资产阶级是蓄意制造一场流血事件。资产阶级之疯狂进攻特别是解散国立工厂是工人六月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月起义爆发于6月23日，一共进行四天。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群众性的起义，除了国立工厂工人外，一般工人也参加了战斗。第二，它提出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求，在起义中提出的口号有：“打倒人对人的剥削！合作的劳动组织万岁！”第三，起义有纲领：解散制宪会议，起草新宪法，实行一切企业的社会化及实行义务教育等等。第四，起义有相当的组织性及计划性。巴黎各区都成立起义的革命司令部。战斗计划是克尔索斯制定的。第五，起义者表现了无畏的革命气概。

在起义面前，资产阶级惊慌失措，他们赶忙调动一切力量进行镇压。6月24日，制宪会议宣布解散执行委员会，授予共和派将军卡芬雅克以独裁大权，由他负责镇压起义的军事行动。别动队也参加镇压。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与装备及武装都很差的四五万起义者对立的是配备有优良武器及大炮的30万政府军。因此，到26日下午，起义的最后据点就陷落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六月起义壮烈结束。

反动政府对失败者进行血腥的报复。在战斗中有500名起义者英勇牺牲了，在起义失败后，又有11,000名起义者惨遭屠杀。反动军队见到穿工人服装者就枪杀，不仅枪杀男人，而且也枪杀妇女甚至儿童。被捕者总数达25,000人，尽管其中半数因缺乏证据而获开释，但是剩下的半数被流放外地去服苦役。

六月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巴黎工人在起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

位。首先，小资产阶级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六月起义爆发后，巴黎小资产者主动参加了镇压起义的军事行动。其次，农民也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本来在二月革命后不久，在资产阶级的挑拨离间下，农民已经对工人阶级抱有成见。而工人阶级也没有对农民进行有力的宣传，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结果，六月起义期间农民成了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而没有成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力量。当时就有不少的乡村富裕农民参加了各省资产阶级的义勇队，开赴巴黎去援助政府。当然，在某些地区，贫农也偶尔对六月起义表示同情。如罗亚尔省卡果尔县的一位农民就说：“起义者是一批诚实人”，“真正的爱国者做了政府的牺牲品”，“这个政府将要垮台”。农民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第一，法国农民是靠资产阶级的帮助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因此农民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第二，法国农民到19世纪40年代已经分化出农村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变成了农民与城市大资本家之间的桥梁，有助于资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法国农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与农民建立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首要条件。但是农民站到资产阶级一方，这就严重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是六月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

当然，起义本身也有缺点：没有统一领导，没有统一的起义参谋本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也很差，以致克尔索斯的军事计划未能很好地贯彻。

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然而六月起义之失败，是1848年法国革命发展中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在这以前无产阶级一直是控制局势的主人，从此以后，工人力量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可以从心所欲地推行反动政策了，这个反动统治发展到顶点，便是1851年政变及波拿巴独裁政权的建立。

（三）路易·波拿巴政变

在把六月起义镇压下去之后，制宪会议便推选卡芬雅克为国家临时元首——执政。于是，资产阶级共和派不仅控制了制宪会议，而且也掌握了行政大权，因而确立了共和派的全面统治。

在建立了自己的全面统治之后，资产阶级共和派便一个接一个取消了人民在二月革命后所争得的一切革命成果。制宪会议于7月28日通过法令，要求政府和警察严密监视俱乐部的活动，实质便是限制集会结社的自由。8月9日到11日又通过出版法令，规定：要出版一种报纸，必须缴纳高额的赋税（在巴黎为24,000法郎），这等于限制出版自由。制宪会议又在8月30日废除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把工作日恢复为12小时。制宪会议拒绝了

小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延期偿付债务的要求，恢复了债务囚禁法。卡芬雅克还对拒不缴纳 45 生丁的附加税的农民进行迫害。这些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不满。

制宪会议在 1848 年 11 月 4 日通过了一部宪法，确认了普选制。关于国家组织，宪法规定：立法会议是最高立法机关，每隔两年由人民投票选出。总统为最高行政元首，四年选举一次，也是由人民直接选出。但是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总统权力很大，他可以任免内阁，内阁向他负责。总统权力规定得如此之大，目的是为了有效地镇压工人运动。宪法虽然承认人民应该享有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信仰等自由，但是同时又强调这些自由必须受国家监督，不得影响“社会安全”。宪法虽然规定了普选权，但是又以选举人必须在该选区居住半年以上的条件来限制这个权利（这对于居无定所的工人很为不利）。因此，马克思在分析这部宪法时指出：“这个文件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的意图的漂亮话。……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

宪法通过后，便是总统选举。参加总统竞选的共有六个候选人。巴黎的工人提出当时仍囚禁在监狱中的拉斯拜尔为候选人。小资产阶级各民主阶层的候选人是赖德律·洛兰。资产阶级共和派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的候选人是卡芬雅克，另一个集团的候选人为拉马丁。大资产阶级的波拿巴派提出了路易·波拿巴为候选人。奥尔良派提出盛加尼埃为候选人。

六个总统候选人中，卡芬雅克和路易·波拿巴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卡芬雅克当时是政府首脑，可以充分地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为自己的竞选服务。而路易·波拿巴在当时却受到大资产阶级中有权势的人物的支持。所以，在总统的竞选中，路易·波拿巴便成了卡芬雅克的劲敌。

卡芬雅克为了击败路易·波拿巴，便利用其政府首脑的职权，极力拉拢教权派和君主派。为了博得教权派与君主派的欢心，卡芬雅克便决定利用意大利事件。1848 年 11 月，罗马爆发了起义，推翻了教皇庇护九世的政权，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这时，卡芬雅克便派遣了一支法国舰队到罗马附近的契维塔—米克基亚保护教皇，准备把教皇送到法国。此举的目的是要教权派的领袖相信，他比教权派更仇视罗马共和国。但是，卡芬雅克的计谋变成了泡影，罗马教皇拒绝接受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殷切接待，而甘愿逃到加埃塔，藏身在那不勒斯的刺刀保护下。

卡芬雅克不仅没有取得教权派的信任，而且他对君主派和教权派过分的、公开的卑躬屈膝引起了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愤恨，这就使他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中丧失了一部分选票。

路易·波拿巴（1808～1873 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他才能平庸，野心很大。他企图学习他的伯父，在法国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因此，曾两次试

图夺取法国政权（1836年和1840年），不过先后都失败了。1844年，他在狱中写了一本小册子《论消灭贫穷》，在这本小册子里把自己打扮成为劳动群众的“代表”。其实，他在暗地里干着勾结大资本家的勾当，发展其党羽势力。他在自己的竞选宣言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超党派”的人，是“民族统一”的坚决维护者，是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继承人。他答应为资产阶级“确保社会秩序，免遭一切侵害”；答应给天主教徒“传教自由”；向工人保证“大赦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向农民保证“减轻赋税”和“保护小土地私有制”，并且用“低息贷款”来安抚小资产阶级等等。在经济危机、贫困、破产和失业的情况下，路易·波拿巴关于提高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恢复商业和物质繁荣，人人都能找到工作等“诺言”，就显得特别诱惑人和特别具有魅力。

1848年12月10日总统选举结果，路易·波拿巴以绝对优势的选票，当选为法国的总统。

路易·波拿巴之所以当选总统，是因为他不仅得到了大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强有力的支持，而且骗取了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信任。大部分工人投路易·波拿巴的票是为了向“六月的屠夫”报仇，推翻卡芬雅克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因不满共和派政府的政策也投了波拿巴的票。农民之投波拿巴的票，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19世纪上期法国农民在高利贷者及资产阶级国家的剥削下，生活每况愈下，很多人把土地抵押出去作为向高利贷者告贷的保证。他们最担心失去小块土地，他们希望波拿巴上台能保护他们的土地财产。农民投票拥护波拿巴是他获胜的主要原因，因为农民占选民的大多数。君主派及大资产阶级则视波拿巴之上台为君主制复辟的开端，所以也投了他的票。波拿巴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因利乘便，利用各种阶级矛盾而赢得大多数人的拥护。

1848年12月20日，卡芬雅克辞去执政职务，波拿巴就任法国总统。但是，波拿巴不满足于当总统，他梦寐以求的是：步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后尘，建立个人独裁，恢复帝制。因此，在他就任总统后，他便一心一意去消灭自己的政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所使用的惯常手法，便是联合未来的政敌共同打击自己的当前的政敌，等当前的敌人被消灭后，再去消灭自己的同盟者。在他就职后所遇到的主要政敌，便是共和派，因为共和派所把持的制宪会议坚持不肯解散，也不举行立法会议的选举。在这个情况下，为了对付共和派，波拿巴决定利用和联合秩序党。秩序党包括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它在六月起义后才出头露面。正统派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拥戴被七月革命所推翻的波旁王朝；奥尔良派代表大金融贵族的利益，他们希望七月王朝复辟。大土地所有者此时都资产阶级化了，所以整个说来秩序党是代表法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强大党派。这个党内的两派尽管各有自己的主张，但是对抗共和派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暂时尚能团结在一个党里。

为了对付把持政权不放的共和派，波拿巴首先任命奥尔良派巴洛为第一

届内阁总理。巴洛乃网罗奥尔良派及正统派组成了秩序党内阁。波拿巴还任命秩序党人盛加尼埃为国民军及别动队的司令。然后波拿巴与内阁、军队共同向制宪会议施加压力，后者不得不在 1849 年 5 月 29 日解散，而让位给根据宪法选出的立法会议。

在立法会议中，势力最大的便是秩序党，秩序党的反对派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法会议开幕后不久，民主派便攻击秩序党及总统的对外政策，攻击他们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认为这是侵犯外国人民的自由。1849 年 6 月 11 日民主派提议将总统及其内阁阁员交付法庭审讯，因为宪法禁止运用法兰西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去反对任何人民的自由。但是，这个提议被立法会议否决了。民主派在立法会议中遭到失败后，便在 6 月 13 日发表告人民书，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反抗政府。这个号召只是得到微弱的响应，在当天有一些群众举行示威游行，但是很快地就被军队驱散了。民主派在 6 月 13 日的失败，充分说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动摇性。

在镇压 6 月 13 日民主党的发动后，反动政府又实行了高压政策：下令逮捕民主派议员，民主派领袖赖德律·洛兰亡命英国。

民主派失败后，秩序党就成为波拿巴的主要对手，因为该党不但控制立法会议，而且还掌握内阁和军权。为了对付这个强大对手，波拿巴乃先培植自己的势力。他在 1849 年 9 月底成立了一个团体，名曰“十二月十日会”，这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拼凑而成的，共有 1 万人。参加这个团体的流氓们既是帮凶又是帮闲，专门殴打革命人士，而当波拿巴到处演说时，这些流氓们就替他捧场。

1849 年 11 月 1 日，波拿巴罢免了秩序党人巴洛内阁，另委托自己的亲信特豪普尔组织内阁，这样就把行政大权从秩序党手中夺过来。波拿巴与秩序党斗争的下一个步骤便是从他们手中夺取军权。不过，在采取这个步骤之前，波拿巴暂时与秩序党控制下的立法会议狼狈为奸，宴行一系列反动政策，其中最突出的便是 1849 年 12 月 20 日颁布的关于恢复酒税的法律及 1850 年 3 月 15 日公布的国民教育条例，前者对于酿酒的农民颇为不利，后者把学校交到天主教僧侣手中。这些反动政策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明显地表现在 1850 年 3 月 10 日的补充选举上。在这次选举中，有一些工人和民主派当选。这在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恐慌。立法会议中的秩序党认为这是普选制造成的，因而在 5 月 31 日取消了普选制，指望借此来巩固自己在立法会议中的地位。

普选制取消后，波拿巴便利用这一点向立法会议进行敲诈勒索，索取 300 万法郎的年金，并且表示如果立法会议拒绝这个要求，他就把立法会议取消选举权的犯罪行为诉诸人民。立法会议只好让步，拨出 216 万法郎送给他。不久，他就利用这笔钱去收买军队，用金钱、美酒、佳肴去招待军官及士兵，

1849 年春，法国政府派 1 万法军到意大利的罗马，企图帮助被黜的教皇复辟。

以此笼络军心。1850年10月10日在大检阅中，军队走过他的身边时一致高呼：“拿破仑万岁！皇帝万岁！”有了军队做靠山，波拿巴便又进一步采取行动，1851年1月10日把秩序党人盛加尼埃的总司令职务免除，于是把军权也从秩序党手中夺过来了。

秩序党在丧失行政权及军权之后，其内部就开始涣散了。在立法会议中，有不少秩序党人感到前途无望而脱离了党。接着又分裂为正统派及奥尔良派，而这两派又分裂成许多小的党派，彼此之间争吵不休。1851年又赶上法国发生经济危机。但是，法国资产阶级当时认识不到这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引起的，他们把经济危机归咎于秩序党内部的纠纷，并且迫切要求出现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波拿巴分子便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唯有建立军事独裁才能挽救法国资本主义社会。这就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对波拿巴抱很大的幻想和期待。

到1851年冬，波拿巴感到建立军事独裁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窃夺了银行大批款项，收买军官及士兵，在12月1日利用军队发动政变。军队占领了巴黎重要据点，包围了立法会议大厅，逮捕其中首要的秩序党议员。政变成功后，波拿巴便成为军事独裁者，并且在翌年12月举行加冕礼，正式即位为皇帝。法国宣布为帝国，这便是法兰西第二帝国。

路易·波拿巴独裁是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反革命统治形式是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而且在斗争中的主要阶级力量基本平衡，即资产阶级已无力彻底镇压革命力量，而无产阶级力量又很软弱，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形势下产生出来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政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阶层，即由银行家、高利贷者和大地主构成的金融寡头以及和宫廷、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大工业家们的利益。这个反动政权使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警察官僚机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强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1848年法国革命，在革命失败后，写出了许多光辉的著作，其中主要的有《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总结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的思想。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国家问题只是提出了“最一般的概念”，“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马克思根据1848年法国革命的经验，在国家问题上又进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马克思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33、134页。

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彻底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99页。

第二节 1848 年德意志革命

1848 年德意志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统一，革命的次要任务才是消灭农奴制残余。这是因为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大多数国家自从 19 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解放农奴，尽管这时还保存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但封建农业已沿着“普鲁士道路”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而 19 世纪上期的德意志仍分成大小 38 个国家，这种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严重地妨碍了德意志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与早期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德意志 1848 年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已经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领导革命的阶级，他们在革命中表现得非常萎靡、畏缩。这是因为：第一，在 1848 年革命前，德意志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工人阶级已开始出现。工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在西里西亚起义中所显示出来的威力已足以使德意志资产阶级发抖。第二，德意志资产阶级出世太晚，当它出世时，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已蓬勃开展，特别是英、法的工人斗争，吓怕了德意志资产阶级。

（一）柏林三月革命

在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普鲁士的首都柏林也爆发了革命。

3 月 13 日，在柏林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群众的和平示威到 16 日发展为人民和军队的街头流血冲突，有一百五十多名群众被打死或打伤。这个流血惨案激起了群众的无比悲愤，3 月 18 日，群众示威队伍包围了王宫，要求把军队撤出柏林。威廉四世不但拒绝了群众的要求，而且还下令军队向群众开枪。群众便在街头筑起街垒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威廉四世调动了 14,000 名常备军和几十门大炮进行镇压，但是武装起义的群众并没有退缩，他们愈战愈强，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终于把政府军队击退。国王见势头不妙，被迫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宣布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和改组政府等等。

3 月 29 日实行政府改组，国王任命莱茵区的大工厂主康普豪森和大资本家汉塞曼组成内阁。5 月 22 日召开了国民会议，其中资产阶级代表占优势。

这样，资产阶级靠工人起义取得了政权。但是，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之后做了一系列蠢事，为自己的最后垮台铺平了道路。第一，资产阶级内阁由于害怕工人斗争的发展，竭力保存旧专制制度下面的国家机器，借以镇压人民革命。他们让原来的封建文武官员继续留任，让旧贵族照旧掌握军队及警察机构。甚至为了镇压工人，资产阶级内阁还请求国王把撤出柏林的军队重新调回来。这样，资产阶级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很不完全，他们只掌握了内阁及国民会议，其余的国家机器大部分仍留在封建势力手中。这就为旧封建势力将来进行反扑准备了地盘。

第二，资产阶级内阁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1848年6月，柏林工人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但是为资产阶级政府所拒绝，因此6月14日工人起义了，起义的工人冲进柏林军械库，夺取了武器。但是资产阶级内阁下令派军队进行残酷的镇压。结果工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摧残。资产阶级这样做，其实是挖了自己的墙脚，因为封建势力之所以容忍资产阶级组织内阁，只是由于有工人革命力量的威胁。

第三，资产阶级背叛了农民的利益。1848年夏，在普鲁士各地出现了农民运动的高潮。东普鲁士农民到处停止履行强制劳动，某些地区甚至迫使地主们立下字据放弃占有农民的劳役的权利。但是国民会议并没有支持农民的这个革命行动，没有从法律上把农民的斗争果实固定下来。相反地，它把农民的主要的封建义务（劳役地租）保存下来了，只是宣布取消某些次要的地主特权，如狩猎权等等。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出卖了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从而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无力对付封建势力的反攻。

原来以国王为首的普鲁士封建反革命势力对资产阶级让步，是迫不得已的。到1848年秋，他们通过养精蓄锐，军事力量已大大增强，同时欧洲各地革命运动相继失败，也助长了他们的反革命气焰。于是他们感到进攻革命的时机到了。10月，国王罢免了奥斯瓦尔德—汉塞曼内阁，而另指定反动分子普菲尔组织内阁。到11月1日，国王又命令自己的亲族勃兰登堡伯爵上台组阁。这样一来，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完全被撵出内阁。接着，国王又准备向国民会议开刀。当时国民会议正在喋喋不休地讨论宪法问题。11月9日，政府突然下令把国民会议从柏林迁到勃兰登堡。11月16日，政府军队气势汹汹地闯入国民会议大厅，强制解散了它。议员们只是作了消极的反抗，他们只号召人们拒绝纳税，而不敢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暴动，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已经出卖了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不可能得到他们支持的。这样，柏林三月革命好似昙花一现，不消一年工夫就以失败而终。

（二）马克思、恩格斯与德意志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1848年德意志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革命刚一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立即奔赴革命斗争的第一线。3月初，他们首先来到巴黎，不久就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制定了德意志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行动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把《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运用到德意志革命具体实践中的一个光辉范例。他们在《要求》中指出：当前的德意志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这次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为了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他们提出一系列革命措

1848年6月20日，奥斯瓦尔德代替康普豪森入阁。

施：消灭封建制度，无代价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实行政教分离，普及国民教育；实行普选制；改革司法制度，实行免费诉讼；成立人民武装等等。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把革命停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而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因此，《要求》还提出了下列各项措施：把没收来的封建地产收归国有，矿山、矿井、铁路、轮船、银行、邮局等也收归国有。

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共产党人按照下列两个原则行动：第一，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一刻也不应忘记最终的斗争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第二，共产党人在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决不能把自己降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水平。要对民主派的动摇性及不彻底性进行斗争。

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回到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祖国，在科伦参加了小资产阶级民主组织“民主协会”的活动。但是，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进行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斯蒂凡·波尔恩（1824～1898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他是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和“工人兄弟会”两个群众性工人组织的领导人。波尔恩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阶级不需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去争取领导权。他宣扬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拒绝执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纲领，公开声言不作“党的政策的奴隶”。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全部任务只是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宣扬工人要在国家的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团体和信贷机构，通过与资本家谈判的途径达成协议，实行点滴的改良。他把工人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斗争上去，反对工人参加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他结党营私，进行阴谋分裂活动。波尔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干扰了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

当时德意志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另一代表，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哥特沙克（1815～1849年）。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当时担任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他脱离德意志社会的具体条件，主张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的口号。他反对无产阶级联合一切民主力量，甚至反对与农民结成同盟。哥特沙克所执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意志工人运动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既批判了以波尔恩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德意志革命的危害性，也批判了哥特沙克“左”倾机会主义的冒险性。他们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工人群众，宣传正确的革命路线，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意义，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战斗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下，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有了转变，撤换了哥特沙克的主席职务，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摩尔当选为联合会的主席。10月，马克思担任了联合会的主席。在马克思的直接领导下，粉碎了

哥特沙克分裂工人联合会的阴谋活动，使柏林和科伦的工人组织开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贯彻和实现为德意志革命所制定的革命纲领，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 1848 年 6 月 1 日在科伦创办了《新莱茵报》，总编辑是马克思。《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第一，主张用革命的办法，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反对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中心的从上面统一德国的计划。第二，号召欧洲各国人民发动一场对欧洲主要反动堡垒——沙皇俄国的革命战争。《新莱茵报》大力支持德意志人民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并以战斗的姿态及时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叛卖行径，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和动摇。

（三）法兰克福国会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三月革命后不久，在全德各地都发出召集全德国会的呼声，人们希望这个国会能领导全德的统一运动。1848 年 5 月 18 日全德国会在法兰克福开幕。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法兰克福国会。在 573 名议员中，绝大多数是拥护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贵族代表。在这个右翼多数集团中，有的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并由它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称“大德意志派”；有的主张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称“小德意志派”。两派在会上争吵不休。议会中的少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建立联邦制的德意志共和国。马克思批评他们的思想“是再糊涂不过的了”，因为“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真正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法兰克福国会本应该发动各邦人民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用革命手段推翻各邦封建君主的统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因为资产阶级最害怕人民革命，所以法兰克福国会只限于制定统一的德意志宪法，只限于咬文嚼字地空谈宪法的每一条文，而没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动。无怪乎人们称这个国会为一个清谈馆。

当这个全德国会正在无休止地讨论宪法之际，普鲁士封建反革命势力霍霍磨刀，并且在 1848 年 11 月就把革命镇压下去，恢复了专制主义统治。但是这一切在全德国会看来，好像没有发生似的，议员们仍埋头于冗长的清谈和讨论。迟迟到 1849 年 3 月 28 日，才最后通过了一部“德意志帝国宪法”。这部宪法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它确定德意志为一个联邦帝国，保留各邦君主的统治地位，中央只设一个皇帝和一个帝国议会。但是，它宣布一切人在法

马克思：《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47、48 页。

律面前平等，并且保障了言论、集会及结社的自由。这在当时的德意志说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这部宪法之通过是在德意志各国革命已经相继失败之后，当时各国都恢复了专制统治，人民又失去了自由。法兰克福国会推选普鲁士国王为帝国皇帝，并且派代表把皇冠送去。但是普鲁士国王以嘲笑的态度拒绝接受，他说：“这不是皇冠，而是奴隶所戴的铁项圈，一戴上它，国王就会变成革命的农奴。”当时，这部帝国宪法没有实力作后盾，所以也遭到德意志其他各国的君主所拒绝。以普鲁士君主为首的德意志各国君主拒绝帝国宪法，激起了各邦人民群众的愤慨，他们自发地起来为保卫帝国宪法而斗争。到 1849 年 5 月，这个斗争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浪潮席卷了许多邦。

在起义中，“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主力，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主力，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组成的”。但是领导权落到小资产阶级手中，这是因为德意志当时刚刚进入工业革命，大工业还没有完全排挤掉小手工业，这就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在德意志占优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起义。1849 年 5 月末，马克思、恩格斯到达巴登首府卡尔斯鲁厄，向起义的领导人布伦坦诺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主张起义军乘胜向法兰克福进军，以推动全德起义。恩格斯还亲自参加了起义的战斗。但是领导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拒绝了这个大胆的计划。

起义蔓延之后，德意志各国君主连忙调集军队到各起义地区去镇压。一场轰轰烈烈的拥护帝国宪法的起义终于以失败告终。

起义之所以不免失败，主要原因在于领导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胆怯、动摇及缺乏坚决性，他们没有采取积极的、大胆进攻的战略，而只限于消极防御。同时他们也没有提出消灭农奴制残余的纲领，因而使农民脱离了运动。起义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兰克福国会没有起应有的领导作用，而采取了逃避的态度。结果，它也没有避免了“强迫解散”的命运（1849 年 6 月）。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失败和法兰克福国会的解散，标志了 1848 年德意志革命的结束。

1848 年德意志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中，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他们的革命行动对整个革命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这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既没有摧毁封建专制统治，也没有完成统一。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背叛、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以及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不成熟和组织上的涣散。

第三节 1848 年意大利革命

（一）革命前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状况

1815 年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的政治特点是：第一，政治上的分裂，大大小小国家林立。第二，多数国家仍处在外国统治下。伦巴底—威尼斯成为奥地利的一个行省，托斯坎纳大公国、帕尔马公国及摩登纳公国受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统治两西西里王国的是西班牙波旁王朝。第三，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被推翻的封建专制君主在维也纳会议后又复辟了，贵族僧侣的特权又恢复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被剥夺了。但丁的作品不准阅读，哥白尼的地球转动学说不许在学校里讲授。一个枢机主教曾断言：“民愚则易治。”

但是，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在北部意大利，特别是在伦巴底和皮蒙特，工业企业数目大增，并且开始采用机器，这说明已进入工业革命时代。1840 年单是伦巴底一地就有 35 家棉纺厂。1840 年出现意大利第一批大型的机器制造企业。三四十年代也开始修筑铁路。

与此同时，意大利农业资本主义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由于工业的发展，对于原料及农产品的需求日增，这就推动一部分地主（皮蒙特和伦巴底）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他们解除租地契约，驱逐农民，而开始使用雇佣工人，建立大资本主义农场。在资本主义农场里采用了新的集约的耕作方法，进行人工灌溉，因而大大增加了产量。大农场一般在 200 英亩至 700 英亩之间，雇佣工人受到残酷的剥削。由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化了，这一部分地主同大商业资产阶级结成了同盟。

但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遇到了层层障碍。一个障碍是外国的统治和压迫。奥地利把伦巴底和威尼斯变为奥地利帝国的经济附庸，并且使其与意大利市场和国外市场隔离开来。无论是一条道路，抑或一道堤坝，如果得不到维也纳政府的批准，就不能兴建。奥地利也限制这里的丝织业的生产，对于向这里进口的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免它们与奥地利商品竞争。奥地利也向伦巴底—威尼斯的居民课以沉重的税，从这里征收的税额，占全帝国国库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土地税非常之高，间接税也很重，尤以盐税和烟税为最。盐税超过盐价的十倍。

另一道障碍是政治上的分裂，在国与国之间都设有关税壁垒，大大阻碍了各国之间的商品流通，而且这些国家的法律各不相同，它们也都有自己的纸币和度量衡。这一切都使得统一市场难以形成。在从帕尔马到摩登纳去的短短的路途上要纳六次关税。在波河沿岸要纳 21 次关税。

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在意大利诸国，君主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贵族及僧侣仍享有特权，国家机构的官职，军队和法庭中的高级职位，都为特权阶级所垄断。不仅广大劳动人民，而且资产阶级也在政治

上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在意大利南部仍盛行封建剥削关系，农民多半是对分农，他们每年的收获物要被地主夺走大部分。总之，封建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在多灾多难的意大利，到 19 世纪 40 年代，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意大利革命的任务便是驱逐奥地利的势力，消灭政治分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意大利共和国。

在 19 世纪 30 年代挺身而出慨然以实现这些历史任务为己任的，便是“青年意大利党”的创始人居赛普·马志尼（1805～1872 年）。马志尼出生在热那亚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在大学里专攻法律，但是他的爱好在于文学，因之一个时候他经常为文学刊物写稿。在大学读书时，他就关心祖国的命运，读了有关意大利历史的大量书籍，对于往日有光荣的历史而现在在外国欺凌下变得支离破碎的意大利的命运，深深感到悲伤。他是那样哀悼祖国的悲惨遭遇，以致日常总是身着黑色丧服。年轻的马志尼相信：只要他的祖国四分五裂并且受外人奴役，他就无法心安理得地当律师或从事文学工作。因此，虽然一度操律师业，但是未几就毅然放弃这个职业，而参加了烧炭党，并且由于参加了一次暴动而被捕入狱。正是在入狱期间，由于有大量思考的时间，他通过苦思冥想制定出一个复兴意大利的方案。在 1831 年获释出狱后，他就脱离了烧炭党，而创立了青年意大利党。党章要求：只有年在 40 岁以下并且愿意献身于把祖国从外国及本国的暴君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建立一个统一的奠基于完全民主之上的意大利共和国的事业的人才能参加党的组织。参加该党的阶级成分很复杂，有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有中、小资产阶级分子，有资产阶级化的中、小贵族，也有城市劳动人民（手工业者、工人和贫民的代表），但是领导这个党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

青年意大利党的功绩在于：它在意大利解放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任务。所谓民主共和国，在他们看来，就是在意大利实现政治民主及普选制。它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统一。马志尼认为只有建立这样的共和国，才能复兴意大利。他说：“意大利曾经通过罗马帝国统治过世界；后来它又通过天主教统治世界；而现在容光焕发并且通过苦难得到净化的第三个意大利，会作为光明的天使而在诸国中活动。”但是，胸中燃烧着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马志尼并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在他看来，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又尊重每一个其他国家，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他相信，如果每个国家都互不干扰而和平相处，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认为：意大利的使命便是教育人类相爱，并且以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为自己的理想。他同情受压迫的民族——匈牙利人、波兰人及爱尔兰人。他组织一个称作“青年欧洲”的国际组织，其宗旨就是成立一个人民的神圣同盟，以对抗暴君的神圣同盟。

为了实现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意大利的任务，青年意大利党强调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具体言之，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奥地利的统治及意大

利各邦的君主专制制度。1840年在青年意大利党内还设立工人部，目的是争取工人入党。马志尼深入工人中间进行活动。他幻想依靠“富人的慷慨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解决工人的生活的困难。他的这个想法，是受到圣西门的思想影响的结果。

马志尼个人的思想情操及青年意大利党的战斗性的纲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短时间内就有6万人参加了青年意大利党。

青年意大利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生气勃勃的急进民主的纲领主张，是意大利的政治状态及阶级关系所决定的。第一，意大利革命的对象既有外国势力，也有意大利各邦的专制君主，而且外国压迫者——奥地利还是一个强国，要想推翻这些反动势力，任务非常艰巨，因此就不能不和人民建立联盟，从而也就不能不提出满足人民要求的激进主张。第二，意大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尚未发展，当时意大利尚未出现英、法那样强大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因此资产阶级有旺盛的革命精神。

但是，青年意大利党的纲领中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他们只限于提出一般的政治上的民主要求，而反对用革命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青年意大利党的另一个局限性，便是它乞灵于宗教，提出了宗教口号，强调青年意大利党的事业，便是“使徒的事业”，“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奴役的民族可以通过道德和自我牺牲而复兴”。

青年意大利党在19世纪30、40年代发动的几次武装起义都归于失败，但是该党在马志尼的领导下有力地唤醒了意大利的民族意识，并且在人民中间广泛地传播了民主共和思想，从而为1848年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二）革命的过程

1845~1846年的农业歉收及1847年的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意大利的经济，意大利粮食奇缺，工人失业遽增。这激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革命形势迅速形成。

1848年1月13日，西西里岛首府巴勒摩的人民首先发难，掀起了反对专制政府的武装起义。起义者在农民群众的支援下，与13,000政府军巷战两周，终于赶跑了政府军。结果在西西里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临时政府。消息传到那不勒斯城，于是该城的人民马上举行强大的示威，要求颁布宪法。国王斐迪南二世被迫于1月29日颁布宪法，并且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组阁。

在巴勒摩起义的推动下，在教皇领、托斯坎纳及撒丁尼亚王国也都爆发了革命。2月8日和17日，撒丁尼亚国王和托斯坎纳大公先后颁布了宪法。到3月14日教皇也颁布宪法。

维也纳三月起义的消息传到意大利时，群情沸腾，人心大快。3月18日，米兰首先爆发了反奥起义，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大学生筑起街垒，同

一万五千多人的奥地利军队激战五天，在 23 日解放了米兰城，把奥军驱逐出境。米兰起义之所以迅速取得胜利，是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下英勇奋战的结果。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动统治，因而具有全欧的意义。

与米兰起义同时，威尼斯也爆发了起义。由于群众积极参加，起义者与奥军血战了两天，就迫使奥军狼狈逃窜。威尼斯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曼宁担任临时政府首脑。

在意大利各国革命接二连三取得胜利的影响下，帕尔马和摩登纳两个小国也发生起义，政权转到资产阶级自由派手里。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各地人民一致要求对奥地利宣战。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撒丁尼亚王国政府在 3 月 24 日对奥宣战。不久，那不勒斯国王和托斯坎纳政府都参加了反奥战争。甚至教皇庇护九世，虽未正式宣战，也派出军队反对奥地利。

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战斗，他们到处组织义勇队和志愿军开赴战场去打击奥军。人民武装的杰出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居塞普·加里波第。

加里波第（1807～1882 年）出身于水手。1831 年他在塔干洛格结识了青年意大利党的一个党员，经这位党员的介绍，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1833 年回国后与马志尼相遇，在马志尼的建议下，他参加了撒丁尼亚的海军，为的是在那里准备起义。他参加了 1834 年的起义，结果失败被捕，但是他逃到南美。1848 年革命爆发后，他立即返回祖国，并且积极组织志愿军，参加反奥战争。

但是，撒丁尼亚国王阿尔伯特惟恐反对奥国的战争发展为人民大众反对君主的革命，所以他没有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不去展开攻势。因此，7 月 25 日撒丁尼亚军队在库斯托萨遭到惨败。结果，米兰也被奥军攻克。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便把军队从前线调回。8 月 9 日，阿尔伯特与奥国订立停战协定，同意恢复奥地利在伦巴底和威尼斯的统治。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奥战争以屈辱的和约而告终。

以上是 1848 年革命的第一阶段。从 1848 年 8 月至 1849 年 8 月是革命第二阶段。

在库斯托萨战役失败后，反动势力一度猖狂起来，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但是意大利人民并未屈服，他们继续战斗，决心把革命推向新阶段。在革命第二阶段，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动力。

资产阶级民主派（其领导人是加里波第和马志尼）提出了自下而上统一意大利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封建贵族和奥地利的统治及消灭专制制度的要求，号召人民为建立统一的“自由、平等和社会公平”的共和国而奋斗。但是，这个纲领没有提出真正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要求。

新的革命高涨是从威尼斯开始的。8月11日，当威尼斯人民得知和约将威尼斯又交给奥地利统治的消息后，群情激昂，立刻掀起暴动。民主派领袖曼宁宣布威尼斯成立共和国。库斯托萨战役的失败也引起了撒丁尼亚王国人民斗争的高涨，在热那亚和都灵不断发生强大的示威游行，国王不得不同意自由主义者约贝谛任撒丁尼亚王国新内阁首相。

罗马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建立是意大利革命新高涨的顶点。11月15日，罗马居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口号：“我们要自由！”“意大利万岁！”手工业者和从前线回来的志愿军要求成立民主的临时政府。一天之后，起义遍及整个罗马。群众袭击教皇宫廷，并迫使教皇庇护九世同意成立世俗内阁。结果成立了自由派世俗内阁。不久，教皇逃往加埃塔，妄图借助欧洲反革命势力来扑灭罗马革命。自由派组阁后，便试图和教皇妥协，结果遭到拒绝。自由派的妥协政策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在人民的压力下，自由派不得不宣布召开制宪会议。1849年2月按照普选制选出的制宪会议开幕。会议根据加里波第的提议决定废除教皇政权，并且在2月9日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同时，成立以马志尼为首的民主派与自由派的联合政府。新政府实行了一些进步的措施：取消中世纪特权，没收教会的土地，取消教会的司法权和宗教法庭，实行累进税，降低80种商品的关税。在罗马革命运动的鼓舞下，托斯坎纳的人民废黜了利奥波德大公的政权，宣布建立共和国。

威尼斯、罗马及托斯坎纳之宣布共和，颇使撒丁尼亚国王阿尔伯特不安。为了保持自己的王权及夺取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他在1849年3月12日重新对奥地利宣战。战争只进行21天，3月23日诺瓦拉一役遭到惨败。于是阿尔伯特不得不退位，他的儿子即位，是为埃马努伊尔二世。新王马上与奥地利签订停战协定。

第二次反奥战争的失败助长了意大利反革命气焰。4月11日，托斯坎纳的共和政权被推翻了，利奥波德大公复位。那不勒斯国王向西西里发动攻势，5月11日占领了巴勒摩。在帕尔马、摩登纳也恢复了旧政权。

只剩下罗马和威尼斯两个共和国继续坚持反奥斗争。在诺瓦拉战役后，奥地利勾结法国与西班牙共同出兵进攻罗马。为了挽救共和国，制宪会议决定成立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政府，以加强对抗战的领导。此时，为了保卫共和国，就必须与人民结成联盟，但是革命政府没有没收地主土地及分土地给农民，因而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同时，马志尼也未能采取加里波第的积极进攻的建议，而采取了单纯防御的战略。因此，在三国军队的联合进攻下，罗马共和国军队大败。7月3日，法军攻入罗马，共和国倾覆，教皇又复辟了。

威尼斯人民在民主派的领导下，在奥军包围中孤军奋战达11个月之久。8月22日，威尼斯陷落了，奥地利统治又恢复了。

1848年意大利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

民主派不愿触动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从而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不利的国际环境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意大利的革命是在欧洲革命低潮时期展开的。因此革命力量薄弱，易于遭到欧洲反动势力的扼杀。

第四节 1848 年奥地利革命

（一）维也纳三月革命

19 世纪中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贵族地主仍然享有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农民不但要缴纳数额高达收获量三分之二的代役租，而且还必须缴纳教会什一税、名目繁多的国税、地方税，层层剥削使农民陷于赤贫。奥地利帝国还统治着非德意志的捷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等。奥地利是“各民族的监狱”。所以奥地利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君主制和解放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被压迫民族。

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独揽大权，他利用民族矛盾，挑起民族纠纷，进行残暴的民族压迫，无情地镇压各民族的解放运动。所以，在奥地利呈现出一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状况。不堪忍受压迫与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经常掀起反抗政府的起义，提出“杀光老爷！”的革命口号。梅特涅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不但加强镇压，而且严禁自由思想的传播，推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将大学、中学和小学置于警察监视之下。

19 世纪上期，奥地利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日益增加，除手工工场外，工厂也已开始出现。到 40 年代初，奥地利已有工厂 135 家，其中大多为纺织工厂。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成了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除生产纺织品外，还生产大量奢侈品、家具和衣服等。在帝国其他地区还发展了化学染料工业、矿业和机器制造业。但是，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奥地利政府的关税政策，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不满愈益加甚。

巴黎二月革命和柏林三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奥地利后，群情激昂，维也纳到处是群众集会，资产阶级自由派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3 月 13 日，首都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大学生举行示威，响亮地喊出了“自由！宪法！打倒反动政府！”“打倒梅特涅！”“人民政府和人民武装万岁！”等口号，并且提出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陪审制和建立责任内阁制等要求。示威群众遭到政府军队的弹压，这便激怒了群众，于是示威发展为起义。在人民的压力下，梅特涅被迫辞职，乔装逃亡英国。但是梅特涅的辞职并没有缓和群众的情绪，他们要求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反动政府不但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在 3 月 14 日任命温迪希格拉兹将军为维也纳行政军事首脑，妄图镇压运动。但是起义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傍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手工业者及大学生把皇宫团团围住。群众的革命行动迫使皇帝让步，他不得不同意颁布宪法，并且改组内阁，指定旧官僚出身的毕莱尔斯道夫去组织内阁。其

实这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手法，新内阁实际上只是皇帝手中的工具。此外，皇帝还被迫同意资产阶级成立国民自卫军和成立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的“安全委员会”。通过这次革命斗争，大学生也获得了成立武装组织的权利，成立了有 4000 名学生参加的学生军。国民自卫军的代表和学生军的代表不久又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为的是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力量去反对政府。但与此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

这样，三月革命的结果，资产阶级靠人民的革命力量取得部分政权。

（二）革命后阶级斗争的发展。维也纳十月起义

4月25日，皇帝颁布了一部“钦定宪法”，它确定立法机关为两院制，并且规定皇帝对立法有绝对的否决权。5月11日颁布的选举法，剥夺了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同时它又规定：只有大土地所有者才有可能被选进上院，有 200 佛罗伦 收入的人才有可能当选为下院议员。

在颁布宪法后不久，亦即 5 月 14 日，毕莱尔斯道夫内阁下令解散国民自卫军和学生军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命令立刻激起群众的义愤，结果 5 月 15 日爆发了武装起义。在起义中，武装工人与学生军及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并肩作战。起义者提出了逮捕反动大臣，废除君主制，改组政府，实行普选制并且召开制宪国民会议等要求。在声势浩大的起义面前，皇帝吓得魂不附体，他在 5 月 16 日偕同宫廷人员逃到因斯不鲁克。到 17 日，起义胜利了。政府再一次让步：承认上述中央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并且答应召开制宪国民会议来制定新的宪法。但是，反动政府不甘心失败，它在 5 月 26 日又下令解散学生军，因为在它眼中，学生军不但是革命武装，而且还不断进行革命煽动，因而是危险的。这道命令又引起了一次武装起义，在起义中学生军和国民自卫军都参加了战斗。结果，政府又一次作了让步，收回了解散学生军的成命。

几乎与城市革命人民的发动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也行动起来，他们到处挣脱了封建枷锁。“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大。”但是，农民通过斗争取得的革命成果，却被资产阶级断送了。7 月 22 日开幕的资产阶级代表占优势的制宪国民会议，虽然废除了与人身依附关系和地主裁判权有关的封建义务，但是却保留了主要的封建义务劳役地租和代役租，除非农民交纳一定的赎金来赎买这些封建义务。

这时，资产阶级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同时又感到经受三次起义打击的封建势力已经不是可怕的敌人了。因此他们开始倾向于与封建旧势力妥协，并且表示欢迎皇帝和宫廷返回首都。8 月 12 日，皇帝及其随从者在国民会议的

佛罗伦为奥地利货币单位。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39～40 页。

“热烈”欢迎中返回首都。于是开始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妥协。这个妥协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8月19日皇帝检阅国民自卫军，第二个行动便是镇压工人运动。

8月23日，维也纳工人举行示威，抗议政府取消发给失业工人的补助金，国民自卫军便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屠杀了许多工人。这次屠杀标志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公开决裂。这时学生军也转而支持政府，对工人运动抱敌对态度。革命阵营的这个分裂，为反革命的封建势力所利用，他们决定向革命力量进行反扑。不过，当时匈牙利革命的火焰愈烧愈旺，一个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威胁着帝国的统治。因此，奥地利反动政府决定先派兵镇压匈牙利革命。10月初，奥地利军事大臣下令把驻在维也纳的一部分部队调到匈牙利战场上去。这时，维也纳的革命群众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匈牙利革命的覆灭，维也纳也不免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10月6日，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大学生和工人群众集合起来，挡住了从维也纳开出去的掷弹营的去路，并且与士兵联欢。同时，他们又攻下了兵器库，立刻有10万群众武装起来了。经过一天的战斗，起义胜利了，皇帝和宫廷再度逃出首都，逃到欧尔姆茨。

起义胜利后，维也纳的政权转到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市议会手中。参加起义的主力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大学生，领导力量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学生军和组成“别动队”的武装工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为保卫革命而战斗。但是领导起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去巩固胜利。他们既没有建立统一领导革命的领导机构，也没有和近在咫尺的匈牙利革命军队联合行动。此外，早在7月就开幕的制宪国民会议根本没有起领导作用，它甚至建议由皇帝出来充当调停人。

逃到欧尔姆茨的皇帝及其近臣们积极调动军队，准备镇压。耶拉契希的部队及温迪希格拉兹的部队都开到维也纳附近。温迪希格拉兹集中了7万大军，携带大炮200门，从10月26日到28日连续炮轰维也纳城。11月1日，维也纳陷落了。

反革命军队对起义人民进行无情的报复，枪毙了起义的领导人美森豪塞尔。1849年3月4日，解散了制宪国民会议，恢复了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

1848年奥地利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途背叛了人民，同封建反革命势力结成了同盟；小资产阶级在领导革命中表现得很不坚决。

第五节 1848 年东欧的民族解放运动

（一）1848 年捷克民族解放运动

捷克王国长期处在奥地利帝国的奴役之下，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实际上，它已经成了奥地利帝国的一个行省，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上完全受奥地利的控制。在捷克王国实行着强制的德意志化。捷克的资产阶级只能经营中小企业，大企业均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后者还竭力将捷克的工商业资本家从捷克市场上排挤出去，这使得捷克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捷克的劳动人民受到本国封建贵族地主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双重压迫。广大农民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更为沉重。他们不仅缴纳繁重的封建租赋，而且履行着名目繁多的劳役。因此农民处于赤贫状态。

尽管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不利于捷克王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到 19 世纪 40 年代，捷克已经成了奥地利帝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时，捷克已有二百多家棉织工厂，其中大部分使用了蒸汽发动机，棉织品的产量占奥地利帝国的四分之三。同时，布拉格已成为机器制造业的中心。机器制造业的发达，推动了冶金业的增长，生铁、钢和煤的产量也急剧上升。由于工业的巨大发展，工人队伍不断壮大，仅从事呢绒生产的工人就达数万名。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捷克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捷克民族独立运动中资产阶级充当了领导者，但在资产阶级中形成了温和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两个不同的派别。温和自由派没有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自由，主张捷克语和德语享有平等地位，要求以赎买方式废除封建权利。革命民主派不仅要求民族独立，而且要求与天主教彻底断绝关系，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无条件地废除封建义务，改善工人生活，实行普选权等等。这个派别于 1846 年在布拉格成立了秘密团体“星皮尔社”。这个组织和工人保持联系，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作，领导许多小组和团体。

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则采取直接行动。1848 年革命前夕，工人在布拉格和其他许多城市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坏机器的斗争。农民则不断发动起义，烧毁贵族庄园，杀死管理人员，拒绝服劳役和缴纳封建租税。

对奥地利帝国统治者唯命是从的，则是那些大贵族地主。他们是捷克民族独立运动的死敌，是革命的主要对象。

3 月初，在布拉格以及捷克的许多城市，到处散发传单，要求实行宪法和言论自由。在“星皮尔社”的号召下，群众举行请愿，要求召开捷克各地区的统一议会，取消封建义务；捷克语和德语享有平等地位和成立责任内阁。由于群众的压力，斐迪南一世被迫作了让步，同意建立责任内阁。承认捷克语和德语享有平等地位。

被群众运动吓坏了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了转移劳动人民的斗争目

标，便在6月2日在布拉格召开奥地利境内斯拉夫人的代表大会。大会上，捷克自由派从原来的自治主张后退，采取了投靠哈布斯堡王朝的立场，主张保存奥地利对于帝国境内非德意志人的统治。

与自由派不同，捷克民主派一直坚持了革命的立场。6月的布拉格起义便是民主派领导的。

在维也纳五月起义的推动下，捷克境内的工人、农民的斗争出现高涨。布拉格的大街上布满了军队，准备随时镇压革命。布拉格的民主派要求政府把军队撤走，并且解除反动将军温迪希格拉兹的职务，但是遭到拒绝。于是在民主派的号召下，布拉格的工人、贫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6月12日举行起义，与军队展开了战斗。战斗持续了五天，于17日被军队镇压下去。

六月起义失败后，捷克民族解放运动便走向低潮。自由派公开叛变，情愿充当奥地利的奴仆，支持哈布斯堡王朝镇压匈牙利革命。

（二）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

1848年革命前夕，匈牙利仍然是一个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封建国家。国王由奥地利皇帝兼任，皇帝派总督统治匈牙利。匈牙利虽然有议会，但是议会不能过问军事和外交。在经济上，匈牙利是奥地利的附庸，向奥地利出口粮食和肉类，再从奥地利进口工业品。对奥贸易额占整个贸易额的90%。

匈牙利是保存农奴制残余的农业国家。匈牙利的大封建贵族拥有大量领地，靠剥削广大小农及雇农而生活，并且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社会支柱。但是，中、小贵族与商业资产阶级有联系，他们要求匈牙利与奥地利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的领袖是柯苏特（1802~1894年），他在1847年当选为匈牙利议会议员。

19世纪上期，匈牙利资本主义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1846年，整个匈牙利已有875家手工工场，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染色、纺纱、铸造和其他行业的作坊。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的交流促进了运输业和金融事业的发达。

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消灭封建制度，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奥地利的统治集团和匈牙利的大贵族地主，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小贵族同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

1848年前夕，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以及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匈牙利，致使匈牙利工人失业、农民破产的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对此奥地利政府却熟视无睹，继续加紧对匈牙利的压榨与勒索。匈牙利的大贵族地主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劳动人民，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这一切逼得广大劳动人民走投无路，无法生活下去。

在维也纳三月革命的推动下，3月15日在佩斯爆发了起义。起义的领导人是匈牙利杰出的革命诗人山多尔·裴多菲。起义者一开始就发表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十二条》，纲领里面列举的要求虽然比较温和，但是起了鼓舞和团结的作用。起义者在当天就控制了整个首都，并且成立了公安委员会，作为革命的政权机关。公安委员会在组织国民自卫军，争取实现革命纲领和推动革命向前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在革命在匈牙利境内全面展开的局势下，奥皇斐迪南一世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3月17日贵族代表温和派分子巴蒂安尼就任首相并且组成第一个匈牙利责任内阁。这个内阁和议会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颁布了下列法令：匈牙利在军事及财政上独立自主；取消什一税和农民的劳役地租。不过取消劳役地租并不是无条件的，农民必须拿出高额赎金。斐迪南一世迟迟到4月上旬才批准了这些法令。

但是，奥地利反动统治者并不甘心于这些让步，9月4日任命耶拉契希为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11日耶拉契希率大军向匈牙利大举进犯。

面临奥地利军队的进攻，匈牙利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踊跃参加保卫革命的战斗。匈牙利议会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通过了成立国防委员会以代替巴蒂安尼政府的决议，由科苏特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于是匈牙利人民在科苏特的领导下开始了保卫革命及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由于人民军队的英勇奋战，奥军在9月末及10月上旬连遭两次败绩，到10月10日就败退到奥地利境内。

在镇压维也纳十月起义后，奥皇又派温迪希格拉兹率大军前往匈牙利进行反攻。科苏特采取诱敌深入和用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战略，但是由于匈牙利失掉了有利的防御条件，敌军长驱直入，到1849年1月5日佩斯就陷落了。匈牙利议会不得不迁至德布勒森。

但是匈牙利革命者并没有因之而气馁，1849年4月14日匈牙利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匈牙利独立，并且推科苏特为国家元首。独立的宣布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战场上的革命战士勇气倍增，因之战局逐渐好转，奥军节节败退。5月21日，首都佩斯光复了。

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的初步胜利，引起了欧洲反动势力的震惊。作为“欧洲宪兵”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更为惊惶失措，因为在他看来，匈牙利革命的胜利，不但会引起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且也会破坏欧洲的反动秩序。因此，当奥皇请求俄国出兵援助时，尼古拉一世立即允诺。1849年5月27日，俄军在巴斯格维奇的统帅下，分两路进攻匈牙利，一路直趋加里西亚，

《十二条》内容：要求出版自由，取消书报检查；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成立匈牙利国民议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国民自卫军；实行普遍课税；废除劳役制；实行陪审制；建立国民银行；军队应效忠宪法，匈牙利军队不准开赴外国，外国军队也必须撤出匈牙利国土；释放政治犯，使其享有自由；与特兰西瓦尼亚合并，平等、自由、博爱。

兵力 10 万人，另一路入侵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兵力 3.8 万人。

俄国出兵，使匈牙利腹背受敌。因之，匈牙利军队在战场上屡次失利。战争继续到 8 月中旬以匈牙利军队最后投降而结束。

匈牙利革命的失败，首先是由于俄国出兵，其次是由于匈牙利内部妥协投降分子的破坏。此外，匈牙利革命政府在主观上犯了错误，也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贵族出身的科苏特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没有发动农民，以致失去农民的支持。同时，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压制境内被统治民族——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自治要求，从而也失去少数民族的支持。

匈牙利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欧洲及匈牙利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十一章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欧洲民族民主运动

1848 年的欧洲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革命给欧洲封建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因而欧洲诸国的资本主义在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冲破欧洲各国的反动秩序。因此，五六十年代欧洲出现了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阶级力量对比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因而运动所采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英国，主要表现为以无产阶级为主力的争取扩大民主权利和爱尔兰要求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欧的德意志、意大利则表现为国家统一的运动，而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是以废除农奴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经过 1848 年革命风暴，欧洲资产阶级进一步失去了革命精神，而无产阶级在组织上、政治上尚未成熟，因之德意志、意大利的民族民主运动，最终都成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俄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及其对沙皇制度的依赖性，改革也走了“自上而下”的道路。“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得这些国家在贵族地主确保政权和土地的条件下完成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50、60 年代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最后一个高潮，同时也标志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确立。

第一节 英国的工业霸权与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一）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19世纪50、60年代是英国经济高涨时期。这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用机器生产机器。这就为工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1850年英国有棉纺工厂1900家，到1870年增至2400家，耗棉量差不多增加一倍。机械纺锤共3000万锭，比法国或美国多六倍，比普鲁士多20倍。在同一时期内，煤产量增加了一倍多，从4900万吨增长到1.1亿吨；生铁产量由220万吨增长到600万吨。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始终一马当先。在1850年的世界生产中，英国出产了一半生铁和一半以上的煤炭，加工了将近一半的棉花。

50年代英国已有不少拥有数千工人的大工厂，有的工厂已有1万以上的工人。城市人口在1870年已占全国人口的60%。

英国的商品大量向海外输出。除轻工业品外，重工业产品，特别是机器日益占重要地位。1842年，政府取消了机器出口的一切限制，英国机器开始运销世界各国。1845年至1870年的25年中，英国机器输出量增加了九倍。英国为世界各国造船，它第一个使用金属造船。英国垄断了国际的航运业。从英国港口开出的数千艘轮船航行到印度、中国、日本、非洲和南美诸国。

工业的飞跃发展和海上运输业的优越，保证英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1850~1870年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居首位。1870年世界贸易总额为374亿马克，其中英国占91.8亿马克，连同其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则占140亿马克。英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过了法、德、美三国的总和。英国对外贸易的特点是，英国出口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进口工业原料和粮食。英国的大农场虽然使用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下降。粮食生产不能保证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英国变成了从世界各地取得原料和粮食、输出制成品的“世界工厂”。

英国的经济繁荣是同它大规模掠夺殖民地分不开的。

执行大规模殖民扩张政策的主要人物是帕麦斯顿勋爵（1784~1865年），他担任过外交大臣和内政大臣，并在1855~1858年和1859~1865年担任首相。帕麦斯顿口头上玩弄自由主义词藻，实际上残酷地进行民族压迫和征服弱小国家。到1876年，英国殖民地面积已达2250万平方公里，人口2.5亿多。英国资产阶级在殖民扩张中攫取了大量财富。仅向中国贩运鸦片一项，1835~1872年间获利达1.4亿多镑。1860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织品比输往美国和欧洲大陆的总和还多一倍，获得了惊人的高额利润。由于工业上的垄断地位和拥有巨量的殖民地，英国在19世纪中叶就具有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列宁写道：“英国的特点是，它从19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

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

但是，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工业发展及经济繁荣，首先只养肥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收入大增，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并没有减轻。1860年英国国民收入的36.5%归于仅占全人口中不到2%的统治阶级——包括大工业家、银行家及大地主，而占全人口中的80%以上的工人只得到国民收入的40%。当时英国工人生活非常悲惨，工人住宅一般地湫隘阴暗，全家挤在一个小屋里，再加上营养不良，因此在工人住宅区经常流行传染病，死亡率极高。劳动强度日益增加，因之生产中的事故越来越多。从1851年到1871年间，仅仅在英国煤井中就发生了一千多次爆炸事件，有将近五千名工人罹难。

(二) 自由贸易与“自由主义”统治

与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相适应，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过去，长久以来英国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17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实行的“航海条例”、“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和1815年开始颁行的“谷物法”都体现了重商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完全着眼于英国大商人船主及大地主的利益的，局部地也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工业(如“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但是，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力量愈益强大，于是上述重商主义政策就越来越不适应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了。先以“航海条例”来说，根据这个条例，垄断航运业的英国大商人船主可以任意抬高进口原料的价格，这当然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的主要目的是使北美殖民地成为英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及商品倾销市场，这对17、18世纪的英国幼稚工业来说，起了保护作用。但是到19世纪上半期，强大的英国工业已经不需要国家来保护了，相反地，这个政策只能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因而不利于英国的工业发展。“谷物法”对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颇为不利，因为：第一，它造成小麦价格上涨，从而提高了工业成本，这不利于和外国商品竞争；第二，它限制了外国小麦进口，从而减少了外国购买英国商品的能力。因此，1832年国会改革后上台的工业资产阶级代表便开始了争取废除上述一系列重商主义法律的斗争。到1846年终于迫使国会废除了“谷物法”。“航海条例”也在1849年被取消了。此外，在1846~1849年间，国会又取消两百种左右的商品入口税。这些措施意味着自由贸易的实现。

英国资产阶级不但在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且也要求外国实行这个政策，以便于英国商品畅通无阻。为了强迫外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资产阶级不惜发动侵略战争。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1854年参加克里木战争，1856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是抱着这个目的的。英国推行自由贸易加速

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破产，摧残了它们的民族工业。

执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在 19 世纪中叶的 20 年中，当政的主要是自由党，这反映了当时工业资产阶级势力的强大。但是当政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仍容忍大地主势力及旧制度残余的存在，如君主制、上院、贵族的闲职厚禄及国教教会等等仍保存下来。因为要想把这些旧社会的残余彻底根除，他们就求助于工人阶级，而他们是不愿求助于工人阶级的，他们宁愿和贵族地主妥协，利用贵族的丰富的统治经验，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资产阶级与大地主的利益在许多地方是一致的，贵族代表人物帕麦斯顿和格拉斯顿都竭力维护工业资本的利益。贵族从工商业繁荣中获得利益。拥有 50 万英亩肥沃土地的波克留公爵，以及拥有一百多万英亩苏格兰地产的圣德林公爵，都广泛地参加工商业企业活动。

自由党在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实行自由主义政策。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第一，国会权力很大，不存在庞大的官僚军事警察机构。第二，实行一系列民主自由，如言论、出版、集会及结社的自由，工人团体及民主团体可以合法地存在。在整个 19 世纪，英国始终是外国革命流亡者的避难所。英国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这种自由主义的统治，主要是因为它感到工联主义统治着英国的工人运动，不存在工人阶级威胁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不需要采用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而且必须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只限于英国本土，在英属殖民地则完全抛弃了这种自由主义外衣，而实行明目张胆的、血腥的暴力统治。

（三）英国工联主义

英国工联（或工会）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的结果，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诞生了。工人阶级刚一诞生，就与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为了斗争，就不能不联合起来，因此成立工会。从 1792 年起，在英国棉纺纱工人中间便出现了工会组织。工会虽然一个时期遭到禁止，但是经过斗争，到 1824 年以后就成为合法的了。

工会在工人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有了工会，工人就可以联合起来抵抗企业主的压迫：可以在工会的领导下展开罢工斗争，以便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及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且工会领导罢工还可以培养工人阶级团结的思想。因此，恩格斯很重视工会的作用，他特别强调工会领导罢工的重要意义，他写道：“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

在这 20 年中，自由党执政 15 年多，保守党只执政 4 年多。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 275 页，人民出版社，1956。

英国工会也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1834年成立的“全国工会大同盟”在其章程第四十六条中就郑重宣布：“尽管这个工会的目的首先在于争取提高工人的工资，防止进一步减削工资，争取缩短劳动时间，但是它的伟大的、最后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勤勉与人道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一个不同的事物秩序，在这个秩序下，只有社会上真正有用的、有知识的人才担任领导角色。”（重点号是编者所加）。

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工会运动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各部门的工会都统一起来成立了总的组织。1860年成立了“工会联合会”，这实际上是英国工会的中央领导机构。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工会运动变质了，工会已经不再是群众性的、战斗性的工人组织了。第一，它只是熟练工人的组织，如1851年成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便是个典型例子。它收的会费很高，每周要纳会费一先令，因之只有工资较高的熟练工人才有可能参加这个工会组织，以致它的会员很少，只有一万多人。第二，工会组织高度集中，地方性的工会组织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全国性领导机关的支配。领导干部不再是由业余工人担当，而是脱产干部，他们领取高薪，因而日益脱离广大会员群众。第三，更重要的是：工会已经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远大理想，它的活动只限于狭隘的经济斗争范围之内，它所争取的只是点滴的改良。工会领导干部甚至反对罢工，因为他们认为罢工会影响工会的财政稳定。工会资金用于罢工方面很少，而主要用在疾病福利、丧葬费、失业生活补助费等等方面。比如上述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在1851~1889年间用在这些福利费方面的资金，就达2,987,993镑，而用于罢工方面的只有86,664镑。为了争取提高工资，他们主要采取和平的仲裁办法：工会与企业主订立长期协定，规定工资按照“滑动标准制”调整：如商品价格上升到标准价格以上，工资亦增至标准工资以上。总之，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不变的制度，只希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改善一部分工人（熟练工人）的眼前生活——这种倾向，就是工联主义。

工联主义之产生并非偶然，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叶垄断了世界市场，因而攫取了高额利润，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从这种高额利润中拿出极小部分去收买参加工会的熟练工人（提高他们的工资）。这部分工人便是恩格斯所说的“工人阶级中的贵族”。恩格斯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第二，英国统治阶级对于工会领袖的收买。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工会上层分子很自然地背叛工人阶级，迷信工联主义。

(四) 1867 年改革

工联主义虽然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的危害，但是，工联在 60 年代领导工人进行一系列政治活动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英国工人在这些政治活动中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1859 年开始的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压迫者的战争，得到英国工人阶级的热烈同情。伦敦工人在海德公园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积极支持意大利人民反对外国奴役、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

英国工人对于美国内战所采取的态度及行动，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当时英国工人热情地支持美国北方人民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斗争。由于这次战争及美国北方封锁南方海岸的结果，美国对英国的棉花供应大大减少。由于“棉花饥荒”，英国许多纺织厂停工，大批工人失业了。但是英国工人不顾一切困难，坚决反对英国政府站在美国南方奴隶主方面实行武装干涉的计划。各个工业区纷纷举行群众大会，热情支持美国北方，强烈反对英国的干涉。因此，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罪恶计划。马克思对英国工人的这种高尚英勇的行为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美国永远不应忘记：从这次冲突的开始直到终了，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

1863 ~ 1864 年波兰人民掀起了反对沙皇俄国的起义。英国工人也发动了一个运动，热烈地支持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这一切都说明英国工人的政治积极性大大高涨。

60 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高涨的另一个表现，便是争取国会改革的斗争。

在 1832 年国会改革中，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选举权，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劳动人民被拒绝给予这个权利。英国工人阶级后来又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中为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而进行过多次的英勇斗争，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到 60 年代初，英国工人阶级重新掀起了争取国会改革的运动。

早在 1861 年就有一些工会提出了国会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马克思积极支持英国工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因为在他看来，在当时不存在马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扩大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特别是普选权，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而且通过斗争还可以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强工人的团结。1864 年第一国际诞生后，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第一国际热烈支持英国工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1865 年，在第一国际的倡议下成立了以争取选举改革为目的的“全国改革联盟”。参加这个联盟的不但有第一国际领导下的英国工会，而且还

马克思：《英国的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463 页。

有资产阶级急进派（其领袖为科布登和布莱特）。诚然，全国改革联盟的内部有意见分歧：工会要求以实现普选权为斗争目标，而急进派则只限于要求扩大选民人数，对普选权不感兴趣。但是，这个联盟发展迅速，到 1866 年已有 70 个支部遍及全国各地。

必须指出：这次国会改革运动与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宪章运动是群众性的、战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的参加者都有很高的阶级觉悟，他们的目的不仅在于争取工人阶级的选举权，而且也在于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参加 60 年代改革运动的工人已经丧失了一个远大的政治理想，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在现存社会中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争取选举权，是为了利用选举权来保卫和改善工会的法律地位。

1866 年，争取改革的运动在全国改革联盟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了。

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罗素的自由党内阁在这一年 3 月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改革法案。这个改革法案很不彻底，它只是稍微增加一些选民人数（大约增加四十万），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工人的要求。但是，就是这样一项法案也被下院所否决了，因为下院里的托利党议员坚决反对改革。当时有一个议员甚至公然以轻蔑的口吻说：工人既是工人，就不配享受选举权利。这句侮辱工人的话，无异是火上浇油，群众的愤怒越发不可遏止：全国到处出现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各地工会都有组织地打着旗帜，带领乐队参加集会及示威。在伦敦，走在运动前列的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伦敦工人。马克思在 1866 年写道：“伦敦的工人示威运动和我们自 1849 年以来在英国看见的比较，是巨大的，这纯粹是‘国际’的工作。”全国改革联盟号召在 1866 年 7 月 23 日于伦敦的海德公园召开一个大规模的工人群众大会。内务大臣下令禁止集会，并且关闭了公园大门，这更激怒了群众。在 7 月 23 日这一天，大约有二十万人聚集在公园门外，当时有大批警察守卫着公园大门。全国改革联盟的领袖们于是决定改到特拉法加广场去开会，一部分人跟他们去了。可是大部分人坚持要在海德公园开会，他们冲破了长达半英里的公园栏杆蜂拥而入，举行了非正式的大会。在曼彻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等城市也都分别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

1866 年 7 月，保守党上台，组成德尔比内阁，在这个内阁中，本杰明·狄斯累利（1804～1881 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狄斯累利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政客，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他看到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会激起动乱，英国政局将不可收拾。当时爱尔兰的革命党人甚为活跃，他们正在准备一次争取爱尔兰独立的武装起义。狄斯累利深恐英国工人阶级与爱尔兰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因此他便当机立断，提出一项新的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在国会里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就被通过，于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 年 7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3 卷，第 391 页。

又称为芬尼亚党人，下面即将详细谈到。

1867年8月由维多利亚女王签字，成为正式法律。该法案取消了46个“衰败城镇”在下院的席位，把这些席位送给了工业城市。法案也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规定城市中每年交房租满10英镑、能缴纳济贫税并在某一选区住满一年的房客，都有选举权。乡村里凡每年交纳地租不少于12英镑的租佃者以及每年收入超过5英镑的土地所有者，都有选举权。这样一来，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就成了选民，但是城乡广大贫苦居民，包括下层工人及贫农，依然被排斥在选举大门之外。当时英国成年居民有1600万人，仍有1300多万人被剥夺了选举权。

这次改革后，熟练工人（“工人贵族”）进一步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而成为工人中的政治上的特权阶层，而工会领袖们从此以后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因此，1867年的改革虽然是工人阶级的一个胜利，但是在实质上工会领袖及“工人贵族”进一步变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因此，可以说，1867年改革的结果，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更巩固了。与此同时，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也由于实行文官制度的改革而得到加强。

（五）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

1688年革命虽然提高了国会的权力，使其享有充分的立法大权及财权，但是却保留了国王的行政大权，并且使国王及大贵族继续掌握任命官吏的权力。结果，英国政府各级官职继续为贵族所垄断，因而买卖官职、贪污舞弊成为普遍的现象。膏粱子弟庸碌无能而踞高位者有之，身为要员领取高薪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有之。不仅在任用官吏方面弊端丛生，而且在晋升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晋升不是凭才干大小、勤奋程度及工作贡献，而是靠资历及奥援。平时缺乏考核，对无能者不加以淘汰，成绩突出者不予以破格提拔。结果，冗官多，效率低，工作混乱。

18世纪80年代，国会对文官制度中存在的这些弊端进行过某些改革，把任命文官的权力从国王及大贵族手中转到各部门负责人手中，由他们推荐任用。但是这个改革仍不能杜绝用人唯亲或用官职送人情的现象。1836~1854年间经过财政部推荐的55名文官人选中，有些人因体弱或年龄关系不能胜任工作，有些人完全不符合条件，还有的人品质恶劣。

针对这些不合理现象，反映工业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主义者亟力主张改革。在财政大臣格拉斯顿的授意下，屈维廉和诺斯科特二人对英国文官制度的现状，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在1853年年底拟出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在报告中痛陈当代文官制度中的弊害，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建议：第一，建议政府通过竞争考试录用文官，各级政府官吏（由选举产生的高级官员及内阁大臣、国会议员除外）只有参加考试合格者方予以任用。中央成立一个三人文官制度委员会（由国王钦定人选），负责考试事宜。第二，建议平素对文官实行考核制度，根据当事人的工作成绩及勤奋程

度晋升。报告指出：对通过考试吸收进来的年轻人，应首先给他们安排最基层的职务，使其从事适合本人能力及文化程度的工作，通过工作使他们经常意识到：“他们的晋升和未来的前途，完全取决于他们履行职务的勤奋程度和能力。靠一般的才能和适当的努力，他们可以有信心地期待他们的生活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有卓越的才能，他们就有理由希望得到职务中的最高奖赏；但如果他们表现得明显地不称职，或是不可救药的懒惰，那末他们就必须准备离开他们的岗位。”第三，建议政府文官应分为高级与低级两大类，要求高级文官有多方面的才能及丰富的知识和大量的工作经验，因之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者。要求低级文官必须是受过一般中等教育者。

1854年2月，这份报告提交国会讨论，但是除了格拉斯顿等少数自由主义者赞成外，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贵族议员反对尤力，因为考试制度会剥夺他们的特权。因此，该报告中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

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机构的混乱及工作效率之低下暴露无遗。陆军部的官员既庸碌无能，又玩忽职守。英军在战场上的伤亡很大，但前线缺乏药品，粮食也未能及时运到，因之士兵因伤重或饥饿而死者，不可胜数。当时的亚伯丁内阁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下台的。

1855年2月，帕麦斯顿就任内阁首相。他本人虽然不甚支持改革，但是为了平息当时被前线败局激怒了的舆论，满足自由主义者对改革的殷切期待，同时又尽量不去触怒国会中的贵族议员，他决定进行一次温和的改革。5月21日他也不经国会讨论，径以枢密院的名义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正式法令，实行了文官制度的初步改革。

但是，这次改革很不彻底，因为它并不要求实行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而只是要求在被推荐的候选人中间进行考试，而且只限于已经充任低级职务的年轻人。这种考试与其说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不如说“只是为了淘汰那些不称职的人”。

1868年格拉斯顿内阁上台后，继续推进改革，力争实现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1870年6月4日颁布了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道枢密院命令，规定：实行公开竞争考试，但同时又规定外交部及内务部除外，而且某些高级文官仍可以不经过考试而直接由大臣任命。

此后，又经过不断的改革、补充或修正，文官制度日臻完善。

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作用和意义是很大的。第一，就改革的作用来说，通过改革，文官质量大大提高，由于文官是经过择优录用的，他们一般都具备较丰富而深厚的基础知识及相当强的业务能力。而且他们一般任期较长，不随内阁的变换而变换，因而成为国家政局稳定和政府政策连续性的有力保证。19世纪中叶英国国家机构不如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庞大臃肿，那样官僚化，而是政府官员办事能力强、效率高——这一切都不能不归功于文官制度的改革。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当时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官制度的健全有关系。

第二，就改革的意义来说，这次改革是工业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对封建贵族的斗争的巨大胜利。本来，通过 1832 年国会改革及 1867 年国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越来越巩固了。现在实行文官制度的改革，又剥夺了封建贵族垄断官职的特权，并且使政府机构成为执行工业资产阶级意志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六）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自从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爱尔兰就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大地主占有爱尔兰的大量土地，使爱尔兰广大农民变为英国大地主的佃农。1800~1801 年英国完全合并了爱尔兰，爱尔兰的议会被关闭，它的议员参加了英国的下院。

1846 年以后，爱尔兰人民的苦难进一步加深。1846 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此后欧洲谷物可以畅通无阻地向英国及爱尔兰进口。在欧洲谷物大批进口的情况下，谷价惨跌。大地主看到：只有经营肉类及羊毛生产才有出路，因此他们便驱逐佃户，改营牧场。于是千千万万爱尔兰人被迫背井离乡。在 1846 年以后的 20 年中，爱尔兰人口减少了三百五十多万。大多数爱尔兰人流到美国和英国求生。

爱尔兰人除了受英国地主和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外，还受到英国统治者的民族压迫。1856 年恩格斯写道：“到处都可以看到‘惩治措施’，政府对任何事情都要干涉，根本谈不上所谓自治。可以把爱尔兰看做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是这样一个殖民地，它由于靠近宗主国，仍然被直接用旧的方式统治着，在这里已可看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

然而爱尔兰人民是不甘受压迫的，他们自从 17 世纪以来，就不屈不挠地进行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充满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到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爱尔兰人民反英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57 年，一些爱尔兰流亡者在美国成立了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爱尔兰革命同志会”，又称“芬尼亚党”。它的宗旨便是以武装起义的方法，为从英国压迫下解放爱尔兰而斗争。到 1858 年 3 月，芬尼亚党的组织开始在爱尔兰内发展起来。参加组织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虽然在领袖中有许多律师和天主教僧侣。

在芬尼亚党的纲领中，土地问题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纲领写道：“地主丝毫也没有占有土地的权利”，“土地是公共财产而属于全人类”。他们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实现土地共有，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因此，马克思认为“芬尼亚运动的特点是：它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从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 年 5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55 页。

否定的意义上说，即作为反对强占土地的运动）倾向，而且是下层阶级的运动。”但是，芬尼亚党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深受布朗基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从一开始就采用了狭隘的密谋策略，而没有把运动变为爱尔兰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他们的计划是：在狭小的组织成员内部秘密进行军事训练，到适当时机发出信号举行武装起义。到 60 年代，参加芬尼亚党的达 20 万人。

1865 年，芬尼亚党准备武装起义，但是密谋被一个民族叛徒泄露给英国当局，结果举行大逮捕，一些领袖被判处长期徒刑。记者兼诗人洛塞被处以无期徒刑。

1867 年，芬尼亚党在爱尔兰的一些城市发动起义，并且同英国军队展开战斗，结果失败，有 169 人被捕。这一年 11 月 23 日，有三位领袖在曼彻斯特被处死刑。这一天成了爱尔兰的国丧日，至今爱尔兰人民还在纪念它。

芬尼亚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强调狭隘的密谋策略，未能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建立联系。

芬尼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唤起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注意和关切。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他们对于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满怀着热烈的同情，并且和这个运动的某些活动分子保持友好关系，公开为他们的革命事业进行辩护。

特别应该指出的，马克思在爱尔兰问题上发挥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卓越见解，他指出：“爱尔兰是英国地主贵族政治的堡垒。对爱尔兰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是他们最大的精神上的力量。……爱尔兰是英国贵族政治借以维持其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主要手段。”“推翻了在爱尔兰的英国贵族政治，必然会引起在英国的贵族政治的崩溃。这就给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列宁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 年 11 月 30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版，第 4 卷，第 362 页。

马克思：《给梅耶和伏格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第 89~90 页，人民出版社，1958。

第二节 意大利的统一

（一）意大利民族解放及统一运动中的两条道路

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仍然是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且外国的奴役更变本加厉了。不但伦巴底和威尼斯照旧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下，而且还增添了新的外国势力：奥地利军队驻扎在托斯坎纳等国，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在罗马教皇国，有在 1848 年革命中帮助教皇镇压革命的法国军队赖在罗马不肯撤走。外国势力竭力阻止意大利的统一，因为意大利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他们的宰割和奴役。在革命失败后，大多数国家又恢复了专制制度的统治。除撒丁尼亚王国以外，其他国家均废除了革命期间颁布的宪法。在受外国奴役及本国反动派统治的意大利环境中，唯有撒丁尼亚王国是个独立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它保存了 1848 年颁布的自由主义宪法，这部宪法限制了王权，采取了两院制的国会制度，并且保障了资产阶级自由。而且，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撒丁尼亚王国掌握了政权。

从 1852 年起领导撒丁尼亚自由派内阁的是卡米洛·本佐·加富尔（1810～1861 年）。加富尔出身于富豪家庭，年轻时供职于宫廷，后来在军中服役。22 岁时他到英国及法国游历，在英国研究英国宪法，醉心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1848 年革命后，加富尔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始经营资本主义农业，并且从事谷物贸易和制造化学肥料。因此，他成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并且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自由派内阁在加富尔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由国家大力资助铁路建设，鼓励建立新的工业生产部门。它坚决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 50 年代大大降低了关税税率，从而使得工业家获得国外的廉价原料及工厂设备。因此，撒丁尼亚的经济在 50 年代出现了空前的高涨。在 1851～1858 年间商业流通额增加了一倍。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有了迅速的发展。1853 年建立了机器制造业。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亦日新月异。地主甚至投资到银行及铁路建设上面。一句话，撒丁尼亚成为意大利半岛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撒丁尼亚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及成绩，使得这个国家成为意大利各邦自由主义贵族及大资产阶级向往的中心，他们把实现国家统一及驱逐外国势力的希望寄托在撒丁尼亚王国身上。

另外，加富尔还在撒丁尼亚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政策。他允许报章杂志刊载反奥的文章，同意意大利其他邦的革命人士到国内避难。仅伦巴底—威尼西亚的意大利人到撒丁尼亚避难者就有两万家。加富尔的这种政策提高了撒丁尼亚在意大利的声望，不但得到意大利各邦的资产阶级自由贵族的支持，而且也赢得许多民主派的好感。马志尼领导下的青年意大利党中有好些人开始把祖国统一的希望寄托在撒丁尼亚王国身上，如曼宁、加里波第等人。1857 年加富尔创立了“意大利民族协会”，让曼宁当主席，加里波第为副主席，从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民主派分子集中到他的间接领导之下。

与撒丁尼亚相比，意大利其他诸邦的经济则是另一种情况。在伦巴底—威尼西亚地区及托斯坎纳等国，由于奥地利的掠夺性政策，经济陷于停顿状态。在教皇国和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下，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当缓慢。在这里，农民苦于无地，只能按照苛刻的条件租种大地主的土地，以致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

因此，意大利革命的任务便是通过驱逐外国势力完成国家统一，并且消灭封建残余。

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个重大历史任务的问题上，自由派和民主派持有不同的主张。

以加富尔为代表的自由派反映了意大利自由主义贵族及大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要求通过“自上而下”的道路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他们主张由撒丁尼亚王国政府用王朝战争的手段，驱逐奥地利势力，完成统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自由派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争取法国的援助；在必要时利用民主派及人民力量。

以马志尼为首的民主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完成民族解放及统一大业，并且力图建立民主的意大利共和国。但是，民主派的弱点是：没有提出反映广大农民要求的土地改革纲领，没有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并且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的革命要求，从而未能把统一和民族解放运动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民主派也不愿发动农民群众，只想依靠少数先进分子的革命行动。当时，意大利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力量薄弱，远远没有发展到威胁资产阶级的程度。因此，意大利的资产阶级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阶级。马志尼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所以能够坚持人民革命战争的道路，其原因亦在此。

（二）1859年反奥战争与统一运动的开始

撒丁尼亚几年来就积极地准备反奥战争。1858年7月，加富尔与法皇拿破仑三世会晤于普隆比埃，双方商定：法国以武力援助撒丁尼亚，把伦巴底—威尼西亚从奥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以撒丁尼亚为首的、包括伦巴底—威尼西亚以及教皇国一部分领地罗曼纳在内的北意大利王国；另一方面撒丁尼亚必须把萨伏依及尼斯两省让给法国。此外，还要在中意大利建立一个包括帕尔马、摩登纳、托斯坎纳及教皇国的一部分土地在内的中意大利王国。实际上就是要在意大利中部建立法国势力范围。

1859年4月，对奥战争开始了。除撒丁尼亚正规军外，在加富尔的号召下，加里波第率领志愿军也参加了战斗。6月4日，法、撒联军在马进塔一役大破奥军，6月22日，把奥军逐出伦巴底。

反奥战争在中意大利各地激起了革命高潮。4月27日托斯坎纳发生了民主派领导的起义，大公利奥波德逃走了。5月，帕尔马人民起义了，6月初

女公爵逃走。6月，摩登纳也爆发起义，统治者被赶走了。接着，在教皇国的罗曼纳人民用起义回答了教皇政权的压迫。起义的各邦都成立了自由派的临时政府，并且都要求与撒丁尼亚合并。但是由于害怕法国反对，加富尔不得不拒绝了合并的要求。

中部意大利诸邦的革命运动吓坏了拿破仑三世，他眼看建立中意大利王国的计划成为泡影。于是他决定退出反奥战争，以图阻止意大利革命的发展。7月11日，他单独与奥地利签订维拉弗朗卡和约，和约规定：威尼斯亚继续归奥地利统治，仅仅将伦巴底让给撒丁尼亚；萨伏依及尼斯合并于法国；恢复中意各邦的君主统治。对此，加富尔非常气愤，他要求撒丁尼亚同奥地利作战到底。国王不同意，因此他引咎辞职。是年11月10日，撒丁尼亚政府与奥地利签订和约，承认了维拉弗朗卡和约的条款。

丧权辱国的和约引起了意大利人民的义愤。中部意大利诸邦的人民普遍成立了自己的武装队伍，以保卫革命政权和抵制君主政权的恢复。这时，自由派政府仍旧坚持要求与撒丁尼亚合并。法国虽然仍是合并的障碍，但是国际情势发生了有利于合并的变化。当时，英国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意大利以对抗法国，同意中意大利诸邦合并于撒丁尼亚。1860年1月15日，在英国压力下，法国不得不与英国达成协议：外国不得干涉意大利的内部事务，意大利中部诸邦应由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归属。

在这个形势下，加富尔重新担任了首相。1860年3月，在加富尔的操纵下，中部各邦举行了公民投票，正式合并于撒丁尼亚。

这样，到1860年春，撒丁尼亚统治阶级利用了人民革命斗争完成了意大利的局部统一。

这时，民主派为了完成整个意大利的统一，主张组织爱国武装力量向罗马教皇国及南意大利进军。但是，撒丁尼亚的统治阶级既不愿得罪拿破仑三世，又害怕进军胜利会使民主派得势，于自己不利，所以拒绝了民主派的这个建议，并且压制了民主派的活动。

（三）加里波第的远征和统一运动的高潮

1860年4月4日，西西里岛的巴勒摩爆发了起义，起义的主力是贫农和手工业者。起义虽然遭到了血腥的镇压，但是不屈的起义者展开了游击战，与政府军进行顽强的战斗。除了巴勒摩外，西西里岛的其他城市也发生起义。城市人民的斗争与农民游击战互相呼应。到4月底，革命席卷了西西里全岛。

西西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意大利后，人民英雄加里波第立即组织了“千人远征军”，于5月5日从热那亚出发，渡海前来援助西西里起义者。“千人远征军”是一支志愿队伍，参加者有工人、手工业者、渔民、大学生、律师和新闻记者。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是民主派。不过，加里波第本人从50年

代起在政治态度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他继续和马志尼民主派及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仍旧坚持主张发动人民通过革命战争方法来完成统一，但是另一方面他开始拥戴撒丁尼亚的萨伏依王朝，希望全意大利都统一在萨伏依王朝下面。在这次远征出发前他曾写信给西西里起义领袖皮洛道：“要记住，纲领是：意大利和埃马努伊尔（撒丁尼亚国王）。”加里波第的这种政治态度决定了他后来在南意大利的行动。

1860年5月11日，“千人远征军”在西西里岛的一个小港口马尔萨拉登陆。游击队从四面八方来欢迎“千人远征军”，在一个月内有5000名游击队员参加了加里波第队伍。5月27日，在起义人民的支持下攻下了巴勒摩。接着革命队伍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肃清了波旁王朝的军队，到6月底解放西西里全岛。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实行了一些改革，如取消了磨粉税等不合理的赋税，废除了谷物和蔬菜的进口税。6月2日又颁布法令，允许参加起义的农民从公共土地中领取小块土地。但是加里波第拒绝了农民提出的分配地主土地的要求。甚至同意派兵去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

1860年8月，加里波第挥师北上，在那不勒斯的卡拉布利亚登陆。实际上在他到来之前，这里许多地方已经发生了人民起义，因之加里波第的队伍得到当地起义人民的有力支持，到10月1日就把整个那不勒斯解放了。国王及其宫廷人员逃之夭夭。临时政府成立了，加里波第在人民的拥戴下成为两西西里的元首。

在解放那不勒斯后，加里波第在临时政府里不但任用民主派，而且也任用了许多自由派当部长。他还把原来的波旁王朝的舰队交给撒丁尼亚海军指挥。

1860年9月11日，约四万人的撒丁尼亚军队攻进教皇国，9月29日占领了马尔撒和安布里亚之后，便进入那不勒斯境内。这时，加富尔向加里波第建议在南意大利举行公民投票，对南意大利并入撒丁尼亚一事进行表决。加里波第不顾民主派克里斯皮等人的反对，同意举行公民投票。1860年10月末举行公民投票后，南意大利正式并入撒丁尼亚。在合并之后，在革命中颁布的关于分配公共土地的法令也被撒丁尼亚当局取消了，农民分到的公共土地又被收回。同时，农民运动遭到撒丁尼亚政府的残酷镇压。

这样，撒丁尼亚的统治阶级吞噬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果实，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南意大利的合并。

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正式宣布成立，撒丁尼亚的国王登上了意大利王国的王位。

意大利王国成立后，掌政的自由派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的改革。取消了过去使意大利各地互相隔绝的关税壁垒，从而建立了统一民族市场。颁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撒丁尼亚的民法和刑法也推广到全王国各地。

（四）意大利统一的完成

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后，威尼斯和教皇辖地尚在外国控制下，因此最后统一尚待完成。

在如何完成最后统一的问题上，继续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意大利王国政府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而民主派和加里波第主张用人民革命战争的手段去赶走外国势力。

1862年加里波第又组织了志愿军向罗马进军，想从法国占领军及教皇政权下解放罗马。但是当时意大利王国的统治集团对法国采取奴颜婢膝的态度，所以特意派军挡住了加里波第部队的去路，加里波第本人在冲突中负了伤。

1865年马志尼领导下的民主派建立了起义委员会，预定在1866年举行起义赶跑奥地利统治者。但是意大利王国政府却把解放威尼斯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1866年6月普、奥战争爆发，意大利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战争在短期内以普鲁士胜利而结束。根据维也纳和约，威尼斯归还给意大利。

剩下的只是在法军占领下的教皇国了。教皇又征募了一支1万人的雇佣军，妄图抗拒意大利统一运动。1867年加里波第又率志愿军进攻罗马，但以失败而终。由是，教皇更加嚣张起来，他高唱“教皇无谬论”，声称他的权力凌驾于世俗君主之上。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不得不调回驻罗马的法军，以便加强法国的防线。9月初法军大败，拿破仑三世也当了普军的俘虏。于是意大利军队和加里波第的志愿军进入教皇国，9月20日占领了罗马。10月举行公民投票，根据投票的结果，罗马教皇国被合并于意大利王国，教皇世俗权力被取消了。不过，意大利王国政府同意教皇避居梵蒂冈，每年拨款12.9万英镑作为教皇的经费。到这里，意大利统一终于完成。

1859~1870年意大利统一及民族解放运动在本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的胜利，是意大利进步力量反对本国反动派及外国奴役者的长期而顽强斗争的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

意大利革命的特点是：它始终贯串着“自下而上”及“自上而下”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以“自上而下”道路的胜利而结束。也正因为如此，在统一后的意大利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君主制及农村半封建制度。

虽然如此，意大利统一还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因为统一的完成为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并且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及成长壮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节 德意志的统一

(一) 50 年代德意志的经济发展与统一问题

1848 年德意志革命虽然失败了，然而经过革命，德意志的政治情况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德意志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阶级在 1848 年革命的震撼下，感到有必要和资产阶级进行妥协，以便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镇压人民，防止未来的革命。因此在 1848 年革命失败之后，这些国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容许资产阶级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甚至普鲁士也不例外。

1848 年 12 月 5 日，普鲁士国王颁布了一部“钦定”宪法，到 1850 年又颁布一部新宪法，作为 1848 年宪法的补充。两部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资产阶级的要求：成立议会，议会有表决法案、批准预算的权力。但是这些宪法也带有明显的反动性质：国王有对议会立法的绝对否决权及行政、军事大权。内阁大臣不向议会负责，而向国王负责。议会分为两院，下院由选举产生，上院由国王任命的显贵构成。选举制度实行三级选举法：所有的选民依纳税情况分为三个等级。纳税最多者为第一等级，人数最少，约 13.3 万人；纳税较少者为第二等级，约 49 万余人；纳税最少者为第三等级，人数最多，约 265 万余人。这三个等级人数虽然相差悬殊，但是各选出人数相等的复选人，再由复选人选出下院议员。这种复杂的程序及公开投票制，保证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在下院中的优势。

这样，在实行宪法之后，普鲁士不过是在君主立宪制度掩盖下的君主专制国家。但是，由于实行宪法，它毕竟不是 1848 年革命前那样纯粹的专制主义国家了。

在 1848 年革命后，德意志发生更大的变化是在经济方面。五六十年代是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德意志重工业部门的产量平均每十年增长一倍多。1850 年煤的产量为 700 万吨，1860 年为 1700 万吨，1870 年为 3400 万吨。铁的产量在 1850 年是 20 万吨，1860 年为 50 万吨，到 1870 年猛增至 140 万吨。随着工业革命在德意志阔步前进，机器制造业也发展起来，1846 年机器制造工厂只有 131 家，1861 年增至 300 多家。也出现一些大

型工厂，黑森的克虏伯工厂在 1860 年已有工人和职员 2000 人，1870 年增至 16,000 人。轻工业的发展也是显著的。纺织机 1849 年有 5018 架，1861 年已有 15,258 架。铁路长度也增长得很快，仅普鲁士的铁路，1850 到 1870 年间就由 3800 多公里增至 11,000 多公里。到 60 年代，德意志工业已经赶上了法国。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早在 19 世纪上半期，已经有一批大地主开始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在 50 年代以后，农业资本主义

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促进这个发展的因素是，第一，普鲁士政府在 1850 年 3 月 2 日颁布了“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这项法律无偿地取消了在普鲁士农村中尚残存着的次要的封建义务。但是，主要的封建义务，包括各种强制劳役，都必须由农民用土地或金钱来赎买，赎买金相当于几十年的地租额。仅仅易北河以东的农民在 50 年内缴给地主的赎金就达 10 亿马克左右。结果，大地主从农民手中掠夺了大量土地和现金，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和机器。相反地，广大农民因赎买封建义务的结果，日益贫困，倾家荡产者不可胜数。第二，国际市场上粮价上涨。这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英国取消“谷物法”，英国从国外购买的粮食激增，此其一。城市工业的迅速增长及城市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大增，此其二。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期间没有俄国粮食的竞争，此其三。粮价上涨，推动了普鲁土地主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过渡，及扩大经营。普鲁士有不少地主还开始经营制糖厂、酿酒厂、磨面厂及锯木厂等等。

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农场主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普鲁士政府还在 1854 年制定“雇农法规”，规定雇农只要有罢工的企图，便处以长期监禁（三年）。

一言以蔽之，五六十年代德意志工、农业资本主义都有空前的高涨。

但是，资本主义愈发展，国家的分裂状态愈难以令人容忍，资产阶级愈感到统一的必要性及迫切性。道理很明显。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邦都有自己的工商业法令，不同的货币，不同的度量衡；而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籍法及对外国人居留的限制。这一切对于大工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再者，由于德意志小国林立，德意志资产阶级在把商品输出国外市场时，缺乏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保护。在英法各国，资本家在国外竞争时，都有外交官保护，必要时用炮舰作为后盾。但是，德意志资产阶级享受不到这种保护。更重要的是，德意志的分裂也使得它无力建立海外殖民地，而德意志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一样，也是热切地追求殖民地的。由于国家不统一，德意志资产阶级痛苦地感到自己缺少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后盾去支持自己参加对殖民地的掠夺及争霸。

总之，到 50 年代，德意志资产阶级对于统一的要求，比 1848 年革命前更加迫切了。虽然如此，但是他们自己却无力担负起统一德国的任务。他们认为如果通过革命来完成统一，势必把无产阶级卷入革命运动中来，有重演巴黎六月起义的危险。因此，他们决定投靠现成的一个大国的统治阶级替自己完成这个统一任务。当时德意志有两个大国——普鲁士与奥地利，但是德意志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普鲁士统治阶级身上。因为：第一，普鲁士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但能够统一德国，而且还可以替资产阶级镇压工人运动及推行对外侵略。第二，普鲁士在政治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普鲁士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就倡导关税同盟，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又又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实行让步——颁布宪法和成立议会。而奥地利在镇压 1848~1849 年革命后，又恢复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成为德

意志诸邦中最反对时代潮流的国家。

50年代末60年代初，拥护普鲁士领导统一的资产阶级分子成立了两个政治组织：一个是1859年创立的“德意志民族协会”，主要是由德意志南部和中部各邦的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另一个是1861年成立的进步党，这是由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创立的。该党虽然拥护普鲁士王朝领导德国的统一，但是也希望普鲁士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使资产阶级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力。

另一方面，普鲁士的容克阶级多年来就梦想借助于武力来统一全德，以便把全德的人民置于自己的任意宰割和榨取之下。而且，普鲁士容克阶级中有许多人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也迫切要求统一，以利于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以实力来说，普鲁士容克阶级自从17世纪以来，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因此它有力量来领导德国的统一。

统一也是德意志无产阶级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统一有利于工人运动及工人解放事业。但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意志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抑或在组织上及思想觉悟上都远远没有成熟，所以它无力领导“自下而上”的革命来统一德国。

因此，当时德意志阶级力量的对比是有利于普鲁士的容克阶级的。这种情况就决定了统一只存在一条可能的道路，那就是普鲁士容克阶级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道路。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其关心德意志的统一，他们号召德意志人民“自下而上”地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普鲁士王朝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君主统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是一条对人民最为有利的道路。但是，由于德意志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怯懦，也由于德意志无产阶级政治上组织上还处在幼稚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张未能实现。

（二）“宪法纠纷”

普鲁士在1849年及1859年曾两次企图在自己的领导下实现德国的统一，但是都由于奥地利的阻挠而归于失败。普鲁士的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要想统一德国，非使用武力不可，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1860年起，普鲁士政府锐意推行军事改革，以便为用武力统一德国作准备。但是这个军事改革却引起了一场所谓“宪法纠纷”。

1860年，陆军部长房龙在议会里提出军事改革法案，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后备军，而把常备军从14万人增加到21.7万人，服役年限从二年延长到三年。房龙在提出这个法案的同时，还要求议会同意拨款1000万塔列尔作为改革用的军费。议会里居多数的资产阶级议员利用1850年宪法赋予议会的权力，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拨款，这就等于否决了军事改革法案。

实际上，资产阶级既然希望由普鲁士用武力领导统一，他们就没有理由反对以增强普鲁士军事力量为目的的军事改革法案及与之有关的拨款。他们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因为军事改革是由房龙所领导的，而房龙是最反动的容克阶级代表，军事改革会增强容克的反动力量，会阻挠普鲁士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议会不但拒绝拨款，而且还要求实行责任内阁制。这就开始了“宪法纠纷”。

“宪法纠纷”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与以国王为首的地主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前者不满足于宪法所赋予它的微不足道的政治地位，他们要求更多的统治权。

186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了回击资产阶级拒绝军事拨款的行动而解散了议会，宣布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在选举运动中，新成立的进步党在竞选尖锐地批评了三级选举法和公开投票制。选举结果，进步党在议会中居多数。

1862年初，新议会开幕。新议会在进步党的带动之下，态度比上一届议会更为强硬，不但否决了军事拨款，而且还向政府提出两点要求：（一）由议会监督政府的开支；（二）经费严格按照议会所批准的计划开支。于是，国王威廉一世又把议会解散，宣布选举新议会。在新议会的选举过程中，政府对选民施加最大的压力，但是未起多大作用，新议会中进步党人占压倒优势。新议会又把军事改革的全部经费都否决了。资产阶级的这个态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都举行群众集会，在普鲁士出现新的革命形势。但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与旧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他们只限于议会活动。

新议会之否决军事改革法案，使得威廉一世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个时候甚至考虑退位。可是当他看到资产阶级畏首畏尾时，胆子又壮起来，1862年他决定邀请一位坚强的人物——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出来组阁，以便渡过难关。

俾斯麦出身于普鲁士的容克家庭。他之崭露头角是在1848年革命时期，当时他建议国王说：要镇压革命必须使用武力，反对国王对革命人民作任何让步，所以被认为是保王党中之保王党。作为一个专制主义者和保守派，他长期以来以同情的态度把奥地利看作是君主制的保障及拦阻民主浪潮的防波堤，因而希望普、奥两国在德意志邦联内友好相处。但是他在1851~1857年间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议会代表期间，他的观点和态度转变了，他认识到所谓德意志邦联不过是奥地利称霸的工具，普鲁士要想成为中欧大国，就必须打败奥地利。同时他也认识到完成德意志的统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而承担这个任务的应该是普鲁士，只有由普鲁士领导统一运动，才能挽救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地位及容克阶级的特权地位；而奥地利是这个统一的主要障

责任内阁制，即是内阁向议会负责，而不向国王负责的制度。

碍，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把奥地利驱逐出去，方能完成德意志的统一。这意味着他的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即从一个君主专制制度及旧封建秩序的顽固的维护者变为统一运动的倡导者。

俾斯麦就任首相后，态度颇为强硬，对进步党寸步不让。他看到了资产阶级“色厉而内荏”这个致命弱点，同时也了解到资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便是统一，只要由普鲁士政府去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归根到底是会得到他们的拥护的。因此，他决定与普鲁士资产阶级斗争到底。他对议会说：“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普鲁士的威力……当代重大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就在这里，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他不得议会的同意而擅自动用国家大量款额去推行军事改革计划。为了压制舆论，政府还下令严格取缔新闻自由：任何报纸在两次警告后仍不停止反政府宣传者，均予以封闭。同时，俾斯麦又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领袖拉萨尔勾结起来。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9年以前全德唯一的工人独立组织，其领导人便是拉萨尔。但是他力图把德意志工人运动引导到有害的机会主义道路上去。他还背着工人阶级偷偷地与俾斯麦勾结，在1863~1864年的短短一年内就同俾斯麦举行六次密谈，另外还多次与他通信。在这个勾结中，拉萨尔用工人阶级的名义表示支持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用战争手段统一德国的计划，俾斯麦则承诺在统一完成时实行普选制。

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软弱和拉萨尔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使得俾斯麦感到国内政局的安宁有了可靠的保障，于是他便有恃无恐地、得心应手地推行他的“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计划。

（三）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与德国统一的完成

为了实现武力统一，在军事上打败奥国是俾斯麦的首要目的。在发动对奥战争之前，正值在德意志与丹麦之间发生领土纠纷，俾斯麦便决定先打败丹麦，然后再收拾奥国。

原来德意志北部的什列士维格和霍尔斯坦两个公国，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同时也是丹麦国王的个人领地，不过并没有与丹麦合并。两公国的居民多数是德意志人，1848年革命时要求脱离丹麦国王的管辖而同德意志合并，但是在沙俄的反对下，这个要求没有实现。丹麦统治阶级早就有意正式把两公国合并到丹麦版图之内，1863年年底丹麦正式宣布合并，这在德意志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俾斯麦便利用德意志的民族情绪，乘机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

俾斯麦之决定发动这一场战争，是有复杂的动机的：第一，使普鲁士在全德人民心中成为德意志权利的保卫者，从而可以提高普鲁士的威信，以便

为普鲁士领导统一扫清障碍。第二，他想在对丹战争后制造普、奥之间的领土纠纷，以便使对奥战争有所借口。第三，以对丹战争作为未来对奥战争的演习。

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爆发了。奥地利在普鲁士的邀请下也参加了战争。结果，丹麦惨败，不得不把霍尔斯坦让给奥地利，而把什列士维格让给普鲁士。

作为对奥战争的准备，俾斯麦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以图达到孤立奥地利的目的。1863年波兰起义，普鲁士充当了沙俄镇压波兰起义的帮凶，因而得到了俄国在普奥战争中守中立的保证。为了确保法国的中立，俾斯麦在1865年9月会晤拿破仑三世时，表示普鲁士不反对把卢森堡划入法国版图，作为对法国在普奥战争中守中立的报答。鉴于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有矛盾（当时奥地利仍占领威尼斯），1866年4月8日普鲁士与意大利王国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双方约定：如果普鲁士在三个月内对奥开战，意大利应立即对奥宣战；只有在奥地利把威尼斯归还给意大利后，双方才能同意与奥地利讲和。

这样，在普奥战争前，俾斯麦已经安排好了有利于普鲁士的国际环境。

不过，在丹麦战争结束后，德意志许多地方出现人民群众反对普鲁士的强权政治的运动。为了缓和人民对普鲁士的不满，俾斯麦向德意志邦联议会提出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召集一个根据普选权和直接选举制产生的全德国会，并且由全德国会实行全德改革，改革的内容是建立铁道、邮政和电报电话事业的全德管理机关，德意志公民在全德境内享有自由居住权，实行全德统一的关税立法和商业立法，实行统一的外交政策，建立全德的统一的军队等等。俾斯麦提出的这个法案虽然没有得到邦联议会的答复，但是的确起了迷惑人心的作用。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俾斯麦便制造理由要求奥地利把霍尔斯坦让给普鲁士，奥国拒绝，这就成为战争的导火线。1866年6月14日，普、奥战争爆发了。

在战争中，德意志大多数邦站到奥地利方面对普鲁士作战，这是因为这些邦的君主们都害怕普鲁士统一德国会使自己丧失原来的统治地位。当时只有德意志北部几个小邦支持普鲁士。意大利也参战，反对奥地利。7月3日在萨多瓦进行决战，有23.8万奥军与29.1万普军对抗。普军不但在人数上胜过奥军，而且其装备及武器也都比奥军好。普鲁士军队在战斗中用后膛的撞针发射枪，而奥军却仍在用老式枪，因而普军的火力高出奥军火力好几倍。此外，普军指挥比奥军更为坚决果敢。决战中，普军取得大捷。7月14日普军逼近奥国首都。由于法国出面调停，7月20日普奥之间达成了停战协定。8月23日在布拉格缔结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同意美因河以北诸邦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获得霍尔斯坦，也吞并了汉诺威、黑森、拿骚、黑森—洪堡及法兰克福自由市。同时，普鲁士也承认南德意志

各邦的独立，并且只要求奥地利付出一笔很小的赔款。对奥地利的这种宽大表明了俾斯麦的手腕的灵活性，因为俾斯麦为了最后统一德国，还要准备对法战争，他希望那时能够争取奥地利的中立。普奥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三世企图获得卢森堡作为守中立的报酬，但是遭到俾斯麦的严词拒绝。

1867年，在普鲁士领导下，北德意志联邦诞生了，有21个邦及三个自由市（汉堡、卢卑克和不来梅）参加。根据1866年12月批准的联邦宪法，北德意志联邦的主席由普鲁士国王兼任，而且是世袭的，他掌握联邦的全部行政及军事大权。俾斯麦也兼任北德意志联邦的总理，总理对主席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议会也不能罢免他。联邦的立法机关是帝国议会、联邦议会。帝国议会议员是由各邦根据普遍、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法选出。联邦议会由各邦任命的代表组成，共有43名代表，普鲁士的代表有17人。帝国议会的决议只有经过联邦议会批准才获得法律上的效力。总之，宪法保证了普鲁士对于全联邦的控制，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普鲁土地主阶级成了全德的统治集团。至于宪法规定普选制，是俾斯麦笼络人心的狡狴手段，特别是麻痹工人阶级的手段，想借此缓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并且使其不反对普鲁士领导的统一。

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是德国统一道路上的决定性步骤。在联邦内部已经没有任何交通限制及商品流通的阻碍了，统一的货币及统一的度量衡也建立起来了。联邦的对外政策及对外贸易也都由联邦政府统一确定，对于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也实行了统一的措施。过去多少年来一直使资产阶级感到苦恼的各种不利于工商业的限制，现在都一扫而光。因此，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无疑地为全德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切，都是与俾斯麦的努力分不开的，因此，在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俾斯麦在德意志资产阶级中的威望大大提高。过去在“宪法纠纷”中反对俾斯麦独断独行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现在也愿意和俾斯麦和解，因为在资产阶级看来，统一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要比自己的政治统治重要得多。普鲁士议会以压倒的多数追认了自“宪法纠纷”以来俾斯麦政府的一切财政支出。俾斯麦也表示了和解的态度，他公开宣称过去内阁不得议会的同意而征税是非法的。议会欢迎俾斯麦的态度。进步党发生分裂，其中大多数人脱离该党另外组成民族自由党，这个新政党除了坚持进步党关于内政的原来主张外，还表示支持俾斯麦的对外政策及统一德国的方针。在“宪法纠纷”的年月里和俾斯麦共事的官僚中有好几个人被允许退休，其官职为同情民族自由党的人接替。

不过，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之成立，并不意味着统一运动之大功告成，因为南德诸邦尚置身于联邦之外。

南德诸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斯塔得——之所以留在北德意志联邦之外，主要是拿破仑三世横加阻挠的结果。拿破仑三世害怕德国完成统一会妨碍法国在欧洲称霸，所以他反对德国统一。他主张南德

另成立联邦。当时法国掌握着斯特拉斯堡这个重要的要塞，法国军队随时可以长驱直入南德诸邦，所以南德诸邦在法国的威胁下，不敢公然和北德联邦合并。在这个情况下，南德诸邦只能与北德联邦结成秘密的军事同盟。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了，法国战败，于是南德诸邦才与北德联邦合并，组成德意志帝国。到此，德国统一大业才臻于完成。

（四）统一过程中的德意志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自从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布解散后，德意志一个时期没有任何工人组织。1857年发生经济危机，德意志工人开始活跃起来。60年代初，罢工运动席卷许多城市。由于害怕工人阶级走上独立的革命道路，资产阶级进步党开始在工人中间建立互助会及各种教育团体。

1862年柏林工人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伦敦工业博览会，从英国工人运动经验中认识到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的重大意义。此后，在工人中间关于成立工人独立组织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这种思想未几便开花结果，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成立了。这个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德国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影响的第一步，它是德国工人阶级独立组织。这个组织一开始就处在斐迪南·拉萨尔的影响下。

拉萨尔（1825～1864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富商家庭，1843～1846年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接受了黑格尔的学说，同时也接触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1848年革命期间，他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并且与《新莱茵报》建立了联系。

60年代初，拉萨尔为建立工人组织而进行活动。1862年4月12日，他在柏林一家手工业协会上作了一次讲演，在讲演中对现存制度作了批判，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这个讲演在德意志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取得了工人的信任，莱比锡先进工人于1862年12月给拉萨尔写了一封信，邀请他来领导工人运动。全德工人联合会就是在拉萨尔的倡议下成立的。拉萨尔的功绩，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于“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

但是，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后，拉萨尔在工人中间宣传和灌输改良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思想。他把国家理解为超阶级的组织，说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与“自然、贫困及愚昧”作斗争。从这个超阶级的观点出发，他否认阶级斗争，反对用革命手段去推翻普鲁士国家。他特别欣赏资产阶级国会制度，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国家制度。他也歌颂普选制，认为它是消灭贫困的万灵膏。在他看来，实行普选制之后，工人阶级的代表可以控制国会，这样的国会可以向工人生产合作社提供贷款。工人可以利用生产合作社组织与资本家竞

争，在挤垮资本家之后，工人便可以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就可以得到实现。

由于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也反对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同盟者——农民，他胡说什么农民是反动的阶级。因此，他反对工农联盟。

在统一问题上，他支持俾斯麦的“自上而下”的道路。他勾结俾斯麦，是背叛工人阶级的可耻行为。

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判拉萨尔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并且怀疑他与俾斯麦有秘密的联系。到 1928 年发现了拉萨尔与俾斯麦的通信之后，这个怀疑才完全被证实了。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拉萨尔所控制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已经离开了革命的道路，所以他们二人便决定全力帮助德国工人另外建立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

60 年代，一部分先进的德国工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 年)与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 年)二人。倍倍尔是一个青年旋工，他在儿童时代备尝贫困的辛酸。早在 20 岁那年他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地就锻炼成为杰出的工人领袖。李卜克内西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论家，参加过 1848 年巴登起义，起义失败后亡命国外，在伦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甚为密切，1862 年回国。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德意志工人中间展开了积极的活动。60 年代出现的“萨克森工人协会联盟”就是由他们二人领导的。但是，这个工人组织当时处在资产阶级“人民党”的影响下，因此还不能算是独立的工人组织。

这两位工人领袖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并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持有错误的观点。比如在 60 年代中期以前，他们还没有认识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重大意义，他们还与人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迟迟不肯与其决裂。其次，在统一问题上，李卜克内西也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他虽然反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并且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各封建王朝，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同时也主张这个民主共和国采取联邦的形式，这是与马克思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在马克思看来，统一后的德国应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李卜克内西的主张有利于地方分裂主义。

但是不久，他们二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热心帮助下，克服了不少错误。特别是他们后来认识到建立独立的、革命的工人政党的重要性。60 年代下期，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开始觉悟的工人纷纷退出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而团结在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周围。建立真正的革命的工人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869 年 8 月 7 日，在爱森纳赫召开了全德工人大会，会上宣布解散“工人协会联盟”，同时宣布成立“社会民主工党”，并且通过了党纲，党纲表示该党站在第一国际的立场上，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为使劳动者从剥削及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

社会民主工党的创立，意味着真正独立的革命的德国工人政党诞生了，这个党在主要问题上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尽管它的纲领也包括了一些有害的拉萨尔派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热烈庆祝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但是同时也指出该党纲领中提出的空洞的、错误的原则，特别批评了为建立“人民”国家而斗争的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年轻的社会民主工党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由于德国工人政党成立较晚，所以德国工人阶级没有能够防止普鲁士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完成统一。

德国统一的完成，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为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基地，因而是历史的进步。

诚然，由于这个统一是走了“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道路，从而把普鲁士的封建势力及军国主义传统保存下来，但是统一加速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因而俾斯麦所领导的统一运动就是一次革命。

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活动中，扮演了自上而下革命的主角，用暴力摧毁了阻碍德国统一的各种反动力量，不自觉地充当了 1848 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因此，对于俾斯麦的历史功绩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19 世纪中叶阻碍德国统一的，是以奥地利王朝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封建君主势力，这个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只有用暴力才能摧毁。在资产阶级怯懦及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只有普鲁士这个强大的国家通过战争手段才有可能消灭分裂的势力而完成统一大业。因此，俾斯麦领导的统一运动完全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这也是俾斯麦值得肯定的地方。

德意志的统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它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 19 世纪末，德国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英法等先进工业国家，而跃居世界第二位。第二，它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场所，统一后的德国工人运动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第三，它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因为统一的结果，德国成为中欧的强国，这就使得德国成为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因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67 页。

第四节 俄国 1861 年改革

（一）克里木战争

克里木战争是西欧资本主义列强与沙皇俄国之间在土耳其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这个矛盾之发生，首先是由于这些强盗国家都想利用土耳其国力衰弱而占有它或奴役它。而且，土耳其处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地方，地理位置颇为重要；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及附近的达达尼尔海峡及博斯普鲁斯海峡有经济上及战略上的价值。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贸易往来必经之处，两海峡是控制黑海与东地中海的咽喉。因此，欧洲列强都想控制两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这便是列强矛盾亦即所谓“东方问题”之由来。在列强矛盾中间，俄国与西欧列强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沙皇俄国自从彼得一世以来，一贯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从 18 世纪末起，就接二连三地侵夺土耳其的领土，把黑海北岸的土耳其大片土地都据为己有。但是，俄国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它还想进一步控制土耳其境内的两海峡，因为两海峡是黑海的唯一出口，掌握两海峡，俄国就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推向近东及地中海，就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东欧的霸权。

1833 年，俄国乘土耳其皇帝与埃及总督之间发生冲突的机会，强迫土耳其与它签订温卡尔—斯凯列西条约，从土耳其取得俄国军舰通过海峡的权利，同时还迫使土耳其不许其他国家的军舰开入海峡。这样一来，沙俄在近东的地位大大加强了。这引起了英、法两国的不安和反对。

英国当时已经把土耳其变为自己的重要商品市场了，它还想进一步把土耳其变为自己的半殖民地。因此它害怕俄国势力的加强会损害自己在土耳其的地位。英国特别不能容忍俄国控制海峡，因为这会威胁通往印度去的航路。土耳其在 19 世纪上期也成为法国商品的重要销售地，而且法国还想进一步把自己的势力伸入土耳其。所以，俄国势力的扩张，也引起法国统治阶级的忧虑。

为了削弱俄国在近东的势力，1841 年当温卡尔—斯凯列西条约期满时，英国发起召集有关国家的国际会议，缔结了关于海峡的国际条约，规定：在土耳其处于和平时期，各强国的军舰一律不准开入海峡；一旦土耳其发生对外战争时，只有得到土耳其允许的国家才有权通过海峡。这实质上是取消了俄国军舰通行海峡的权利，是俄国外交的失败。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抬头。沙皇俄国在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之后，在国际反动势力中间的威望突然提高，成为名符其实的“欧洲宪兵”。因此，沙皇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恢复自己在近东所丧失的地位，于是开始积极作侵略土耳其的准备。同时，俄国国内封建农奴制危机愈益加深，广大人民对于沙皇的反动统治日甚一日地不满起来。在沙皇政府看来，为了摆脱国内的困难，加强对外侵略是唯一的出路。

这时，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进入高涨时期。英国到 50 年代已成为“世界工厂”，工业资本主义在法国也达到空前繁荣阶段。这就使得英、法资产阶级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加强了，他们都在渴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近东的商品市场，因此他们对于俄国的野心都忧心忡忡。为了对抗虎视眈眈的俄国，英、法都加紧“援助”土耳其，尤其是法国以大量的贷款及军火供应支持土耳其的反俄政策。土耳其越来越依靠英、法了。

巴勒斯坦“圣地”问题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线。长期以来，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之间就在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问题上发生争执。1852 年 8 月，土耳其政府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宣布“圣地”的管辖权归于天主教会。沙皇利用这一事件，指责土耳其政府迫害东正教徒，蛮横无理地要求土耳其政府把土耳其境内所有信奉东正教的臣民交给俄国“保护”。1853 年 2 月，沙皇派特使到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再一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土耳其由于有英、法撑腰，便拒绝了这个要求。俄国便以此为借口，于 1853 年 6 月派大军入侵摩尔达维亚及瓦拉几亚。由是俄、土战争爆发了。

土耳其一开始便遭到惨败，几乎无法继续打下去了。这就引起了英、法的参战（1854 年）。克里木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就战争的性质来说，沙俄与英法双方都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当时侨居在英国的马克思坚决反对对沙俄的侵略行为，同时也谴责英法资产阶级的无耻勾当。

英、法虽然参战了，但是不愿予俄国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尽管两国在土耳其问题上与沙俄有矛盾，但是在英法资产阶级看来，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是镇压国际革命的重要力量，不应把它摧毁。因此英法不想扩大战争，只是把它局限在克里木半岛上。到 1855 年秋，俄国在半岛上的重要要塞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于是，战争很快就以俄国战败而结束。1856 年 2 月在巴黎订立和约，根据和约，俄国失去了在黑海保有舰队及在黑海沿岸保留要塞的权利。宣布黑海及两海峡中立，对各国商船开放。因此，俄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俄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的社会经济落后。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在经济及军事上自然要远逊于资本主义的英、法。加之，战争期间国内农民运动高涨，这就威胁了俄国的后方，从而大大削弱了它的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克里木战争推动了俄国在 60 年代的改革。当然，60 年代的改革，主要是俄国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

（二）农奴制的危机

19 世纪上期，西欧国家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先后在这些国家掌握政权。但是，俄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农奴制的国家。沙皇作为整个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在警察宪兵及贵族的淫威下，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中。

在封建农奴制下面，地主不但在经济上敲骨吸髓地榨取农奴，而且有权任意殴打、虐待农奴，甚至可以出卖农奴。农民在地主的百般剥削和压迫下，贫苦困顿，不堪言状。农民在地主的折磨下，死亡率极高，1836~1851年农民人口减少50万人。

压迫和剥削必然引起反抗和斗争。俄国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农民起义几乎与俄国农奴制相终始。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震撼了整个俄国大地，把地主阶级吓得丧魂落魄，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

但是，到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已经走向衰落了，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9世纪40年代，由于西欧特别是英国对粮食的需要大增，俄国粮食出口大大增加，这就推动地主加强对于农民的剥削：增加农民每个星期的劳动日数，并且缩小农民的份地，甚至完全剥夺了农民的份地，使他们每天都为地主服劳役。农民已经下降到近乎奴隶的地位。这种现象在黑土壤诸省特别触目。这是农奴制衰落的重要征兆之一。

在非黑土壤诸省，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收代役租。代役租在19世纪上期有增无已，以致农民劳动所得远远不敷缴纳代役租之数。因此，有许多人不得不到城市去出卖劳动力，把工资收入作为代役租之补充。这是俄国农奴制趋于衰落的第二个表现。

农奴制衰落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发展，工业企业的数目增多了，自由雇佣劳动的使用也增多了。

1804年俄国手工工场为1200家，1825~1828年为1800家，到50年代后半期则约为2800家。自由雇佣工人在全部工人中的比数，1804年为48%，1825年为54%，1860年为87%。在个别工业部门中雇佣劳动所占的比数更大，比如，1825年在棉织工业中有94.7%的工人是雇佣工人。

19世纪30~50年代，俄国也开始了工业革命，1858年只是在莫斯科一省就有158架蒸汽机。

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在农业中也萌芽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农奴制下面，由于地主不断加强剥削，强迫性的农奴劳动的生产率越来越低，以致对于地主说来，剥削农奴已经无利可图了。这种情况使得一小部分地主得出雇佣的自由劳动优于农奴劳动的结论来。他们开始在40~50年代在自己的庄园上采用雇佣劳动。第二，在40~50年代，农奴内部的分化也日益显著，一小部分富农靠残酷地剥削贫农而致富，他们也在开始使用雇佣劳动。于是他们便成为在农奴关系掩盖下的农村资产阶级了。但是，任何一个致富的农奴也感觉不到自己是自己财产的完全所有主，因为地主随时可以侵占或霸占农奴的财产。

但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大大低于西欧诸国，而且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也比西欧诸国缓慢得多。其原因只能从农奴制中去找。农

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就严重地限制了工业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的供应。农民在地主的无情的榨取下，无力购买大量商品，这就有力地限制了工业品市场的扩大。

事情很明显：到 19 世纪中叶，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最大的绊脚石。因此，农奴制的废除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但是，农奴制应该如何废除？在这个问题上，俄国农民及革命民主主义者坚持主张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具体言之，就是用革命手段消灭农奴制，无代价地把土地分配给农民。

在 1858~1860 年间共爆发了近三百次农民暴动。农民运动在实质上体现农民“自下而上”地消灭农奴制的企图。

农民的反农奴制斗争，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在思想方面表达了农民的利益和愿望。他们在 1859~1861 年挺身而出，成为社会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力量。这是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由低级官吏、低级僧侣、小商人、小市民、农民以及没落贵族出身的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战士。在平民知识分子中间最杰出的人物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及杜勃罗留波夫等。

亚力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 年）在 1857 年开始出版了《钟声报》，大胆提出消灭农奴制的主张。他呼吁把农民从农奴身份中解放出来，并且把土地分配给他们。赫尔岑虽然有时表现动摇，有时也幻想由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但是他认为如果这条路行不通的话，应该采取革命手段。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则更为坚决，他们充分表达了劳动农民的要求和热望，对农奴制怀着强烈的仇恨。

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年）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政论家及文艺批评家，他积极传播农民革命的思想。他相信用和平手段解放劳动人民无异于缘木求鱼，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革命上面。他对统治阶级不抱任何幻想，他主张：为了废除农奴制度，必须消灭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俄国必须实行农民革命，推翻专制政体，把土地归还给农民。他在 50 年代末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强调用革命方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而坚决反对由农民赎买土地。

尼古拉·亚力山大洛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 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他也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毫不留情地攻击农奴制及专制政体。

革命民主主义者在 1859~1861 年间曾建立了革命组织，企图通过革命组织去领导运动和准备公开的革命行动。当时有两个秘密的革命组织，一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彼得堡成立的组织，另一个是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伦敦成立的组织。伦敦的组织在 1857~1860 年间曾制定了比较

详细的纲领，纲领首先要求“立即废除地主和国家对人身和土地所享有的一切农奴制特权”，把土地无代价地授予农民，至于地主，则当“从国家的公共收入中”领取土地原价，“而不再从农民身上征收任何特别款项。纲领也要求废除等级制，实行全体公民的权利平等，以民选代表去代替国家官吏。纲领的制定者之一奥加略夫认为这些要求如果遭到沙皇的拒绝，就应该发动军队中的进步军官，以军队为核心发动农民革命。奥加略夫还为革命成功后的俄国制定了一个蓝图，主张建立由九个“联邦”组成的共和国联盟。从这个纲领来看，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对沙皇还存有幻想，他们的主张也不彻底。

彼得堡的组织所提出的纲领是比较彻底的，他们坚持“自下而上”的革命，要求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农奴制，使农民无代价地分到土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60年末至1861年初写了一篇标题为“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揭露了沙皇制度的真相，号召农民武装起义。

但是，1859~1861年间的农民运动的高涨及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都没有发展为革命，这是因为一方面沙皇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力量，另一方面农民力量涣散，觉悟很低，要想把分散的农民运动汇合成全面革命，是很难的。这样，“自下而上”地消灭农奴制的企图终于以失败而终。

革命虽然没有发生，但是农民运动及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却迫使沙皇政府进行让步，它不得不走上改革的道路。

（三）1861年的改革

1861年的改革，是俄国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到19世纪中叶，农奴制度之阻碍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这便是这次改革的基本原因。直接推动沙皇政府实行改革的因素有以下几点：第一，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充分暴露了农奴制的落后性和腐朽性。第二，席卷全国的农民运动，在统治阶级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第三，在某些地主看来，农奴制不如资本主义剥削有利可图。

早在1856年3月30日，亦即巴黎和约订立后12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开始谈到农奴制的废除问题了。他对莫斯科一些贵族代表说：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从1857年起，沙皇政府就着手准备改革了。

负责改革工作的是“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高级官员及大农奴主组成的。参加这项工作的也有自由主义者，如内政部经济司司长米留金。参加改革工作的官吏及地主贵族代表分成好几个派别，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大地主是农奴制的维护者，所以他们对改革抱勉强的态度。他们虽然同意解放农奴，但是反对把土地分给农民。中等地主倾向自由主义，要求过渡到资本主义农业。不过他们中间又分成两派：一派代表非黑土地地区的地主的利益，主张在解放农奴时把土地完全分给农民，但是必须由农民拿出巨

款来赎买。另一派是黑土地地区地主的代表，他们希望在解放农奴时尽可能更多地把土地保留在地主手里，以便由地主经营资本主义农业。因此他们主张只允许农民赎一小部分土地，小得不足以养家，以便迫使他们最后到地主的农场上当雇佣劳动者。但是以上几个派别之间不管分歧多大，他们在主要问题上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他们都主张以有利于地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以便在改革中保存地主的经济优势及特权。

因此，围绕改革而进行的主要斗争不是地主内部的斗争，而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农民要求得到全部土地和全部自由，他们不仅要求从农奴身份下解放出来，而且也要求把地主土地无代价地分配给农民。但是在废除农奴制问题上最有利害关系的农民却没有被允许参加改革的准备工作。革命民主主义者支持农民的要求，反对用钱赎买的办法，他们指出：赎买的办法会使农民陷于破产，使他们继续受地主宰割。

政府最初拟出的改革草案是以大地主的要求作为基础的，但是围绕改革而展开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强大压力，迫使政府改变态度，否决了解放农奴而不给土地的草案。

1861年2月19日，沙皇亚力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3月5日颁布了这个法令。法令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实现人身自由，地主不能买卖或交换农奴，地主不能禁止农民结婚，也不能干涉农民的家庭生活。农民有权用自己的名义订立契约，可以从事其他职业，领有动产及不动产，并且用自己的名义打官司。第二，农民可以得到土地，但是必须缴纳赎金，而且土地的估价比实际地价高出两三倍。农民无力马上支付赎金者，可以先付赎金20%至25%，其余由国家代付，由农民分在49年内按年偿还国家（附有利息）。农民为了取得土地而缴纳的赎金，到1905年为止，已达到20亿卢布。农民虽然付出如此高的代价，但是他们所得的是又少又坏的土地，因为地主在改革过程中，把肥沃的、整块的良好田都据为己有。地主往往故意使自己所保留的土地与分给农民的土地互相交错，地主的土地常常楔入农民的土地中，将其分为两部分，其目的是为了为了使农民不得不出高价地租租种地主的这些楔形地。此外，地主还把农民所必需的树林、草地及牧场据为己有。至于农民所分到的土地之多寡，是因地而异的。在黑土壤地区，农民所得的土地很少：在萨马拉州，通过这次改革，农民的耕地比过去减少44%。在非黑土壤地区，农民分到的土地较多，这是因为这里的土地过于贫瘠，没什么使用价值。如在沃洛格达州，农民分得的土地比自己原有土地增加14%。

在改革中全俄每个农民平均分到3.4俄亩的土地。

为了加强对改革后农民的控制，政府把农民组织在旧有的农民村社中，实行连环保。村社在名义上由农民选举公职人员，实行“自治”，但又规定村社隶属于地方行政机构，必须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地主有权否决村社的

任何决议，有权要求撤换村社公职人员，甚至把农民开除出村社。此外还特设了一个由地方贵族产生的调停人，负责处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一切关系，以保障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因此，过去受个别地主支配的农民，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地方贵族的集体权力的支配之下。

1861年的改革，在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一次大规模的掠夺：农民的大量土地和金钱被地主夺去。因此，改革后农民大多数不能经营独立的经济，他们只能向地主租地。为了向地主租地，农民每年必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他们变成“对分农”了。因此，1861年改革后，农奴制残余保存下来。

可见，这次改革远远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因此改革后农民运动并未减少。1861年有1176个庄园农民掀起风潮。农民运动一直持续到1864年。

在1861年改革后，沙皇政府又在其他方面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1864年，在州、县成立地方自治局，自治局的代表由选举产生，除贵族外，资产阶级和农民也可以参加选举。自治局主要是管理地方经济、卫生、教育的机构。自治局处在地主控制下，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只扮演陪衬的角色。1870年在各城市又成立市杜马，杜马的职权也限于纯经济方面。杜马虽然由选举产生，但是选举有财产资格的限制，参加选举的只是房主、工商业企业主和银行家。1864年实行司法改革，实行公开审判，可以在审讯中进行答辩。但是只有贵族及资产阶级分子有资格充当法官和陪审官。实际上，这些改革并没有改变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

但是总的说来，1861年的改革虽然有掠夺农民的性质，但它仍不失为俄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使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因此在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有了较为顺利的发展。

